9400
I25
482

中国穆斯林朝觐纪实

2002200629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穆斯林朝觐纪实

铁维英　李学忠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宁夏日报社报新印刷厂印刷
（银川解放西街1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　字数：188千　插页：2
1994年12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10100册

责任编辑：汤晓芳　封面设计：项玉杰

ISBN7—227—01447—9/B·26　定价：8.00元

珍贵的史料　独特的历程(序)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国内教务部主任

马云福

宁夏友人送来《中国穆斯林朝觐纪实》一书。灯下，翻阅凝集着中国穆斯林风情和作者才智的书稿，深深为历代中国哈吉在朝觐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爱国爱教精神和不畏艰难险阻、虔诚完成天命、沟通中阿文化、传播科学知识、维护人类正义、缔结穆民情谊的种种事迹所感动。

朝觐是伊斯兰教五功之一，是历代中国穆斯林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独特的行进轨迹，非常值得后人去探讨、研究。在虔诚的中国穆斯林心目中，能在有生之年具备条件前去朝觐，不仅是完成自己的宗教功课，而且通过一次难能可贵的跨国界长途旅行，将可以耳闻目睹伊斯兰世界的种种声响景观，并获得“哈吉”这个受人尊崇的称号，这无疑是一桩震憾心灵的人生大事。因而历代有条件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总是竭力整点行装，而亲朋好友也热情给予帮助，促其成行。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哈吉”的称号既反映个人具备一定的宗教品行，也表明他具有比较开阔的眼界。因而，参加朝觐活动对穆斯林来说既有宗教方面的精神价值，也会产生相当的社会影响，所以自古至今，都拥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每到朝觐季节，凡在中国穆斯林聚居的地区，都可以看到送迎“哈吉”的盛大热闹场面。

自 80 年代以来，我一直参与从事组织中国穆斯林赴麦加

DK89/13

朝觐的服务工作，对中国哈吉为完成此项天命的虔诚心情和各种动人事迹深有感受，同时，又很想了解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的情况。但据我所知，在中国史册上，关于朝觐的记载极为罕见，不易寻觅。现在，宁夏社会科学院的两位回族青年学者(其中铁维英还是一位女士)通过5年多的访问、调查和翻阅大量的书籍报刊，在我国穆斯林中青年学者余振贵研究员的悉心指导下，终于把极为分散的史料整理辑录后撰写成一部较完整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史，并用活泼的语言和史话形式，记述了自明代至当今五百多年来中国哈吉们的各种生动、有趣而又令人感奋不已的朝觐故事。其中既有重点描述，又交代了朝觐历史发展脉络，使本书成为了解中国穆斯林朝觐历史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我认为他们的这项成果对深入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包括中国穆斯林的中西交通史、经籍翻译史和经堂教育史有很高价值。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中国穆斯林的经济能力逐渐提高，使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有条件跨出国门实现朝觐并顺便看一看发展中的伊斯兰世界。因此，木书对千千万万当代中国哈吉和从事朝觐管理工作的干部来说，也是一部了解先辈业绩，沟通中国与阿拉伯人民友谊，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的入门读木或常识书籍。

近年来，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关于伊斯兰教的研究成果频频推出，并涌现出一批中青年回族学者，本书即是其中的新人新作之一，这是十分可喜的事。关于中国伊斯兰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个难度很大的课题，需要经过许多人的长期努力，在这里我预祝本书的作者们在继续奋斗中取得新成就，给各族人民奉献出更好的作品。

1994年7月1日

目　录

前言　麦加朝觐　千年盛举……………………（1）

（一）天房历史堪称久远　神奇传闻更添异彩………（5）
（二）朝觐礼仪古有定规　井然有序世代遵循……（17）
（三）宗教精神藉以宏扬　社会活动亦受影响……（34）
（四）了解往事可获知识　提供经验有助现实……（44）

一、哈吉业绩　代有记述……………………（54）

（一）明朝郑和哈吉世家　晋谒天房有碑作证……（54）
（二）清代回回阐述"聚约"　"以儒释伊"著书为据……………………（68）
（三）民国报章重视采访　巡礼消息及时刊载……（80）
（四）群众喜读朝觐见闻　《西行日记》大受欢迎……………………（90）

二、不畏艰险　奔赴圣城……………………（103）

（一）丝路古道万里征程　处处留有哈吉屐痕…（104）
（二）海上行舟千顷波涛　成全心愿何惧颠簸…（114）
（三）远行难免撞凶遇险　受苦遭难举意不变…（124）
（四）面临不测心地坦然　完成天命五功齐全…（133）

三、沟通文化　传播知识 …………………………… (144)
(一)有识之士西行取经　回国传授影响深远 … (145)
(二)阿语典籍成批携入　汉文译著得以丰富 … (154)
(三)负笈求知增长见识　造就一批回族学者 … (162)
(四)爱国爱教奉为宗旨　民族教育大力推进 … (171)
四、遵循天命　维护正义 …………………………… (182)
(一)悲愤交集独行西亚　达浦生游说为抗战 … (183)
(二)争取舆论奔赴中东　"访问团"使命图救国 ……………………………………………… (189)
(三)留埃学子正气凛然　忠奸显形麦加城下 … (201)
(四)中国哈吉齐声呼吁　巴勒斯坦应获和平 … (210)
五、政策开放　情谊发展 …………………………… (218)
(一)万隆会议建立友谊　巡礼之路重新恢复 … (219)
(二)祖国进步政策开放　中阿兄弟日益亲近 … (232)
(三)改革推动经济振兴　自费朝觐方便穆民 … (245)
(四)朝发夕至直飞吉达　中国哈吉倍增豪情 … (258)
后　记 ……………………………………………… (275)

前言　麦加朝觐　千年盛举

一千三百多年来，无论在东起印度尼西亚，西至西班牙，北自中国，南抵非洲之间这片伊斯兰教传播较早的广阔土地上修建的清真寺，还是世界上其它地区新盖的清真寺，不管其外形和内部装修如何呈现多种多样的风格，全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寺里禁设圣坛，禁设雕像，找不到专为尊贵者留出的座位，都有一个用以指示麦加"克尔白"(天房)方向的"米哈拉布"，全世界的穆斯林世世代代就面朝麦加的方向进行礼拜活动。

在数以亿计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各国穆斯林心目中，座落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山区的麦加是伊斯兰伟大和光荣的圣地；克尔白(天房)是真主创造的奇迹，也是真主的权力、威严、宽容和慈惠的象征。据伊斯兰教最尊贵的经典《古兰经》论述：安拉"为世人而创设的最古的清真寺，确是在麦加的那所吉祥的天房、全世界的向导"(第 3 章第 96 节)。接着《古兰经》又明确的向穆斯林作出指示："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第 3 章第 97 节)。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对朝觐作了进一步阐述："众人啊！真主确把朝觐定为你们的主命。你们为真主去朝觐而没有淫乱和作恶，就象刚出世的婴儿一样纯洁无邪；你们如为真主完成几次副朝，罪过定会赦免，虔诚的朝觐定会获得天堂的恩惠"。因此，除了日常礼拜必须面对着麦加方向，赴圣地麦加朝觐同样成为穆斯林宗教生活中的一桩大事，它与念清真言、礼拜、斋戒、交纳天课

等一起被列为伊斯兰教天命(法里则),或五大宗教功课,中国穆斯林简称五功(即念、礼、斋、课、朝)。凡到圣地麦加朝觐过的穆斯林,因他(她)们亲身完成了神圣的天命功课,瞻仰了圣地克尔白,缅怀了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迹,从而坚定了认主独一的信念,净化了心灵,并同世界各国穆斯林会聚,增进了团结和友谊,因此受到人们的尊敬,故在其姓名前冠以"哈吉"的尊称。中国穆斯林习惯将这一称谓列于姓后,以张哈吉、李哈吉尊称之。哈吉亦有译作"哈只"、"罕志",为阿拉伯语"朝觐者"的音译,专用以尊称前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并按教法规定履行了朝觐功课的男女穆斯林。中国穆斯林称"哈吉"有文字可考的记载见于明代的墓志铭。如明代航海家郑和之父及祖父均赴麦加朝觐过,故明永乐三年(1405 年)所立的故马公墓志铭碑载:"哈字(哈吉),姓马氏,世为昆阳人"。其陵墓称为"马哈吉墓"。根据《古兰经》与圣训的教诲,朝觐能否成行必须具备相应条件,也就是说,凡具备条件的男女穆斯林毕生去麦加朝觐一次才算履行了天命。按伊斯兰教法规定,这些条件包括:(一)必须是穆斯林成年男女;(二)身体健康,能履行朝觐的各项功课;年迈体弱者,不能乘车、船或飞机,不能履行朝觐的各项功课则不承担朝觐义务,但可请人代朝;理智不健康的人,也不承担朝觐义务;(三)妇女朝觐必须随同自己的丈夫或至亲(直系血亲)前往;(四)路途安宁,即朝觐者的身体和钱财不会受到任何侵犯;(五)不负债。清初我国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刘智曾在《天方典礼》一书中精炼地概括了上述条件:"《经》曰:穆民必朝,路艰可待。《传》曰:路塞、乏用、无亲邻、废疾,可无朝"。由此,可以看到伊斯兰教朝觐制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相辅相成,它充分考虑到每个穆斯林的实际情况,因而,

古今中外穆斯林对此天命始终奉行如一。民国年间，我国著名回族学者薛文波曾在《月华》杂志上发表了《麦加游》组诗，其首篇"起程"，即表达了中国穆斯林对履行朝觐天命的崇敬心情：

红海滔滔自东流，行人纷纷集渡头。
借问诸君何所向，云是同作麦加游。
麦加回教有年会，迢迢远来五大洲。
世界回民无限制，不论走卒与王侯。

赴麦加朝觐的中国哈吉在履行教法规定的神圣天命功课后，往往要在当地和其它地方瞻仰伊斯兰教的历史遗址和穆罕默德的一些圣迹，并绝大多数要前往麦地那瞻仰穆罕默德的圣陵和参加正朝后另行举办的一系列瞻仰巡游活动。

朝觐的时间，是伊斯兰教历（希吉来历）的 12 月 8 日至 12 月 12 日。因希吉来历属纯阴历，每年只有 354 天多，同公历相差约 11 天。因此朝觐时间按公历计算，每年均有变动，即逐年提前 11 天。

于是，每年伊斯兰教历的 12 月初，即举行一年一度朝觐礼仪的日子里，麦加大清真寺就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近年来的朝觐活动中，每年有大约二三百万人云集这里，麦加顿时成为穆斯林的海洋，你只能从肤色上看出他们属于哪个人种，而不能分出他们属于哪个国家、哪个阶层。虽然他们彼此无法用自己的母语交流情感，但此时，他们却用同一种语言（阿拉伯语）念诵"应召词"（"台勒比叶"），发出气势磅礴的同一个声音："真主啊！我应召来了！我应召来了！我应召来了！惟你独一无二，我应召来了！赞颂确归于你，惟你有恩惠、权威，惟你独一无二！"

麦加大清真寺又称“禁寺”，既有至高无上之意，又有在此地禁绝一切斗殴争讼杀牲之意。在历史上它几经扩修，目前已成为一个可容纳近50万人同时礼拜的大寺，其中心场所是克尔白即天房，它座落在大寺的中央。其四周是两层楼的拱形柱廊和高耸的7座宣礼塔，中间的场地约有一个足球场大小。中央的克尔白是一座高15米、长10米、宽12米的石头建筑，上面覆盖一顶用缎子制作的天房幔帐。克尔白的东南角墙壁上嵌有一块四周镶着10公分宽银框的黑石，传说这是一块宇宙空间飞来的陨石，又称玄石，数千年来名闻遐迩。安放玄石的目的是为了向世人证明这座建筑是显示真主恩威的天房，玄石的安放位置，也标志着朝觐者环游天房时的起点和终点。每年伊斯兰教历12月份，这里逐渐汇聚起二百多万人的朝觐大军。到了礼拜时间，大清真寺内以及寺周围一条条街道上，虽然没有乐队、没有合唱队，但到处听到宣礼员（穆安津）那雄伟、浑厚、肃穆、庄严的男性音调在发出召唤。此刻，在圣地麦加上空回响的这种富有穿透力的礼拜召唤，以其感人心脾的震憾力量，一遍遍撞击着穆斯林们的心灵，使他们深深沉浸在动人音调的狂涛之中，心弛神往、豁然开朗、肃然起敬、如愿以偿。

此时此地，前来朝觐的这二百多万生灵怀着赞颂和崇拜真主及其先知穆罕默德的一致愿望，依照既定的礼仪，以十分虔诚和自我克制的态度团聚到一起。各种身份的穆斯林，从工匠到商贾、从教师到农牧民、从家庭主妇到政府官员，现在已丢开一切自我打算，超脱日常生活的各种纠葛，在一种宗教精神力量引导下融汇在天房周围。这个时刻，无论白种人、黑种人与黄种人，男人与女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与土耳其人，亚洲

人、非洲人与欧洲人，都在一种神圣力量的感召下，穿着朝觐时统一的戒衣，嘴里诵念着同一种阿拉伯语应召词，来到了天房前按教法规定环绕天房巡游七周。

清晨，朝觐的穆斯林在“邦布达”晨礼的宣召声中，迎来黎明；傍晚，他们在“底格尔”的祈祷后，送别太阳慢慢沉入黄沙大漠。此时此刻，他们为了追求人类共同的理想和利益，从世界各个角落汇聚到天房周围，众口一声呼唤安拉至尊至大与永恒，祈求和平与幸福。正是这来自五洲四海的数以百万计的各国穆斯林朝觐者，用自己虔诚的心意和祈祷的双手，于红海之滨荒芜的阿拉伯土地上，在世界面前托举起一个令亿万人瞩目的辉煌的麦加城。由此可见，朝觐这项伊斯兰教重大宗教活动，一千多年来，年复一年地持续进行，其参加人数之众多，礼仪活动场面之壮观，不仅在人类社会活动史上规模是空前的，也是任何一种其它宗教所罕见和望尘莫及的。

(一)天房历史堪称久远　神奇传闻更添异彩

围绕着麦加大清真寺中的克尔白，有种种动人的故事与神奇传说。从外表上看，天房的形状并不奇特，但鉴于它的神奇历史却赋予其超越世界上一切建筑物地位而具有不同凡响的声名。

早在伊斯兰教诞生前，克尔白就是礼拜的场所。穆罕默德幼年时，克尔白曾是信奉多神教的阿拉伯人供奉他们部落和地区所信仰的各种神灵的殿堂，后来被穆罕默德发动的伊斯兰革命将所有偶像一扫而光，但来此朝觐的习俗——纪念真主和圣贤伊卜拉欣，而不再是向多神教的偶像顶礼膜拜——

却被伊斯兰教所吸收，并获得了充实与发展。

关于克尔白的最早修建者，历代伊斯兰教学者们对此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大天使吉卜利勒受安拉之命在麦加山谷率几位天仙建造石房，先把地基挖好，然后由另外几位天仙负责把四周山上的巨石搬来，填进基坑，接着垒起一座四方形的石房，既无门窗又无顶盖，这就是最早的克尔白。有的伊斯兰学者认为克尔白是在阿丹时代修建的。据说阿丹感到孤独时，曾面对满开（即今麦加）向真主祈祷。当阿丹后来到达满开时，真主将天园中的一块红宝石降落人间，红宝石坠落在而今克尔白的位置上，阿丹就一直围绕着宝石巡游。在大洪水降临人间时，那块宝石自动飞升到天上去了。也有的伊斯兰学者认为克尔白是由阿丹夫妇亲自修建的，据说真主曾面谕阿丹和好娲夫妇："去给我修一间房屋吧！"天使吉卜利勒给他们二人画出图样后，阿丹开始挖掘地基，好娲便来运土。当挖到见水时，有人自地下呼唤："阿丹，停止挖掘吧！"。当夫妇俩建好房子时，真主启示他们绕着此屋巡游，并被告知："这是世界第一房，你是人间第一人"。有的传说把这段故事描述得更为具体：阿丹好娲偷食禁果被罚下界后，因日月无光而分别被困于麦加附近，不能团聚。他俩向真主忏悔，真主才让日月重放光辉，使二人相会，后来又让天使吉卜利勒送来帐篷，让他们遮风蔽日。阿丹好娲安定下来后，动手建造了一座石头房子，开始生儿育女，后人把这座房子称为克尔白天房。经过多少世代变迁，到伊卜拉欣时，才加高了该房的地基。还有的伊斯兰学者把克尔白的修建归功于阿丹之子施斯，认为施斯是阿丹最有声望、最优秀的继承人，是他繁衍了整个人类，也是他用泥土和石块修建起了克尔白。

但是几乎所有的伊斯兰学者，都承认伊卜拉欣父子是克尔白具体而真正的修造者。伊卜拉欣出生于伊拉克，从小帮当木匠的父亲制作各种供人们崇拜的偶像，因而对这种迷信活动十分厌恶。有一次，他独自闯进神庙，把所有的小偶像一一砸碎，只剩一个最大的偶像。当人们追问到他时，他指着大偶像说："是它干的，如果这些偶像真有灵性，你们就可以从它那里得到回答"。崇敬拜物教的人们决定把伊卜拉欣投入烈火以作惩罚，他被迫带着妻子萨莱逃往巴勒斯坦，又从那儿逃往埃及。好色的埃及国王抢走了萨莱，但国王从梦里得知她的不寻常来历，便把萨莱送还伊卜拉欣，赠给他们许多礼物和一名叫哈吉尔的女奴。当时萨莱没有生儿子，而哈吉尔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伊斯玛仪。萨莱妒嫉哈吉尔母子，逼迫伊卜拉欣把他们送往当时没有人烟的荒凉山谷——麦加。那时天房的所在地是一个小红石坡。不久，母子二人的粮食和水快用完了，哈吉尔便外出找水，在萨法和麦尔卧两座小山之间来回奔跑，等她跑了七趟回到伊斯玛仪身边时，发现伊斯玛仪因干渴啼哭正用脚蹦地。忽然，一股清泉从地下喷涌而出，据说这口泉是大天使吉卜利勒暗中为他们掘开的，母子俩获水得救，并在这里定居下来，这口泉就是天房附近著名的"赞目赞目"泉，也称"渗渗泉"。后来奔赴麦加朝觐的一代代穆斯林，就把在萨法和麦尔卧两座小山之间奔走七次及饮用渗渗泉水，作为纪念伊斯兰教先贤和感恩真主的一项重要朝觐礼仪。

不久，朱尔胡姆部落途经此地，见到鸟儿在山谷上空飞翔，知道附近定有水源，就请求哈吉尔允许他们留居。很快，伊斯玛仪在朱尔胡姆部落长成为一个健硕的男子汉，学会了阿拉伯语，成了家，而原先荒芜的山谷因为有了水和生气，渐渐

得到了开发利用。许多年后，伊卜拉欣来此看望儿子，受到素未谋面的儿媳妇的热情接待。她将奶和肉食端到了马前，伊卜拉欣为她祝福。她又从家里搬出一块石头，放在马的一侧，伊卜拉欣从马背上将身子一歪，右脚离蹬站在石头上，让她给梳了梳头发。她又把石头移到伊卜拉欣的左脚下面，再次给伊卜拉欣梳了头擦上油。结果石头上留下伊卜拉欣一左一右两个深深的脚印，他让儿媳收起这块石头，说将来会有用的。据说以后伊卜拉欣建造天房时，曾踩在这块石头上砌筑屋墙。

当伊斯玛仪 30 岁时，伊卜拉欣奉安拉之命再次来到麦加，和儿子一起修建克尔白，父亲垒墙，儿子递石块。此时，虽然原先由阿丹等人修建过的克尔白已杳无踪迹，但安拉却授意天仙设法将其旧址指示给伊卜拉欣父子，因此当他们在挖掘一个土墩时，在他们眼前突然出现了消失于古代的克尔白房基，因此新建的天房就座落在这个克尔白原址上。当房子高度增加，伊卜拉欣举不上石头时，他就站在过去曾留有脚印的那块石头上。如今，在麦加大清真寺的天房旁边还保存有伊卜拉欣立足的遗址。当伊卜拉欣父子完成了安拉命令他们修建的天房时，安拉又指示他们向世人宣布，天房是人们朝觐的对象。伊卜拉欣父子在修建克尔白快竣工时，还差一块石头就可合拢，伊斯玛仪搬来一块准备填上，却发现不知何时已经有一块石头砌在那个屋角上了，只见这块石头黑里透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光溜溜的表面上还有黄红色斑纹。伊斯兰学者们认为，那块石头出现在这里是安拉的旨意，有人相信是大天使吉卜利勒送来的，它是一块陨石，过去在天上发过光，曾经光芒四射，照亮过东西南北各个方向。天房上砌有这块受人尊敬的神圣之石，是为了表明天房并非伊卜拉欣父子私有之物，而是

显示真主恩威的象征，因此天房成为后人祈祷的场所，成为一切穆斯林巡游者、修行者、跪拜者、鞠躬者的尊敬对象。黑色玄石置放在靠近天房大门的一隅，成为天房最早的边界，巡游天房的人都以此为起点，所以黑石既受到伊卜拉欣父子的尊崇，也被以后历代穆斯林视为圣迹。由于伊斯兰教是从根本上反对任何偶像崇拜的，为了消除后人们对玄石进行崇拜的偏见，穆罕默德曾站在这块黑石前宣布："我知道你是一块石头，无害亦无益"。然后亲吻了玄石，表示并不崇拜这块黑石，只是向它表示敬意，以此作为同伊斯兰教先贤联系的象征。第一任哈里发艾卜·伯克尔朝觐时站在玄石旁说："我知道你是一块石头，既不能给人灾祸又不能给人福利。若不是我见到真主的使者亲吻你，我是不会亲吻你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也曾作过类似的表示。沙特政府编发的著作中曾作过这样的解释："穆斯林决不是崇拜玄石。他们吻它或抚摸它是因为大家知道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这样做过。他们由此与先知建立一种联系。先知这么做是因为玄石是他自己与伊卜拉欣之间的一种联系物。"

克尔白建成后，伊卜拉欣告别了儿子返回埃及，其子伊斯玛仪继承父亲忠实可靠的秉性，成为一神教事业的倡导者，后来被尊称为圣人之父，据说伊斯兰教的圣人都奉命跟随他的脚印。不久，麦加随着朝觐天房者的增加而发展成山谷中的一个狭长城市，最宽处约有 700 米，最窄处还不足百米。后来赴天房朝觐者越来越多，麦加的发展也随之加快。当时阿拉伯各部落间战争频繁，为了保证各地的阿拉伯人和其他地区的教众，包括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以及各种多神教徒和基督教徒，有充分的时间平安抵达麦加，朝觐的季节曾规定为 3 个

月。在朝觐期内，允许在麦加经商、开展赛诗活动，禁止打仗，也不许杀生，故又称朝觐期为禁月。因此，早在伊斯兰教诞生前，拥有克尔白的麦加已成为阿拉伯半岛一个重要的宗教、商业和文化的活动中心，而当时的克尔白，经过漫长的时代变迁和多次改建，实际上变成一个供奉着众多偶像的庙堂。

据较可靠的历史记载，公元七世纪初的克尔白约高7米，没有屋顶，很容易被窃贼偷走供品，也容易受到山洪冲击，而且确实有几次被洪水冲毁过墙基。先知穆罕默德年轻时，麦加的古莱氏部落首领们准备重修克尔白，这时从地穴里爬出一条巨蟒，盘绕在克尔白的墙头上，人们无法走近。几天后，空中突然俯冲下一头巨鹰把蟒叼走，于是人们得到启示，认为这是真主鼓励人们修复天房原样。当重修工作进行到安放玄石的时候，人们又发生了分歧：参加修建的各部落头人都争着由自己去安放，以图吉祥。眼看头人们横眉怒目、剑拔弩张，只见年轻的先知穆罕默德走到中间，把玄石放在一件阿拉伯衣袍上，然后让各部落的头人一块提起袍子，共同把玄石抬到克尔白的东南角，然后由先知穆罕默德把它摆平砌好。从而解决了刚才的难题，使众人都感到满意。克尔白经过这次重修，高度增加一倍，加上了屋顶，房子里矗起六根大柱，分列成两排。同时，门槛也被加高，并砌了台阶。先知穆罕默德对安放玄石的妥善处置，提高了他在各部落群众中的声望，为传播伊斯兰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麦加城一度是阿拉伯地区偶像崇拜的中心，有360个偶像陈列在克尔白内，当时居民们处于愚昧状态之中，连环绕克尔白的礼仪也十分不雅。因此，当伊斯兰教创立之初，最早的一批穆斯林礼拜的朝向，是面对北方的圣城耶路撒冷。只

有当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622年(伊斯兰教历元年),率领教众们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后的次年,即伊斯兰教历的第二年,穆斯林才重新将麦加的克尔白作为礼拜的朝向。公元630年(伊斯兰教历第8年),先知穆罕默德兵临麦加城下;麦加民众感悟到伊斯兰教的巨大威力,故没有抵抗而敞开城门。在古莱氏族首领阿布·苏富扬宣布皈依伊斯兰教后,先知穆罕默德进入麦加,开始了伊斯兰教的一个新时代。先知穆罕默德骑着高大的骆驼率先来到克尔白,绕天房环行7周,用手杖触摸玄石,并亲自下令捣毁克尔白内的多神教偶像。据说他亲自砸掉了一只悬在天房顶上的木雕鸽。他一边用手杖击倒这些偶像,一边朗诵着《古兰经》文:"真理来临了,虚妄已消灭了;虚妄确是易灭的"(第17章第81节)。

公元631年(伊斯兰教历第9年),先知穆罕默德委派艾卜·伯克尔前往天房朝觐,并由自己女婿,即后来的第四任哈里发阿里朗诵了《古兰经》中的"忏悔章",并向世人宣告今后再也不允许多神教徒再到麦加来朝觐。第二年,即公元632年3月(伊历10月)先知穆罕默德换了戒衣,从麦地那出发,率领10万穆斯林进行了伊斯兰教历第10年的朝觐。朝觐路途中万众欢腾,齐声欢呼:"真主啊!我应召来了!我应召来了!我应召来了!惟你独一无二,我应召来了!赞颂确归于你,惟你有恩惠、权威,惟你独一无二!"穆斯林们的祈祷声越过沙漠,跨过河谷,河谷、沙漠好像也在同穆斯林们一起发出向安拉祈祷的回声。以后一千多年中,在逐年递增的朝觐行列中,上述赞词一直在朝觐礼仪中被袭用。穆罕默德率队绕行天房7周,前3周是跑着绕的,亲吻了黑石,在伊卜拉欣踏脚石前礼两拜,饮了渗渗泉水,然后在萨法和麦尔卧两座小山之间来

回奔走7次。当晚抵达米那，次日礼拜后，骑着骆驼在阿拉法特山下的盛典上发表了内容极其重要的演讲。他强调了伊斯兰教的"一神论"认主学思想："万赞统归安拉，我们赞颂安拉"，"除安拉之外，别无他主，安拉是独一无偶的"。接着宣布蒙昧时代的高利贷一律废除。然后，对财产继承、宗教礼仪制度等有关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穆斯林基本道德和相互关系等重大问题一一发表了看法。在演讲的最后，先知穆罕默德满怀深情地对穆斯林们说："众人们，你们要领会我的话。我已经传谕了我要传谕的话。你们只要记住我的话，就永远不会误入歧途，我已把安拉的真经及安拉使者的教诲留给了你们。众人们，要听取我的话，你们要懂得，穆斯林都是兄弟。穆斯林兄弟不能把自己所不喜欢的事强加给穆斯林兄弟"。先知穆罕默德在结束演讲时，大声呼吁："安拉啊，我已传谕了我所应传谕的事了吗？"人们从四面八方回答说："是的。"穆罕默德说："安拉啊，请你作证。"作完演讲后，先知穆罕默德宣读了真主降予他的最后一段默示："今天，不得道的人，对于(消灭)你们的宗教已经绝望了，故你们不要畏惧他们，你们当畏惧我。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教做你们的宗教"(第5章第3节)。艾卜·伯克尔听了先知穆罕默德的讲演后哭了，因为他感悟到，先知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离归真的日子已不久了。先知穆罕默德离开阿拉法特山后，当晚住在穆兹达利法并作宵礼，次日清晨作完晨礼，骑骆驼来到米那山谷，向三根立柱各投掷石子7粒。回麦加后，又宰杀了63峰骆驼献牲，当年他63岁，这意味着他每活一年献一峰骆驼，让阿里把骆驼肉与皮分发给穷人。最后先知剃了头，从而履行了全部朝觐仪式。后人把这次朝觐称为告

别朝觐，是因为这是先知穆罕默德最后一次来麦加和天房；有人称之为伊斯兰朝觐，是因为安拉在这次完美了伊斯兰教，完成了他对穆斯林们的恩典；也有人称之为传谕朝觐，是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向朝觐者们传谕了安拉令其传谕的事情，从而载入史册。

在这次大规模朝觐活动中，没有一个多神教徒参加，这样，克尔白与禁寺成了穆斯林独有的一座圣洁的大寺。穆罕默德率众进行的朝觐仪式，成为后来穆斯林朝觐时的正式仪式。

先知穆罕默德于公元 632 年 6 月去世后，克尔白又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修缮和扩建。历任哈里发，都十分重视与维护克尔白。欧麦尔任哈里发时，出钱购置搭盖在克尔白周围的民居，予以拆迁，扩大了禁寺的面积，并砌矮墙一道，在墙上安有照明灯盏。到奥斯曼任哈里发时，又扩大了天房周围的空间，修建了回廊予以保护。公元 683 年，天房被一场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圣妻阿依莎及其外甥阿卜杜拉·祖拜尔主持了重建和扩建工程，将大门改为一进一出的两扇门，屋高达到现在的 15 米，把原有天房西北角的矮围墙内设为禁地，又在天房四周砌起围墙，并把原来的走廊予以扩大并竖起大理石柱。她第一次用绸缎制作天房的帷幔，取代早先的粗布和皮革帷幔。倭马亚王朝时的哈里发阿卜德·马利克重修克尔白时，曾再度加高围墙。到瓦利德任哈里发时，又花 3.6 万第纳尔金币，为克尔白的门、水管和柱廊镶嵌上了金子，用白色和绿色的大理石铺砌地面，还用大理石从天房里面衬砌四周的墙壁，并多次扩大整个清真寺的面积。阿巴斯王朝时，在麦加与麦地那、也门和伊拉克之间，修建了道路和驿站，为朝觐者提供方便，并多次加固和修复天房。哈里发艾敏继位后，专门花了 1.8 万第

纳尔金币，为天房镶嵌上金门，连门钉和门环都用金子制成，总共耗金3.3万密斯格尔(一密斯格尔等于4.68克)，约合160公斤。公元1540年，克尔白在暴雨中冲毁，当时的执政者重建天房，扩大了规模，但保留了罕加吉时代所建造的克尔白的格局和样式。19世纪初，麦加曾连续两天两夜受到山洪冲击，天房三面墙壁被冲蚀。当时的埃及总督立即派出埃及工程技术人员前去抢险，用了6个月时间完全修复。鉴于玄石周围受冲蚀较严重，工匠们就把玄石镶在宽约10公分的一圈银框中。

历代人们为了表示对天房的敬仰和尊重，都曾为天房制作特别的罩子加以保护，又称帷幔。围绕克尔白帷幔的制作，历史上有许多有趣的传说。据传闻，为天房制作罩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伊斯玛仪时代，但历史学家们较普遍的看法是在伊斯兰教历前两个世纪，由也门国王艾巴·克尔卜·艾斯尔德·土白尔第一个给克尔白做了罩子。罩子用一种叫“赫苏福”的椰枣叶编织的厚布制成。以后，面料质量逐渐提高，由厚变薄，由粗变细，而颜色则各种各样。到古莱氏族控制麦加时代，每年给天房换一次罩子。先知穆罕默德攻克麦加后，他和他的第一位继承人艾卜·伯克尔选用也门出产的布料制成天房罩。到了欧麦尔和奥斯曼先后任哈里发时，采用了埃及纺织的一种名叫“古巴图”的白色细料为罩子。到穆阿维叶时代，则一年中先后使用绸缎和毛织两种质地的天房罩。早先，旧的罩子并不取下，到公元776年阿巴斯王朝时期，统治者马赫迪·阿巴斯去朝觐时，看守天房的人告诉他，克尔白的罩子逐年增多超重，影响天房的安全，于是他下令换下旧罩，并规定一次只罩一块新的。到阿巴斯王朝的第七任继承人麦蒙时代，改为

每年为克尔白更换3次罩子：第一次在伊斯兰教历的7月罩上毛织罩；第二次在“莱麦丹”月第29天换成白绸缎罩；第三次在伊斯兰教历12月8日饮驼日时换成红缎罩。统治者纳赛尔·阿巴斯将天房罩制成绿色，后又换成白色布罩并保持很久。在整个阿巴斯王朝时期，人们都十分重视克尔白罩子的制作技术，除继承前人传下来的工艺外，在编织、染色、刺绣、镀金、镀银等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创新。后来阿巴斯王朝崩溃后，由埃及国王扎希尔·比比里斯为克尔白制作罩子。至公元1240年，又由也门国王蒙孜法尔承担此项重任。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执政时期，制作克尔白天房罩子又由埃及担任，全部费用由国家支付。土耳其和奥斯曼后裔中的掌权者们特别为天房内部提供帐子，即内部四周墙壁挂着的帐子，并将此视为荣耀。

标准的天房罩由8块黑丝绸缀成，上面绣着阿拉伯文“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每一块丝绸的长度约为15米，两块正好挂于方形天房的一面，用坚固的铁环挂在天房顶部，然后用扣子将两块绸子连在一起，下端再用若干金砂环固定。据闻，埃及制作天房罩起初是在达米埃塔北部坦尼斯城的一个著名纺织厂内，除制天房罩子，该厂还定制天房内的帐子和装天房门钥匙的袋子。在埃及每当伊斯兰教历11月中旬开始向麦加运送天房罩时，都要举行盛大庆典，埃及国王或他的代表亲自莅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古城堡广场步行到侯赛因清真寺，在此地把天房罩子卷起来装进箱子，而后护送上船驶向红海。到麦加后，交给看守天房的长老。长老将丝罩存放在家里，直至宰牲节早晨，人们将丝罩运至天房，换下旧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虽然英国占领了埃及，但运

送天房罩的工作未曾中断。只是1924年阿卜杜·阿齐兹·阿勒沙特统治麦加后，由于战争和埃及国内动荡，才改由伊拉克做天房罩子。1928年沙特政府在麦加建立了制作天房罩子的工厂，延续10年之久，但由于种种原因，1937年起仍交由埃及制作。1962年在阿卜杜·阿齐兹国王时代，制作天房罩子又由沙特王国1928年建的那座工厂承担。1977年沙特在麦加的翁姆兆德开辟了一个新的制作基地，增加了机器设备并保持原手工生产中带有较高技巧的部分，制作工艺不断改进。

目前的天房罩子是用黑色颜料漂染的纯丝制成，并通过轧花机轧上伊斯兰风格的花纹和阿拉伯文字组成的图案，如"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慈悯的、大恩大德的真主啊！"等等。这些基础花纹和图案与丝罩同一颜色并布满丝罩。丝罩高14米，在三分之一高处，环绣有一条90厘米宽的带子，上绣《古兰经》文，如"奉大仁大慈的真主之名"、"凡能旅行到天房的，人人都有为真主而朝觐天房的义务"(第3章第97节)、"在朝觐中当戒除淫辞、恶言与争辩。凡你们所行的善功真主都是知道的"(第2章第197节)等等。上述经文均用三一体的阿拉伯文大楷书写，字周围绣有伊斯兰教风格的花纹，然后沿着每一字的笔画用银线和镀金线进行堆绣，使经文凸起2厘米高。带子全长47米，由16块丝织布组成。在带子下面每一角均绣以《古兰经》中"忠诚章"文字组成的圆形图案，周围饰以方形的伊斯兰花纹，构成了一个内圆外方的美丽图案。带子下端还绣有6段《古兰经》文，分别绣在一些装饰性边框花纹内，而每个边框花纹间又缀有阿拉伯灯盏形状的图案，绣着一些赞主赞圣经文。至于天房大门的挂帘也用同样黑色丝绸制作，高6.5米，宽3.5米，上面也绣有《古兰经》文和伊斯兰风格的花

纹。因此，天房罩子实际分为五大块，即四面各一块加上天房门的一块，所用丝绸原料全系进口，共用丝 450 公斤，织成丝绸后为 658 平方米。据悉，生产一顶天房罩子共需 1700 万里亚尔，约合 450 万美元。天房内部张挂的丝绸帐子，则用绿色绸缎做成，缀以手绣《古兰经》文和清真言，并绣有各种精美的伊斯兰风格的图案，1982 年后由麦加本地生产。

每年替换下来的天房罩布，现在都裁剪成小块分赠给一些有代表性的朝觐者。谁能得到一块天房罩布，周围的穆斯林都会前来瞻仰，认为是十分吉祥荣幸的事。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著名的纳家户清真寺中，就有中国哈吉朝觐携回的一块天房罩布，装入镜框挂在阿訇住的上房，被当地回族同胞视为珍宝。

（二）朝觐礼仪古有定规　井然有序世代遵循

伊斯兰教是一种既重视后世寄托，也重视人生现实的宗教，因此伊斯兰教的功修，不光是穆斯林顺从真主安拉的表示，也是信众们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基本锻炼。在连续多天的朝觐中，穆斯林要履行一系列规定的、有时很艰苦的仪式，并且在许多场合下要徒步行走。当朝觐季节刚好是盛夏的月份，朝觐者就得忍受烈日炙烤和酷暑煎熬，这对体弱者和老年人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人生考验。因此，朝觐作为伊斯兰教五项功课之一，无论从其仪式的庄重严谨，或安排的紧密有序而言，都反映出为使穆斯林探原返本，磨炼他们意志和坚定他们信仰的明确目的。

根据伊斯兰教法的要求，要完成朝觐这项宗教功课，到麦

加的朝觐者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内履行完规定的宗教仪式。根据《古兰经》第2章第197节教诲:"朝觐的月份,是几个可知的月份。凡在这几个月份内决计朝觐的人,在朝觐中当戒除淫辞、恶言和争辩。凡你们所行的善功,真主都是知道的。你们当以敬畏作旅费,因为最好的旅费便是敬畏。"自朝觐者踏上旅途起,他们为履行朝觐的神圣仪式而作准备的洗涤灵魂的过程即算开始。按照《古兰经》的规定,朝觐者在旅途中不得行房事、不得骂人、不得说下流话或做猥亵事,并禁止在朝觐时捕杀动物。限制狩猎据说是为了强调朝觐是一个与真主创造的万物和睦相处的时期,也是考验他们在长途跋涉中的自我约束,如果违背这条禁令,此人必须带一头价值与他杀死的动物相等的家畜作为祭品到克尔白或通过斋戒向穷人施舍食物来赎罪。在过去漫长的年代里,朝觐是阿拉伯民族和其他民族穆斯林的一次陆上长途跋涉,《古兰经》中的不少规定都是有针对性的。今天,大多数朝觐者都是坐飞机或海轮抵达红海边的吉达再坐汽车转道麦加的,但《古兰经》中关于朝觐的基本规定仍然受到大家的严格执行。

依据伊斯兰教中影响最大的哈奈菲教法学派的有关朝觐仪式和程序的解说,朝觐有正朝与副朝两种。正朝(罕志)属于主命,即凡有能力的成年男女穆斯林,在有生之年及时朝觐一次。正朝的时间一般应在伊斯兰教历的12月的前十天内进行(其内容包括在克尔白巡游和在麦加以外的其它活动)。副朝(欧目赖)属于圣行,每个穆斯林在完成正朝功课的前提下,一年中任何时间都可以履行副朝的功课(主要是受戒和环游克尔白天房,不住米纳和阿拉法特)。但在伊历12月9日至13日的5天正朝功课中,不宜履行副朝,否则算可憎行为(买克

鲁海)。副朝，以斋月去为贵重。

正朝又分单朝、连朝、享受朝三种形式，朝觐者可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不同的选择。单朝(伊夫拉德)是指专作正式的天命朝不连带其它副朝；连朝(格拉尼)是指副朝同天命朝连在一起进行，受戒副朝后不开戒直到将天命朝的全部功课完成为止；享受朝(台曼吐尔)，又称分朝。是指先单独进行副朝后开戒，等到规定的正朝时间再行受戒，举行天命朝。目前我国去朝觐的穆斯林由于受旅程影响，多选择享受朝，即先受戒举行副朝，然后开戒，等到正朝时再次受戒举行正朝。但也有的中国穆斯林选择连朝。

按伊斯兰教法规定，朝觐功课可分两类。第一类属主命(法里则——鲁坤)，包括三大要素：1、受戒；2、在阿拉法特驻一日；3、环游天房(12 月 10 日)。第二类属当然义务(瓦直卜)，包括五方面：1、在穆兹台里法停留；2、在萨法与麦尔卧之间奔走；3、射石；4、外地朝觐者辞朝(离别前环游天房)；5、剪发开戒。上述功课都不得随意放弃，如未完成"主命"的，其朝觐功课即被破坏而徒劳往返；如缺漏"当然义务"的，要纳罚赎或斋戒。除上述"主命"或"当然义务"之外的礼仪，如到达麦加时的首次环游天房，就属圣行。

根据中国哈吉朝觐的实际情况，朝觐(正朝)的仪式大致如下：

(一)受戒。在进入圣地麦加之前，各国朝觐者都必须在规定的戒关受戒。中国朝觐者近年来乘坐飞机，从北京经沙迦直飞吉达，在沙迦上飞机前受戒即可；为了使朝觐者更加方便，从 1993 年起一部分哈吉到吉达后先去麦地那瞻仰圣陵和其它伊斯兰古迹，因此可以在离开麦地那前往麦加的途中戒关

受戒。有少数哈吉因故不能乘坐中国民航包机者可在所在国前往麦加的戒关受戒。受戒的内容是:(1)举意,即立意为朝觐受戒,念:“真主啊,我立意去朝觐,求主使我顺利易行,请你承领我的功课吧!”(2)进行大净或小净。(3)更衣,即脱去日常服装,男性应披一块未经缝过的白布或白毛巾被,下身则应围一块3尺×7尺的白布,赤足或穿未经缝过的拖鞋,不许戴头巾或帽子,不穿袜子;妇女穿平时服装,不蒙面,不艳装,不裸足。(4)穿戒衣后礼两拜受戒副功拜。此后朗诵应召词(台勒比叶),即“真主啊!我应召来了!我应召来了!我应召来了!惟你独一无二,我应召来了!赞颂确归于你,惟你有恩惠、权威,惟你独一无二!”从念应召词开始,即算进入受戒状态,要遵守以下限制:禁止打猎杀生,虽蚊蝇、蚂蚁也不能杀;不准理发、剃胡须,拔除或剃去任何毛发,不能剪指甲,不得与人争吵或斗殴;不得砍伐或拔除禁地的花木;不得戴帽或遮盖头顶;不得使用香料。凡违背上述戒规者均要根据教法规定按不同程度进行罚赎。

(二)瞻礼。进入麦加后,可稍事休息即去禁寺(哈兰)瞻礼。进入禁寺门等于上礼拜殿,所以应该持有小净和脱去拖鞋。进来后看到克尔白时即应念赞主词和其他祈祷词,然后朝向黑石部位举起双手高念赞词。人少时,可上前亲吻黑石,否则可自吻己手沾吉。

(三)转天房。无论天命朝或副朝等转天房的方式都是一样的。第一步是禁寺巡礼,在阿拉伯语中称为“塔瓦夫”,即朝觐者汇成一股股人流,涌进禁寺的广场中央,挤入天房周围的环形走道,跟随向导或带领人由天房东南角的黑石方向起,按逆时针方向环绕天房七周,边走边念赞词,每转一周所念的不

尽相同。不会念者跟随向导一句一句地念。会念的人尽量往前站，不会念的人也可自行念会念的祈祷词，如清真言，作证言及一些赞词等。如果人少，前三圈应快步走，后四圈用正常步伐走，但人多时只能顺序而行。环游时既要精神振奋，也要前后呼应，尤其照顾好老年人，特别要防止因人多拥挤而走失。有的国家针对人多拥挤这一情况，在专门编写的《哈吉手册》中建议说："当千千万万人集合在一起时，出现互相冲撞和某种混乱场面是很自然的。要尽最大努力来履行仪式，要镇定地、安静地移动步子……先知穆罕默德教导我们，在哈吉仪式中要保持镇定和安静。"这些话是很正确的。环游时每次转经黑石时，都要致意，高念赞词。在天房门与黑石之间的地方叫"穆洛台再木"，意思是祈祷必准之处，经过这里也要多念祈祷赞词，环游七圈后巡礼仪式在黑石方向结束。随即进行第二步，到一间圆顶的六面体小亭阁前，也就是伊卜拉欣立足之处，礼两拜嘉懿圣行拜。如人多不能到此地，可随意在禁寺场内就地礼拜，拜时必须朝向天房。第三步是在萨法与麦尔卧之间奔走，在一个奔走大厅内分上下道进行。环游天房后，先登上萨法山高处，面向天房致意念祷词，从这里开始奔向麦尔卧山，这样来回奔走 7 次，以纪念当年哈吉尔为了寻水救伊斯玛仪在此来回奔走 7 次的事迹。两山中间有一段是在绿色路标之间行进，这段路要求疾行，其余可按常速步行，但要接踵而行。奔走结束时，要登上麦尔卧山高处，面向天房致意，并连续念祷词。在紧张尊贵的环游和奔走功课暂告一个段落后，朝觐者争先恐后涌向"赞目赞目"泉饮水处，品尝几杯清凉佳美的泉水，并给远方的亲人带回一壶泉水。按礼仪，喝泉水时要先面向天房方向，念"奉真主之命"，喝的中间要歇气 3 次，然

后诵念"真主啊!给我有益的知识,供我丰富的食禄,治疗我所有的病痛"。有的还不断念诵《古兰经》文,意在追念人类远祖,表示饮水不忘掘井人,同时也对远祖与困难进行斗争的精神表示钦佩。按享受朝先履行副朝功课的中国朝觐者在上述功课结束后即可首次开戒,按常规驻居麦加,等到天命朝时再受戒并重新进行转天房。

(四)**驻阿拉法特**。伊历12月9日是阿拉法特日,朝觐者应到位于麦加东南方25公里的阿拉法特地区住一天,也就是12月8日,朝觐者必须离开麦加进驻米纳(距麦加约7公里),米纳山谷中有一座历史悠久的海夫清真寺,当晚在米纳过夜,按哈乃菲教法视为当然。次日由米纳去阿拉法特站留一天是朝觐的基础(鲁砷),任何一位朝觐者未去阿拉法特站留的,其天命朝觐徒劳无效,因此这项功课十分关键。"阿拉法特"意为认识。相传那一天为人祖阿丹与好娲在天国被贬后,在人间重会相识之日,意味着人类之间的相会结识。朝觐者在这里举行隆重的仪式,一方面纪念阿丹好娲的团聚,另一方面纪念先知穆罕默德在这里发表了一生中最后的一次演说。因此这一天节日气氛浓厚,当属朝觐高潮。在阿拉法特停留期间,主要是念经、礼拜,这一日晌礼时间,要将晌礼和晡礼并礼,即念一个宣礼词(邦克)、两个齐班词(伊戈买特),其礼拜地点据说就是当年先知穆罕默德最后一次朝觐时的"告别演讲"平原。这时候,数百万朝觐者一个个面朝克尔白天房方向站立祈祷,不分年龄、不分国别、不分肤色、不分地位高低、不分贫富,用同一个声音祈祷、礼拜,场面蔚为壮观。午后,由主持礼拜的大伊玛目登上山顶,作布道演说和赞念真主。另外,在停留期间,朝觐者还可上赖哈麦特山(阿拉法特山区最高

点)眺望，如果人多拥挤，也可不去。据有的国家所编的《哈吉手册》所说："阿拉法特日是兴奋、敬畏、赞颂和知觉的一日。这一日，我们的至仁至慈的安拉在上天显示他的光辉，在他的众天使面前为地上的人感到自豪，使他们亲眼看到他赐予他的崇拜者以宽恕和欢迎。这是至仁的安拉赐予朝觐者的最大款待和最珍贵的报酬。在阿拉法特平原巨大的广场上，人们热泪流淌，那些请求真主宽恕并对过去的错误作了诚恳忏悔的人，纠正了他们的错误，洗涤了他们的罪孽，矫正了他们的过失。能在这一特别的日子里得到安拉宽恕和喜欢的人是多么幸福。这就是先知穆罕默德为什么要说'朝觐就是阿拉法特'的原因。"

在阿拉法特停留至黄昏后起身返回米纳，途中在穆兹台里法停留一夜，在这里要于宵礼时间内将昏礼和宵礼两次拜功并礼，念一个宣礼词，一个齐班词即可。当晚露宿在这里，趁空闲休息时机，可拣一些小石子，越小越好，一般可拣 49 颗至 70 颗备用。

(五)进行射石和宰牲。伊历 12 月 10 日是宰牲节，黎明前由穆兹台里法返回米纳后，要先去阿格白射石场射石，每射一次要念"安拉乎艾克拜尔"(真主至大)一次，随即停念应召词，意味着进入了开戒。射石打鬼仪式是纪念伊卜拉欣在此曾用石头投击并赶走诱惑的魔鬼，也是为了保护朝觐者在朝觐期间或成了哈吉以后，不被恶魔诱人歧途。据载伊卜拉欣为了表示信主真诚，决心牺牲自己的儿子伊斯玛仪，但受到魔鬼的阻挠，伊卜拉欣在去米纳的路上投石逐鬼，终于把魔鬼击退，然后去宰自己的儿子献祭。安拉看到伊卜拉欣的真诚，于是赐他黑头白羊以代替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宰牲节的来历。米纳山有

大中小三处石柱，朝觐者个个仿效当年伊卜拉欣和穆罕默德两位先知驱鬼投石的行动行射石礼，依次向3根石柱投掷7颗石子。按哈乃非派教法的规定，由阿拉法特回来后住米纳3天为圣行，而射石打鬼（每天一次，每根石柱射7次，共三天，最低为二天），定为当然（瓦直卜）。10日那天射石要首先打大石柱，11日或12日射石要依次打小、中、大石柱。现在沙特政府稍微扩大了代表恶魔的石柱，并建筑了一座巨大的立交桥完全围住了它。而石柱本身挺立在中央未被覆盖。无论从立体高桥还是桥下平地投石，都是合乎规定的。

紧接着这个仪式的是献牲，通常是一头山羊或绵羊，中国的哈吉常用交款代宰方式献牲。在这一天，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各家各户都仿效米纳献牲仪式宰羊，一部分羊肉在家宴上吃，另一部分散给亲邻或穷人。在米纳献牲后，男朝觐者要剃头，女朝觐者要剪发，并都要修剪一次指甲，朝觐者可以换穿通常的服装和进行除房事外的一切活动。特别应该注意的是，从阿拉法特回到米纳的第一天宰牲开戒后，当日要回到麦加环游天房7圈，第二天、第三天亦可，但第三天要在太阳落山前，这次环游为"法里则"（主命），否则全部朝觐无效。

（六）辞朝。朝觐者完成朝觐的全部功课后，在离开麦加前，去转天房辞朝，也称离别朝，在教法上定为当然（瓦直卜），如果做过辞朝功课，但未离开麦加，仍须在临行前再作一次辞朝。条件允许时可与天房门坎接吻，抚摸天房罩，倒退出寺门离去，以示留恋。

由于非穆斯林是不得进入麦加的，因此在过去的许多世纪里，麦加朝觐活动对于教外人士来说是一件神秘的事情，但是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都可以详尽地看到了，因为主要仪式都

通过电视向穆斯林国家转播，沙特国家广播电台还为电视转播配上英文解说词。同时，沙特新闻部还提供介绍各种仪式的录像带、幻灯片或图片册。

参加朝觐的各国哈吉在麦加逗留期间。往往在完成天命功课之余，抽暇去拜访瞻仰当地的伊斯兰教历史遗址和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些圣迹，以缅怀先贤，净化心灵，坚定自己的信仰。哈吉们常去的几处地方主要是先知穆罕默德的降生地、希拉洞、白拉尔或叫希拉尔（月亮）的一所清真寺、阿伊莎清真寺、镇尼清真寺、拉叶（旗帜）清真寺、木哈拉区先知隐匿的街道、圣后赫蒂彻的住所和陵园及赛维尔山。

先知降生的房子位于麦加城艾布库巴易司山脚下，夸沙希阿区的苏克拉易尔大街上，虽然1400年前的建筑已不存在，但现有的房子仍然精确地盖在先知的父亲嘉纳卜·阿布杜拉住屋的原地址上。据历史学家推究，公元571年4月27日，先知穆罕默德就诞生于此地。从克尔白所在的大清真寺靠近赛法山丘的任何一扇大门出来，向右手沿谷地的房屋走500米，你就可以找到这所房子。

希拉洞在麦加城外大约3公里的地方，位于一座高约几百米的努尔山山顶上。先知穆罕默德41岁时，他开始独处，有许多夜晚在希拉山洞里继续沉思和祈祷，终于在赖麦丹月的某一个神圣的夜里，真主安拉将《古兰经》最初的一些章节传喻到了他纯洁的心上。大天使吉卜利勒要先知穆罕默德跟着他念下面的话："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古兰经》第96章第1至5节）。这是真主最早降示给先知穆罕默德的几段默

示，从此成功地开始了颁降《古兰经》的默示。因此在广大穆斯林心目中认为，正是从希拉洞射出的光明，除去了所有黑暗和愚昧的痕迹，向全世界传播着真主的信息。

从克尔白大清真寺出来，沿黑石角方向一直向前看，就会看到圣地麦加众山中最为神奇的艾布库巴易司山。按照伊本阿拔斯的说法，这座山是立于地球之上的第一座山。还有的传说讲在大洪水（先知努哈的时代）之后，克尔白的黑石曾安全地留在这座山上。也有的传说讲（《古兰经》上也有这件事的记述），先知穆罕默德曾在此向民众显示了分裂月亮的奇迹（用一个手指将月亮一分为二的著名事件）。在这座山上有一座白拉尔清真寺，规模不大但众所周知。许多伊斯兰历史学家主张，这所寺的名称应该是希拉尔（月亮）清真寺。因为麦加城处于一个谷地，而观看月亮，即看分裂月亮的奇迹是在这座山上。穆斯林认为，在这所寺里做副功拜和祈祷属于善行，会得到真主的恩赏。阿伊莎清真寺位于从麦加去麦地那路上的塔乃艾木，该处是为进行副朝而穿戒衣的地方，从麦加克尔白大清真寺的阿布杜拉阿齐兹门有公共汽车去那里。镇尼清真寺靠近赫蒂彻墓地的穆阿拉商场，又称拜阿特寺或哈尔斯寺。在这儿先知穆罕默德曾接受精灵做他的追随者。原先这儿是一片开阔地，现在修建了一座美丽的清真寺，在穆斯林心目中该寺也有着神圣的地位。拉叶清真寺位于镇尼清真寺右手不远的地方。拉叶的阿拉伯语意是旗帜。先知穆罕默德征服麦加时曾在此地树立过自己的旗帜，并赦免了一个罪人，表现了他仁慈博大的胸怀。

位于先知穆罕默德诞生地东南方的木哈拉区巴尼哈希姆，是由一系列昔日的小巷和多层楼房组成的小区。历史上，

这个地方居住着古莱氏部落的巴奴哈希姆家族，他们的首领就是克尔白的管理人、先知穆罕默德的祖父。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长辈及其女婿阿里都曾在这个地区生活过。按伊斯兰教史记述，此地还是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弟子们为躲避异教徒的暴虐和压迫而隐匿的地方。当年有一个不让民众与他们接触的布告，连食品和饮料都不许卖给他们。在整整三年时间里，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弟子们是以忍耐、刚毅、高声祈求真主之名及对真主的感恩度过这段难关的。当各国哈吉们拜访这个里巷交错，充满着旧麦加情调的小区时，无不为先贤们的业绩而深深感怀钦佩。

哈吉们在萨法和麦尔卧两山之间奔走后，从麦尔卧出口穿过那里的商场，转到右手第一条小巷里，就可以找到先知的第一位夫人赫蒂彻的旧居。先知穆罕默德在迁徙去麦地那以前，一直居住在这里，他的女儿法蒂玛就诞生在此。因此，这座住所在圣地麦加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从麦加去米纳的路边，靠近镇尼清真寺处，有一座名为嘉纳图穆阿拉的著名的历史性墓地。陵园内有一条贯穿其间的道路将它分为两部分，北边的部分筑以小围墙，先知穆罕默德的夫人赫蒂彻和他的一些长辈，如祖父、伯父等安息在这里。其余部分则埋葬着先知穆罕默德的再传弟子和一些伊斯兰教先贤们。哈吉们可以进陵园瞻仰或为亡人祈祷。

在距离麦加 16 公里处的赛维尔山上，有一个著名的山洞，先知穆罕默德与艾卜·伯克尔从麦加往麦地那迁徙时，曾在山洞里度过一个晚上。由于山势陡峭，十分危险，发生过不少登山事故，所以年老体弱者不宜前往。目前沙特政府已制止人们到山上去，仅允许私人车辆在山下附近逗留。

各国朝觐者在正朝结束后大都顺道去麦地那瞻仰先知穆罕默德的圣陵。麦地那是先知穆罕默德把伊斯兰教推向胜利的重要纪念地，也是他度过一生中最后十年的城市。先知穆罕默德和他最杰出的早期皈依者就安葬在那里。因此访问麦地那是穆斯林对先知及伊斯兰教表示敬仰的行为。在《圣训》中就有穆罕默德这样的教诲："谁在我死后探访我，同我活着探访我一样。""探访我的陵墓的人，我有搭救他的义务。"

从圣地麦加到灿烂的城市麦地那之间的距离是 277 公里。虽然去麦地那瞻仰伊斯兰遗迹不属于朝觐功课，但那里有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第一、第二位继承人的神圣陵墓，有巍峨壮观、金碧辉煌，能容纳 25 万人礼拜的"麦斯吉德纳巴维"（又称圣寺或先知清真寺），有先知穆罕默德刚到麦地那时建起的第一座清真寺库巴寺、有著名的"双朝向"清真寺、星期五清真寺、云彩清真寺，还有其它许多圣迹如法蒂玛陵墓、巴奇陵园、白德勒古战场、吴候德古战场及纪念壕沟战役建立的六座清真寺，从而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朝觐者前来瞻仰和探访。

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寝位于圣寺内（即麦斯吉德纳巴维）。圣寺的地址，据传说是先知穆罕默德当年迁徙麦地那时，他乘坐的母驼夸斯娃停留的地方。因为当时许多麦地那居民都争着想把住房奉献给先知作歇息之处，穆罕默德回答说："让我的母驼夸斯娃前进，它会停在真主命令它的地方。"夸斯娃继续前进，终于在今日圣寺所在地停了下来，住在邻近的艾卜·安优布·安索勒抬起了骆驼的座鞍，领先知穆罕默德到自己的两层楼房去休息。因夸斯娃停歇的地方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不太平坦的地面上生长着椰枣树，先知穆罕默德准备在这里建便于穆斯林集体礼拜的清真寺。这块土地属于两个孤儿，

他们诚心诚意地要把土地奉献出来盖清真寺，但先知穆罕默德非常关怀他们，付给他们一大笔钱。先知穆罕默德用祝福的双手奠基，并亲身参加清真寺的建设。1400年前，这座寺虽然是一个简单的以椰枣树叶和树干建成的礼拜场所，但却是个鼓舞人心之地。有整整十年，先知穆罕默德在这座清真寺里进行礼拜，因此这儿成了伊斯兰教的第一个传教和教育中心，正是以此为出发地，伊斯兰教在世界上逐渐获得权威和光荣，开创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也正是在这里，先知穆罕默德的声望达到了顶点，他在这里亲自向教众们传授真主默示予他的《古兰经》文，使穆斯林的性格和品行得到陶冶。伊斯兰教历第7年时（公元628年）先知穆罕默德对这座清真寺进行了重修，在以后的千余年里，又进行了多次扩建和修建，目前的建筑是1955年7月9日落成的。先知穆罕默德曾作过这样的训示："在我的寺内（指圣寺）礼一拜，强于其它寺的一千拜；麦加的圣寺除外，那儿礼的一拜，强于我的寺内的一百拜。"

目前的圣寺共有10个进出的大门。在寺内的讲坛和圣坟间是一个叫"利雅则吾里占乃"的地方，有7个用镀金瓷釉装饰的大理石柱子，这是圣寺内一个特别重要的部位，据说柱子中间的地方是来自天堂的一个花园。这里的每根柱子都有一段典故，如哈纳奈柱是先知穆罕默德发表讲话的地方，阿伊莎松迪克柱是阿伊莎松迪克指出在这里做礼拜可获得赐福的地方，瓦福德柱是先知接见来访代表团的地方，撒利尔柱是先知夜晚在此安床休息的地方，哈拉斯柱是真主卫士阿里穆尔台则经常在这儿礼拜并坐在这儿保卫先知的地方，艾布拉巴卜柱是先知的伙伴艾布拉巴卜忏悔过错并最终获得真主宽恕的地方，台罕珠迪柱则是先知在这儿的台罕珠迪（黎明前）礼拜

的地方。在圣陵的北端，有一个用铜栅栏围起来的约150平方米的地方，称艾实俄卜松法(坐在阴影里的先知的伙伴们)。据说这里是最先所建清真寺的走廊或多阴影的所在，一批无家无业的先知的伙伴当年整天在这儿朗诵《古兰经》，聆听先知的教诲。为了纪念这些陪伴先知的穆斯林，所以后人留此遗址以供纪念。在圣寺内圣陵的上方，是一个巨大的绿色圆顶。圣墓的宽度是15米，长度为16米，四个角全是伸至顶部的大理石柱子，伊斯兰教历980年(约公元1601年)，苏丹萨里姆二世在圣陵顶上建造了用彩石装饰、金子润色的举世无双的大圆顶。伊斯兰教历1255年(公元1876年)圆顶由白色涂成绿色，从此叫做绿圆顶。朝觐者来此瞻仰圣陵，常常渴望一睹绿圆顶的雄姿，从而表达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挚爱。

在先知穆罕默德当年领导礼拜的地方，现有大理石的一道拱门，叫做“米哈拉布纳巴维”。原先这里由艾卜·伯克尔筑了一座墙，将除过先知立过足的地面外，整个遮盖起来，禁止别人践踏先知的慈祥前额礼拜时叩落的地面。以后，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这座墙改为一道拱门，因此，后来的朝觐者到这个拱门前礼拜的话，他们的前额正好接触到先知穆罕默德立足过的地面。

先知穆罕默德的陵寝正处于圣寺内当年阿伊莎个人居室里面，在圣陵的旁边还有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两位哈里发的陵寝。圣墓的一侧以铜格子窗封闭着，其余的几侧安放着铁格子门。在铜格子窗上有三个孔，当朝觐者面对中间的格窗站立时，你的左手旁的圆孔是先知穆罕默德圣面的前方，邻接着它的是一个关闭的门，直接相邻于这个门的圆孔，即在你右手边的是艾卜·伯克尔脸面的前方，再右一点的孔，则是欧麦尔

脸面的前方。也就是说，在这个神圣的地方，忠诚的艾卜·伯克尔的脸停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胸之侧，而尊敬的欧麦尔的脸则停放在艾卜·伯克尔的胸侧。前来瞻仰的朝觐者在作完必要的礼拜(台赫叶特麦斯吉德乃玛子——祝贺清真寺的礼拜)后，就可以来到圣墓前，这时要紧握自己的双手，犹如先知活着一般，以极恭敬的态度，使自己的脸一直保持向着先知的圣面。所有来瞻仰圣陵的朝觐者，此时此刻都想象先知在墓中是活着的，并且知道自己的到来，聆听自己的祈求。朝觐者全神贯注在这样的思想里，极其虔诚，流泪满面，把自己的整个心灵投入到诵念祷词中去。

在光辉的麦地那郊外约五公里处，有一个叫做库巴的市镇。在伊斯兰教开始创建的迁徙时期，这儿住着许多麦地那的本地居民。先知穆罕默德在库巴镇住过 4 天，为建库巴清真寺奠了基，这便是伊斯兰历史上修建的第一座清真寺——库巴寺。如今在这个寺做礼拜被认为是一件祈福的行为，它的效果等于一次副朝的善功。

离麦地那不远，还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双朝向礼拜寺，其全称是给布来台尼清真寺，它象征着伊斯兰教史上一件重大的事情。起初，穆斯林礼拜的朝向是耶路撒冷。到伊斯兰教历第二年 7、8 月间，先知穆罕默德在这所清真寺礼拜时，刚完成前两拜，当进入第三拜时，他传谕了真主的下述《古兰经》文："我确已见你反复地仰视天空，故我必使你转向你所喜悦的朝向。你应当把你的脸转向禁寺。你们无论在哪里，都应当把你们的脸转向禁寺"(第二章第 144 节)。因此整个礼拜从面向耶路撒冷改变为面向麦加天房克尔白，从此穆斯林的礼拜都固定为这个朝向。由于在一番拜中，前两拜朝向耶路撒冷，而后面

的两拜朝向麦加克尔白.因此后人把该寺称做两个朝向的清真寺,以纪念上述重大事件。

在库巴清真寺往麦地那去的路上,住过一个巴努撒利穆部落。在迁徙时期,先知穆罕默德于一个星期五途经这里时,正逢做"主麻"礼拜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部落与大家一起做了"主麻"礼拜,这就是光辉的麦地那的第一个星期五。后人在当年先知做过礼拜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星期五清真寺",有些朝觐者在访问库巴清真寺归回途中,到这个寺做副功拜以示纪念。在麦地那城里离圣寺不远还有一所俄玛买清真寺(云彩的寺),先知曾在这里做过"尔德"礼拜,还领过一次向真主祈求降雨的礼拜。据说当他结束礼拜时,天空中乌云密集真的下起了雨,因此后人又将此寺称做"云彩的寺"。在"云彩的寺"附近,还分别建有艾卜·伯克尔清真寺,欧麦尔清真寺和阿里清真寺,据说这些哈里发都曾在上述清真寺中做过礼拜。

在麦地那,还有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安息处。关于其具体地点有三种说法:其一说在圣寺内;其二说在阿拔斯的坟地附近;其三说是在靠近巴奇(圣眷)陵园的附近。有不少朝觐者先后拜访这三个地点并诵念祷词。在麦地那的东头,还有一所埋葬着先知穆罕默德多数伙伴,包括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们的叫做巴奇陵园的坟地,朝觐者也常前去瞻仰。

在从麦加出发,离开麦地那还有近 110 公里时,离公路不远处就是发生过伊斯兰教史上著名的白德勒战斗的古战场。现在有界墙标明这个战场的范围,其中又有一片圈起来的墙垣,里面埋葬着白德勒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伊斯兰教历第二年(公元 623 年)赖麦丹月 17 日,313 名穆斯林在此和 1000 名有经验的来犯之敌进行了殊死决战。穆斯林们只有两匹马、

几匹骆驼及很少的武器，而来犯的却是充满仇恨的多神教徒，不少人是从麦加来的迁士们的亲戚。但穆斯林们严肃而忠实地将自己与坚定的伊斯兰信仰联系起来，并决定与罪恶断绝一切关系。最后，穆斯林们不惜为伊斯兰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大无畏精神起了作用，引导他们杀死了 70 个敌人，包括古莱氏族领袖阿卜哲海里，彻底击败了来犯之敌。

离麦地那北约 7 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吴侯德山，伊斯兰教历第三年（公元 634 年），著名的吴候德战役就在这个山脚下发生。这个战场东西大约有 6 至 7 公里长。当时，只有 100 副甲胄的穆斯林军队 700 人要迎战一支由 3000 人组成的能征善战的多神教徒。为了以少胜多，先知穆罕默德在一个通道里布置了 50 名弓箭手，指令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离开阵地，不论穆斯林军队胜负如何，他们都不要管。战斗开始后，多神教军队未能顶住穆斯林军队的攻击，从战场上逃跑。这时那 50 名弓箭手按捺不住参战的心情，也跑出来追逐敌人。多神教徒利用了这一机会，从背面发起了进攻，结果穆斯林军队遭到了惨重的伤亡。先知的 70 位伙伴，包括他的叔叔哈穆则壮烈牺牲，连先知穆罕默德本人也受了伤，掉落了几颗牙齿。后人凭吊这一古战场，正是为了怀念先贤们艰苦卓绝的捍卫伊斯兰信仰的精神。

在伊斯兰教历第五年（公历 626 年），由犹太人、多神教徒和偶像崇拜者组成的约 1 万名各派联军，再次进犯麦地那。先知穆罕默德采纳了波斯人赛里曼的建议，围绕着麦地那，背靠赛里山挖掘壕沟，先知自己也参加了挖沟劳动。异教徒联军由于为壕沟所阻，未能进得城去，在相持的一个多月里，穆斯林们忍受着饥饿的折磨，顽强地坚守着阵地。由于供

应缺乏，不满和混乱的情绪开始在联军中弥漫。终于在一个冬季的夜晚，一场狂风吹落了联军的帐篷，损坏了他们的供给品，使他们个个变成污秽的土人。联军顿时陷入一片惊慌之中，终于摸黑从战场上逃跑了。到第二天黎明，包围已经解除，穆斯林们依靠对真主的坚定信仰赢得了对峙的胜利。现在，有6座清真寺建在赛里山下的古战场各处，包括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伙伴们搭过帐篷的地点及他们祈祷过的地方。

当朝觐者从麦地那启程和告别前，往往要再次到圣寺礼上两拜，然后来到真主的使者穆罕默德的陵寝前，为自己的父母、亲戚和朋友而祈祷，并为离开先知而落泪，他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颂念："离别了，真主的使者（赞主，祝你平安）啊！真主喜悦的人啊！祈主勿使这次对你的敬谒成为我唯一的一次，祈主给我幸福，安全，健康和平安。如果我活着，靠真主的意愿，我还想再来。如果我死了，我即靠你获得安全。从今到审判日我作证，我约定，我确信：'世上再没有受拜的，唯有真主。真主独一，无匹无偶。我作证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三）宗教精神藉以宏扬　社会活动亦受影响

人类的发展过程证明，任何民族的历史都伴随着一定的宗教活动。综观世界文明史，宗教如同大海之浩瀚，曾渗透入人类社会活动的广泛领域。人类社会既然拥有了宗教世界，那么宗教世界决不会对人类社会毫无作用和影响。宗教曾经给原始人类的社会生活方式注入过活力，提供过智慧和勇气，使人类生活方式向高层次发展。可以断言，如无宗教的历史存在，原始人类社会的大厦将失去一根重要的精神支柱而倾斜。

正因为这样，即使当代人的生活，也和宗教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世界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生活内容的日益丰富，人类的宗教活动形式与日常生活方式有了明显的区别，但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聚居地区，宗教对社会仍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伊斯兰教是由一系列礼仪习俗及对穆斯林规定的精神态度和生活中的具体义务组成的一个连续整体，它具有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伦理和宗教体系，因此，它的影响也覆盖到穆斯林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个人修养到家庭关系到社会交往。

自从1400多年前，穆罕默德把朝觐作为穆斯林生活中五大要素之一并昭示天下开始，朝觐活动遂成为穆斯林精神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朝觐的目的是让人们置功名利禄于脑后，进而陶冶牺牲精神和增强世人向往的大同观念。因此，朝觐礼仪中有一天的活动称为宰牲节，又叫牺牲节和忠孝节。通过朝觐，每个身临其境的穆斯林都参加了一次大规模的人类迁徙，都经历了一次集体性的精神锻炼，这在其它宗教信仰里是闻所未闻的。通过朝觐，他们完成了真主的一系列命令：接受考验、坚定信仰、虔诚礼拜、访问禁寺、参谒圣迹、驱除邪魔、履行忠孝、分享伊斯兰教的兄弟情谊。当朝觐者日后恢复正常生活时，作为终身的哈吉，朝觐得到的精神财富将保留下来并不断使其感到安慰。

由于朝觐具有一般宗教活动所无法替代的巨大鼓舞力量，所以千余年来参予这项活动的穆斯林越来越多。在伊斯兰教兴起初期，由于受穆斯林生活水平、交通工具及当时社会局势等因素的影响，每年去麦加参加正朝的只有千余人，直至本世纪40年代，每年也就是二三十万人。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

和中东石油国家的经济崛起，到60年代中期，朝觐人数每年已突破百万人大关。70年代继续上升，1979年高达190多万。1980年因受两伊战争的影响，人数略有下降，但仍在180万人以上。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朝觐人数每年便增加到200多万人。严格说来，朝觐本来是一种单纯的宗教礼仪，但如此大规模而又一年一度的全世界穆斯林聚会，对于感情的联络，意见的交换，知识的传播，文化的沟连，商品的流通及各人心得的发挥，都有十分显著的推进。因此，在当今世界中，穆斯林朝觐的宗教意义和社会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

1、朝觐的宗教意义，就是这项活动对穆斯林身、心、性、命、财为一次总考验，使他们的言行要有所修养而不乱，身体要有所锻炼而不懈，财帛积散要取舍有道。从而使伊斯兰教精神发扬光大，更趋完善，具体可分五个方面：

（1）履行朝觐就圆满执行了伊斯兰教所赋予穆斯林的天命五功的全部课修。朝觐是伊斯兰教"念、礼、斋、课、朝"五项功课亦称天命中的一项，既然是真主安排给穆斯林的功修，就必须真诚的服从执行。朝觐与念、礼、斋、课等其它四项功课有密切关系，是构成伊斯兰教礼仪教规的基本内容，因此，对一个身心理智健全，言、动、视、听正常严肃的穆斯林，就要求他自愿遵守天命五功并去实行，做到这个要求，他就可以成为一位不敢为非作歹、完成穆斯林天职的正派人士。此外，除了居住于圣地附近的穆斯林外，其它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要想实现"朝"功，需受身体状况、经济条件等主观条件及社会旅途等客观环境的限制，因此，要想完成全五功并非易事，所以，每个能完成"朝"功的穆斯林，都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据说穆民之

母阿伊莎曾问:"安拉的使者啊！我们认为为正道战斗是高贵的功课,那么,我们女性也出去战斗吗?"先知穆罕默德回答:"最高贵的战斗是朝觐"。

(2)朝觐是一次洗涤思想的灵魂净化过程。伊斯兰教认为,人们平时或为衣食忙碌奔走,辛辛苦苦;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不能抽出工夫来实行敬主爱人的功课,死期一到,离开人间,平生的财富积蓄,丝毫不能带走,懊悔也来不及了。安拉创造人类,并规定了一些功课,使人类因履行这些功课,而容易整饬他们本身的宗教及调和群众的社会。朝觐就是训导穆斯林的一种功课,令他们对身、心、性、命、财作适当的认识,最后能牺牲世界上所有的虚荣,实现归真返璞趋于至善。例如通过朝觐,能令人感到人间的友爱、平等、和平,从而使朝觐者明了自己对世界和平、人类平等应尽的职责,勉励自己应该对人类社会有所贡献,使普天下的人们,都能同享幸福。同时,朝觐礼仪中还有不少禁规,经历了朝觐实践后,会使朝觐者明白,朝觐是择善弃恶的一种锻炼,使人们从此以后能自觉地改邪归正、改过自新、明白是非、行善止恶。因此有人认为,自朝觐者一踏上旅途,他为履行朝觐的神圣仪式而作准备的洗涤灵魂的过程即算开始。

(3)仿效圣贤懿行,既奉天道又重人道。伊斯兰教的朝觐天房,有固定的时间,合理的仪式,与其他一般集体、集团活动和国际会议迥然不同,它是根据《古兰经》和圣训安排活动,而又以教内先贤为效行楷模。教外有些人出于误解,把朝觐称为"朝圣",把哈吉称为"香客",这完全与伊斯兰教教理不相吻合。因为"朝圣"将被人误解为"朝拜圣人";说哈吉为"香客"则是把穆斯林混同于偶像崇拜者,错以为他们去烧香把圣人当

偶像崇拜。其实朝觐期间的节日就称作忠孝节，阿拉伯文的统一名称是牺牲节。忠孝节的由来是伊卜拉欣圣人实践信约为安拉尽忠，而他的儿子伊斯玛仪圣人则服从父命而尽孝道，他们父子二人由于虔诚敬事安拉而获得后人敬仰，于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忠孝"美名。所以能前往朝觐的穆斯林，除了参加朝觐的一切仪式，同时亦以力行忠孝节的功德，奉安拉命令朝觐，做圣人之懿行，虔诚专程赴会，表现穆斯林应有的"身、心、性、命、财"的素养，对优于我者，尊之效之；对等于我者，互相切蹉砥砺；对次于我者，则忠言善导，从而获得遵主命以尽人事的功修，是今生积最大之善。

伊斯兰教还是对天道人道同时并重的一种宗教，它强调敬主尊主，又强调爱人惠人，所以认为履行朝觐功课，有利于发展与加强穆斯林道德的基础，是一种贯串人道精神的实践，对穆斯林的诚意，正心、修身、素质、学养的磨炼提高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对穆斯林的现实利益也无妨碍。据说在制定朝觐制度初期，人们往往在朝觐期间于米纳地方做生意，但他们害怕在受戒期内不得进行买卖，心里很不踏实，于是先知穆罕默德向大家宣布了安拉颁降的一段《古兰经》："寻求主的恩惠，对于你们是无罪的"(第 2 章第 198 节)。意思是利用朝觐空闲搞贸易是真主允许的，是安拉给予穆斯林的恩惠，从这条训示中可以看出，朝觐是将天道人道并行不悖的。

(4)朝觐是磨炼穆斯林精神和气质的一次重要考验。自从先知穆罕默德率众由麦加到麦地那进行了第一次规模盛大的朝觐，确定了朝觐的各项功课后，直至本世纪初，穆斯林朝觐者总是背着干粮、步行或骑着驴、马，驼风餐露宿，长途跋涉，其艰难程度可想可知。以后人类进入了汽车和喷气式飞机时

代,交通条件大大改善,然而由于朝觐季节穆斯林人数达到二三百万人,麦加地处沙漠地带,每天的气温不下40℃,因此酷热难捱。虽然近年来沙特政府进行了巨额投资,从饮食到医疗保健各方面来改善朝觐者的生活,但由于车船劳顿在所难免,加上当地温度过高,语言习俗差异,水土难以适应,及朝觐功课紧张等因素,可见朝觐仍然是对人们的一种严峻考验。首先,旅途及生活中的磨砺,有利于提高穆斯林的精神境界,熔炼其刚毅气质,使他们产生一种不惧危难、刻苦奋斗、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上进心。其次,朝觐使人们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体念列圣们的丰功伟绩,培养扶弱济贫、谦逊和蔼的克制精神,投身于为群众服务的伟大事业。而难得一逢的集体生活锻炼,更使穆斯林感受到群众气氛,纠正其惟我独尊或独善其身的偏颇观念。再次,朝觐是纯宗教的陶冶,朝觐期间的生活举止有规律而与平素不同,经受了这种陶冶与训练后,可以改变昔日醉生梦死的、落伍的、散漫的、混乱的或昏迷无纪律的生活方式。第四,朝觐是一种纪律训练和意志考验,使穆斯林们随时保持警惕性和戒惧心理,用以自卫和反抗强敌。因为伊斯兰教的反对者、攻击者、破坏者及内心的私欲邪念,随时都会出来挑战,如果没有良好的纪律训练及坚心强意的修养,有可能堕入歧途。

(5)朝觐活动本身是扩大伊斯兰教影响的重要场合与时机。每年多达数百万的穆斯林聚集在麦加一个地方进行礼拜祈祷,这种宏伟壮观的场面对每一个朝觐者都会留下终身难忘的影响;而各种肤色的世界各国穆斯林汇聚在一起,也显示了伊斯兰教的巨大召唤力量,这一切都会大大加深每个朝觐者的信仰程度。当各国穆斯林从家乡启程时,各国各地的报

纸、电台、电视台就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报道；尤其到了朝觐高潮时，各种新闻媒介更要进行跟踪报道。这些关于朝觐的文字和画面，年复一年地使没有参加朝觐的近十亿穆斯林感受到亲近和自豪，也使几十亿非穆斯林人民体验到伊斯兰教对世界的震憾力量。朝觐教育穆斯林：真主对服从他的人是既仁慈又公正的。朝觐仪式包括亲身往返，但这些只是方式，不是目的。朝觐的精神目的是为了让朝觐者摆脱世俗打算和日常琐事，与真主沟通并赞颂他的独一，从而使这些精神力量激励朝觐者的余生。一旦成为“哈吉”，就终身为“哈吉”了。在一些国家里，一个朝觐者从麦加回来后，他的名字前就会冠以这个被人羡慕的头衔。正是这遍布世界各地而数以千万计的哈吉队伍，成为穆斯林的尊敬对象，也成为穆斯林中维护伊斯兰教信仰和原则的影响巨大的核心力量。

2、朝觐的社会意义用一句话来归纳，即它是向世人显示伊斯兰教凝聚力的一种重要形式。我们可从五个方面来进行认识：

(1)朝觐体现了伊斯兰教的一种凝聚力量，是显示穆斯林团结的重要形式。巍峨壮观的克尔白清真寺，这座用大理石砌成可同时容纳 50 万人礼拜的大寺，每年有几百万朝觐者汇聚在这里，虽然人们的肤色、语言、民族、风俗习惯各不相同，但相见时道一声“色兰”，彼此就显得亲密无间，真是语不相通心相通。这是世界穆斯林的盛大集会，也是各国穆斯林相互交往的良好时机，因此成为穆斯林之间传播友谊，开展经济文化交往的一座桥梁。除了朝觐，很难有哪个国家或团体有如此庞大的财力和人力能组织起规模如此宏大的人类聚会。几百万人汇聚在一起礼拜，并迈着同一步伐行进，这是除伊斯兰教以外

的其他宗教所望尘莫及的。朝觐还是伊斯兰教一切教派并肩参加的活动，它把信仰伊斯兰教——这种多种族的国际性宗教的、操多种语言的近十亿人民都团结到共同的信仰里，并年复一年地在朝觐季节里向世界公开展示伊斯兰教的这种特殊凝聚力。

(2)朝觐体现了人类超民族、超国家的世界大同理想和实现人类相亲相爱、平等互助的良好愿望。朝觐期间种族、语言、肤色、文化各各不同的人们集中在一个地方，他们中男女老幼有别，贵贱贫富迥异，但在敬主惠人的共同目标下穿着同样的素色戒衣进行着同样的礼拜仪式，按照同样的教法规定安排日常起居，虽然时间只有几天，但也让朝觐者看到人类有着共同的利益，这就是：和平、幸福、平等、互惠互利。随着各项礼仪的依次进行，二百多万朝觐者同时行动，同来同往，简直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野战部队那样纪律严明，有条不紊，这样大规模的人群快速移动却绝少发生差错和争执，这也完全依靠朝觐者们的协作精神和平等意识。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还是一介平民百姓，不管你是百万富翁，还是普通工匠，在朝觐礼仪中都没有高低之分，没有特权可享，没有占先之理，使人深深感受到突破财产、种族、肤色、国别等种种界限后出现的纯真、朴素的人际关系和宁静平衡的心理境界。

(3)朝觐有利于提高穆斯林的道德素养和遵纪守法观念。朝觐中，当千千万万人集合在一起时，在饮食起居及交通方面，都会产生一定困难，出现互相冲撞和局部无秩序场面也是很自然的。这时，就要求穆斯林尽最大努力来控制自己的感情和动作，按可能条件坚持履行仪式，镇定地、安静地移动脚步，因为先知穆罕默德曾告诫穆斯林：在朝觐仪式中要保持镇定

和安静。所以说，每个穆斯林在朝觐的人海中，可以发挥自己健全的理智和善良的天性，比较人与人之间理智与天性的优劣，从而引起警戒，择善弃恶。另外，几乎对绝大多数没有出过远门的中国穆斯林来说，赴麦加还要学习掌握许多行政或法律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中接受一次深刻的法制教育，从而有助于日后增强法制观念。朝觐者出国前首先要学习一系列注意事项，比如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令，严禁买卖毒品或违禁物品；严禁扰乱治安和支持所在国的反政府组织的活动，如参加游行示威和帮助散发传单；保护好自己的护照、机票和外币；三人同行，防止迷路，衣帽要整齐，说话有分寸，交往讲礼貌，乘车要谦让，以维护祖国尊严，表现中国穆斯林的风度；按规定注射预防疫苗；带足经常服用的药品；不将文物、名贵药材等违禁品带出国外，也不带电器用品及过量物品入关。由此可见，朝觐是一种人情理智与法律的配合运用，它不仅是一种宗教仪式，而且是一种对人类来说合情合理合法的社会活动。

(4)朝觐对穆斯林来说是一种世界性观摩教学的大课堂。在旅途和朝觐礼仪中，朝觐者能实地观摩到来自世界各国的种族、肤色、民族、语言、生活习惯、服装、体质形态均不相同的人们，形形色色，奇异非常。在这场以朝觐为课堂的现场教育中，人人必须虚心地接受真善美的教育，提高自己的见识水平。穆斯林们在朝觐途程中，接触到国外社会的各个方面，了解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区别，首先增强了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爱心。不少朝觐的穆斯林切实感受到了祖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声望越来越高，从而使自己在国外受到相应的尊敬和热情接待，如新疆的一位哈吉说："过去大陆去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在国外上飞机时，广播里不叫新中国的国名。而叫台湾用的国

名。而现在从外国上飞机时，每当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穆斯林请上飞机'时，其他国家的穆斯林都用友善的目光注视着我们，我们中国人真是扬眉吐气了。"目前许多自费朝觐的穆斯林都是普通农民，他们长期生活在偏僻之乡，是西行朝觐使他们大开眼界，特别是伊斯兰教国家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的程度之高和工作生活的现代化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许多哈吉认为，我们国家搞改革开放，提倡学习外国科学技术，这个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实现四化这个大目标也是完全正确的。有不少哈吉朝觐前不看电影、电视，不听录音机，到国外一看，许多穆斯林都看书报，许多大清真寺内部都有现代化的扩音、录音、空调等设备，他们回国后，就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5)朝觐活动对推动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进程和穆斯林经济发展亦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正因为这个原因，有关政府都把组织好本国朝觐作为团结穆斯林的重要手段。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家也都利用这个穆斯林大聚会的时刻，交换对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的看法。有时还提出相应号召，如动员全世界的穆斯林力量去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促使朝觐者也关心同穆斯林利益相关的政治问题。另外，根据历史上朝觐的习俗，朝觐期间可以经营买卖，从而促进了各国小商品、布料、服装、药材、首饰、头巾和宗教用品的交换、流通，国内外均有不少穆斯林通过这个渠道致富。伊斯兰教的传播本来就曾与穆斯林商业活动有密切的联系，据维吾尔族传说，喀喇汗王朝的沙土克，就是在穆斯林商人影响之下皈依伊斯兰教的。因此，不少中国穆斯林，尤其是新疆的维吾尔等族穆斯林，在朝觐途中也进行文化交流和贸易活动。因此，在整个东

西交通线上，中国穆斯林朝觐者及其组成的商队曾经络绎不绝，在中亚的戈壁沙漠里，在幼发拉底河畔的沼泽地里，在西奈半岛的旷野里，或者在南亚热带雨林及喜马拉雅山的峡谷中，都曾出现过他们的身影，从而为发展中国与阿拉伯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创下了历史功绩。现在也有的穆斯林积极学习国外先进经营手段，如新疆有的朝觐者在麦地那观摩了现代化养鸡场，回国后就照样办了一个，年获利 6 万元。

（四）了解往事可获知识　提供经验有助现实

在虔诚的中国穆斯林心目中，能在有生之年具备条件去朝觐，不仅是完成一次重要的宗教功课，提高自己在后世的品位，而且通过一次难能可贵的长途旅行，可以耳闻目睹伊斯兰世界的种种声响景观，使儿时就获得的宗教知识和神话传闻得到实地印证，这无疑是一桩终身受益的人生大事。因此每年的朝觐季节，凡是中国穆斯林聚居的地区，都可以看到送迎哈吉的盛大场面，走的人兴奋，送的人激动，充满民间节日的气氛。

作为伊斯兰教的重要礼仪，朝觐是中国穆斯林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独特的行进轨迹，非常值得后人去探讨。而在今天的穆斯林生活中，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各族穆斯林的经济能力逐渐提高，使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跨出国门实现朝觐心愿，顺便看一看发展中的伊斯兰世界。因此，目前申请自费朝觐和借用探亲名义朝觐的穆斯林比以往大大增加，给朝觐活动的组织管理工作带来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

党和各级人民政府十分关怀穆斯林的朝觐需要，从多方面提供物质帮助和协助组织管理。由于目前国家外汇紧缺，不得不使朝觐人数受到限制，但每年有组织的中国朝觐者都有2000余人，加上用探亲等名义自行筹措外汇前去朝觐者，使中国朝觐者的总人数在1993年达到5300人，1994年增至6000多人。国家始终通过各种渠道协助解决朝觐所需的一部分外汇额度。同时，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及各地分会，每年都派遣朝觐工作团、组前往沙特为中国哈吉服务，保证了他们平安顺利地完成朝觐功课，从面获得中国穆斯林和沙特有关方面的共同赞扬。鉴于上述原因，研究总结中国穆斯林在历史上的朝觐活动情况及其特点，将会给各族穆斯林提供前辈哈吉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和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也会对今后朝觐组织管理工作带来某些启示，可供有关部门进行参考。

综观中国历史上的穆斯林朝觐活动，大致呈现四个方面引人注目的特点：

1、群众基础深厚，史料逐代增加。对中国穆斯林来说，朝觐是一件影响终身与惠及亲朋的大事，但保留下来的有关资料却不多见。自唐代伊斯兰教传人中国，一批集中定居沿海城市的西域蕃客相继建立了诸如扬州仙鹤寺、杭州凤凰寺、泉州清净寺、广州怀圣寺这样的著名伊斯兰教活动场所，并留下了普哈丁墓、三贤和四贤墓，以及宛葛斯墓等回回遗址。然面在唐、宋、元三代，有关中国穆斯林朝觐的史料却遍寻不见，据初步推测，可能出于这么几个原因：(1)当时的蕃客、色目人、回回人尚处于侨居状态，中国朝野人士对他们的宗教生活视作奇风异俗，因而对他们的朝觐活动根本未予重视；(2)中国各族穆斯林群众自身汉文基础不高，不善于作文字记录，也不懂

得保存这方面材料的价值，即使有一些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其它民族文字记载的史料，也因为时代变迁或没有及时译成汉文进行交流，而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下；(3)在蕃客、回回、色目人中，有的来中国以前就完成了朝觐功课，如浙江《嘉兴府真教寺碑记》中所提到的阿拉伯教士"嘉米里哈吉"，而在华留居后因路途较远，能成行的不多，也就没有留下什么记载。

到了明代，新疆地区逐渐伊斯兰教化，而内地及沿海的回回也开始发展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因而在史籍和碑铭中出现了关于穆斯林朝觐活动的片断记载。如公元1603至1605年，利玛窦所著《鄂本笃访契丹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喀什喀尔自有王。……当是时(1603年)喀什喀王之妹归自麦加城，道经可希里(即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与商队同行。喀什喀王名麻法默德汗，其妹乃和阗王之母也。""和阗国王名曰摩哈美德汗，鄂本笃往朝之，进献时辰表、望远镜及欧洲带来诸奇珍，王见后大惊，遇鄂甚优。鄂初不宣泄欲往契丹(即中国)之谋，仅言往喀什喀尔东邻嘉理斯国(因喀喇沙尔)。祈王颁护照，以便行程，王热诚助之。王即前可布里城所遇往麦加参圣王后之子也"(冯家升等《维吾尔史料简编》第181页，民族出版社)。至于为时更早一点的，有明永乐三年(1405年)华亭李至刚为郑和祖父所撰的《故马公墓志铭》，提及"公字哈吉，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吉，母温氏。……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内监"(袁嘉穀撰《滇绎》卷三)。郑和的祖父、父亲都名为哈吉吉，可见父子二人都曾作过朝觐。据传明末，回族著名经师胡登州也曾赴麦加朝觐，回国后大力培养宗教人才，为发展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奠定了基础。但是有关他朝觐的

事，却只有传闻，没有留下文字材料。至于明代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士朝觐的史料，也许还保存在某些民族文字古籍中，可惜因缺乏系统的收集整理，目前还不清楚。

有清以来，海禁逐渐废弛，交通也渐趋方便，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开始频繁，因而涌现出像马德新《朝觐途记》这样的朝觐问题专著。在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中，则记述了雍正六年(1728年)固原花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和雍正七年(1729年)哲赫林耶门宦创始人马明新分别去麦加朝觐的史料。此外，一些知名人士，如云南伊斯兰学者马联元、中国伊赫瓦尼的创始人马万福(即果园哈吉)、回族教商家王宽也都曾赴麦加朝觐，并且产生过较大社会影响。

进入民国时期，中国各族穆斯林朝觐活动记载逐渐增多。二十世纪初，上海成为中外闻名的商埠，穆斯林人口也逐渐增多，当时东南省份的穆斯林首先取道上海赴麦加朝觐。现在有较早记载的，如上海穿心街(福佑路)清真寺教长王裕三于1914年乘轮船去麦加。此外，买俊三、达浦生等回族知名人士也曾取道上海口岸去朝觐。当时曾有一位110岁高龄的河南李芳孝长老，也由上海出发并平安归来，被引为佳话。在民国时期，国内穆斯林创办的一些伊斯兰教报刊，如《月华》、《晨熹》、《震宗报》、《突崛》等，也及时刊登我国穆斯林朝觐活动消息，发表关于朝觐问题的论述和朝觐日记，如赵振武的《西行日记》，马明道的《从伊斯兰堡到麦加》，并采访归国哈吉或登载中国穆斯林朝觐题名录。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时期的朝觐者同前辈相比，文化素质有很大提高，不少人归国后纷纷撰写朝觐见闻，一部分已在报刊上发表，另一部分则由私人刻印后在亲朋中间流传，因而积

累了大量朝觐资料。此外《中国穆斯林》也适时登载朝觐动态。

2、不畏山高水远，执意奔赴天房。穆罕默德曾经留下这么一句名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由此可见，在这位先知的心目中，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距离，确实遥远而充满艰险，因此不易走到。从地图上看，中国最西部和麦加之间的距离就不啻5000公里，其间还有沙漠横亘，山水阻隔。如果从东南沿海坐船，航线更超过上万公里。在清代，新疆哈吉从陆地赴麦加朝觐，来回一次要用三年时间。直到四十年代，单程也需要两个月。如喀什的阿吉艾拜都拉就有亲身体验。他1947年启程时，先骑马走40天到克什米尔，又坐2天汽车到拉瓦尔品第，接着坐3天火车抵达卡拉奇，然后又乘12天轮船才到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还有不少穆斯林由于路途阻留而没能赶上当年的朝觐日期，只好在当地做工以待来年。在解放前，中国穆斯林朝觐旅途所经常遇到的困难，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陆路行程自然环境险恶，海上行船常遇狂风恶浪。如雍正七年（1729年）马明心和叔父取道新疆，沿着丝绸古道，费尽千辛万苦，用了近一年时间才抵达也门，途中突遇风暴，叔侄失散，致使幼小的马明心流落异乡，几经辗转，才为当地穆斯林收养。古代哈吉搭木船在印度洋上往返，其风险苦难更不堪设想。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是根本抵挡不住的。清代马德新在《朝觐途记》中也曾描述：“风大不顺，空中冷甚。吾人十分艰苦，乃舍船及诸货，以小船行。”还有一次，“雷击中桅，中标之上节粉碎之，损其大梁，并损下桅，约1尺余，……船中人皆惊悸。”第二，路途不宁，生命有虞。旧社会豪强逞霸，杀戮相寻，出门人长途跋涉很不安全。马德新在由麦

加往麦地那时，也因“途中有贼，官阻之不准行。”第三，盘缠不够，流落异乡。中国穆斯林朝觐者大多数是劳动群众，在历史上，由于路途远，不测事件多，所以花费较大，即便条件比较好的哈吉抵达麦加后，手中也已所剩无几。当时沙特政府没有能力提供资助，这就迫使朝觐者在完成宗教功课后必须自寻活计维持生存，同时积攒回乡旅费。有的人长期欲归不能，便慢慢定居下来。这种情况在新疆穆斯林中比较常见。宁夏马龙阿訇，三十年代曾两次朝觐，也因回程旅费不敷，便留下来给后来的中国哈吉当向导谋生，凑钱回家。第四，因环境变化，被迫绕道，增加了旅途困难。如 1939 年西北回教朝觐团一行 100 多人，因日寇占据中国东南沿海，无法搭轮船出行，改从西宁出发，穿越西藏，经尼泊尔、印度等地，然后再坐船越过阿拉伯海而抵达吉达。途中，仅西宁到拉萨一段就走了两个来月，其中有五位哈吉因体力不支而身亡。清代马德新在行程中，因船家急忙赶路，企图躲开“避瘟禁所”，夜间停泊荒岸，“而意未遂”，仍被迫令驶往避瘟禁所。马德新下船后找不到原船，“同人已去，予在沙滩两夜，不见一人，无食无饮，亦不知由何途往。后同人来寻，乃至避瘟禁所”(《朝觐途记》)。第五，水土不服，易患疾病。有的朝觐季节，气温高达 40℃以上，朝觐者常因人多天热而水土不服，非常容易患上疾病。加上有的哈吉年老体弱长途辛劳，也常病倒在异乡。据《朝觐途记》所载，马德新去朝觐时，“未至满克之前二月，满克有瘟疫。西八月，瘟复至，其症吐而腹泻，甚至晡礼后，殡即二十五柩。是日，予闻殡者约四百。”“迁都一千二百六十三年正月，疟疾至满克，亡者颇多，陕西人周欲补与予同行，彼有腹泻之病，已移吾寓所，后其人病沉重”。正因为旅途上有如此众多的艰险，却更磨

炼了中国穆斯林朝觐者的意志，因而不少朝觐归来的哈吉，以后都在事业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朝觐者的虔诚信念和执著精神，也引起广大穆斯林的感佩，从而倍受尊重。

3、旅行路线复杂，交通方式多样。从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情况来看，大致分为三类，即陆路、海路和空路。其实，所谓陆路海路，也不是十分准确的，几乎所有的路线都有海、陆交通穿插的情况。而他们乘用的交通工具更是五花 八门，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或毛驴，有的乘火车、汽车，也有的坐轮船、飞机。可以认为，探讨中国穆斯林朝觐交通史，可以了解社会的进步，世界的发展，也可以掌握中国穆斯林历史环境和自身地位的变化。

走陆路，古时候在西北方向主要沿丝绸之路行走，据《朝觐途记》所述，清代朝觐者通常走"天山北路途程"，分别抵达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港或埃及的开罗后再乘船赴麦加。在陆行途中，有时有几条不同的分支路线，全凭当时环境和朝觐者个人情况作出选择。据马明心朝觐传说，可能还有一条陆行路线是从新疆到也门，走阿拉伯半岛的南路，但沿途不详。到了近代，陆行路线又有所变革，一条是骑马或毛驴去克什米尔，然后坐汽车到拉瓦尔品第，再坐火车抵达卡拉奇，换乘海轮抵吉达。或者坐火车穿越亚欧大陆，到伊斯坦布尔坐船至吉达。有时中途在黎巴嫩换船。80年代中巴公路建成后，我国穆斯林获得了一条朝觐捷径，他们可以直接从喀什坐汽车翻越红其拉甫山口，抵达伊斯兰堡，再换火车至卡拉奇，然后乘船过海。陆路行程还有一个西南方向，即沿唐代初期所开创的"吐蕃泥波罗道"，即翻越青藏高原到达克什米尔，再经阿富汗南下坐船至麦加。

走海路，在古代大致也有两条路，一条系《朝觐途记》所述，由内地经川西平原抵达云南至缅甸，坐船抵吉达。另一条由东南沿海港埠，如广州等地出发。到民国时期，多从上海启程，由于有了轮船，停泊点减少，航程更为直接，尤其自1930年开通朝觐专轮后，沿途只停五个港口，即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科伦坡、亚丁，到吉达。这条线路费用比较省，因此目前有人建议重开这条航线。

空路，是建国后辟设的，80年代以来的政府朝觐团和内地自费朝觐者，大都采用这种迅捷安全的交通工具。空中航线大致有两条，一条是从北京至伊斯兰堡或卡拉奇，再换乘朝觐专机抵达吉达。另一条是自1989年起，在中国民航的支持下，开辟了自北京（或乌鲁木齐）直飞吉达（只在沙迦加油）的最新航线，当年900余名中国哈吉即利用这条新航线前往麦加。朝觐路途虽然遥远，但中国穆斯林凭藉自己的宗教信念，使条条大路都通向圣地，征服了艰险，博得了声誉。

4、履行宗教功课，不忘人间使命。飘洋过海，长途跋涉的朝觐活动，既是为了履行宗教功课，对有事业心的穆斯林来说，也是考察学习域外情况，增长学识的大好机会。

我国清代成就卓著的伊斯兰教学者马德新，在朝觐初期即详细考察了克尔白圣地，绘制了图样，次年又在赴麦地那途中凭吊了"白德尔"古战场，然后依次游历了开罗、亚历山大、伊斯坦布尔、塞浦路斯、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亚丁、苏伊士等城市，所到之处，搜寻典籍，择风问俗，考察阿拉伯各国典章制度，并与当地名流学者广泛接触。回国时，携带了大量图书资料，以后，陆续撰写了三十余部伊斯兰教译著，如《大化总归》、《四典要会》、《道行究竟》等。归途中，他还在新加坡停留一年，

进行天文测验，“向闻新歌敷尔(即新加坡)地近中线(赤道)，乃南北(半球)间正中之线，平分地为两半，其地北极与地平，南极亦然，昼夜如一。夏夜昼不见长，冬至昼不见短，日在春分、秋分，凡太阳偏南，影子偏北；凡太阳偏北，影偏向南。因此予据斯岛一年试之，罗盘之间立一针，验其二至二分，得古人所言，皆属事实、与所遇符合”(《朝觐途记》)。因此，被白寿彝先生誉为“颇具科学实验精神”之举。

在近代伊斯兰文化运动中勇于革故鼎新的伊斯兰教学者王宽，也曾于1906年朝觐麦加。回国后创办“中国回教促进会”，提出“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的进步口号。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东诸国开展颠倒是非的反华宣传，致使一些中东上层人士对我国抗战产生疑虑。达浦生阿訇就藉朝觐机会，于1938年奔赴麦加，与中国回教访问团人士相聚，利用时机向沙特国王和大臣们解释了中日战争真相，并呼吁沙特抵制日货。1939年，甘、宁、青等省的100多位穆斯林取道西藏、印度来麦加朝觐，他们本来是一心一意来履行宗教天命的，但他们得知日伪“华北朝觐团”一行五人也溜到麦加时，形势的变化和对祖国的忠诚，使他们自觉担当起了宣传抗日的任务，于是联合马坚、庞士谦等留埃及学生朝觐团一起展开斗争。

中国朝觐者这种爱国爱教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继续发扬光大。自80年代以来，我国穆斯林在完成朝觐功课后，总是努力搞好同世界各国朝觐者的关系，向外国穆斯林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和中国穆斯林的新生活。归国以后还主动作报告、写文章，向周围的同胞介绍伊斯兰国家发展科技文化的生动事例，讲述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新旧社会朝觐者的

不同变化，在穆斯林群众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一、哈吉业绩　代有记述

对中国穆斯林来说，朝觐虽是一项花费巨大，路途遥远的宗教功课，但正因为“哈吉”的名称来之不易，因而历代有条件前往麦加的人总是竭力整点行装，而亲朋好友，也热情给予资助，促其成行。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哈吉”的称号既反映这个人具备一定的宗教品行，也表明他具有比较开阔的眼界。因此，参加朝觐对穆斯林来说既有宗教方面的精神价值，也会产生相当程度的社会影响.所以自古至今，都拥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哈吉的业绩，自明代以来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记述和传播。

(一)明朝郑和哈吉世家　晋谒天房有碑作证

郑和(1371—1434年)是明代回族中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事迹，流传了五百余年之久，读书人不用说，即使是街头里巷间的妇人孺子也都略知一二。郑和的事迹之所以流传得如此广泛，大概因为中国旧时代素抱闭关主义，偶与他国往来，自然视作新奇事件。郑和以一个回族人士竟能七次奉派出使，不光把大明的国威远远地宣扬开去，而且在远航活动中有不少穆斯林如哈三、马欢等人参加，他们所访问的对象又大部分是伊斯兰国家，并专程派人去麦加参加拜谒克尔白天房的“副朝”活动，因此比汉代张骞出使西域

的故事更耸人听闻，其意图也为后人们猜测不已。几百年来，郑和的勃勃英姿也就在“七使西洋”的众多公开或神秘的传说故事里闪现着、活跃着。

郑和本姓马，公元1371年出生在云南昆明一个虔诚的回族穆斯林哈吉家中。在元代末年，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朝觐麦加。云南的回族，有史以来就跟以穆斯林为主体的阿拉伯世界或伊斯兰世界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元朝初年，进入云南的探马赤军、色目工匠就有不少是从阿拉伯地区来的穆斯林。其中部分定居者，日后进行对外联系和接触，主要机会就是利用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我国回族著名学者林松查阅《明史》发现，当时既有定居中国的穆斯林出访中东，也有伊斯兰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来中国，其中就有来自天方国（沙特阿拉伯之麦加）的弟弟赴云南寻访哥哥之记载，其哥哥来华40多年未归，这种来访不是贡使，而是探亲，属于民间私人交往，由此可见云南在历史上与西亚的相互联系确实存在（《明史》卷332《西域四》）。郑和因排行第三，人称三宝。这三宝自小聪明伶俐，才智过人，甚得家人喜爱，待三宝稍懂事，哈吉父亲便给他讲述当年驾船漂洋过海，去红海岸边的伊斯兰圣城麦加朝觐的故事，以及与狂风巨浪搏斗的情景和西洋各国的风土人情。这一桩桩的奇异经历，一件件的域外珍闻，像磁铁一样，把小小的三宝牢牢吸引住。从此，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渐渐地扎下了去远航朝觐的思想根底。为了使这根儿有朝一日开出花儿，结出果儿，他学习划船、使帆、游水，并博览群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不料在他十几岁时，一场横祸从天而降。原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消灭盘据在云南一带的元朝残余势力，派大军征讨，战火肆虐，百姓流离失所，三宝一家也遭到

浩劫。而最使三宝伤痛的，乃是他被明军俘虏，押至南京强行作了阉割，送往深宫当了太监。从此，一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的后生，失却了做男子汉的资格；一个天真烂漫、满怀憧憬的少年，再也无法去实现远航的梦想，怎不令他肝肠寸断。孑然一身，无依无靠的小三宝，在皇宫难熬难忍，度日如年。不久，他又被当作"礼物"赐给了燕王。当时的燕王朱棣镇守北京，他见新来的小太监聪明伶俐，手脚勤快，一表人才，很是喜欢，便留在身边使唤，三宝成了燕王府里一位受到重用的内监。公元1398年，明太祖驾崩，其子朱允炆登上皇位，号称惠帝。惠帝登极之后，即同亲信商量对付皇叔们的办法，先后把周王、湘王、代王、齐王等人囚禁起来，由于燕王镇守北平，兵强马壮，实力雄厚，他没敢轻举妄动，只是派人打探燕王的虚实，伺机出师，一举歼灭。燕王朱棣自信才智过人，又手握重兵，但兄长死去以后并未得到继位的权力，不免耿耿于怀，如今见各位王爷个个惨遭侄儿毒手，更加愤愤不平。1399年8月，燕王朱棣率领"靖难师"，浩浩荡荡地向南进发。1402年6月打过长江，南京城落入燕王军队手中。三年的靖难之役结束了，朱棣黄袍加身，成了明朝第三位君主，人称明成祖。三宝由于战前主战，战中出入敌阵，并为保护燕王出生入死，屡建奇功，晋升为内官监太监。次年明成祖又在皇宫举行赐姓仪式，亲笔题了一个"郑"字，赐予三宝。从此，马和便改称郑和，成为明成祖朝廷里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于郑和的形象，与他同时代生活，当时誉为第一大相术家的袁忠彻作过如下描述："内侍郑和，即三保也。云南人。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法反此者极贵。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可见他绝不是一般宦官那样的中性人物形象，而是一位相貌堂

堂而身材魁梧的人。

明成祖即位之后，国家基础渐渐得到巩固，逐渐克服了伴随着王朝更替的动乱和“靖难之变”的内讧而带来的破坏，以农业为主的诸项产业，包括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这种新兴国力为背景，朝廷考虑到向海外发展。当时，海外贸易也是那个时代的要求，自宋、元时代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曾持续发展，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拥有卓越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基础。明朝建立之初，由于张士诚残余势力一度盘踞于东南沿海岛屿进行抵抗，朱元璋曾实行海禁政策，严禁国民航渡海外，并把贸易范围限制于朝贡贸易形式，其实就是向海外诸国游说到中国来贸易。这种为适应明初政治状况而与时代趋势背道而驰的闭关政策，到明成祖时已引起国内政治、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失调，并影响了明政府与海外诸国的关系。尽管如此，作为祖宗成法的朝贡贸易不能轻易改变，民间贸易也不允许重开，能做到的事是只有在朝贡贸易的基础上，进行更为直接的贸易活动，即由政府本身来组织对外贸易。因此，明成祖作出了“出使西洋”的重大决策。当然，除了国家的政治经济需求，成祖的心目中也有对海外诸国炫耀明朝实力、促进朝贡的意向。正如后人所分析的，明成祖担心已黜建文帝朱允炆的行踪，并准备铲除反明残余势力和与邻国建立军事同盟的目的也可能都是促使他考虑下西洋的重要因素。当然，“下西洋”不只是由于中国一方的动机和目的而筹划的，它亦与对方国家的利益息息相关。应该承认，“郑和下西洋”是在 15 世纪前半期，东西两个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把以东南亚至印度洋、阿拉伯海为舞台的国际通商圈的存在作为前提，以谋求其扩大

的目标，并与这种结构的变动对应而不断展开的重大海上活动。明成祖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的目光不仅限于中国，而且正确地顺应了国际社会的要求，果断地下达了派遣以郑和这个回族穆斯林为钦差正使统率贸易船队的决心。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海上活动，而且是直至 15 世纪初，在人类所进行的同样事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它的面前，被誉为“大航海时代”的迟于其几十年的种种外国人航海业迹，便相形见拙了。而郑和的功绩，则是没有辜负朝廷的厚望，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把事业干到底的勇气和统率庞大船队的组织能力。在整个洪武、永乐年代，带着同样目的赴海外者不光是郑和一人，但数他最为著名，尽管他出航次数比别人多，然而最受人称赞的不光是他的事迹，还有他作为一个穆斯林从小培养起来的开拓眼光和坚毅素质。

在郑和的航海活动中，有一些回族穆斯林参加，船队所访问的也大部分是伊斯兰国家，这与保证这场航海的成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明朝初年，朝廷对伊斯兰教的政策是尊重的，正是在这种宽容的气氛中，使回回这个穆斯林民族得以在明代逐渐形成。在另一方面，穆斯林商人早就活跃于自印度洋至马六甲海峡的地域，其中一部分还长时期和中国交往，与之相对应，中国商船也早已到过印度洋。可以认为，环绕印度洋而依照伊斯兰教秩序的通商圈在宋元以来已经确立了，因此只要这种秩序不乱，贸易就能在平稳中继续。多达七次的郑和通商航海，几乎始终都很顺利，就是因为明成祖在确定统帅人选和批准行动计划的时候对上述形势有正确的认识，因此使整个“下西洋”活动具有不同凡响的国际威望。虽然传说明成祖在任命郑和前，曾让专司星相的袁忠彻为郑和看过相，袁回

禀道："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臣查其气色，诚可任。"但恐怕这都是次要的原因。郑和的成功基本上是因为严格遵循了当时环印度洋诸国的伊斯兰氛围而事事处处用友好互利的态度处事行动，如果说为了追求贸易利益而行使必要武力，那只有在信奉佛教的锡兰，当然，郑和的做法既符合当时的国际潮流，也出于他自己的心愿。因此，当代日本史学家寺中隆信在《郑和——联结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航海家》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见解："应该说，'郑和下西洋'即是以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为主角，以东南亚、印度、西亚各国的伊斯兰教徒为配角而展开的不平凡的伊斯兰教的事业。倘若如是，成祖的意图另当别论，而在中国的伊斯兰教徒中间，说不定还带有探求由海路到麦加巡礼的可能性这样的目的。"

领受了"下西洋"君命的郑和，因为少年时的梦幻有可能实现，其欣喜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他很快布置了造船事宜，在各地分头赶造各类船只。经过一年多，62 艘宝船先后竣工，其中最大的宝船长 44.4 丈，宽 18 尺，有 9 根桅杆，12 张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坚固的航船。此外，还建造有专门的马船、粮船、水船和战船，以保证几万人的庞大船队长期航行所需。在七次远航中，每次都有 100 多艘船只同行，有时多达 200 艘左右。随行人员都经过严格挑选，认真训练，各自分工明确。在 27800 多名人员中，仅医官医士就有 180 多人。永乐三年（1405 年）夏六月乙卯（15 日），62 艘宝船和 40 多艘辅助船秩序井然地离开江苏太仓刘家港，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一幕由此揭开。

郑和出身于"哈吉"世家，他跟伊斯兰教的关系，除了表现在认真履行钦差使命，积极发展同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经济联

系外，还在个人生活及处理航海工作时的具体做法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远航归来后曾专程回乡为父、祖祭扫，并在碑文中突出他们的朝觐者身份。据云南和南京两地流传的家谱所载，郑和是元初累官至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咸阳王的赛典赤·赡思丁之第六世孙。这一记载虽尚待寻求更多的有力佐证，但郑和的父亲与祖父是到过麦加朝觐的“哈吉”，则可凭他为父亲立的《故马公墓志铭》及墓碑为实证。“墓志铭”是郑和奉使第一次远航前夜（1405年），委托当时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志刚撰写的，其中主要内容有：“公字哈吉，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妣马氏，父哈吉，母温氏。公生而魁岸，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己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护周给，未尝有倦容，以故乡党靡不称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为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谨明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勚，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由于首次远航出发在即，郑和没来得及亲自送铭文还乡并参与追记立碑仪式，但也能窥测这是他在远离祖国之际所萦怀惦记、非了却不可的一件心事。撰铭文者是根据郑和口头提供的情况所写，但铭文明确提到父、祖是“哈吉”，详及父亲的生卒年、月、日，可知他多年来牢牢记住自己是穆斯林的后代。此外，从碑阴右上角所刻的文字看，系对他第三次远航归来后获准回乡的记载，主旨是对“祖宗坟茔祭扫追荐”，时间长达40多天，而那段时间恰好是伊斯兰教的斋月。郑和选定这个月追荐亡父，在家乡度过斋戒期，沐浴馨香、把斋礼拜，完全符合回回民族的宗教习

惯。

第二，郑和在远航中，吸收了一些穆斯林随员，其中有人去麦加作了"副朝"，在历次远航的浩荡行列中，少则27000余人，多则3万人，文武齐备、应有尽有，包括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书、木匠、梢人等，其中也有一些起过重要作用的穆斯林。比较著名的有副使太监洪保，他是著名的留存至今的刘家港石碑和长乐石碑中都有名可查的人物，早就跟西洋番国打过交道，去那里出使过，同郑和共过事，并亲自参与过问派人往天方国访问和进行"副朝"的事。据马欢《瀛涯胜览·天方国》记述："宣德五年(1430年)，钦蒙圣朝差正使太监内官郑和等往各番国开读赏赐，分䑸到古里国时，内官太监洪保见三国差人往彼，就选差通事等七人，赍带麝香、磁器等物，附本国船只到彼，往回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麒麟、驼鸡等物，并画天堂图真本回京，其默伽国王亦差使臣将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献赍于朝廷。"这次有明确记载的天方国之行，即使没赶上一年一度的朝觐期，也应该是一次朝天房的"副朝"，被允许进入克尔白并"画天堂图真本"者，当然必须是穆斯林，他们是作为船队中所有穆斯林的代表被选派搭便船而去的。有意思的是，日本史学家岛彦一在新发现的埃及马木鲁克王朝阿拉伯文的史料中，竟然找到了对这件麦加巡礼事件的记载："希吉来历835年2月22日从麦加传来如下消息，数艘戎克从支那到达印度的海岸，其有两艘停泊在阿丹海岸。……那两艘戎克的首领便向麦加的埃米尔……呈递了书信，要求准许他们前往秩达(吉达)"，马木鲁克王朝的苏丹批准了这次来航，并要求"殷勤地接待他们"。希吉来历835年2月22日，是公元1432年6月22日，也就是宣德七年五月二十

五日，当年马木鲁克王朝的史料和《瀛涯胜览》记载基本相符。至于担任通事的马欢、郭崇礼，他们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是多次随郑和远航的穆斯林。在明监察御史古朴撰写的《瀛涯胜览·后序》中，明确提到"崇礼乃杭之仁和人，宗道（马欢字）乃越之会稽人，皆西域天方教，实奇迈之士也，二君善通番语，遂膺是选，三随軿轺，跋涉万里。"马欢撰著的《瀛涯胜览》，是具有珍贵文献价值的远航纪实之一，在反映各国穆斯林情况方面，比费信所撰的《星槎胜览》和巩珍著述的《西洋番国志》更为翔实、准确、具体，如该书记载"天方国"时的详尽程度，可以使我们相信马欢即是上述参加克尔白"副朝"的7名远航随员之一。《瀛涯胜览》一书中除了个别地方有误，绝大多数符合当时当地实情："此国即默伽国也，自古里国开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个月方到本国码头，番名秩达，有大头目主守。自秩达往西行一日，到王居之城，名默伽国，奉回回教门，圣人始于此国，阐扬教法，至今国人悉遵教规，行事纤毫不敢违犯。其国人物魁伟，体貌紫膛色。男子缠头穿长衣，足着皮鞋，妇人俱戴盖头，莫能见其面。说阿剌毕言语。国法禁酒，民风和美，无贫难之家，悉遵教规，犯法者少，诚为极乐之界。婚丧之礼，皆依教门体例而行。再行大半日之程，到天尽（禁）礼拜寺，其尽番名恺而白，其周垣城，其城有四百六十六门，门之两傍皆用白玉石为柱，其柱共有四百六十七个，前九十九个，后一百一个，左边一百三十二个，右边一百三十五个。其堂以五色石叠砌，四方平顶样，内用沉香大木五条为梁，以黄金为阁，满堂内墙壁皆是蔷薇露、龙涎香和土为之，馨香不绝。上用皂纻丝为罩罩之，蓄二黑狮子守其门。每年至十二月十日，各番回回人一、二年路远的也到堂内礼拜，皆将所罩纻丝割取一块为

记验(念)而去。剃割既尽,其主预织罩之仍复,年年不绝。堂之左司马仪圣人之墓,其坟垅俱是缘撒不泥宝石为之……城内四角造四堆塔叫礼,左右两傍有各祖师传法之堂,亦以石头叠造,装饰极华丽。…… 又往西行一日,到一城名蓦(麦)底纳,其马哈嘛圣人陵寝正在城市,至今墓顶豪光日夜侵云而起。"

著述《星槎胜览》的费信、金天翔在《续云南志稿·郑和传》中认为他是"天方教人"。费信随航次数比马欢多,但其著作"国名多而记载微简",后人曾猜测他可能不一定懂阿拉伯语。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随员是西安大学习巷清真寺教长哈三,其人虽然跟马欢、郭崇礼等都是通晓"番语"的穆斯林翻译,但哈三还另外具有宗教专业人员的特殊身份即掌教(伊玛目)。凭籍这一身份,在伊斯兰国家或地区,哈三对沟通情感建立友谊能起重要的桥梁作用。据《西安大清真净寺记》载:"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诸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郑和特邀哈三随行,既是对外交流的需要,也反映了郑和的穆斯林情感和船队中穆斯林成员的宗教生活比较严格。如在航海中由"伊玛目"依教法宰牲,才能保证穆斯林随员放心地吃到肉食,又如对航海中以身殉职的回回人,由哈三主持伊斯兰教土葬或水葬殡礼(举行"者那则"),才能告慰亡人和周围的穆斯林。船队中还有一些行迹近似穆斯林的人,尤其是在下层人员中,如火夫厨师等人中必然要配备穆斯林,否则在漫长的漂流生涯中,像哈三教长这一类对饮食习惯特别讲究的人,就无法使用清真食品。此外,传说航船在苏门答腊追擒喃渤利,并俘其妻子回来时,海中"风涛横作,几至危险",多亏哈三向安拉默祷,才使

“风恬波寂，安妥得济”。于是郑和发誓重修哈三主持教务的西安清净寺，使西安回族至今引以为自豪。从保留至今的《郑和航海图》来看，还清楚地反映了他们曾熟练地利用阿拉伯人的天文知识的事实，因此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航行时，获得了很高的安全系数。假设船队的主要成员不是穆斯林，并且是由对伊斯兰文明毫不关心，毫不理解的人来指挥，大概就不会有对阿拉伯航海技术的积极引进和利用。因此，郑和下西洋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融合的产物，是 15 世纪世界上中阿技术大交流的成果。

第三，郑和曾在泉州灵山伊斯兰教先贤墓前行香，在清真寺祈祷。据《泉州灵山回教先贤墓行香碑》记载，郑和在第五次出航前，于“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行香的日期是公元 1417 年 5 月 31 日，在唐宋之际行香的地点泉州是穆斯林“蕃客”、“胡商”来往频繁的重要港口，也是伊斯兰教在我国早期传播的发祥地。郑和至泉州清真寺礼拜，并到郊外灵山回教早期来华传教的“三贤”、“四贤”墓前行香，既反映了他对伊斯兰教先贤的缅怀景仰，也体现了作为穆斯林特有的宗教情感。应该注意的是，《行香碑》记立者“镇抚蒲和日”就是个穆斯林。据《蒲氏家谱》载，此人“秉清真教，慎言微行，礼拜日勤”，曾资助修缮当地清真寺，并参与郑和的第三次远航，以“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功封泉州卫镇抚司”。在最近发现的泉州港史料《西山杂记》中，又记述郑和等在泉州“选大船百艘”，还曾在首航下西洋前“上九日山（在泉州南安），祈风，至清真寺祈祷。满载陶瓷锦绣布帛，历漳、潮、琼崖至古城”。看样子是为出航选择贸易商品。

第四，有的学者根据多种资料，推测郑和在下西洋的时候

可能亲自去过麦加，即明代所称的“天方”。他们认为《明史·郑和传》、明人古朴所作《瀛涯胜览·后序》、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谈迁《国榷》卷十三、陆容《菽园杂证》及近人李士厚《郑和家谱考释》等书中都提到郑和曾亲自去过天方。他们还根据多种材料作出分析，认为郑和是于第4次下西洋时去的天方。其理由为：(1)第4次下西洋是首次访问阿拉伯国家，郑和作为穆斯林，机会难得；(2)下西洋耗费极大，随时有可能遭反对派阻止，因此必须抓紧机会一偿朝觐夙愿；(3)以往云南穆斯林去麦加朝觐都要出缅甸或越南，由水路前往，耗时需几年，现在郑和自己率船队西行，麦加近在咫尺，岂有不去之理；(4)郑和第4次下西洋时，一开始就有去天方的打算，去西安请了哈三教长，又让通晓阿拉伯语的马欢随行(马欢第5次未出访)。由于朝觐事先要作各种准备，路途还要耗费时间，所以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郑和奉旨，实际上于次年冬季出发，又于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才返回，在国外大约呆了一年又八九个月的时间。有人认为郑和去麦加的时间，应在永乐十二年，即1414年年内。要确定郑和真的去过麦加，当然还需要发掘出更加有力的资料才能作出定论。因此，上述推断，目前只能认为是一种猜测，不能据此认为郑和一定亲自去过麦加。但上述一系列见解肯定了郑和自身有明显的穆斯林信仰倾向，则基本上是符合其身世和思维逻辑的。其实，在明代万历年间罗懋登所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一书中，就明确提到“三宝老爷原是回回出身”，言之凿凿，无从怀疑。罗懋登的《西洋记》虽有“文词不工，更增支蔓”的缺点，但它反映了在对外国已经有了比较精确的认识的明朝，文学家是怎样把现实成分与幻想成分结合起来而创作长篇小说的。《西洋

记》里有一章通过想象塑造了郑和亲临麦加并去克尔白"礼拜伸谢"的故事，其中有些内容系参照马欢《瀛涯胜览》中关于默伽国的记载，也有些细节系作者进行文学加工，但该书把郑和作为去麦加巡礼的主人公，也许作者自有类似的证据和别的什么道理吧！该书这一部分的章名就叫做"天房国极乐天堂，礼拜寺偏多古迹"。对郑和去麦加朝觐有下述想象性的记叙：

郑和到了阿丹国后，国王告诉他，回回地"极西上有一个祖国，叫做天堂极乐之国"，不久，天堂国派三个通事、四个回回前来迎接郑和一行。郑和随之抵达天堂国，"国王亲自迎接，帐上相见"，"说的是阿剌比语言。跟随的头上缠布"，"都生得深紫膛色"。三日后，郑和"亲造其国。只见风景融和，上下安帖，自西以来，未之有也。国王迎接进城，盛设筵宴，大飨诸将。只是不设酒，回回教门禁酒故也。元帅(郑和)道：'大国名天堂么？'国王道：'敝国即古筠冲之地，名为天堂国，又名西域。回回祖师始于敝国阐扬教法，至今国人，悉遵教门，不养猪。不造酒……是个极乐之国。'元帅道：'大国有礼拜寺，在那一厢？'国王道：'在城西，离城有半日程途'"。郑和表示要"亲自去拜谒一番，少伸谢意。"国王自愿陪同。"到了礼拜寺，只见寺分为四方，每方有九十间，每间白玉为柱，黄玉为地。中间才是正堂。正堂都是五色花石垒砌起来。外面四方，上面平顶，一层又一层，如塔之状，大约有九层。堂面前有一块拜石，方广一丈二尺，是汉初年间从天上吊下来的。堂门上有两个黑狮子把门，若行香进谒的，素行不善，或是贼盗之类，黑狮子一口一个，故此国中再无贼盗。堂里面沉香木为梁栋、栎科之类，镀金椽子，一年一镀，黄金为阁溜，四面八方都是蔷薇露和龙涎香为壁。中间坐着的是回回祖师，用皂纻丝罩定，不见其形。面

前是一面金字匾，说道'天堂礼拜寺'。每年十二月初十日，各番回回都来进香，赞念经文，虽万里之外都来。来者在皂纻丝罩上，剜割一方去，名曰香记。其罩出于国王，一年一换，备剜割故也。堂之左是司马仪祖师之墓，墓高五尺，黄玉叠砌起来的。墓外有围垣，圆广三丈二尺，高二尺，俱缘撒不泥宝石砌起来的。堂在左右稍后有各祖师传法之堂，俱花石叠砌而成，中间俱各壮丽。寺后一里之外，地名蓦氏纳，有麻祖师之墓，墓上毫光日夜侵云而起，如中国之虹霓。墓后有一井，名为阿净糁，泉甚清冽，味甘。下番之人取其藏在船上，若遇飓风起时，以此水洒之，风浪顿息，与圣水同。说不完的古迹……名官礼拜伸谢。""却说三宝老爷原是回回出身，正叫做回龙成祖，好不生欢生喜，赞念经文，顶天礼拜。"虽然我们至今仍没有掌握郑和亲自去麦加朝觐的确凿史料，但前人对此事所作的种种想象，也可以说反映了广大穆斯林的一种心愿吧。

郑和从首次到第七次下西洋，前后经过近三十年(1405年到1433年)，对亚洲、非洲的30多个国家进行了访问，促进了中外交通、国际文化交流和中国沿海居民的海外活动，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一行涉沧溟10万余里，最远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把中国人民的友谊撒向南海和印度洋沿岸的广阔土地，他们航行路线之长，航海技术之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他们绘制了40幅海图，留下了关于南海和印度洋的许多重要记载，为航海和海洋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于郑和家族及其下属穆斯林具有神秘色彩的朝觐天房经过，不仅是我国穆斯林朝觐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朝觐活动之一，而且早已成为穆斯林群众喜爱的民间故事，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二)清代回回阐述“聚约” “以儒释伊”著书为据

明朝后期，由于伊斯兰教已成为新疆维吾尔等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而内地及沿海的回回也逐渐形成回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因此不光在史籍（如利玛窦所著《鄂本笃访契丹记》）和碑铭（如《昆阳马哈吉碑》）中出现了涉及穆斯林朝觐活动的片断记载，一些著名的伊斯兰学者亦在明末清初出版的汉文译著中认真阐述“聚约”（即朝觐）的规范和意义，比较有代表性的为王岱舆、马注、刘智等人。到了清代中后期，海禁逐渐废弛，交通也渐趋方便，因而出现了马德新于道光年间赴麦加巡礼游学归来，并撰写出我国第一部朝觐问题专著——《朝觐途记》的盛举。

王岱舆（约1580—1660年）系明清之际中国回族穆斯林学者和经师，著名译著家，晚年别号真回老人，金陵（今江苏南京）人，祖籍阿拉伯，与刘智、马注、马德新同时被誉为“清代四大回族学者”。在他的著作中，比别人较早地论述了朝觐问题。明代初年其先人随贡使到中国，因其先人擅长天文学，明太祖时在钦天监任职，并在南京敕建净觉寺供其居住，世代免除徭役。王岱舆因承家学，熟悉伊斯兰教教义和阿拉伯、波斯典籍，成年后，攻读性理、史鉴之书，旁及百家诸子等中国传统文化，被誉为“学通四教”（指儒、佛、道及伊斯兰教）。后专攻伊斯兰教义，立志用汉文介绍伊斯兰教。他长期从事译著，喜欢用伊斯兰教的教理与人辩论。晚年北上京师，于正阳门外讲经，去世后葬于北京三里河清真寺墓地。著有《正教真诠》、《清真大

学》、《希真正答》等汉文译著，流传颇广。在被世人称作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伊斯兰文汉译著（明崇祯十五年，即 1642 年刊印）《正教真诠》中，王岱舆论述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基础、安拉德性、伦理道德及教法制度等，并将伊斯兰教的五功比喻为经常开启穆斯林心灵的五把钥匙，所以他称作"五常"："正教之五常，乃真主之明命，即念、施、戒、拜、聚之五事也。因人之表里，乃色妙相借，连环互合，其为锁也。兹锁有眼、耳、鼻、舌、身之五窐。其窐必以五常之五匙，方能解脱也。是锁若开，自然贯通，自然无疑。倘有蔽塞，诚醉梦耳。"

王岱舆把朝觐称作"聚"，他围绕聚、约、信三者关系，作了深入分析："五常之末，曰'聚'，聚会之谓约，全约之谓信。其约有二：曰'先天之约'、曰'后天之约'。爰自开辟之初，降人祖于天房，天房居于四极正中，如国之有君，身之有心，日影可证焉。然后阿丹人祖，遵真主之明命，而后有正教，教化日行，人物日增，则流于天房国外，流被渐远，日趋于迷，旁枝侧脉始于此矣。真主垂悯世人之离散，顿忘自己之从来，敕命阿丹人祖阐扬大众，平生一次朝觐天房，割爱离家，古今相继，为不忘历来之根本，相承正教之遗踪，更遵真主之明命，此后天之约也。及至此间，行其庭宇，不见先人；朝阅天房，复思原走。自豁然开悟，天地是何造化，前人归回何方？有无如梦，富贵如尘。忆起先天何处，后天何所？此地风光，无非客途之幻景，未是吾人之长住。是时省悟，随即斩断万缘牵绕，超越生死关头，忆还无极之乡，完结先天之约，复命归真，一心向主，此正教聚会之信也。"

另一位较早谈论朝觐问题的回族学者是马注（1640—1711 年），"字文炳，号仲修，经名郁速馥，云南金齿（今保山）

人，据说是元代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的十五世孙，故称作"赛依德"——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马注年少孤苦，发愤读书。1657年，南明桂王永历帝在位，马注被荐任中书和锦衣侍御，后南明覆灭，他"僻隐教读，笔耕自膳"，结交滇中名士，著书立说，文史并盛。专攻伊斯兰教经典，涉及佛籍，曾撰作《樗樵》、《经权》两文集，未获传世。1688年离滇出走，到达北京，沿途结识不少伊斯兰教学者，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由喜文章，求功名，转而从事伊斯兰教教义的研究。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将历年潜心研究的学术心得，辑为《清真指南》十卷。此书未刊行前，各地穆斯林已争相传抄；既刊之后，风行海内，寺院经堂竞相采用，被视为伊斯兰教经典之作。

在《清真指南》卷四"因教篇"中，马注这样写道：对真主至诚有六种要求，其中之一，即是领命，"所谓领命者，如五时拜，钦月斋、天课银、大小净、游天房、习学经典、忠君孝亲、敬师尊长，一一皆属主命。穆民之与外教无所分别，惟此数事。"在该著作卷九"认己篇"中，马注针对朝觐的宗教意义作论述道："世态繁剧，尘缘易蔽：可染熏煎，逐队随波。真主恐人之昧其本而忘真也，故谕以认、礼、斋、济、游之五命。圣人遵之，以修道言教，垂训万世。""游亦有五：眼如闻天语之声，鼻如闻天国之香，身如处天国之地，舌如对真主之言。临深履薄，悚惧恐惶而游之道得矣。"按他的见解，朝觐者的心情必须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如果能做到这些，巡游天房的道理也就懂得了。在卷九"附答篇"中，马注又认为："主降天房，定为人神朝向，平生一次，属于天命。缘人生四达，路远道长，以七朝礼，一年不脱，准此一次。经云，朝拜之人，自家至寺，按每一步书他十件好，勾抹十件歹。"意思是说麦加是人神朝拜的方向，每个穆斯林

一生到麦加朝觐一次是真主的命令。因为人生活在四面八方，距麦加的路途有的遥远而漫长，不可能都具备条件前往。平时只须每7天的“主麻儿”(聚礼)日举行礼拜一次，便算是到麦加朝觐一次。马注还举经书之言为例证：“礼拜的人，从他的家中出发步行到清真寺，沿途每走一步，真主要算他做下十件好事、勾销他所做的十件坏事。”

在清代四大回族学者中，刘智(约1655—1745年)关于朝觐的论述最为全面丰富。他字介廉，金陵(今南京)人，出生于虔诚的穆斯林之家。青年时期博览经、史、子、集及佛、道典籍，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他师事伊斯兰教学者李寿、袁汝琦，在学术思想上，又深受马注“以儒诠经”和“借儒以自重”的影响。学成之后，避世山居20余年，先后完成译著数百卷，但刊行问世的仅50卷左右。其代表作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等，历来深受国内外人士赞赏。《天方至圣实录》于乾隆四十七年进呈御览，被收入《四库全书提要》存目，此外，还著有《五功释义》、《真镜昭微》、《天方字母解义》及《天方三字经》等。晚年移居金陵清凉山，闭户著述，逝世后葬于城南郊扫叶山麓。

刘智的《天方典礼》共20卷，不但是一部伊斯兰哲学典籍，也是一部根据伊斯兰教礼法，系统论述回族穆斯林履行天道五功、人道五典及在居、用、服、食等方面行为规范的著作。《天方典礼》第八卷是专门论述朝觐的篇章，着重介绍礼仪情况，内容如下：“朝觐者，亲诣天阙，以返其所自始也。期月一朝。先期备行。比至关，受戒。先洁己沐浴。易服，佩香。礼拜致告。诵应辞，人戒露顶，裸足，不衣黄紫，不佩容臭，不嗅香果，不涤首，不剃发，不齐髭，不剪指，不取一切修饰，不杀一切

生灵。服戒衣。至墨克，先朝谒。寓弥拿。饮日饮牲。厥明，王侯官庶，咸洁己沐浴。王步履出郊，百官十庶从之。大会弥拿。王登坛告谕。晨，驻尔立法堤。正仪面厥，时或高诵应辞，时或恭默念主。暮驻'母子得理缚'，厥明，归弥拿。大射。凡三射。初射中射，射于本山；终射，射于尔胳白。止应辞。宰牲。开戒。斋戒沐浴，盛服佩香。弁冠入觐。抚石。周回克而白七匝。每过石，必抚。每游行必赞。临位礼拜，致祈祝。出至索法，登绝顶，仰天面厥面赞、而颂、而告，默致己衷，陈其志之所在，下径白土泥川，趋于两墩之间，至默尔栐，登绝顶，事如索法。复入拜阙，悉如前仪。归弥拿。厥明，复射。翌日，终射。已。归必辞朝。谒陵。探泉。复诣阙，抚幔，拊擗，怃然鞠躬而退。《经曰》：'穆民必朝，路艰可待'。《传曰》：'路塞乏用，无亲命，废疾，可无朝。'《道行经》云：'朝之为言，会其纷散，而返乎其本也。'省亲、亲贤、阅心、念主，其亦犹之乎朝也。"《天方典礼》又名《天方典礼择要解》，即作者为使读者掌握天方礼经要义，在正文之外又增加了各类注解，分别用小字排出，"有实义，有广义，有考证，有集览，有问答，有附论。集览、考证，多儒者之语，余皆天方各经传中采辑而成。"如正文第一句"朝觐者，亲诣天阙，以返其所自始也。"其注文为："天阙，即朝堂，又曰天房。盖造物设之，以作万方朝向者也。其地在天方之墨克国。墨克，实下之祖国也。天方。乃天地正位，在大地之中，墨克又在天方之中，而朝堂又居墨克城之中，故万方之向朝堂，犹四体之朝心也。人之所以必当亲诣朝觐者，返乎人生之始处也。"

如果说到刘智在《天方典理》中阐述了朝觐礼仪，则他在《五功释义》一书中从仪、法、义、理、证等五方面详尽分析了朝

觐对穆斯林的价值。《五功释义》共 63 章，象征穆罕默德在世 63 年，论述朝觐的内容占了 5 章。第 28 章“朝仪”论述：“朝觐者，身心财货，均至乎主，而以返其初也。天方其生人之始地也。期月而朝，至关受戒，沐浴易服，不饰装；不宰牲。先朝谒，饮日饮牲，厥明大会弥拿(墨克南郊)。王帅群僚士庶，晨驻而里缚堤(山名)，夕驻母子德里缚(山名)。昧爽归弥拿，大射，开戒。宰牲、沐浴。盛服，佩香，乃入觐抚石。游庭七匝(天房)。临位礼拜，致祈祝，出登索法(山名)，仰天朝阙(即天房)，而赞、而颂、而告。下径白土泥川，趋于两塹之间，登墨而袜(山名)，事如索法(山名)，复入拜阙，如前仪。归弥拿，厥名复射，翌日终射。谒陵。探泉。归复辞朝。”

第 29 章“朝法”论述：“夫朝者，五功之总归，而天人之大会也。念不辍于心，词不辍于口。拜焉，谨趋，跄而昭对越。斋焉，谨外制内，而制身心于无为之境。财不用，私不减，称其所有而力行之。自居而途，自近而远，割爱离乡，崎岖跋涉功行之中，莫勤于此，莫劳于此。爱焉而不自爱也，毋谓观瞻，毋谓远离；毋谓身至而即为功。严防乎戒，慎宠乎事，内外精严，极尽乎诚敬而已。”

第 30 章“朝义”论述道：“人惟怀土之念深，则契道之念浅。朝觐者绝域登途，去所贪恋，以近乎其本原也。夫朝觐之人，割爱离家，崎岖跋涉，而后乃诣其境。则凡修道之人，亦必镨克己私。勤修苦行而后乃还其真。此借有形之朝，以起无形之朝也。善朝者，身向而心亦向之矣。远其私欲之乡，逾一切好恶之界。至礼仪之关，新归洁之沐浴，脱人欲衣，服天理戒，登明识山，会常安邦，宰气欲牲，然后入亲主之禁。所抚机微之悬石，拜伏于契合之圣位，即接浑化之天房矣。外之所朝者，似

乎趋跄之迹犹存。而内之所朝者，浑乎真宰之体为一矣。修道之功，岂复有过于此者哉。《经》曰：'弃尔来'。谓弃尔己私，来于天理，此朝觐之实义也。"

第32章"朝理"则论述道："朝曰归，义旨尽矣。归者，人所公欲，而万物自然之情也。旅人之还家曰归，使臣之复命曰归，鸟之返林，鱼之下渊，百川之汇海也，皆曰归。归，盖出于人物之自然，而无强勉之情也。欲归而遏之不使归，何不自然之甚；归焉而未止于其境，何不自安之甚。虽然人之处于外也，必有所为而来，底事未尽，则亦难言乎归。人之处世，旅之寓也，将必归。必有所为而来也，尽其事，而后乃可归。圣人尽其事归矣，而悯人之弗归，复作法以导之归。贤者效之，而率人归。智者从之归，愚人不欲归，惟嗜欲是恋，渐至流荡忘返，而终于不知归。朝觐一功，乃指其归境，而勉之归也。夫归自然之事，何须勉？上人不勉而归，中人勉之而归，下愚勉之而亦不归，此下愚终成其为下愚也。其不若物类也甚矣。"

第32章"朝证"最后归纳道："理境之于人，若朝堂之于天下也，无处不通，无人不可至。而惟人背之，则日趋于远，或向之而功程未尽，终不能到，是朝堂无阻于人，而人自阻也；朝堂无隔于人，而人自隔也。理境于人亦然，无人不可至此理，无处不可见此理，而惟人之向背不同，功夫各别，有圣凡贤愚之差异也。理本通而人自塞，理本明而人自晦。苟能一日返身而向之，而归于一原焉，则何圣凡贤愚之别乎！朝堂有远近，理无远近；朝堂有方位，理无方位。期月之朝，形迹之朝也，返身而试，则时时朝，处处朝。时时朝，则无念而不以主为思维。处处朝，则无动而不以主所命我者为遵守。念、拜、斋、课皆以一朝而包完；身、心、性、命皆以一朝而修尽；忠、孝、节、义，皆以一朝而

周全；天道人道，皆尽于一朝之功。故曰：朝者，百功之总会也，苟于身心之间，有一念一动之违于理，即为背真，即为朝之义无有矣。是故观人之朝者，观于其日用功夫而已矣，观于其举止动定而已矣。”

在清代四大回族学者中亲身经历过朝觐而又加以记述的当数马德新（1794—1874 年），字复初，云南大理人，出身于经学世家，为他攻读伊斯兰经典提供了优异条件。成年负笈陕西，系胡登洲“四传弟子”周大阿訇门生。道光博二十一年（1841 年）他赴麦加朝觐，漫游麦地那、开罗、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亚历山大等名城，广搜经典，与当地名流学者共同探讨“天方之学”达 8 年之久，所著《朝觐途记》即其旅游阿拉伯世界的见闻录。1848 年马德新载誉归来，在建水回龙、玉溪大营等回族聚居区设帐教学，求学之士“星列云集”。1856 年云南官府制造“丙辰之变”下令“灭回”，马德新一度站在斗争最前列，领导回民武装自卫，后惨遭杀害。晚年时他一度息影林下，完成波斯文、阿拉伯文和汉文译著 30 余种，代表作有《宝命真经直解》（中国最早的《古兰经》节译本）、《四典要会》、《大化总归》、《道行究竟》、《礼法启爱》、《天方历源》、《环宇述要》、《尔勒壁春秋》、《醒世箴言》、《会归要语》等。

《朝觐途记》原稿是用阿拉伯文写的，咸丰十一年（1861 年）由作者的“门人弟子”马安礼译为汉文，在昆明刻印问世。马德新朝觐时已 47 岁，尽管老之将至，可是“及其晚也，翻然于真传之未得，名师之罕遇，乃出滇南，历岭表，越漂洋，觐天庭。”他一方面在朝觐时履行了穆斯林的“天职”，另一方面在国外广泛学习。作者凭籍“朝觐”的行踪所至，以文字记载了阿拉伯世界的众多历史文物、古代遗址、遗迹的原貌以及风土

人情，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中国及西亚各国海、陆交通概况，对于研究西亚的人文政治、地理沿革、社会生活、交通运输，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据说国外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对《朝觐途记》的赞赏，超过了对作者的其他译著。当年马德新在麦加的故居，曾被当地群众保存下来。1939年纳忠先生随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去麦加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时，还专程去该处瞻仰。

清朝康熙年间回族学者赵灿编写的《经学系传谱》，是记述明朝和清朝前期我国回族、撒拉族中伊斯兰教著名经师之间的传承关系及其社会活动的唯一的一部留存后世的作品。该书稿只有四部手抄本流传，1988年才由青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成书。该书在介绍"冯通宇先生传谱"时，记录了其门人王明宇出国朝觐游学并取得成就的曲折经历。

王明宇系甘肃河州人，早年跟随在五原的小河川(今陕西定边)开设学堂的著名伊斯兰教经师冯通宇学习。他天性聪颖，勤奋钻研，又加上才思敏捷，口齿伶俐，所以接受老师的传授非常快，讲解起经典来言简意赅，通俗易解，同学们都愿意课下向他请教。他的老师冯通宇虽然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但寡言少语，不苟言笑，讲课时过于斟酌用词，因而迟缓生涩，枯燥无味，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同学们便纷纷向领悟较快的王明宇讨教。

冯先生看到学生们不听自己的讲学，反而去听一位学生讲授，面子上有些下不来，因此很不高兴，多次告诫王明宇让他不要做让老师难堪的事。王明宇也觉得这种做法对不住老师，就婉言拒绝同学们的请教，但是众同学因为再没有第三个人可以请教，还是不断来找他，这使王明宇左右为难，只能私

下继续辅导同学，其结果，是使师生间产生了更深的隔阂。不久，冯先生由于个性比较倔强，不能原谅和理解学生做法，于是就不再向王明宇教授伊斯兰教经典，任凭王明宇多次恳求，老师还是不答应，无奈，王明宇只得向先生辞别，请求准许他返回故乡。先生还是没有爽快的给他口唤(应允)，而是任其去留，处于这样尴尬的境地，王明宇只得返回家乡。虽然老师如此对待他，但他还是非常尊重老师。回家乡后王明宇与老师相隔很远，仍然没有擅自开学授徒，当然教学尚在其次，主要是因为没有新的经典可供他学习，而在当地又没有合适的老师可以请教。王明宇向往学到更精深的经典，于是他决定去朝觐天房，一方面可以完成自己的宗教功修，而另一方面又渴望在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学到更多的东西，真正一举两得。主意一定，就找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伴一起向西出发，经过玉门关，穿越西藏喇嘛教盛行的地区时，他曾被当地人抓住，由于宗教信仰不同，根本不可能对他有什么优待，逼着他做苦役，王明宇害怕不听从吩咐会被杀掉，就服从了他们。大约过了两年，从埃及来了一位伊斯兰教长，在此地德高望重，深受欢迎，当地王公贵族、庶民百姓都把他视为活佛。王明宇不知为什么在信奉喇嘛教的西藏地区，人们会对一位伊斯兰教长如此敬重，但不管为什么，反正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如果失去，就不知又要过多少年才能有机会离开此地。于是，他悄悄潜往教长的住处见他，用阿拉伯语，说自己是中国伊斯兰学者，请求教长予以解救。教长一听他是穆斯林，又精通阿拉伯语，非常惊喜，说愿意救他，并且向他建议："只要你作为我的老师，那么救你就很容易了。"王明宇听从了他的意思。教长就向当地王公说明，他的老师在其国中，希望能与他相见，王公命令

官员在国内查找，果然找到如教长所描述的人，送来见教长，这样，王明宇终于摆脱了困境，与这位埃及伊斯兰教教长同返其国。教长在途中向王明宇传授修性之学，只用很少的指点示范，王明宇即刻领会明白，且铭记在心，因此对教长十分感谢。虽然刚刚脱离险境，但王明宇始终把此次西行的宗旨挂在心上，于是又向教长诉说自己朝觐天房的志愿尚未完成，打算辞别教长继续奔赴麦加，教长很支持他，就带他到一个叫馨都可托呢的国家（系西域大国，管辖有80多个地区，出产大象）。这个国家的君主听说他们来了，即召入内庭，宾主见礼后，王明宇用波斯语流利地回答各种问题，君主对此很诧异，又对他进行各种知识方面的考察，发现其知识、口才及语言能力都比其国内专门从事这些工作的人更高超。

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国往往有不同风俗，其文字和经典也多种多样，诸如《白僚赫》、《呐哈旲》、《费格》、《克料谟》、《满推格》、《索赫特》这样的伊斯兰教认主学、古兰经学、法学等专门知识，往往一个人很难掌握全面，而王明宇几乎样样精通。因此，君主对王明宇具有的通才能力十分赞赏。第二天升殿，就命令王明宇坐在旁边，展看各国来函，并做出回复以应付来使。王明宇不一会发派完毕，该国的文臣武将，对他的才思敏捷很惊异，君主也愈发对他重视。君主又询问他的家庭情况，王明宇回答说："父母都已亡故。唯有一个妻子，当初曾经乞求我允许带她这地方来。"君主听后说："我想聘你为我的辅佐，可以吗？"王明宇乘机表白："我的本意是去朝觐天房，这件事待到朝觐归来以后再商议吧。"君主见他的态度非常恳切，就答应了。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王明宇终于得到朝觐天房的机会。

于是辞别国王继续向西出发。国王对他非常厚待，下令出动三艘赤色龙舟，派遣陪同大臣二员，卫士五百人一齐护送他前去朝觐。他们横渡大洋，途中经过二十多个国家，才到达天房，王明宇完成了终生的夙愿。他们所经过的国家，当地君王都用盛情的礼节对待他。过了五年多，又返回西域大国，国王很高兴。

当时正好有中国商人在该国进行贸易活动，有了解王明宇家世的人告诉他，他的妻子遵照丈夫的要求守节六年后还是不愿改嫁，后来身体欠安，已病逝几年了。王明宇非常难过，觉得很对不起妻子。国王听说这些情况后，就又命令他的宰相做为媒人，想招赘王明宇。王明宇回复说："糟糠之妻不下堂，我不敢答应，必须得到我岳父同意的信，才可以再娶。"正因为王明宇这样明礼，有涵养，国王更加看重他的人品，因此国王重重地赏赐了中国商人，让他们往国内河川带信。王明宇就修书三封，一封给岳父，一封写给冯通宇先生，一封写给他在小河川学习时住过的房东家。捎信人把信送到了杏园（长安附近）冯通宇家，冯先生接到他的来信，后悔地流下了眼泪，说："早知道他去很远的地域，不能再相见，当初我一定答应他留下来的请求了。"冯先生本想写封回信，但又没有送信之人，对许多年前的那件不愉快的事，老师真是追悔莫及。

后来，王明宇在异国，收到他岳父的来信，信中告知虽然王明宇的妻子已死，但他却如此尊重别人的感情，续妻之事还要由岳父同意，十分感谢他的仁义之举，应允他另择贤妻。得到确切答复以后，西域国王就把自己的女儿嫁与王明宇为妻，并让他代国王管理国家。数年以后，公主病死。西域国王又想把次女嫁给他。但王明宇因历经沧桑，饱尝人间酸、甜、苦、辣的滋味，宁愿脱离尘世，况且多年前埃及教长所传授的学问，

一直记在心里，很想仔细研究。于是，就辞谢婚事前去修行，国君见他意志坚决，知道也留不住他，于是，为他开设道堂。从此，王明宇潜心钻研伊斯兰教经典，教授该国的学生达数千人。做为中国人，他时刻思念着家乡，也想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但由于西域国王对他有知遇之恩，自己又不愿让学生半途而废；这样，一年一年过去了，直至客死异乡，终于没能再踏上家乡的土地。上述王明宇在海外的种种奇异经历，难免有传说修饰的成份，但王明宇那种为追求知识，完全五功而不畏艰险去麦加朝觐的生动事迹，却是对当年中国穆斯林朝觐者形象的一种真实写照。

(三)民国报章重视采访　巡礼消息及时刊载

清朝后期，由于封建政权的残酷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和云南回民起义先后遭到失败，在强化民族压迫的高压政治下，中国穆斯林的社会地位和精神境界同时处于低落之中。他们的宗教生活成了慰藉亡人和自己心灵的安魂曲，他们的朝觐活动更加艰难，在社会的长夜中默默地进行，偶尔露出一鳞半爪的消息，但局外人几乎一无所知，更不明白其所以然。

时代进入 20 世纪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越来越激烈的变化，在严重的内忧外患面前，中国穆斯林和中国各族同胞纷纷觉醒，并奋勇投入变革的洪流。从整个社会来看，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终于推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浪开始在神州大地澎湃激荡。从中国各民族穆斯林自身来说，呼吁民族平等解放的愿望已获得其他各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他们的正当宗教生活要求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尊重。时代变化了，穆

斯林民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同胞的观念也变化了，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虽然还是穆斯林自己的内部事务，但因其礼仪的独特和涉外性质，也成为民众之间沟通信息，增加了解的一桩社会新闻，开始经常出现于民国时的报章之中。当时，除了一些地方性报刊陆续刊登当地穆斯林朝觐启程、回程消息及报道有关的重大事件外，由穆斯林自己创办的各种伊斯兰历史报刊（指 1949 年以前在国内外，也包括香港地区出版的涉及中国穆斯林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乃至历史等方面内容的期刊和报纸，其总数不下百余种）更是报道中国穆斯林朝觐情况的主要新闻传播媒介。在穆斯林主办的报刊上介绍的朝觐活动内容，不仅有消息、有评论、有照片、有专访、有诗作，还有统计资料和见闻连载。

民国时期朝觐之所以从内部事务扩展为社会新闻，不仅在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还因为朝觐交通条件的改善，以及固定交通线路和集结地点的形成。过去因为交通工具不便，中国穆斯林往往根据各自情况，从西北、西南循陆路至出海口，或从东南沿海寻便船远航，因而旅行的途径多种多样，在时间上根本不能自主，完全要凭当时机遇而定。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以来，随着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和定期航班成为现实，东西交通已越益变得安全、准时，而上海作为一个东方大港，也成为中国沟通南洋和西亚、欧洲、美洲的海上交通中心。因此，除了新疆穆斯林仍按传统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转道阿拉伯海坐船赴麦加外，中国内地的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穆斯林朝觐者，都乐意取道上海前往圣地履行朝觐功课。渐渐地，上海自然形成近代我国穆斯林从海路赴麦加朝觐的集散地，每年由全国各地抵沪的朝觐者少则十余人，多则百余人，

他们从上海乘船抵沙特的吉达港转赴麦加。近代上海地区第一位去麦加朝觐的当数松江清真寺掌教拜登有(1839—1900年)。他是陕西临潼县海家庄人，1887年6月由麦加朝觐归国，途经上海时应松江穆斯林挽留任清真寺掌教，1900年逝世，葬于松江清真寺回回坟园，后人立碑纪念。继拜登有阿訇之后上海地区赴麦加朝觐的有浙江路清真寺教长马子贞(1891年)、福佑路清真寺掌教王裕三(1914年)以及哈德成、买俊三、达浦生等著名阿訇，他们朝觐归来，为上海地区伊斯兰教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使朝觐这项伊斯兰教功课为更多的教外人士所了解、关心。同时，上海穆斯林自1925年前后每年负担着接送朝觐者的职责，为哈吉们提供食宿，并协助办理护照，兑换外币，购买船票，组织迎送。尤其是当哈吉们回国时，上海穆斯林还组织欢迎行列，请哈吉们介绍朝觐见闻等。因此，上海在近代伊斯兰教历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当年有关报刊在报道伊斯兰教新闻时都把上海作为一个重点地区，关于朝觐的消息也大都从这里发出。但是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南沿海，从上海启程的海上朝觐之路被迫中断，有关朝觐的报道大部分停顿了。后来，在内地桂林、重庆等大后方出版的一些穆斯林报刊曾刊登少数中国穆斯林突破封锁前往朝觐的报道、日记和诗作。抗战胜利后，上海又成为朝觐的出发地，《中国回教协会会报》等也恢复对朝觐消息的报道。

(1)有关报刊在报道朝觐消息方面的情况大致如下：

创办于1929年10月的著名中国伊斯兰教刊物《月华》，是在抗战前朝觐活动处于正常状况时发布中国穆斯林朝觐报道和评述的一个主要阵地。早在1930年5月5日出版的第2

卷第 13 期，登载过王世明撰写的"朝觐须知"；1932 年 1 月 5 日出版的第 4 卷第 1 期，登载海维谅《来年之汉志及汉查士国王对汉志之各种设备》，介绍了沙特国王改善朝觐设施的各种计划；1932 年 2 月 5 日出版的第 4 卷第 4 期，介绍了 1932 年 1 月朝觐者共 49 人的情况；1934 年 9 月出版的《月华》第 6 卷第 25—27 期合刊本，透露了朝觐船讯；1935 年 4 月出版的第 7 卷第 11 期，则登载了"麦加之盛筵"的报道，介绍沙特国王在朝觐季节结束时宴会上的演说词，共有 800 位各国贵宾应邀赴席，中国穆斯林代表也在被邀之列；1936 年 2 月出版的第 8 卷第 6 期，刊发评述《朝觐之当然与重要》；1934 年 11 月 30 日出版的《月华》第 6 卷第 31 期，刊载了 1934 年"中国朝觐题名录"；在下一年 3 月 30 日出版的第 7 卷第 9 期，对上述名单进行了补充，刊登了更完整的"（伊历）1353 年全中国朝觐题名"，公布朝觐者人数为 178 位，除登出姓名外，还介绍了其籍贯。此外在该期和上一期卷首都刊印了"朝觐写真照片"，除麦加景色外，还有朝天房的情形、麦加的中国领朝人（即中国哈吉向导），及中国哈吉对领朝人的各种书面评价意见；1936 年 4 月 20 日出版的《月华》8 卷 11 期上又刊载了"（伊历）1354 年中国朝觐题名录"，1936 年从上海出发的朝觐者共 181 人，其中有 4 名儿童（随从）。应该说明，这些名录只指内地回族、东乡族等朝觐者，尚有部分通过其它路线前往朝觐的新疆各族穆斯林未及统计进来。

根据麦加专门接待中国朝觐者部门的统计，《月华》5 卷 17 期曾列出中国内地朝觐者的人数表，该表不包括每年由新疆直接通过中亚各国走陆路前往麦加的朝觐者，估计新疆各族穆斯林朝觐者每年逾千名，行程长短不一。

1923—1933 年中国内地朝觐人数表

民国纪年	圣 历	人 数
民国 12 年	1341	49
民国 13 年	1342	88
民国 14 年	1343	12
民国 15 年	1344	65
民国 16 年	1345	29
民国 17 年	1346	15
民国 18 年	1347	93
民国 19 年	1348	92
民国 20 年	1349	160
民国 21 年	1350	75
民国 22 年	1351	66

在抗战前刊载过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信息的主要刊物还有在广州创办的《天方学理》，其 1920 年 3 月出版的第 18 期上，刊载了"今年赴麦加朝觐之人数"，截止元月 30 日，各国朝觐者已达 22867 人，并正在增加。1936 年 4 月该刊第 74 期还刊登"哈止(朝天房)"一文，介绍朝觐礼仪。1934 年 11 月在南京出版的我国另一份重要伊斯兰教学术刊物《突崛》，在刊首显要位置刊登了"欢迎朝觐的贤达"的短评。此外，在上海创办而在东南沿海回族中有较大读者面的《人道》杂志，也于 1935 年 3 月和 5 月出版的第 1 卷第 8 至 10 期和第 11 至 12 期两期合刊中刊载了当年中国朝觐者启程和回返的消息。在 1937

年元月1日出版的第2卷第5至8期中，还详尽报道了1936年10月青海省主席马麟等一行11人，率甘宁青穆斯林朝觐团126人(女6人)出国朝觐的消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不久，又发生了日军侵占上海的“8·13”事件，上海不久陷入敌手，通往麦加的海上航线由此中断。与此同时，《人道》之类的穆斯林刊物也被迫停刊，另有部分刊物如《月华》、《突崛》等迁往大后方。同时，在重庆等地又创办了《回民言论》、《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后改名为《中国回教协会会报》)等新刊物。1938年组成的西北穆斯林朝觐团共200余人绕道青藏高原通过印度出海，其间经历了千难万险。当他们归来时，1939年3月30日在重庆出版的《突崛》第5卷第8期刊载了署名“舍慕松底尼”撰写的“甘青回民朝觐团会见记”。1939年5月15日出版的《回民言论》1卷9期刊登了薛文波写的“火炬下的回民活动”和蒋君章写的“秦家岗上的一群——一个民间的国际宣传队”。1940年出版的《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2卷2期刊载了王梦扬撰写的《哈直访问记》和1939年朝觐教胞返国消息。在同年4月出版的《回民论言》1卷7期上，还刊登了“我教胞在麦加的宣传工作”的朝觐活动评论。

抗战胜利后，中国穆斯林又开始恢复朝觐功课，《中国回教协会会报》7卷1期(1946年11月)报道了1946年朝觐动态，后因交通问题未能成行。在7卷8至12期(1948年3月)刊登了“1366年度(1947年)朝觐大事纪略”“告朝觐弟兄书”等。据上述消息介绍，申请1947年朝觐者共200余人，经中国回教协会就轮船、外汇、护照等方面进行协调，正式获准朝觐人数为72人，由上海乘船出发者39人，由南疆经巴基斯坦

出发者18人，穿越西藏而往者15人。由于抗战结束不久，南京政府为了显示其作为“中央政府”的“权威”，争取国内少数民族的舆论支持，因此对穆斯林朝觐活动给予前所未有的方便，在新疆省政府、蒙藏委员会等配合下，其中40人可购买官价外汇，每人180英镑，新疆及内地教胞各占20人。另外，官方又支出一笔招待费(旧币1亿元)作为宣传、住宿之用。1947年7月中旬朝觐者陆续抵南京，由中国回教协会及天山学会、中国边政学会于8月2日举行欢迎茶会，并招待新闻界。后又由回协理事马天英率领全体哈吉拜访政府有关部门及长官，白崇禧专门设宴招待。8月3日上午11时，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黄浦路官邸破例召见朝觐人员，“对教胞圣洁虔诚的精神表示钦佩并嘱旅途注意健康”。当晚朝觐团乘车抵上海，办完检疫等手续，于8月13日“搭轮赴港，换搭艾加麦慕奴轮放洋”。完成朝觐功课后，全体哈吉于1948年元旦回到上海，在码头上受到当地教胞的热烈欢迎，哈吉为了感谢各方面的扶持，分别向有关部门赠送了拜垫、桌毯及阿拉伯大红枣。在该刊8卷2期(1948年10月)上又刊登了1948年朝觐情况：甘、宁、青、新及各地申请者共24人，经中国回教协会与有关部门协商，46人准许购买官价外汇共7200英镑，此外批准160人自备外汇前往，200名朝觐者名单中，新疆占100名，甘、宁、青等地100名，各地朝觐者7月16日起先后来南京转上海，8月12日乘轮船赴香港，后到者则分批乘飞机赴香港再转往麦加。在中国回教协会委派华声慕、张秉铎二人作代表护送下，全体朝觐者于9月1日平安抵达麦加。

(2)有的穆斯林报刊在报道朝觐消息及评论之外，还刊登日记、诗词等多种题材作品。如《月华》5卷1期至15期

(1933年1月5日至5月25日),先后刊载了赵振武撰写的《西行日记》头几章。1936年7月15日至12月5日刊出的《晨熹》2卷7至12期,则刊出了马明道撰写的《从伊斯坦布尔到麦加》见闻录,记述了以新疆维吾尔族为主的穆斯林跨越大陆,从伊斯坦布尔坐船往返吉达海港时的艰难历程和奇闻轶事。1935年3月出的《人道》1卷8至10期合刊刊登了外国穆斯林撰写的《麦加巡礼记》译文。为了抵制日本帝国主义试图欺骗世人而派出的所谓"华北回民朝觐团",1939年元月中国在埃及的穆斯林留学生组织"中国回教朝觐团"从开罗赶往麦加,既履行朝觐功课,又开展爱国宣传,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的阴谋。事后,1939年五六月间出版的《回民言论》第9、第10期和第12期先后刊登留埃学生张怀德与自适(笔名)分别撰写的《中国回教朝觐团日记》。1939年5月出版的《月华》11卷10至15期,还刊登过署名天仆的《朝觐日记》。作者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报道了这次不同寻常的朝觐情况。

刊登有关朝觐的诗作,较有代表性的当数1936年6月1日于南京建康路净觉寺出版的《回教青年月报》1卷3期所刊载的署名"五五瘦人"的"天方游归"(新诗)两首。诗作者可能系朝觐过的哈吉。其一为"苍茫的蓝蔚,/无知的穆民;/默伽是我们宗教的归处,/朝觐一次是表我的信心?/平安一去,无恙归程;/知感真主的调养,/高赞真主的慈悯。"另一首为"朵司提的欢送声尚未去耳,/朝觐的人受戒衣此刻已脱;/光阴的快如箭,/日月的行如梭;/真主给我的平安,/圆美平生的功课;/乡众围绕着我问我天方的景致,/我很感赞真主的慈悯与他们说。"此外,1938年9月于桂林出版的《月华》10卷14至16期合刊上,刊有马兴周译自阿拉伯文选的《麦加巡礼》一文,

其中提到先知穆罕默德与"迁士"们在麦地那居住时怀念朝觐圣地麦加的情景："当一忠实信士艾巴奈自麦加跋涉而来，穆圣首先询问玉紫黑尔与南麻买两种香草(这是麦加所特有的)之后，眼里情不自禁地充满了聆切之热泪！"圣后阿易舍用诗一般的语言赞扬麦加道："但愿迅速迁回麦加居住啊！我不再看到比麦加的地面更接近青天的了；/我的心从没有象在麦加居住时的安定，/我不曾看到哪一方的明月会如麦加那样地晶莹而皎洁。"穆罕默德的侍从班拉鲁更因怀念麦加而引吭高歌："理智未曾想到，能有一夜，/我屏着气息躺在麦加的田园里，/烂漫的红玫瑰盛开着。/……竟有一日我能痛饮米占那的泉水，/在那沙梅与退斐露的山谷间。/无疑地身居在外的人的心，/常常会绵缠于羁旅的岑寂与家乡的萦怀，是谁也避免不了的！/多少地面多少家，使你住得习惯了，贪恋了，/然而依然地要使你永远怀想着原先生长的家乡！"文章虽然没有涉及中国朝觐者，但其对麦加的一往情深却获得中国穆斯林在感情上的一致共鸣。民国初年曾在袁世凯卫队任职的李谦，1933 年率两个儿子去朝觐，将沿途所见及麦加朝觐功课、瞻仰古迹及晋谒国王情况，均吟诗纪述，编为《回部百诗赞》诗集一册。

但是最为典型的描述中国穆斯林朝觐的诗篇还要数薛文波的《麦加游》，这些发表在 1938 年 11 月 25 日出版的《月华》第 22 至 24 期合刊上的组诗(共 14 首)，有的如"起程"，我们已在前面作了介绍，有的还将在下文中提及，在这里，且将其 1938 年参加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在麦加履行朝觐礼仪的 10 首诗作照原文摘录，以飨读者。

其一为"进麦加"："'天房'辉煌衬金碧，摩肩继踵人如织，

玄石亲后绕幕驰，潜心默祷若太息。更见群伙跑两山，风起云涌飞行急。往返旋避辄相随，人单势孤难伫立。”

其二为“天房成礼”：“‘班克’声起礼拜时，教民依班整戒衣，‘白顿拉’（即阿拉伯语“天房”）前无隙地，街心悄悄行人稀。导拜音传遥呼应，哀转久绝若悲啼，惊人何必夸形式，表里如一是根基。”

其三为“出会阿拉发山”，篇幅较长，描述也更具体形象：“麦加城外多黄沙，平原广野无人家，驼驼相续遥相望，远征豪气自不赊。途中颇有安慰在，旅人原爱泛天涯，最是低徊日暮里，飞鸟荒山夕阳斜。健驼腾跳趱途忙，英风凛凛是阿王，百官文武簇拥走，卫兵呼喝谁敢当？阿王谦逊不骄众，教民亲我是荣光，人类本无贵贱殊！地位何能异心肠？千驼万驼腿如林，不见人马见尘坌，漫指荒烟蔓草里，前后追逐若行军。平沙漠漠鲜古径，长车驰骋若无人，相亲相伴恐失散，烈日皇皇何处寻。印度老翁终不老，隆隆深目须髯好，笑说当年健壮时，百里一日仍嫌少。‘白大卫’（即贝都印）族游牧儿，长发披肩身轻巧，日光煜煜透云出，扬鞭共指石山小。阿拉发山势峥嵘！天幕衔连若野营，几处缕缕炊烟起，旌旗当空吹不停。幕幕往来互恤间，亲爱何殊手足情，多少穆民同心趣，精神结合是长城！”

其四为“山上虔悔”：“问君罪恶有几许？虔诚吁主哀音吐，真宰至公复至慈！虽谓弥天原可补？更见石旁流泪人，力尽声绝倍凄苦，明知欺人是自欺，安拉所弃是耻辱！”

其五为“夜宿‘木自得里飞’”：“黄昏日落暮云堆，撤幕牵驼万家归。家家彼此夸颜色，朝觐功课今不亏！天地为庐可露宿，星斗体人夜风吹。温柔乡里未辨此，富贵何求心转灰！？”

其六为"米那宰牲"："易卜拉欣古圣哭！自守唯恐干主怒，慈爱何如父子情！？为主忍痛杀骨肉。真宰至慈代以羊，古风至今犹未去。良美典型莫空存，牺牲之心应如故！"

其七为"阿王阅兵"："良马嘶风风萧萧，阿王好武逞英豪。娱宾不用古音乐，五百健儿舞枪刀。阿拉伯人多雄烈，声威远播绿旗飘。不信请观'回犹'战（指穆斯林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流血斗争气不挠。"

其八为"麦加形色"："礼成脱去戒衣裳，麦加城里多样装。红缨帽儿垂黑穗，白布缠头若银霜。花裙委地西服短，宽袍曳袖到地长。形形色色看不尽，应笑人群是戏场。"

其九为"辞朝"："'白顿拉'（天房）旁泪涟涟。绕幕七匝往复还。嗟呼真宰其悯我，愿得清白在人间！？面向天房缓缓退，应是不忍竟恋恋。千山万水来非易，重朝贵地是何年？"

其十为"尾语"："漫道博爱假文章，钩心斗角正未央。惟有回教无畛域，兄弟奚必生一方。真宰造化岂爱憎，奈何无因自分疆。大同理想将谁向？回教教理放毫芒！"

综观上述《麦加游》组诗，虽然并非字字珠玑、篇篇上乘，但基本上表达了中国穆斯林朝觐者对天房克尔白的崇拜，对朝觐礼仪的虔诚，对圣地麦加的敬仰，以及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对人生、对世界、对伊斯兰教的诸多真实感想。作者用诗词形式表达自己的观感，活跃了朝觐活动报道的内容，也受到广大穆斯林的喜爱。

（四）群众喜读朝觐见闻 《西行日记》大受欢迎

朝觐的基本礼仪虽然千年不变，但由于朝觐者个人的背

景、社会情况、出发时间、旅行路线、交通工具、同行的旅伴、经历的事情甚至履行的逐项礼仪时所处的方位各各不同，因此哈吉们回国讲述或发表的朝觐见闻，只要是亲身见历，忠于事实，始终受到中国广大穆斯林的欢迎。尤其是文辞优美、可读性强的见闻作品，在报章上刊载后，还很快应读者要求印刷成单行本传播于社会。

就朝觐材料而言，民国时期和明清两代有显著不同的一点就是，社会上不仅出现了关于朝觐的新闻报道、知识介绍、各类评述和见闻日记，还流传着一批虽然数量不多，但却颇有影响的专门论述朝觐问题或以大量篇幅记述朝觐巡礼活动的专著。尽管清代后期咸丰辛酉(1861年)曾在昆明刻板印刷过马德新用阿拉伯文撰写、由其门人弟子马安礼译为汉文的《朝觐途记》，但该书毕竟印数不多，且记述过于简略，难以引发普通穆斯林的兴趣。而民国时期出版的一批朝觐著作，基本上用白话文写成，除记述朝觐礼仪外，还穿插了旅途描述和许多未能踏出国门的广大穆斯林群众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因此社会影响较大。在上述朝觐著作中，讲述朝觐规矩及穿插个人见闻者有《朝觐摘要》、《朝觐纪略》两书；作为朝觐交通手册者，有《上海到麦加》一书；专门记述朝觐见闻者，则有《西行日记》、《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麦加巡礼记》和《埃及九年》等书。其中，《西行日记》的影响最大，可以认为是以后各类朝觐日记的发轫之作。

《朝觐摘要》的作者为甘肃武都王世龙阿訇，1927年赴麦加朝觐时，深感"朝觐在东土穆民上实不易之事，因路途太远，路途不通之故"。在麦加期间，他亲眼见到印尼来的哈吉学者"每晚执其经卷，聚众于哈然(克尔白四周之拜堂)中以朝课之

当要者，详解于该国之众人"，因而"痛惜我中国之学者，何竟不知朝觐之规律焉？"归国后，他以阿拉伯文原著本马德新《朝觐途记》与阿拉伯经学家满俩尔利所著的朝觐经典为基础，撰文"专叙朝觐须知，为朝觐者得完成其功也。"为了便于不懂阿拉伯文的穆斯林进行学习，王世龙运用半文半白的汉语进行摘译。又根据亲身经历，对清代中后期以来朝觐途程中出现的新变化进行补充，并增添自己的见闻感受。该书前半部分为阿拉伯文原著摘要，后半部分为汉文朝觐须知及作者见闻，约 8 千字，1930 年元月以《朝觐摘要》为名排印成书。封面由唐柯三题写书名，曾由阳曲朵珍重印。在卷首"自序"部分介绍了朝觐的四种名称：罕智（单朝，天命）、欧目味（素朝，圣行）、隔让（连朝，天命与圣行相连）、太满土耳（续朝，天命与圣行相续）。又介绍朝觐的四种功课：团哇福则牙来（正朝觐，天命）、团哇福孤度目（朝谒，圣行）、团哇福韦大而（朝怀，应当）、团哇福奈福立（副朝觐，余功），并一一作了解释。该书正文共分 8 个篇章，依次为：1、朝觐由来；2、朝觐之天命与应当；3、朝觐之出发；4、受戒须知；5、上朝；6、出郊（即出弥拿）；7、射石宰牲与开戒；8、辞朝。本书既依据前人权威资料介绍了朝觐须知，又结合本世纪 20 年代的实际交通情况对有关数据作了修订补充，真可谓当时朝觐者的旅行指南。而书中记述的某些见闻，既为将去者提供了参考，也使未成行的读者藉此作一神游。比如作者在吉达曾出东城门约二里之遥，去拜谒"呼哇"（好娲）之墓，只见"墓长约八十余丈"，因年代久远，"多已颓败不堪"。作者在禁寺中礼拜时，觉"其所奇者，四山虽高，而不见其'凯尔拜'之低，其尊严隆巍，令观者之眼光自炫，辉煌夺目。"仔细观察，是"凯 尔拜"地基甚低。作者对麦加人民的诚实作风印

象极深，“一日，有河南穆君者，将金钱包遗之于沐浴室”，被领朝人的佣人拾去，该领朝人“闻系穆君之物，急令其佣人送交穆手。又有韦州马哈知，由义坟送亡人而归，迷失路途，昏倒街上，被警察抬至医院，用药治好，叫去吾等中有懂言语者，令将马君领回，并问马曰：‘你失物件否？’”马查衣袋中失洋3元，该警便将洋付马。“街市商家，各务其业，但闻寺中‘邦开’全体赴寺，遂有换钱摊，金洋满桌亦无人照料。此在朝觐之期如是，而往日之宗教与政治之优良更可知也。”

《朝觐纪事》是民国时期又一部中国穆斯林朝觐专著，由江苏金再之、安徽王少泉编撰，卷首有两人于1932年写于南昌清真寺的序言。全书共16页，约3千字。书中也用半文半白语体记述了编者30年代初由上海出发进行朝觐活动的经过及观感。正文10篇，依次为：朝觐由来，朝觐行程、朝觐功课、满克（麦加）名胜、满克民情、探望圣陵、满克拜考、满克葬礼、朝觐感言、附志。本书虽篇幅不长，但在记述朝觐礼仪之外，又披露了作者的新鲜见闻：“一日甘肃苏鸿年‘罕志’将皮箱一只交某工人代提至某处，议明力资1角，中途因人众挤散，该工人四处寻找苏‘罕志’，遇于途中，交还原件，并不多索分文”。又一日，“再之（作者）见一贫人低首诵经，当赠洋一元，渠婉谢云：‘感真主慈悯！今日食物已足，请转送其他贫人。’仍低首诵经，可见满克人爱道不爱财也。”

《上海至麦加》是一本反映近现代中国穆斯林朝觐交通情况的旅行手册。自本世纪初以来，国内回族穆斯林团体或个人赴麦加朝觐大多由上海出发，最初行程，自沪整装，乘轮船至新加坡，再换轮船赴吉达，既耗时日，又费旅资，十分不便。自1930年起，中国旅行社与“蓝烟囱轮船公司”商定，特放专轮，

直航吉达，"如是旅费既省，又无转折待轮之劳，朝觐诸君，群称便捷。"1932 年 11 月，为了接待最近一批朝觐团赴程，中国旅行社又预定一艘专轮，计划 1933 年 1 月 29 日由上海启碇。该轮名万宁号，载重量 7730 吨，可载客 1348 名，为了吸引朝觐教胞，"以旅程情况，舟车行经，编为小册子，以供参考，谆为朝觐诸君所采睹也。"该书为非卖品，小 32 开，共 30 页。卷首除有中国旅行社作情况介绍"导言"外，其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系中国旅行社六年来接待国内朝觐团体的经过，包括民国 21 年朝觐团全体合影、朝觐教友题名录、所乘轮船的照片及舱室、厨房照片，以及 1933 年朝觐专轮特讯。第二部分为朝觐者应办手续及旅途介绍，包括"由上海至麦加简图"，客票价目、船上伙食供应、办理护照及注射防疫针手续、行程与沿途情况；沿途各埠可提供的照料、语言翻译，以及蓝烟囱公司所辖各船吨位、载客数目及装备情况。第三部分介绍上海穆斯林接待朝觐来客的地点和负责人，包括安排朝觐团住宿的上海西城小桃园清真寺内部设施，上海清真寺地址一览，上海清真教门菜馆地址，以及热心帮助朝觐教胞的金子云先生情况介绍及照片。第四部分为朝觐知识，包括金子云撰的《朝觐之真谛》一文，及伍特公写的《阿拉伯地理政治说明》，另附有沙特国王近影一幅。《上海至麦加》虽是一本篇幅不大的资料手册，但向读者展示了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中国穆斯林从海路前往麦加朝觐的历史资料，包括组织机构、热心人士、旅行手续、沿途情况、朝觐航程待遇等必要细节，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穆斯林朝觐史提供了生动可靠的材料。

在日记类著作中，《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堪称近代中国伊斯兰教对外交往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国回教访问团"

与"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齐名，均系20世纪30年代末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派遣，前往中东与东南亚各伊斯兰教国家宣传中国抗日救国决心的工作团(该书的问世背景及内容将在本书第四部分详尽介绍，这里再不赘述)。是书用日记形式记载了这次重要国民外交活动的实况，书后附有《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总报告书》。《麦加巡礼记》也系中国伊斯兰教日记体朝觐历史资料，作者唐易尘，1938年至1939年春，曾与刘德润等一行五人，受日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的派遣，以"华北回民朝觐团"的名义前往麦加，逾时100多天。到达吉达港后，他们即受到中国爱国穆斯林的监视、抵制，旅途之中，他们亦惴惴不安，处处受惊。归国后，唐易尘将此行见闻整理成文，在北京《新民报》及《震宗报》(杂志)上陆续登载，但因文章较长，未及刊完。1943年1月作者将修改稿由《震宗报》杂志社刊印成单行本，全书约14万字。卷首有作者肖像、"自序"、"朝觐须知"、"朝觐教仪"及37幅旅途照片。正文共分10章，章名依次为：1、动机；2、出发；3、放洋；4、登陆；5、巡礼；6、归途；7、返棹；8、返国；9、闻见；10、结论。尽管作者一再辩称此行目的没有政治动机，"无任何使命"，更无"日系人员随行"，但仍不得不承认此次成行是由日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的日本顾问小池批准，并由日本顾问高垣对人选加以"慎重"推定的，因此这次所谓"巡礼"无疑是推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一次活广告，自始至终受到爱国穆斯林的反对。虽然本书记述的是一次不光彩的"旅程"，但书中反映的一些材料，如30年代末自上海赴麦加朝觐的海上旅途变化；当时沙特王国的社会面貌、经济状况、交通设施、中外朝觐者的生活情况；上海伊斯兰教人士和清真饮食业的情况；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操纵利用伪"回教

联合会"的内幕等，对了解当时的中国穆斯林情况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据作者自称，抗战前出版的《西行日记》一书对他印象极深，那时他正在长春，由北京要去一本，"一连整整看了四天三夜，有时吃着饭饮着茶，但是这本西行日记，我绝不释手。"因此他写《麦加巡礼记》时多有仿效，基本上也逐日撰写，并增加一些富有戏剧性的插曲。《埃及九年》是又一部日记体朝觐著作，作者为回族伊斯兰教学者庞士谦，1938 年赴开罗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历时 9 年，1946 年回归祖国。本书是作者归国途中在船上写的日记和回忆，全书约 20 万字，部分内容曾在《月华》杂志上发表，1951 年才由月华文化服务社出版。该书大部分回顾作者在埃及的留学生活，但第二部分附录中收有"1939 年朝觐团日记"，记述作者与留学埃及的中国穆斯林青年组成"中国回教朝觐团"专程从开罗赶往麦加与伪"华北回民朝觐团"唐易尘等一行五人巧妙周旋、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事迹。因此《埃及九年》中的这段日记恰与《麦加巡礼记》的内容两相对照，我们将在本书第四部分中详加介绍。

在日记体著作中最驰名的当数《西行日记》，这部由中国穆斯林撰述的朝觐纪事和阿拉伯风土人情见闻录，在诸多方面开前人之未有，因此令当年的读者耳目一新，争相拜读。作者赵振武，当时为北平成达师范教员和《月华》旬刊主笔，1932 年 11 月，偕马松亭、张润之等二人陪送成达师范马金鹏、张秉铎、韩宏魁、王世明、金殿桂等五名学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他们从北平坐火车抵上海后，乘海轮途经香港、新加坡、孟买到埃及塞得港，换火车至开罗。将五名学生送入学校就读后，他们晋见了法鲁克国王，并就继续派遣留学生，设立伊斯兰教育基金和创办成达图书馆等问题与埃及教育部官员进行

了蹉商。次年3月，赵振武等3人又去耶路撒冷参观历史古迹，并从苏伊士港坐海轮前往麦加朝觐。在大朝前夕觐见过沙特国王，并在沙特财政大臣派车派人的帮助下瞻仰了麦地那圣陵。1933年4月下旬，作者随同50余名中国哈吉一起坐蓝烟囱公司的“万宁”轮归国。全书用日记体形式，自1932年11月28日开始记载，直到1933年5月19日结束。在《月华》第5卷1至15期(1932年1月15日至5月25日)陆续刊载日记前几章后，即受到各地教胞的欢迎，渴望知道他们的行踪，但刊物篇幅有限，因此根据大家要求，于1933年8月由成达师范出版部印成单行本问世。全书约15万字，卷首有作者照片及“自序”。

《西行日记》的主要特点是：第一，运用日记体形式，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犹如当回聆听作者讲述故事，同时脉络清晰，显得有始有终。由于对开罗、麦加、吉达港及新加坡等名城的市容、风情、伊斯兰教务、清真寺及先贤古迹、穆斯林教育和沿途见闻都有详尽生动的记载，所以是读者了解当时埃及、沙特阿拉伯、巴勒斯坦、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基本情况的入门读本，为后来的朝觐者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旅游交通手册。比如作者亲自采访了麦加与麦地那的两个施舍所，记载了施舍的人数和不同的施舍办法，从而比较客观地反映了30年代沙特经济尚处于落后状态的真实情况，如麦加施舍所每年开支2万5千英镑，当时由埃及负责提供。又如作者在耶路撒冷参观时，坐车经过犹太人居住区时，虽昏黑不辨东西，也不敢开灯，怕遭到袭击，形象地反映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历史积怨。

第二，作者能根据读者的喜好选择素材并加以恰当组织，如对早有定规的朝觐礼仪，作者只作略写，但对新鲜事物及人

际交往，作者则详加记述。如在开罗亲睹埃及法鲁克国王到爱慕鲁清真寺作斋月最后一个主麻礼拜，作者跟随爱资哈尔大学人员进寺时："各机关的人们陆续着都来了，御林军散布在殿的每个柱子之下，黑奴们用喷射器不时的在满殿上喷放香水；还有，几个穿白衣的黑奴用提炉燃檀香，在米合拉卜的前面左右行动，散布芬馥的香气。11 点半，一个念家(喀哩)开始念克赫夫。12 点 5 分，大炮响了，我们数着，一共鸣炮 21 发。当炮声响到 14 下时，国王在军乐洋洋、掌声如雷中冉冉的走进大殿，""当响至第 16 炮时，班克的声音便很高朗的灌入人们的耳了。""国王并不亲自领拜，他委派一位长者叫筛海拜布拉威。""礼完了主麻的天命拜……国王便立起来，走到爱慕鲁的墓前去作祈祷，一时间，殿上的气氛便不那么严肃了。炮又鸣了，国王起銮了。在殿下随同国王礼拜的平民——人数可以多过正殿上的人数的几倍——便一拥而进，挤到爱慕鲁墓前作礼拜。坟前的栏杆是木质的……也已被人们摸的都光了。"再如开斋节时，作者作完礼拜上街，发现开罗的习惯比中国热闹多了："从昨晚起，街上，巷中卖糖食、果子、鲜花的小摊贩，已经鳞次栉比的排列在两边。轰轰烈烈，彻夜的叫喊声和人马汽车行走声不绝于耳。到今早，你看：满街满巷的男女老少，都换上了新衣。……他们的习惯，在开斋节这天，家家都要上坟……一车一车的，地上走着的，携带了许多食品、鲜花、果子甚至于煎茶的火炉、茶具，摩肩毂击的往坟山走去。""使我们最注意的是每个石墓上都插着鲜花，石墓的四周，围坐着全家的上坟人，有的在念经，有的已然念毕了，在那里吃喝，有的在谈话，有的在哭泣：形形色色，很离奇。"作者在抵达麦加朝觐时，因大朝日子未到，曾由沙特财政大臣派汽车前往麦地那瞻仰

先知穆罕默德的圣陵．谒陵的典礼是这样："作完了礼拜，领谒人领着走到圣陵之前、面陵面立，两手抚胸，赞圣道安，诵法体哈。阿布伯克陵和欧马尔陵均在圣陵之侧，谒陵的人一律副谒。谒毕，面向格布顿（天房）作都阿，礼成。""谒陵者，都距铜栏一步以外而立，不得近栏，近栏则警察干涉，这是因为人们从前谒陵时都在向圣陵接吻，逐渐演成一种无意识之迷信举动。"作者还去拜谒了麦地那的先贤公墓，发现出乎意料的简朴："里面荒凉得很．大贤欧斯曼的墓，至圣九宫墓．圣女法图麦墓．圣叔阿巴斯墓，至圣诸姑墓等都只是在红色沙土上放两块石头作坟堆而已。其余平民之墓，简直没有坟堆。"作者在记述种种见闻之余，还用较多笔墨写下了朝觐期间按规定露宿穆兹台里发旷野的感受："我生平没有住过这么高的房，睡过这么大的床．燃着这么辉煌的灯光！这只是第一次。把铺盖铺在政府指定的汽车停泊的软沙上，身子躺在平而软的细沙上，似乎是比较毛褥子舒服得多！仰首望着青天，星月在天空嵌着，轩敞高朗．任何高大的殿宇也比不上。这种极舒适、极甜美的功课，作起来太洽意了。"

第三，全书文笔生动，穿插趣闻，引人入胜。书中插有 20 余幅照片．且印刷清晰，正如《月华》为本书所作的广告词中所说："一面看书，一面看图，不啻卧游教土。"此外，作者在描述海上旅行时亦有相当细致的刻划："人们作了沐浴，眼睁睁地看着半轮红日走人海中，便一群群底聚成昏礼。礼毕，西方云霞还在灿烂未央的当儿，而一轮红月，很大的一轮红月又从东面的海中钻出，把天际海边许多乱云照得白一块，黑一块，与西面的残霞相映成趣，使人在船的两弦之间跑来跑去的赏玩，真仿佛置身山阴道上，大有应接不暇之势云。"快返回上海时，

船遇上了大雾，作者描述："许多撑着篷的旧式海船，在云雾中航行，很自在的过他们捕鱼的生活。而偌大的火轮船，却为了雾气，静静地停在海中，丝毫不敢动，只有一声声不断的鸣汽笛，表示它的难过而已。"作者还在书中记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奇事：在麦地那，他们沐浴后出门上寺礼拜，街上肃静得很，"除去巡警和不满10岁的小孩以外，连个人影都没有：铺子、摊子，都只在前面挡上一块白布，一切货，照常的摆设着，并不收拾起来，也不用人看管，尤其是钱摊和兑换所，他们也照样的丢下就走，都到寺中去礼拜，一点不用顾虑丢东西。"同时还有一件奇事，当他们走在街上时，街上有一块银钱遗在地上，有几个贫妇围着(张)润之要乜贴，润芝拾起银钱送给她们，她们都笑了，说这样的钱你既不该拾，我们更不敢要，仍旧放下吧！等待遗落它的主人来寻它。说罢仍旧把那块钱放在地上。

第四，由于作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见识不同一般，因此记叙和征引资料相结合，表达了个人的独特感受，又颇具知识性。比如作者乘船穿越红海时，就注意用自己的观察和前人的记述(指《卡奔德游记》)进行对照，发现前人在记述红海气温，空气中咸度等方面有诸多失实之处。作者在开罗时，专程访问了慕名已久的出版伊斯兰教经典的著名书店："它的营业部只是一幢三楼三底的最下层，印刷部也只是三楼三底的整幢三层而已。不过，它的营业部发达得很，世界上有名的回教城市，差不多都有它的书店。"作者在离开耶路撒冷的前晚，还专程去走访了著名伊斯兰教学者安萨里(1059—1111年)撰著《正道复苏》一书的写作地点："这著书处就在寺内，不妨在今晚一临，所以振着精神，冒着险去攀登那四无遮拦的高台，

因为他的著书处是在城墙上面，由寺院内攀登上去——只有一人宽的石道，并无栏杆，险得很；而天又昏黑，举手不见掌，格外觉得可怕。幸而我们有几盏手电灯，前后照映，一蹶一蹶的上去了。这是他编纂《伊合雅·欧鲁民丁》的处所。”在《西行日记》这本书中，还有很多是属于情景交融的记载。如作者乘坐的轮船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时，为防上次大战时留下的水雷，看见许多乘客穿了救生衣走上甲板，“我们打算作了哺礼试救生衣，那知正在犹豫之际，而警号已发——是汽笛短鸣六下，长鸣一下，所有船上遇警时都鸣起这个警号。我们只得忙着穿上救生衣，匆匆往船面上跑。及至跑上去，而许多水手们已分别立在每个救生船之侧，在准备曳下了”，“这种不曾经过的举动，多少总令人心中有些慌张。静静地在船面上候着，吉凶莫卜。”后来总算平安驶过这段危险区域。又如作者描述轮船航行在阿拉伯海，由于半个多月禁锢在船上，终觉不舒适的心情：“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马)松亭每在心中有特殊感觉时便朗读古兰，这是他的恒态，今天他几乎诵读了一天；(张)润芝是出来进去的坐卧不定；我呢，只是睡。”又如作者描述自己和在埃及的留学生告别前往麦加朝觐后而归国时：“海外的离别毕竟与国内不同，前后届的同学在我们的车开行时，哪个的热泪不想夺眶而出?！甚至于定交两月的阿礼君都眼红的要落下泪来了；而韩生宏魁竟抓住已开的火车而哭出声来。”再如作者记叙在国外理发的感受也很有趣：“开戒——这虽不算很要紧的功课，但是，在炎热的阳光之下的帐棚中，直挺挺的坐在地上受亮黑亮黑的黑人用不锐利的剃刀像刮冬瓜皮似的剃发，却也是件很难受的事。”后来作者于回国途中在槟榔屿的华侨那里理了一次发，遂大为感慨地发表

言论道："出国以来将及半载，始终没有得着象今天这样痛快的一次理发！看起来中国人还须中国人理发适宜些，不论是推头、剪发、剃头、刮脸，以至于掏耳，哪一样都比洋人的手强。"思乡之情，溢于纸上。其实作者出国之际不仅仅是思乡，而且时时在忧国。他在日记中先后记载了从国际电传中了解到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山海关，侵占热河，和在北平上空携炸弹作威慑飞行的种种暴行，既表现出作者作为一个刊物主笔的新闻职业敏感，又使读者更深地敞开了解作者宽广的爱国爱教的胸怀，从而使这本《西行日记》格外增添了生命力和感染力。

二、不畏艰险　奔赴圣城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面貌复杂，因此历史上穆斯林们选择朝觐路线时，必须根据自己的环境作出选择，有的走陆路，有的走海路。其实海路与陆路是互相交叉前后衔接的，因为走陆路免不了要或长或短坐一段船才能抵达吉达港去麦加，而走海路在登船前也往往要经过一大段陆上行程。海路与陆路的区别，只能说在陆上或海上哪一部分花费的时间较多。住在中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的各族穆斯林去朝觐，往往穿越中亚（也有穿越青藏高原或亚欧大陆）寻找方便的海港如卡拉奇、伊斯坦布尔等乘搭航船，相比之下，他们在陆上的行程要长一些。住在中国其它地区的回族穆斯林，他们一度选择广州或缅甸的港口作为乘船出发地，到20世纪初，最终集中到上海乘船西行，相比之下，这些朝觐者在海上度过的旅程要长一些。从大体上看，陆路的主干道基本上走的是"丝绸之路"，而海路如从广州出发，则是依循传统的"香料之路"前进。

然而不管是在陆上行走或海中飘泊，中国和阿拉伯半岛之间毕竟有万里之遥，因此朝觐在历史上是一种带有很大风险的跨国界宗教活动，一是其旅途中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二是要和病魔及种种天灾人祸争个高低，三是要镇定自若地和各种不测事件巧妙周旋，以维护西行宗旨，所以也留下了无数朝觐者化险为夷或为此献身的动人故事。回顾整个历史，中国一代代穆斯林凭借自己虔诚的伊斯兰信念，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确实出色地完成了朝觐这项重要的宗教功课。

(一)丝路古道万里征程　处处留有哈吉屐痕

在古代，联结我国和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的陆路商道，实际上是由若干条东西相联、南北交错的道路所形成的交通网而组成，它以“丝绸之路”的名称闻名于世，在沟通东西方经济的同时，它还使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和宗教也得到交流传播。位于亚洲腹地的新疆，是维吾尔等穆斯林民族历代休养生息的地方，朝觐在这些民族中间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群众基础。横贯新疆的传统丝绸之路，开拓了这些民族的视野，并提供了一条便捷的走出国门的陆上通道，尤其是近千年来，使他们沿着这条陆上大动脉前往西亚完成朝觐功课或开展游学、经商活动。

穆罕默德曾留下名言“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可见，在这位先知心目中，中国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距离，确实遥远而充满艰险，因此不易走到。从丝绸之路走向看，中国最西部和麦加之间的距离不下五千公里，其间有高山峻岭阻隔，沙漠戈壁横亘。尤其自唐代以后，由于中亚地域政治变动较大，许多繁华的城镇历经兴废，甚至杳无人烟；因此后人们沿着昔日的丝绸之路旅行，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和绕道从东南沿海乘船出海相比，又要省下不少路程。新疆边界线漫长，其西南部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等国接壤，它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冲，昔日丝绸之路的多条干道从此地通过，为居住全疆各地的朝觐者提供了就近选择路线的便利。

丝绸之路以中国的长安为起点，通过河西走廊，自西端的敦煌分为三道，这三条道路都能通往西亚或欧洲，也都留下过

中国历代朝觐者深深的脚印。

北道经伊吾（今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过塔勒奇山脉入伊犁河平原，渡伊犁河、楚河到碎叶城（今吉尔吉斯的托克玛克城附近），由此西行到怛逻斯，这个城市在公元9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库达特拔和10世纪的伊本·霍克尔的书中都认为是突厥人和穆斯林通商的要地。经此南行，过塔什干，渡锡尔河之后，就到了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费尔干纳盆地。

中道则沿天山南麓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蜿蜒而行，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疏勒（今喀什噶尔）等地后，越过帕米尔高原也到达阿姆河、锡尔河之间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帕米尔号称"世界屋脊"，气候恶劣，道路险峻，朝觐的穆斯林常在夏季时结伴过此西行。该高原上的吉兹尔阿特山，高3053米，据当地的穆斯林传说，在穆罕默德时代，有一位东来传教的人，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这座山峰，卒后葬于此地。

北道和中道的两条干线分别由锡尔河以北和帕米尔以东的地区进人费尔干纳盆地后，经过该地区的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向西南渡过阿姆河到麦尔夫，经过伊朗高原的突斯、哈马丹等城市，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巴格达到叙利亚中部的巴尔米拉，这是古代中东国际贸易的名城。阿拔斯王朝时著名的地理学家伊本·库达特拔将自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名城撒尔玛罕到巴格达这一段商道，称作呼罗珊大道。这条大道从巴格达向南经库法或巴士拉可转道至麦加，是从东方来的朝圣者们的必经通道之一。据乾隆年间马明心朝觐传说，他曾从新疆步行到也门，走过阿拉伯半岛的南部，走的就是巴格达

向南这条通道。

清代回族穆斯林学者马德新在他的《朝觐途记》一书中载有“天方北路途程”，具体线路为由嘉峪关至哈迷（哈密），经土尔方（吐鲁番）、哈喇溪（焉耆）、阿克苏、哈什哈尔（喀什）、五干市（乌支根）、昂底章（安集延）、墨尔蓝（马尔格蓝）、火干（浩罕）、火章低（列宁纳巴德）、卧尔特白（乌拉提尤别）、止早（治札克）、色墨尔干（撒马尔罕）、克特虎尔瞰（卡特库尔干）、克你墨那到布哈喇（布哈拉）。然后分成两条支线，一条经寨黑尼江（捷詹河）、黑什低（马什哈德）、西拉特（德黑兰）、黑母大尼（哈马丹）、白恩道德（巴格达）、巴尔枯枯（基尔库克）、母碎勒（摩苏尔）、母尔丹（马尔丁）、乌尔法、尔叨补（加济安特普）、哈拉普（阿勒颇）、哈马提（哈马）、汉母思（霍姆斯）、狄密什吉（大马士革）、拜台母捍德思（耶路撒冷）、抵达迷思尔（开罗），然后乘船越红海抵达吉达。从尔叨补（加济安特普）也可分道至七刮思（基利思）、安托期（安培基亚）、了特更叶（拉塔基亚）、特拉布鲁思（塔尔图斯）、安呵（阿克）至地中海的雅法乘船。另一条是从补哈拉（布哈拉）向南至哈什（卡尔希）、马作尔里（马扎里沙里夫），薰布勒（喀布尔）、敢德呵尔（坎大哈）、夫申（皮申）、克拉体纳（基达）、拜览（比拉）到达大海边，然后穿越阿拉伯海，直抵麦加。这一朝觐路线虽然不是马德新亲历，却是他向走过这条路线的新疆朝觐者调查访问后记下来的，其中包括城镇之间的驿站路程，如“哈迷（哈密）至土尔方（吐鲁番）十二站”，“母捍德思（耶路撒冷）至谜思尔（开罗）十站”。马德新所记述的“天山北路途程”和丝绸之路中道基本吻合，清代新疆穆斯林前往西亚都选择这条通道。其实它自中世纪起，就是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或到阿拉伯地区求学、经

商的主要道路。

丝绸之路的南道，也曾留下中国朝觐者的屐痕，自敦煌的阳关经罗布泊、沿昆仑山脉北麓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过鄯善（今若羌东）、且末、于阗（今和田）到渴槃陀（今塔什库尔干县），越帕米尔到喀布尔，由此行到赫拉特再经法腊、设拉子、巴士拉，再骑驼马、步行或坐船，也可至麦加。葡萄牙人鄂本笃访问中国由印度越帕米尔高原途中，曾在喀布尔见到从麦加朝觐回来的喀什噶尔王的妹妹哈吉·哈努姆，她与鄂本笃所在的商队一行就是从喀布尔向北，越过塔什库尔干到叶尔羌（今莎车县）的。在摩洛哥学者的著作如《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有着对这一条商道兼朝觐之路的记载。

到了近现代，陆行路线又有所改变，一条是骑马或毛驴去克什米尔，然后坐汽车到拉瓦尔品第，再坐火车抵达卡拉奇，换乘海轮抵吉达。另外，还有一条线路，即从新疆经前苏联，到土耳其的伊斯兰堡（伊斯坦布尔），然后分成两路，一路乘火车到贝鲁特，换船去吉达；另一路直接乘船走苏伊士运河，过红海直至吉达。到 80 年代中巴公路建成后，新疆穆斯林又获得一条朝觐捷径，即直接从喀什坐汽车越红其拉甫山口抵伊斯兰堡后，再换乘火车至卡拉奇或直接从伊斯兰堡坐飞机去麦加。走这一条路线去麦加，来回一次约需 2 个月至 2 个半月。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是在 10 世纪末与 11 世纪之间，最早只有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及和阗等地的居民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13 世纪至 14 世纪蒙古帝国崩溃以前，龟兹、焉耆、天山北路自今日的昌吉以西直至伊犁，均开始崇奉伊斯兰教，但其它地区仍信奉佛教，还保留着一批景教徒，因此伊斯兰教在新疆还没有达到统治地位，其宗教活动形式的影响也

未被普遍关注，朝觐活动也可能仅限于部分上层人士，人数不会很多。到了明代，新疆地区逐渐伊斯兰教化，关于穆斯林朝觐的记载开始出现在当时的史籍和碑铭中。15世纪时，喀什噶尔著名学者穆罕默德·比尼·热西提·艾力前往西亚游学，他在阿拉伯半岛对当地享有盛誉的四位学者的名著进行了必要而成功的修改，以致引起轰动。大约在1460年，他逝世于麦加。他名字叫穆罕默德，必然是位穆斯林，又长期居住在圣地麦加，我们有理由肯定他是一位作过朝觐的维吾尔族哈吉。十七世纪初，葡萄牙人鄂本笃由印度越帕米尔高原来中国时，曾在喀布尔见到了从麦加朝觐回来的喀什噶尔王的妹妹、和阗王的母亲哈吉·哈努姆。1665年，阿布杜拉在称汗叶尔羌国27年之后，把政权交给长子尧勒瓦斯，也曾去麦加朝觐，返回后留居印度德里城。大约在18世纪伊斯兰教独揽整个维吾尔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后，朝觐的范围才开始扩大，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期间，群众性的朝觐活动几乎没有间断。《西域图志》卷39关于"阿吉"(朝觐)是这样写的："回部有默德纳，为回回祖国。回人凡终身，必亲往礼拜一次，以答鸿庥，办装裹粮，往还期为三年。唯富者能酬其愿，贫无力者不能也。亦有附香火之资于富室以偕往者。"

清末民初执掌新疆权柄的杨增新在《补过斋文牍》中所述虽有误解，但更为具体："新疆素号回疆，回缠人民，因宗教之关系，请领护照赴土耳其(应为麦加)朝觐者，每岁不下数万人(该数字似过于扩大，不确切——编者注)"。由于穆斯林把赴麦加朝觐"视为身心性命之图"，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天方真传"，因而"纷纷请领护照者"，并没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有所减少。为了巩固军阀统治，杨增新表面上恭维朝觐是"乐

善好施，悔过迁善之举”，实际上一度对到麦加朝觐进行限制：一是借口“欧战”爆发，“一律停发护照”；二是对于坚持到麦加朝觐的人，则借口“补助公益”，以“振兴宗教，维持学务”，“所有请领出国朝汗护照者，每护照一张，除照费外，定为加捐款喀票银六百两。”其中三百两作为领护照人“原籍地方礼拜寺之用”，另三百两捐助“原籍地方学校之用”，“公家决不能提取分文”。这项“捐款”美其名为“补助公益”，实际上是一种对朝觐的经济限制，因为当时能拿出这样一笔大额银两的人不多，使许多新疆穆斯林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推迟到麦加朝觐的日期。但杨增新下台后情况又有所变化，尽管自民国初至1949年解放，新疆社会长期动荡，但据沙特朝觐管理部门统计，每年至麦加赴朝者多在千人以上，30年代一度保持在二千余名左右，不少人以探亲名义申请出国。光是1936年经从伊犁、前苏联到土耳其转船去朝觐的新疆哈吉就有500多人，其中伊犁地区130余人，南疆地区180余人，东疆各地约200人。当时由俄罗斯经营的旅行社包办行程，在莫斯科停留7天，抵土耳其前的食住行收110土镑(合250块银币)。只是在抗战爆发后，人数才有所下降。

建国以后，新疆许多穆斯林仍然按照先辈的方式用探亲访友的名义去麦加朝觐，因此，不易统计他们的确切人数，到80年代中期，由政府组织的自费朝觐出现，有关部门开始掌握具体的朝觐人数。如和田地区1979年至1982年探亲朝觐的有214人，1983年209人，1984年增至1195人，从红其拉甫口岸出国的有843人。昌吉回族自治州穆斯林自费朝觐人数历年为：1985年17人；1986年15人，还有一人探亲朝觐；1987年13人；1988年9人；1989年9人，1990年10人，有2

人探亲朝觐。全新疆1988年有组织的自费朝觐者为170人，另有探亲朝觐300多人。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8年底，新疆自治区前往麦加朝觐的穆斯林已有7318人，其中有组织的自费朝觐者978人，协助工作的人员75人，以探亲去朝觐的6265人(《新疆年鉴》1989年)。1989年新疆有组织的自费朝觐者180人，探亲朝觐者1020人；1990年自费朝觐者163人，探亲朝觐者702人，到1993年新疆有组织的自费朝觐者800人，探亲朝觐者3000余人。近年来，新疆朝觐的哈吉人数远远超过建国前。

从新疆到麦加，横跨了整个中亚、西亚地区，直线距离就达几千公里，故在清代，新疆穆斯林从陆路赴麦加朝觐，来回一次要用三年时间。直到本世纪40年代，单程也需两个月。如喀什的阿吉拜都拉是1947年去麦加，先骑马走40天到克什米尔，后又坐2天汽车到拉瓦尔品第，接着坐3天火车抵达卡拉奇，然后又乘12天轮船才到沙特的吉达港。所以维吾尔族朝觐者往往结伴而行，有的则是一家几口相依出国。如1907年，和加尼牙孜的母亲听说托克逊县伊拉沽丹有个名叫吾守儿满克里的人要去朝觐，就带着儿子来到那里，然后结伴乘马车先到喀什，没过几天，又有一批朝觐者相继而来，于是大家一起经蒲犁出境去麦加。自1920年以来，仅阿图什县的阿扎克乡和松达克乡夫妻同赴朝觐的就有6起，母子同行的5起，父子或父女同去的2起，兄妹同去的1起，其余的也都是同乡邻里搭伙结伴而行。

新疆的朝觐者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由于路途遥远，即使经济条件比较好的穆斯林抵达麦加后，手中也就所剩无几，而且很多朝觐者都因路途遥远而错过了当年的正朝期限，结果

只好等待来年的朝觐月，这样必然带来不少生活困难甚至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当时的沙特政府无力为朝觐者提供资助，也不可能提供就业机会，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自谋生路。如1907年去朝觐的和加尼牙孜，朝觐完毕就曾在当地一个枣园里做了3年雇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人因缺乏旅资欲归不能，就慢慢定居下来。阿图什县阿托克乡铁间村的阿布都热依木卡力阿吉，于1934年陪同母亲艾则力·巴利汗一道去麦加朝觐。由于路途艰难而漫长，使他们没有赶上当年的朝觐月，只有等待来年。然而生活的清贫和疾病的侵袭，使母亲不久离开人间，阿布都热依木在异国安葬母亲后，出于感情的原因，在参加完朝觐活动后，没有马上回国，为了维持生计，在当地做小买卖，打馕、卖烤包子。这样，日久天长，就定居下来，并且结婚成家。沙依提阿吉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他是1948年和母亲一起去朝觐的。他们骑着两匹马，还带有一头毛驴走了6个月才出国，到达卡拉奇母亲病倒了，因为轮船禁止病人乘坐，所以就只好住下，不料半年之后母亲去世；沙依提阿吉只有自己启程到麦加，因距朝觐月还有一段时间，就做起裁缝以为生计，从此再没踏上归国的途程。当年新疆穆斯林朝觐之后定居下来的人为数不少，据洛甫县的牙森阿吉讲，他是1947年去麦加朝觐的，当时一块去的有70多人，除15人回来外，其余都在沙特或其它地方定居了。阿布利克木也是洛甫人，他曾对人说："我是45岁去麦加朝觐的，在那里住了三年，主要靠背水卖为生。当时去的还有10人，那时我曾遇见过50多名维吾尔族人。"据了解，在本世纪初的时候，沙特的塔伊夫地方就有50多户维吾尔人从事开荒，据说那里第一个种水果的就是新疆人。还有的朝觐者受时局的变化欲归不成，定居下

来，如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新疆穆斯林流落到麦加的就有“百余人”之多，盛世才时期喀什“四大巴依”之一的阿不都热依木发现局势不利，便率全家于朝觐后定居国外。

早期到沙特朝觐后定居的维吾尔人，以打馕为生的占70%，因为这种食品很便利各地朝觐者食用，沙特政府对从事此行业的人员给予较多的补贴，所以是个吃苦而赚钱的买卖。其次主要是卖水的，还有做小生意的，打铁的、剃头的、做衣服制帽子的。

40年代以后，沙特的经济随着石油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因劳动力缺乏等方面的原因，对定居在该国的新疆人限制不严。特别是入籍的维族华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沙特公民所能享受的各级待遇，于是，不少新疆华人靠自己辛勤的劳动，逐渐富裕起来。阿布都卡的尔·依布拉因是新疆玛纳斯县人，1935年随父母、哥哥、姐姐一同赴麦加朝觐，后来就定居此地并加入了该国国籍。经过几十年的奋斗，现在他在沙特的新疆人中，已是一个既富有，又具有一定地位的知名者。前面提到1934年与母亲朝觐，后定居沙特的阿布都热依木，起初住在吉达，经常徒步往返于麦加之间作买卖，有时还要长途跋涉到也门赚些钱，当有了一些积蓄后，就在麦加买了一间土房子。由于他能吃苦耐劳，把一时无处出售的羊皮积存起来，后来从叙利亚来了一位皮货商，阿布都热衣木把自己收藏多年的皮子合盘托出，获得了一笔收入，从此他便专门经营起皮货，生活渐渐好了起来。1949年以后，他又同日本的商人作了几起大的贸易，从此便富了起来，购置了家产，以致发展成了沙特新疆籍华侨中首屈一指的富商。

建国前，由于朝觐等各种原因定居于国外的新疆穆斯林

华侨，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已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由于身处异国他乡，这些朝觐者为寻求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相互帮助，相互依存，慢慢形成一个小小的社会细胞，保持着“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他们凡婚丧嫁娶都相互往来，如有遗产继承及纠纷等事须处理，一般也不找当地政府部门而是通过大家推举出来的“阿克沙卡里”（即有威望的长者）调停解决。虽然他们领了外国护照，但他们心里仍是中国人，所以他们都非常关心国内的情况，关心祖国的强盛发达。因此，当国内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他们就积极与国内亲人取得联系，一方面回国探亲，另一方面又根据自己亲眼所见所闻向国外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为发展祖国与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联系交往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些与祖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当年朝觐者及其后代，他们怀着爱教报国之心，是推动新疆开放、进步、发展的一股新动力。

除上述经丝绸之路从新疆西行朝觐的路线之外，民国以前从陆路走还有三条到麦加的路线，常常为中国各地的回族穆斯林所采用：一条是沿着唐代初期所开创的“吐蕃呢波罗道”，即被今人称作“麝香之路”者南行，先从西宁乘马至拉萨，出西藏到印度的噶伦堡，再至大吉岭，这时或西行到喀布尔转道往麦加，或在印度半岛诸港口乘船赴麦加。这条路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抗战期间仍被利用，过去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来回一次要历时 2 年，本世纪初有了汽车、轮船后，也少则要 4 个月，多则半年。另一条路线是自四川成都平原过雅安、西昌、渡金沙江到云南的大理、腾冲，在到达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沿江下行至仰光，搭船再至孟加拉候大船去吉达。据《朝觐途记》一书所述，清代马德新出国朝觐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或者是到达伊洛瓦底江上游后，越过那加山脉到阿萨姆，沿布拉马普特拉河到该河和恒河的入海处——恒河口，经这里的港口乘大船也可越过印度洋到达吉达港。这后一条路要经过热带雨林，常常遇到瘴疠瘟疫，其艰难程度不亚于穿越沙漠戈壁。第三条则是通过岭南到达广州，从这里搭远洋船只，沿“香料之路”航线西行麦加。然而不管陆路行程多么辛劳，每条道路又各有多少险隘难关，但在意志坚定性格刚毅的中国朝觐者面前，都被一一征服，因此不管从那条路线踏上征途，结果都变成“条条大路通麦加”。

(二)海上行舟千顷波涛　成全心愿何惧颠簸

中国穆斯林从古代直至近代赴麦加朝觐，不管从哪个方向启程，几乎都离不开搭乘船只，因此都免不了要在千顷波涛上飘摇一番，也都分别领略过南海，印度洋或地中海咆哮的味道。那种在惊涛骇浪中的筛摇颠簸，那种因风向不顺而发生的延误行程，那种困囿于船上的小小空间而产生的拥挤不便，那种需中途换船来回倒腾而带来的种种麻烦，无一不是对中国哈吉们信念与毅力的严峻考验。

首先看一下坐船的行程问题。在19世纪中后期以前，海上交通都依靠帆船，其主要动力就是利用季风，所以中国穆斯林乘船朝觐的顺利与否，就看能不能赶上季风，不然的话，就得在途中长期等候，延误行程。当时无论从广州出海还是从印度洋诸港口出海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朝觐途记》一书就记述了作者马德新类似的遭遇。1841年农历10月，马德新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朝觐兼游历域外诸国的行程。他从昆明随

同几位商人出发，过了澜沧江边的景洪进入缅甸，经过近代滇缅贸易的重要城镇腊戍，在缅甸旧王城及民族文化中心曼德勒拜谒了缅甸国王。当他发现这个座落在伊洛瓦底江畔的历史文化名城还居住着三千多户穆斯林时，感到大为惊奇。1842年农历2月，马德新到达缅甸的海滨城市仰光，准备从这里搭游船前往阿拉伯半岛。但他到达的季节不好，原来印度洋上向西航行必须借助东北季风，而东北季风只有在秋冬季。他到仰光的时候，正是"欣德之海(印度洋)风浪大作，不能行船"之际，因此船家都不出航，只能苦苦等候近5个月。1842年农历7月马德新终于登船西行，但此时风向还没有由东南季风改为东北季风，一路上逆风而行，通常半个月可到的路程，却花了40天才抵达印度的加尔各答。在此地，他又为寻找去吉达的便船滞留了4个月之久。遇到这种情况，大多数人只能听天由命，耐心等待，然而马德新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不虚耗光阴，而是积极利用停留机会采访当地贤达、了解风土人情。也有的时候，中国哈吉延误了船期，不是因为自然环境，而是出于人为因素。如1936年经伊斯坦布尔乘船去麦加朝觐的几百位新疆哈吉，在完成大朝抵达吉达港准备及早返回家乡时，原先乘搭的土耳其轮船提高了船价(来时船票价45土镑，交卫生捐13土镑，共58土镑；归时船票价涨至88土镑)，因此遭到哈吉们的抵制。有的新疆哈吉计划改坐别国轮船，有的则去土耳其驻吉达领事馆交涉。后来船方让步，每人减少8土镑、不收其它杂费，并保证冷热水及时供应，才解决了这场纠纷。尽管这样，原定于月末启航的轮船推迟了一星期，而负责交涉的我国留土耳其学生马明道则被土耳其驻吉达领事馆下令交了1英镑(11土镑)回土入境签证费(来的时候不用交)。

但是与中国朝觐者在惊涛骇浪中苦苦煎熬的经历相比，延误一些船期带来的心焦意烦真还算不了什么大事。

1933年北平成达师范教师兼《月华》主笔赵振武去开罗护送留埃学生并顺途朝觐时，从上海买的船票是经济二等舱，比二等舱地位靠下一层，与过去大多数朝觐者坐四等通舱条件相比要好得多。就是这样，仍难免风浪侵袭，请看其《西行日记》记载他在南海的一段航行："12月13日，雨，风。船因为风雨，比昨天似乎摇得更甚了。夜里，我的床旁边的圆窗，虽在昨夜经茶役们关牢，在一点多钟时，浪仍旧打进来了。固然，我是必须起来收拾水的，(马)松亭们却也惊起，忙着把盆子、手巾，一样样递给我……。比我还忙……中午，水进来的更多了，仍是从那个圆窗中，以至于上床上边的衣物，下床下边的箱匣，都淋湿了。12月14日，大风雨，船更厉害地摇着，闷热亦更甚于前两天。窗子钉得牢牢的，惟恐浪头打进来，一点气都不通。到船面上去乘乘风，又有雨，所以觉得烦闷些……傍晚雨停了一会儿，我们便都跑到船面上去乘风，甚至摇的东倒西歪也不管。"再请看1931年与马坚等结伴上埃及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并曾参加过麦加朝觐的纳忠先生对经过北部湾时海上风暴的描述："待船启碇后，风浪大作，头眩晕得不能走……午夜12时，北风劲，暴雨急，巨浪越打越凶，船身不住地前后起落，这时我们住在船尾的人，躺在床上，忽而如升上云霄，忽面如插入海底；巨浪向船板打来，如雷声，如地震。不到十分钟，我的脑中胸中，如被一块巨大的东西压迫着，肠里胃里如吃了烈性药物，一阵阵搅动起来，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翻肠倒肚地吐个不休，接着仲明、子仁也吐了，最后沙先生也吐了，只有病后的子实还能呼呼成睡。这时乘客的呕吐声，呻吟声，

桌椅的翻倒声，瓶罐的破裂声……嘈嘈杂杂，真个是天翻地覆。而暴风仍然不断吹着，巨浪仍然猛烈地向船压迫，其声如万马奔腾。这时我心如鹿撞，思路纷纷的想着……大海……风暴……?！天破晓了，雨也停止了，但暴风仍催着巨浪，不住地耀武扬威，船依然如秋千。”(纳忠《埃及九年》，《阿拉伯世界》1992年第3期)。1936年4月，留学土耳其的马明道随新疆哈吉们朝觐完毕回伊斯坦布尔时，下午5时，船刚刚驶入红海，“7点以后，起了大风。4月6日，大风雨，竟日未起床，呕吐两次。4月7日，风势消减，随同医生，检验哈直，有91岁哈直‘乃咂尔’，疏勒人，务农，因船摇，致重疾，移入病室，夜大风又作，病者气绝身死。4月8日，早，风势仍未减，八时抵秃勒，这里有埃及政府的隔离所，凡自阿拉伯来之过境哈直船，须在此地停留，哈直登岸入所，做海水浴”，“隔离3日”，“死去的人，埋在这里。”“4月9日……天将亮的时候，听医生说，一位叫‘由苏甫’的85岁的老哈直，死去了(疏勒人，务农)。4月10日……死人，投到海里了。”“4月12日，又遇到大风雨，船摇甚凶，除呕吐之外，无可记录者。上午，风势未减。下午，过罗多斯岛后，风渐少，哈直等，都叫苦不迭。”(马明道《从伊斯坦堡到麦加》，《晨熹》1936年第2卷第12期)。

其实，由于坐船化费的时间较长，除了不时要遭受风浪侵袭之苦，漫长的航行还令人倍感寂寞、单调和精神压抑。这些因素再加上有些船只的设备不好，以及海上闷热潮湿的气候，使许多朝觐者染上疾病，甚至献出生命。如赵振武等一行从开罗去吉达时，买的是意大利的三等舱票，结果“附近的厕所不许你出恭，厨房不许你烧饭，”“船上的水龙头为了我们洗小净，被他们用铁丝锁起”。有时一天只吃“两顿面包就咸菜，惟

一的汤是向同行印度人阿布喀迪尔君处索寻了半壶白开水每人冲了一碗油茶面。"由此可见当时因为经济拮据的广大中国穆斯林坐四等舱时是什么滋味。马明道在《从伊斯兰堡到麦加》中就写道，他们乘坐的从伊斯坦布尔开出的哈吉船约1300吨，船主为了多赚钱，却多载了300多位新疆哈吉，很多人没有床位，只能睡在甲板上、过道里，其中有86岁的维吾尔族老太太。买二等舱的，每屋原为4张铺，却安排住7至8人，买三等舱的，则挤住在货舱。有时中断供水，经与船长交涉，才每天凭证领水3次，每人每次给开水冷水各一壶。赵振武和马松亭等朝觐回来坐的是专程接中国哈吉的蓝烟囱公司轮船，设备还算可以，"但船上的气候，的确有些不适于陆居的人，何况十几天不见一点土星儿，无怪乎好人都带三分病！在舱内既潮且热，到船面上去，海风吹得又很凶，一不留神，便容易致病。""宣化张春华阿訇，本来带着病来朝觐的，""真是万幸张春华君打病病歪歪之中，把天命交还了，可是病也日深一日。这次上船的当儿，已竟是力疾而登了。到了船上，""经过医生昨日一日的治疗，始终不见丝毫起色，今晨晨礼前，他竟辞了五十多路伴而回到真宰面前去了。……他的'者那在'（殡礼）是在8点半举行的，参殡的人员是全船的哈吉——中国人和马来人。只有船主并不允许尸首在船上停留一刻，因为顾虑全船千余旅客的安全计。因为此，不能不举行水葬。那是9点钟，他的'者那在'举行完毕，全体哈吉把他运到船夫预备好的木板上，把一块重约50斤的铁条束在他的身上，用绳索将木板系到水面上，绳子一斜，他便随着鲸鲵的导引而沉到4千公尺深的海底去了！""马希圣哈吉的病，仍其重，怕不能敷衍到上海去，同人们都为他捏一把汗。……他在宵礼之后，9

点半钟的时候回到真主面前去了！同人们请求船主打算明日晨礼前为他作葬礼，但是，他们不允许，他们仅能容到子正12点为终时。同人们不得已。便手忙脚乱的洗埋体、缝克番。大约是10点钟，人们为他站了'者那在'，11点，他便与张春华哈吉在水晶宫中会面了，"赵振武对此大为感慨地说："人们在世，多少年才算够呢？张春华差不多50岁，人们还为他的死可惜；马哈吉尚不足30岁，亦已竟与波臣为伍，人说那条路上无老少，的确不错！然则人的责任，应该在你没有走上那条路之前，赶快去干吧！"

对中国朝觐者来说，除了坐船有误期、颠簸等麻烦外，中途倒换船只也是困扰大家的一件事。上海至麦加这条朝觐之路，基本上是走古代香料之路一线。与以往不同的是，航海工具都是大轮船，安全性强，航行快，大大缩短了中国与阿拉伯各国的航程。主要由英国蓝烟囱轮船公司承办这条航线。但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它并不是直航吉达港，旅客必须两次中转，先停靠香港，旅客住宿当地回教博爱社，由该社代理购船票去新加坡，住宿在当地热心伊斯兰教务的艾则尔改夫（又简称三喀夫）设立的招待所内，再从新加坡乘半月一次的朝觐班轮船去吉达港。由于沿途辗转待轮，朝觐者往返一趟少则半年，多则8个月，花费时间久，住宿与伙食费也高，每人往返需银元500多元，按当时生活水平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数字。

上海西寺（现小桃园清真寺）的创建者金子云，1929年去麦加朝觐，同行者有日晖港清真寺韩礼堂教长、金耀祖阿訇、达静轩乡老等人，当年他们乘的是美国邮船公司威尔逊总统号轮，如期从上海直放新加坡，再转轮至吉达港，一路上都比较顺利。但是回程时驶离吉达港不远，就遇上连续十八昼夜的

大风浪，轮船随波起伏，摇晃不停，哈吉们晕船不起，饮食不进，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在经历这场风浪冲击之后，船虽然平安抵达新加坡，但金子云感受颇深，深刻体会到朝觐者的艰辛，尤其是广大内地和西北地区穆斯林，为了赶到上海港而所付出的艰辛。金先生早就想在旅途安排方面为朝觐者做些努力，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这次他借在新加坡转轮之机，考虑了开办直达朝觐班轮和在上海开办哈吉招待所等事宜。他在与新加坡穆斯林热心人士交谈中吐露，如果每年有直达轮船，于朝觐期间往返上海、吉达，为中国穆斯林朝觐者提供方便，那将是最好不过，希望新加坡方面能提供帮助。这一设想很快得到艾则尔改夫先生的积极支持和响应，艾则尔改夫的祖父与父亲都曾热情接待过往的中国朝觐者，设立专门招待所。当年马德新朝觐归来在新加坡留居考察时，就曾得到他们的帮助，其后代亦把帮助中国朝觐者视为乐事，因而受到中国穆斯林的高度评价。他们就近与英商蓝烟囱公司取得联系。不久，金子云返回上海，又同上海银行附设中国旅行社等进行磋商。为争取第二年和以后的朝觐者能有专 轮往返麦加而奔走不懈。经过与中国旅行社经理邓炳铨、顾承林二人多次协商，终于达成协议。中国旅行社发言人为此公开宣称：“本社之设，原以服务行旅为旨。有鉴于朝觐诸君之困难，乃谋一便利之方，十九年(1930 年)冬，各方教友，齐集沪渎，本社遂与蓝烟囱公司商妥，每年特放专轮，自上海起程直达芝(吉)达。如是旅费既省，又无转轮折待之劳。”按照上述宣告，自 1930 年起朝觐者在“来者布”月(教历七月)在上海会集，办理出国手续，准备朝觐事宜，轮船直接往返中国上海与沙特阿拉伯的吉达港，只在中途停靠加油加水，中国穆斯林朝觐者得到了当时最佳朝觐路

线。至此，昔日“香料之路”或称海上丝绸之路又变成朝觐者的通衢大道了。

为了接待各地来上海的朝觐者，使他们能安全迅速地组织起来及时登上朝觐班轮，金子云又把上海小桃园清真寺作为朝觐人员的接待中心。小桃园清真寺由金子云等人于1917年首创，当时规模较小，后来又于1925年发起重建，各方教友积极捐集巨资，仔细设计策划，兴建完毕，占地二亩多，礼拜殿三层五间，上面两层为教友试办的孤儿教养所，下层为会客厅，设备完整，诗画古玩点缀得宜。礼拜殿的南面，盖一座洋楼，前面为四开门，有二层，专设招待朝觐教友的特设房间，可容纳100多人。后又建了第三层，有三间房子，作为沐浴室，室内装置冷热水管，上下三层浴仓，共计30间，自己装置了电力吸水机，用水相当方便。金子云除了在清真寺为朝觐者提供住宿方便，他知道内地尤其是西北朝觐赶到上海就已经因为路途遥远，跋涉艰难，有些人甚至不明白出国应办的手续，因而临行发生阻碍，就专门在寺内设置人员，对于签发出国护照、购买船票、兑换外汇等等一切均代为办理，他付出了艰辛劳动，使朝觐者不至于耽误和疲于奔波。金子云热心教务、办事公道、喜善好施、助人为乐的行为受到全国各地穆斯林的好评和尊敬。

英国蓝烟囱公司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拥有航行欧洲及远东干线的船只达81艘，其中甲级轮船9艘，专载头等旅客；乙级客船65艘，专门载运东南亚地区朝觐者由新加坡至吉达。船的吨位由4500余吨至11400余吨不等，船上的设备比较完善。船舱多用紫色和白色漆成，所以显得异常雅洁。对朝觐者来说最方便的是船上有露天甲板，可使他们晨夕礼拜，

而不至于耽误功课。船上的厨房设备齐全，地方宽敞，可给乘客提供柴、炭、清水、食品等。以1932年中国穆斯林朝觐者所乘的"爱茄披那"轮船为例。这艘船净重7578吨，时速每小时14海里，可载乘客1117人。1932年朝觐的中国哈吉是50人，由船主安排在甲板上层的中舱，这个舱定员应为116人，当年由50人乘坐，所以地方宽敞。厨房为每个朝觐者每天供给的食物和水都有严格的定量，如平均每天给米1磅又十分之一，椰子油1盎司，南瓜、马铃薯等4盎司，咸盐三分之一盎司，洋葱1盎司，干鱼3盎司半，糖1盎司，调味品三分之一盎司、咸鸭蛋一个，隔日供应新鲜去骨羊肉3盎司半，清水一加仑半等等(盎司为英两，约23.4克，相当于中国杆秤半两)。如团体满50人，一周或5天供应一头活羊。船上为了安全，一般不允许乘客自行燃火做饭，必须由船上的厨师在指定的厨房代乘客调羹烹饪。

当年去麦加朝觐的中国穆斯林，除非家境好的，一般的旅资都来之不易，自然非常节省，他们从内地赶到上海，所需时间就得个把月，多一天时间，就得多花一天的食宿费。所以到上海出国乘轮船的中国穆斯林一般都买往返票，这样能省不少钱，如1932年由上海至吉达的蓝烟囱轮船统舱票价，由上海至新加坡单程国币30元，来回国币50元；新加坡至吉达，单程需新加坡银圆127元，来回只需新加坡银圆182元，即买一次来回票，要比买两次单程票便宜72元。

自从1932年开辟"上海至麦加"固定航班的海上朝觐之路后，到抗日战争爆发，6年内大约有六七百人乘坐这条航线完成了朝觐功课。这些朝觐者包括全国各省的穆斯林，但大部分系来自甘、宁、青等省，也有新疆的穆斯林。如1932年由甘

求杨文清为首的 50 人朝觐团，大部分是甘、宁、青朝觐者，但人数较多而声势较大的，则是 1937 年由当时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为团长的朝觐团。1936 年 10 月 27 日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一行 11 人率甘、宁、青穆斯林麦加朝觐团 126 人（女 6 人）由上海乘蓝烟囱公司“阿斯飞隆”号轮船放洋。据说行前甘肃省绥靖主任朱绍良曾一度劝阻，说：“值此边疆不靖之秋，正赖老成如我翁者坐镇。如必欲出洋朝觐者，可待来年。”马麟回答：自己已举下意了，万不能再缓。当时小桃园清真寺乡老马儆吾、金子云，孤儿教养院金耀祖、王镇平，浙江路清真寺哈德成，福佑路回教堂达浦生，《人道》月刊社杨玉书、马吉先，小沙渡回教堂买俊三等知名人士及孤儿教养院全体学生等约百余名上海穆斯林前往码头欢送。同时参加送行的，还有当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代表李大超、公安局长的代表及杜月笙等上海闻人。

马麟一行朝觐归来不久，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上海抗战事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华界，因此，原定当年从上海出发的朝觐者无法按时启程，经过多方协调，这一批朝觐者终于冒着危险穿越青藏高原前往印度搭船去麦加。上海至麦加的朝觐专线整整停了 10 年，直至 1947 年和 1948 年，才有两批朝觐者继续乘搭这条航线前往圣地完成天命功课。建国后，随着航空运输的发展，新中国的朝觐者都通过乘坐飞机前往麦加，这样既省时间又相对安全。因此，上海至麦加的朝觐航线及其后来开办的往返班轮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中国穆斯林朝觐者结束了跨海远航的难忘时代，但他们那种为完成天命而不畏艰险的气概和种种动人事迹已成为历史上值得回忆、记载的重要一页。

(三)远行难免撞凶遇险　受苦遭难举意不变

中国穆斯林昔日万里迢迢前往麦加朝觐，除了要克服陆上行走或海上泛舟所产生的种种困难外，还要和病魔及种种天灾人祸争个高低，尽管遭受凶险苦难，但举意完成朝觐的誓言决不会改变。

俗话说：走的路多，吃的苦多。中国朝觐者远行在异国他乡，碰到的麻烦岂止一桩！以当年马德新的经历为例，就可略知其中端详。其一，他从吉达港乘船返回家乡时，其所坐的“法苔母波勒”号于半夜经过一个岛屿时，撞上海中礁石，在巨大的震憾声中，一船的人都以为即将沉海，幸亏真主之恩典，该船没有撞出洞口，所以侥幸脱险。其二，也是在归国途中，马德新乘坐一艘叫“底呀浪澜米呀澜”的海船，突然被雷电击中船桅，使其上节粉碎，影响到大梁，并损坏了大桅上部，折断1尺多。乘客们都惊慌失措，害怕雷火窜入船内，引起船上所载棉花燃烧，后来经仔细察看，总算安然无恙，每人这才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其三，过去西亚诸国经济落后，卫生条件很差，因此经常流行各类疾病。有的国家害怕病菌传入，便对从国外来的过往船只进行检疫，当时叫避瘟禁所，“凡远方人至，置诸城外，拘禁15日，国人不敢近之，必俟禁期满，曰‘其避远方瘟疫’”。马德新在西亚游历时，已领教过关入避瘟禁所的滋味，但在一次驶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程中，船家害怕耽误行期，故意躲开避瘟禁所，停泊于一个荒岸，结果仍被人发现而被强行驶入该禁所受检疫。马德新当时下船在荒岸上露宿，船被抓走时他全不知道，“苦难及我，几至死，同人已去，予在沙滩两夜，不

见一人，无食无饮，亦不知由何途往。后同人来寻，乃至避瘟禁所，居15日，其期限也。”其四，1845年至1846年之间，麦加地区先后遭受“瘟疫”的多次袭击，不但持续时久，而且疫情严重，受灾面积大。根据“吐而腹泻症状判断，似乎是流行霍乱，”仅一日之内，“殡者约四百”，后来阿拉法特、米那地区“死者数千”，继之而来的是“疟疾”，“亡者颇多”。请看马德新在《朝觐途记》中的有关记述：“未至满克之前二月，满克有瘟疫，丁八月，瘟复至，其症吐而腹泻，亡者多。甚至晡礼后，殡即二十五柩。是日，予闻殡者约四百。后平安数月。于西历十二月，瘟复至，尔来溥体(阿拉法特)、弥那死者数千。一千二百六十三年正月(伊历)，疟病至满克，亡者颇多。”作者对当时麦加穆斯林的健康十分关切，但又无能为力。不久，他居住的街区又“遇火灾，尔母勒门延烧禁庭附近之庐，”“自晌礼时至昏礼，火焰入禁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他已完成了朝觐天命，但难于继续考察学习，不得不启程回国。“陕西人暗欲补(阿尤布)欲与予同行，但彼有腹泻之病，已移吾寓所，后其人病沉重”，马德新从吉达“起程之夜，暗欲补卒”。

由于路途遥远，行程紧迫，阿拉伯地区天气炎热，再加上众多朝觐者汇聚在一起，卫生条件较差，沙特政府当时经济落后，没有财力改善环境，因此过去历代的朝觐者都或多或少碰到过类似马德新这样的疾病袭击或环境方面的不适应。有的朝觐者刚到吉达港时就发觉港口“不但水浅，而且有许多沙滩。海水因为深浅的不同，或蓝、绿、黄等色，加上西沉的阳光，美观异常。”但“全市面积不大，用一小时可以走个整圈，街上的人不太拥挤，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到麦加去了。大街只有二条，下余都是小巷，街道狭小欠整洁。这里没有平房，至少是两

层的楼房。房子的门窗户壁，都雕刻着很精细的花纹，富东方色彩，足以代表阿拉伯艺术。这是因为回教禁止绘像，所以他们致力于图案。但是多破旧欠粉饰修理，殊为减色。房内光线不大讲求，街上的飞尘扬沙，比北平厉害得多，苍蝇、蚊子多得不可胜计。这种市政，我们虽然不满意，但是据当地人说，已经比以前大有进步了"（马明道《从伊斯坦堡到麦加》，《晨熹》第2卷第8期）。从吉达往麦加的交通，虽然路程不长，但在30年代即使坐汽车走此一遭也非易事："从准德（吉达）到麦加约华里120余里，完全山路，少数是沙漠，看去好像平坦，事实下面完全是坎坷不平的石头，所以汽车走起来，将人颠起数尺，墩的屁股生疼。有时将人颠起面墩下时，只听挨墩的老头们，呲牙裂嘴的念了一声'吾勒孩们都淋两席'（感赞唯独真主）"。去时如此，汽车回程时装满了行李，颠簸时更为不适："人是挤了满满的，车的当中是行李和箱子，将走出不远，这箱子便都倒在乘客们的腿上来。虽然是坐车。无异成箱子架子，所以车一颠起来，身子便悬起一二尺，然后落下时是连人带箱子一同往下落，砸在身上，皮破血出，有许多老人们，简直是太难受了，听去每一颠簸，真是呻吟不绝，就这样在山道里走了有3个钟头，大概这些坐车的人，身子都像散了，我的腿想动也动不了，箱子犄角和箱子上的铁环，将我的腿揉破了好几处，并且还磨破了几个包"（唐易尘《麦加巡礼记》）。至于麦加地区的炎热，更是对朝觐者的一大考验，而当时卫生条件的落后，使患病的人不断增加。赵振武在《西行日记》中写道："在好的习惯中往往藏着不良，在麦加也有些小事，使我有所感！比如这里的人听见念班克，便随处取一点水在盆中，就可以作小净；可是东边蹲着一个在作小净，西边蹲着一个在作小净，几

乎每个铺子或摊子前都有作小净的，这未尝不是美风，好习惯，因为表示他们每个人都不怠于功课；然而，把一条土街弄得左一汪泥，右一片水，尤其是晨礼、宵礼时，使赴寺行路的人们感觉极端的困难！”此外，“麦加的蝇子、蚊子、臭虫之属的东西，终年的，不分四季的与人们为对，而受戒者偏不许伤害它们，这是一点不便的地方”

由于原先身体素质差，旅途过度辛劳又导致感染了疾病，因此几乎每年都有若干名中国哈吉在麦加或归途中谢世，但他们都受到了中国同胞或当地穆斯林的尽心照拂。据金再之、王少泉《朝觐纪略》一书所述：“三月初五日，有甘肃老阿洪（年63岁）殁于满克，当请二人用‘宰目宰目’水将亡人洗净并洗大小穿布三件”，“穿毕用钱传念‘以思卡得’，由众‘罕志’抬至‘买士知得’，放在‘凯而白门’首地下。礼‘者那则乃妈子’者约13万人，礼毕出葬沿途众‘罕志’及本地官民争沾‘白而克特’，轮抬亡人至坟山，时送殡者各念求饶‘都哇’，葬毕互道‘色那目’而散。”甘肃王世龙在所撰《朝觐摘要》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述：“余往40多日，不但街巷未见该地妇女，即在‘哈散’（朝觐向导）公寓，仅于早晚出入，得见该寓女主人。一次，因有我甘省哈吉某，临终之时被该女主人闻知，即同其女仆，随带美香与‘宰目宰目’水瓶来到，观其装饰，长衣扫地面拂纱巾，只露两眼，无他语，以水喂之某口，并洒其胸，而提作证之言，直至某之气绝。余后始悉其女为故君候赛尼之闺女也，闻者莫不赞叹，佩而敬之。”四川回族文化界人士余泽州，光绪末继承成都“宝真堂”业务，印刷汉文经籍颇多，又与周子宾合办“爱伯书局”，经销海外购进的阿文书籍。1929年以七旬高龄只身赴麦加朝觐，就于圣地归真。有一位日本籍的穆斯林田中逸

平，也曾在1935年3月于上海出版的《人道》杂志第1卷第8至10期合刊所撰《麦加巡礼》中述道："麦加地方的第一印象，第二印象，只是热，除了釜中水苦，别无其他可以来形容它。热，是一切的净化。……忍着酷热疲劳，每天遵循着制规，在神宫庭从事五次的勤行。虽然第四天的朝晨在新加坡相会的五十余名的中国各地的教徒，是到达了而增加了热闹，但病人是陆续的生出来，死亡的也接踵相寻"。"我是和一个多年的中国的巡礼者相伴，投人旅宿，倾注着陶器的大瓶，尽量喝着神水(赞目赞目泉水)，才好容易生出了一种甦生之感。在这个宿店里面，可怜已有3个甘肃人死去。可是，作为他们的夙愿，能够在这个圣地死去，他们是一定死也甘心的。"在阿拉法特盆地幕营而泊时，"在这等的巡礼中，以及在每个时间的修行之中，为有如蒸煮那样的炎热所苦，我们的一团体中，中国人死去的，在米那山谷是有1人，在这个山谷是有3人，全体的死者有1千数百人之多。自古以来，在这个地方，凭着真主的名义而死去的，约计当不下几十万人吧。……把死去于人祖的发祥地而回归到天堂的这件事引以为光荣的教民，实在是丝毫都不感觉一点的不平和苦痛的。这个，实在是教外的人们无从想象的呀！"

到了近十来年，由于沙特石油经济的腾飞，卫生及医疗条件大大改善，类似过去的那种落后而貌已成为历史陈迹，中国朝觐者由于大部分坐飞机来往，也大大减少了旅途劳累。但由于朝觐人数逐年增多，汽车的废汽污染和炎热的气候交织一起，仍然会使一些年老体弱的朝觐者染上疾病甚至归真，但这一切，都不会动摇千千万万中国穆斯林为完成朝觐功课而作出的庄严举意与亲身实践。

朝觐路途上的艰险，有时不止是自然灾害，还有旧社会经常发生的“人祸”，包括人身侮辱，欠缺旅费，甚至车匪路霸肆虐，也不时地来袭击朝觐者。

1932年赵振武等从麦加回国时，曾在香港祭扫了当地的回教公墓，并为1931年在香港被杀的杨阿訇诵经祈祷。据他记述，杨阿訇是年与4个同伴于斋月期间抵达香港，其中3个即刻搭船西去，他和一位李哈吉偏偏留下，想要另雇船只。他俩住在一所清真寺里，次日沿街问船，街上人见他俩面貌——连鬓胡子，衣服都特别，而言语又不通，无不看作稀罕，其中也有知道他俩虽衣服褴褛，腰中却富有金镑，因此，坏人们便打他俩的算盘了。以后更有人介绍代买船票，把他们诱到海中，而杨阿訇便在这期间遇害了。清真寺中人和李哈吉见杨阿訇两日不归，情知有异，便拿了他的护照，到官府报案请为查寻。果然，报案之后水面上捞着一具浮尸，衣服、面貌都有些相似，才知杨阿訇是被人害死的。当地仁人捐资为杨阿訇修了汉白玉的石墓，并筹资送李哈吉西去。李哈吉决定留居麦加，而杨阿訇则长眠此间了，享年66岁。

宁夏吴忠市郊杨马湖乡团庄五队马明文阿訇，民国19年(1930年)曾第一次去麦加朝觐(1982年又参加中国伊协组织的朝觐团去了一次)，当时才20出头，是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从小就举意去朝觐，因为家里很穷，祖、父辈根本没有可能去，所以他就加倍的劳动，把所有的积蓄都用在实现这一夙愿上。在经济上有了一些保证后，他就找到了何以江、李三等几位同乡商量，决定从黄河走水路迈开朝觐的步伐。当时从宁夏去上海乘海轮，必须先到包头，然后转辗京津一带，搭火车去南方，路途既不方便，也不安全。他们从吴忠的古城乡坐船，说是船，

其实是大羊皮筏子，即宰羊时，羊皮从羊的颈部连同躯干、四肢整个剥下来，弄干净缝好以后里面充上气，几十个捆绑在一起，四周围用木头固定好，上面铺成木板就成了。这种水上交通工具是宁夏黄河地区的特产，因为这段黄河流经区没有什么急流险滩，除羊皮筏子外，只有极少数的木船用作交通工具。

马明文出发头几天还比较顺利，五天以后到达内蒙古的西山嘴，当晚在此地住宿无事，但第二天出发不远，就遇上了土匪。这里地方偏僻，周围是毛乌素沙漠，人迹稀少。这帮土匪非常野蛮，他们逼着所有的人都下船，但不允许带任何东西，马明文的包袱里有他长年省吃俭用积攒起来的7个银锭（约50两为一锭），不甘心眼睁睁地全被土匪抢去了，正在想拖延的办法。这时同船有一位老太太抱着包袱坐在船头也不肯下来，土匪喊了几次她也不听，一个土匪不耐烦，抬手就是一枪，把老太太打死了。这一下，把不幸的旅行者全吓坏了，他们明白眼前是一帮根本没有人性的野兽，与他们对抗等于是拿生命开玩笑，于是都含着眼泪下了船。这帮匪徒把旅行者的钱物全抢走还不算，又开始搜身，并逼着人们脱衣服，只要是好一些的衣物也全抢走。同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面对土匪的枪口连大声哭泣的胆子也没有了，只能默默地流泪。这伙土匪见再榨不出油水了，但还在人群中搜索，最后把目光留在了几位年青妇女身上，他们淫笑着上来拉扯这些妇女，她们大哭大叫，拼命想挣脱这群畜牲，但最后还是有四位妇女被土匪抢走了。劫后余生，马明文他们忍饥挨饿好容易到内蒙的五原县，不料，又一次遭到土匪的洗劫，这一下全船的人真正是一无所有了。面对着一群叫化子，船主也不可能再运载他们了。马明

文等几个穆斯林就一路乞讨着，四五天之后才到达包头。本来从包头到天津可以先坐汽车到张家口换坐火车直达，但已成为叫化子的马明文，不用说买不起车票，就是不饿死也算万幸。但就是在这种困境中，马明文也没有打退堂鼓，而是继续向东进发，一路上他沿公路线、铁路线乞讨，只要一有机会，就偷偷地扒货车，被人发现后，不免要挨顿骂，甚至还要挨打，马明文全不在乎。这一路走了几个月，除了要饭，他也到当地的清真寺要乜贴，当地穆斯林听了他一路上的遭遇，都非常感动，想方设法给他接济。

到达天津后，马明文的信心更足了。当初在从吴忠出发前，他听别人说路上不安全，时常有土匪杀人越货，为了慎重起见，他把一部分旅费先汇到天津，这真是他的明智之举，虽然路上损失惨重，但不至于倾家荡产。把这笔钱取出来后，他的朝觐梦又可以实现了。当时有钱的人去朝觐，都是直接从天津坐火车到上海，这样既省事又方便。但马明文不敢有这种奢望，损失了7个银锭，给他的旅途开支大大打了折扣，他得千方百计省钱，他先坐船到山东烟台，然后再换船到上海，但乘船速度很慢，一路上又花去十几天。

到上海以后，马明文松了一口气，以为很快就可以乘海轮出洋，没有想到光为办理出国签证，又等了一个多月。当时的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驻上海的外国领事馆根本瞧不起中国人，他们把中国人视为下等公民，更何况是贫苦的百姓呢，因此处理任何事情都故意拖延时间。等签证终于办妥后，他乘上从上海到香港的日本船，走了3天；从香港到新加坡又转乘英国船，又走了7天，在新加坡为了等待去往沙特的海轮又住了10天。因为马明文根本买不起客舱的票，只能卷宿在船的

底舱。在这样简陋的旅行条件下，对一路上大海的景象，无论阳光明媚中平静的水流，或者沿途停靠海港的繁荣景象，他都无心去欣赏。在船上这群贫苦的中国朝觐者不能随便去上层甲板透气、走动，更不可能让他们到餐厅与外国人在一起吃饭。由于他们在船底不透空气，又长时间没有地方活动，一遇上大风，他们晕船晕得简直连头也抬不起来，再加上卫生条件太差，非常容易得病，所以在船上的几十天如同下了地狱一般，令人不堪回首。轮船中途在一个叫“格兰底”的地方抛锚，按规定对所有朝觐者检疫，种牛痘，因为外国医生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待，胡乱一种了事，马明文的胳膊都被扎肿了。种完牛痘，又命令他们全体把所带的衣服提上，穿在身上的衣服全部拿走消毒，随即把乘船的一百多中国朝觐者驱赶在一个大厅中用药水冲洗身体，冲完之后，每人发一条裤衩，由外国人用车推来他们消毒过的衣服，任他们自己去认领，这种看似文明，但却包含着轻贱的待遇，像一根尖针扎在马明文的心头，让他万分难受。而更让人气愤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有几个外国人一直围观他们，嘴里不停地说中国人脏，并且拿着像机拍照，使这些朝觐者感到受了莫大的屈辱。马明文赴麦加正朝完毕后，又去麦地那瞻仰圣陵，当时坐汽车需 9 个金币，骑骆驼 6 个金币，而雇驴最便宜，马明文采用了雇驴的方法。当时两地间共 12 个驿站，而分站雇驴更便宜，这样马明文到麦地那只化去 3 个金币，钱是省下了，但来回却花了一个月时间，受了很多辛苦。

马明文在朝觐途中所遇到的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都被他以坚韧的毅力克服了，他的这种矢志不渝的精神不仅受到家乡穆斯林的敬佩，甚至连周围的汉族朋友也为之赞叹。在以

后的几十年中，特别是建国以后，马明文积极为家乡穆斯林群众做有益的事，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弘扬民族精神，成为宁夏一名德高望重的宗教界人士。

1982年，马明文哈吉有幸做为中国朝觐团成员参加了他一生中第二次朝觐。出国前，每人新做了二套衣服，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领导也来送行并讲话。从北京到吉达乘飞机才13个小时左右，而当年他去朝觐来回几乎化了近一年时间。在卡拉奇中转时，世界伊斯兰联盟负责人和中国驻巴基斯坦负责人都开车接他们，还安排他们参观清真寺、大学等地，把他们的业余时间安排得丰富多彩所需办的手续也都由随团工作人员安排妥当。所有这一切，与他半个世纪前第一次朝觐时的情景相比，反差是那么的大，因此这位目前已过耄耋之年的老阿訇每当谈到朝觐时就感慨万千地说："过去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我们朝觐者被当作叫花子，今天，祖国强盛了，朝觐者去麦加被当成贵宾，新旧两个时代，真有天壤之别呀！"

（四）面临不测心地坦然　完成天命五功齐全

赴麦加朝觐虽然是一项重要的宗教功课，但因为参加人员包括各个国家各个种族的穆斯林，其旅行安排和履行礼仪期间的人员大规模汇聚和流动，又都是和世界、中东、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的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有密切关系的一系列社会活动。因此，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利益冲突、思想分歧，派别差异，甚至人们思想品德方面存在的诸如争先恐后、容易受惊等性格弱点，有时就会在如此大规模集中的人群中触发一些不测事件，甚至造成不应有的人员伤亡，从而成为穆斯林朝

觐交响曲中偶尔发出的一丝不和谐音。尽管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不愿意看到这类事件的发生，历届沙特政府也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保证朝觐活动的正常进行和精心维护所有朝觐者的安全，但在一个发展中的世界上，人们始料不及的事还有很多．正如很多穆斯林所理解的那样：也许这些不测事件的发生正是真主安排的一种考验。因此，在圣地麦加发生一些不测事件也并不奇怪，重要的是，面对这些不测事件要冷静对待。在这一方面，中国穆斯林朝觐者的表现是历来值得称道的，他们始终能处变不惊，坚持自己越洋西行的基本宗旨，不受任何干扰地完成有关的天命功课。

事实之一：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国外有人散布沙特国内不稳，朝觐活动难以进行的流言。中国穆斯林根本不听这类挑拨言论，反而在我国较早创办的《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926 年第 1 卷第 3 至 4 号上刊登"汉志王萨和德之通告"，"声明汉志全境安谧，担保旅客完全安宁。"其通告内容为："新加坡艾尔萨改夫氏(即三咯夫) 接汉志国王萨和德 2 月 9 日来电。文曰：'汉志国赖真主慈悯，全境安谧，请将此事代通告菲律宾群岛马来由半岛等处：凡各人民悉有完全自由，以遵行教理朝觐圣地，吾人对于在汉志圣地内居留与旅行之朝觐，仰赖真主，担保其完全安宁，敌人散布谣言，全无根据，冀阻人朝觐，以谋其私利，请代释明云。'"根据《月华》第 5 卷公布的资料，那一时期中国穆斯林朝觐人数也并未受流言影响。除去新疆穆斯林朝觐者另计，据沙特官方朝觐部门统计，中国内地朝觐者 1926 年为 65 人，1927 年为 119 人，除 1928 年略有减少外，1929 年和 1930 年分别为 93 人和 92 人。

事实之二：1935 年朝觐期间，沙特国王在绕天房巡游时

突然遭到行刺，虽然此事轰动一时，但参与当年朝觐的中国哈吉均未受其影响。据当时路透社电讯："汉志内遮德国王伊品萨和德，与其长子伊米尔萨和德，今日清晨礼拜之际，险遭暗杀。缘王正环绕克尔白天房第四周时，忽有数人，持利刃向王奔来，王方抵玄石之前，刺客之首领直扑之。王太子见状，趋前阻挡，刺客稍却，方欲再前，卫队一人开枪毙之，维时其他刺客，群攻王太子，但未及加刃，均为卫队击倒，王与太子，卒镇静告成环绕克尔白天房七周之礼。礼毕，欢然接见入贺之代表团，盖此为朝参圣地功竟之常礼也。刺客均为也门之齐狄斯人。按上年伊品萨和德曾与也门交战，故此次行刺，目的必在复仇也。"参加当年朝觐的马骥、马文辉、马廷祥、纳房金、拜成玉、绽德善等 130 余位中国哈吉，多数系甘、宁、青三省穆斯林。他们于 1934 年 12 月 20 日从上海乘蓝烟囱公司的"斐洛希斯号"动身，历时 3 个月又 26 天，1935 年 4 月朝天房事毕，转吉达仍乘该公司的"明蒙号"轮归国。同行的有女教友 1 人，途中有 1 位哈吉因病去世。据他们向亲朋介绍，当年全世界朝觐者约有 37 万多人，他们和所有朝觐者都一心放在完成宗教功课上，别的事情打动不了他们。

事实之三：自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穆斯林的朝觐活动中断达 14 年之久，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各项民族宗教政策逐步落实，1979 年 10 月，中国伊协组织的朝觐团才再次奔赴麦加。但恰恰就在中国哈吉恢复朝觐活动的第一年，他们完成朝觐功课于 11 月 10 日离开的 10 天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麦加事件"。

那一天——1979 年 11 月 20 日，东方行将破晓，天色依然昏冥，在麦加的大清真寺里，已经有成千上万穆斯林在做祈

祷了。在伊斯兰教历中这天是1399年的除夕，14世纪的最后一日，虔诚的哈吉们用对真主的诵赞向过去告别，祝愿即将来临的新世纪给他们带来平安和幸福。突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清晨4点刚过，几百名武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突然出现在这座禁寺的各个角落。他们把大清真寺的几十道门户统统关闭，用枪胁迫人们坐在一起听他们的头头讲话。宗教仪式的肃穆气氛一下子被破坏了，很多人在锁门之前冲了出去，另外不少人被截留在这座禁寺中作为人质——其中有麦加当地的居民，有沙特阿拉伯的显要人物，也有朝觐结束后尚未离去的各国哈吉。一个留着胡子的年轻人跳上了高台阶，两眼发出狂热而可怖的闪光，他拿起扩音器话筒，向被迫听他讲话的穆斯林大声叫嚷："我就是'马赫迪'，真主让我把你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他的同伙用枪口对着人质，要他们承认这个"马赫迪"，崇拜和追随这个"马赫迪"。"马赫迪"本是伊斯兰教传说中的"救世主"，一千多年来，不断有人自称为"重返人间的马赫迪"，其中最著名的是19世纪苏丹的民族英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阿卜杜拉，他曾以"马赫迪"的名义领导人民同英国殖民军战斗，在苏丹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现在冒出来的这么一位"马赫迪"，则宣称必须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清除来自西方的邪恶影响——其中包括电视、收音机、足球，还有妇女参加工作。这时，大清真寺的萨比勒教长已认出这个"马赫迪"是一个曾在伊斯兰神学院学习过而后来离校的大学生，在追随他的武装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是沙特本国人。面对这样的"救世主"，被扣留的穆斯林有的惊恐，有的惶惑，但更多的是鄙视和愤怒。这时在大清真寺外，这伙极端分子对圣地的亵渎行径激起了全世界穆斯林的公愤，沙特

政府也立即派出治安部队进行镇压。当治安部队的士兵逼近寺院大门时，武装分子从楼层和尖塔进行射击，可恶的是，他们的火力指向了正在寺院广场仓惶出逃的穆斯林，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哈吉。根据伊斯兰教的规定，大清真寺周围是严禁流血甚至斗殴的，但此时此刻，穆斯林平民和治安部队士兵的鲜血却浸染了这片圣地。几天过去了，"饥饿战略"未能奏效，激烈而持久的战斗仍在继续，形势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不然就会遭到更大的损失。

11 月 24 日，利雅得国家广播电台宣布了一项宗教法令：沙特阿拉伯的 32 位伊斯兰教"穆夫提"和伊斯兰教学者，根据《古兰经》的规定，决定授权政府军队使用任何必要的力量来清除亵渎神圣的大清真寺的"异端分子"。最后皇家军队执行，法赫德王储亲自指挥。下午 5 点，几辆装甲车隆隆开进了大清真寺，向盘踞着武装分子的寺楼开火，对方用手榴弹还击，寺院的一侧冒起了大火，滚滚浓烟弥漫在麦加上空，凭着优势的火力，皇家军队开始在这个要塞般的建筑中同密布的厅室、曲折的回廊和高耸的尖塔中的武装分子展开争夺战。25 日，官方宣布大清真寺的楼上楼下，7 座尖塔和其它制高点都已经收复，当天下午，这个圣寺的一部分地区重新开放供朝觐者做礼拜。但是地下搜索是旷日持久的，直至 12 月 4 日内政大臣才发布声明，宣布"残余武装分子已被击毙或被俘虏"。总共有 200 名武装分子被捕或被打死，那个自命为"救世主"的头头尸体，也在清理现场时被发现了。这次事件前后持续了 15 天，次年 1 月，沙特政府公开处决了 63 名武装分子。尽管事件发生时中国朝觐团已先期离开了麦加，可他们和全世界的穆斯林一起十分关注事件的演变。虽然中沙两国尚没有建

交，但中国朝觐者和全体穆斯林都完全尊重沙特政府的主权，支持沙特政府为平息这次事端而采取的处理办法。以后，在中国制订穆斯林朝觐的出国注意事项中，头一条就写上了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令，并强调严禁从事有碍社会治安和支持所在国的反政府组织的活动。中国穆斯林的这种明智而识大体的态度，对增进中沙人民友谊，拓宽今后朝觐之路产生了积极作用。

事实之四：在 1987 年朝觐的日子里，200 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正云集麦加履行礼仪。7 月 31 日下午，数千名伊朗朝觐者在大清真寺外游行示威。沙特警察出面制止，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造成 649 人受伤，402 人死亡。死亡者中有 257 名伊朗人，85 名沙特保安人员和 42 名外国朝觐者。这场发生在圣城的惨案，在伊斯兰世界激起强烈反响。据外国观察家分析，引起麦加冲突的政治原因主要是伊朗对沙特在两伊战争中站在伊拉克一边不满，但两国教派分歧则是更为深刻的内在原因。这次骚乱事件发生时，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近 1500 名哈吉（包括台湾省 50 人）恰好在麦加履行宗教功课，其中有宁夏的吴葆祯，李耀文两位阿訇。首先，中国哈吉们对这一令亲痛仇快事件的发生深表遗憾，并盼望两国政府能尽快协调解决事端，实现穆斯林团结；其次，大家一致表示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法律、法令，决不介入游行示威、帮助散发传单等扰乱治安和支持所在国反政府组织的活动。在十分平静而克制的状态下，中国哈吉们完成了朝觐天命，平安地返回了祖国。

事实之五：1990 年朝觐期间，约 200 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正汇集在圣城麦加进行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尽管沙

特王国为组织好这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宗教聚会作出了最大努力，但每年的朝觐总免不了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故，这些事故有的是有政治背景的人为事故，也有的是偶然发生的自然事故。7月2日，是宰牲节的第一天，200万朝觐者于当天上午从麦加启程赶往米纳，过去这里山道狭窄，无法容纳众多的朝觐者，每年都发生交通堵塞现象。为了缓解这一矛盾，沙特政府耗费巨资修设了山间公路，此后又在公路下修了长500米，宽20米，高8米的穆埃塞姆隧道。这一天，隧道里气温达43℃，由于隧道内外都人满为患，以至在隧道上方路面上有7个人被挤落摔死在隧道出口处，顿时秩序大乱，正常的行进失去了控制，有些人在出口处被挤倒，后面的人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事，便向后退，同继续前进的后来者拥挤到一起，以致许多人被踩在脚下。事件发生时，隧道中挤满了5万人，在惊慌失措中，被踩倒和被窒息的人一层压过一层，造成了朝觐活动迄今为止最悲惨的事件。7月3日，沙特王国内政大臣宣布，共有1426人死亡，其中包括562名印尼人，447名土耳其人，400名伊朗人。据悉，也有个别中国哈吉在这场事故中罹难。事故发生后，国王法赫德亲临米纳行宫督理此事，发表公报，向朝觐者中的伤亡人员表示慰问和哀悼，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悲剧。那一年我国有1482名穆斯林参加了朝觐，听说发生事故后，全体中国哈吉都为死难者举行了祈祷，并加强了安全措施，以克制和谦恭的心情顺利地履行了全部宗教功课，平安返回祖国。

前面所讲的都是中国穆斯林和朝觐者们正确对待发生在麦加的种种不测事件的故事，其实，在其它不测事件降临时，中国朝觐者也表现了良好的品德素养和坚强果敢的应变能

力，显示出他们对朝觐这项宗教功课的虔诚与执着追求，抗战时期唯一的两批从国内出发的中国穆斯林(西北)朝觐团，就是这方面的楷模。

自 1937 年初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所率朝觐团归国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就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接着占领了上海，使得中国穆斯林传统的海上朝觐通道被迫中断，已作好当年朝觐准备的穆斯林对这个不测之变感到震惊和愤怒。但他们很快就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不能对侵略者的凶狂退却让步，朝觐还要继续进行，要通过实际行动来向世人显示中国穆斯林爱国爱教的一片赤诚之心。上海不能通行，就穿越青藏高原到印度洋上搭乘轮船。虽然这样要多花一倍的钱，但也非如此不行。这一年甘、宁、青三省就有近 130 名穆斯林参加朝觐，除 10 人经滇渝公路从越南转道香港出海，其余 115 人组团走西藏这条路线，由在甘肃河西当掌教阿訇的马云率领。马云是一位思想开阔，在群众中很有威望的宗教界人士，以前已完成过两次朝觐，这次率全家一块西行。这个西北朝觐团多数是五六十岁的人，但也有 80 多岁的老人和十二三岁的少年，马云只有 4 岁的小女儿和青海省主席马麟 70 多岁的母亲参加在内，另外还有几个女哈吉。朝觐团还分成 8 个组分别经理膳食。1938 年春，这个民间朝觐团从青海西宁出发，虽然古代有过“吐蕃呢波罗道”，又被人称之为“麝香之路”，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后来已没有现成道路，他们只是辨着方向前进，在茫茫原野上昼行夜宿，好像古代游牧民族的迁移，骑着自己的马，拿着自己的枪，倦了张幕休息，饿了捕兽为食。进入西藏以后，大河又深又宽又多，他们没有渡河的工具，都是连人带马的漂浮过去，就是老太太们，也只是在鞍头上绑一个“鹦哥架”后，就随

着大浪漂过去。从西宁到拉萨整整走了两个月，后来又遇到瘴气，有5个同伴得病死去。到了交通稍便利的中尼边界后，他们又以极低的代价，把枪支马匹换成现钱充作盘缠，经尼泊尔、印度乘轮船抵达麦加。为了等待朝觐季节，他们先后在麦加逗留了约6个月。朝觐结束，他们乘轮船返归印度的加尔各答，一部分人仍从西藏路线返回，另有85人又换船到越南海防经昆明贵阳而于1939年3月末来到重庆寻机回家。在南温泉附近，由于汽车倾覆，又死了两位哈吉，另有3人受重伤。后来，"五·三"、"五·四"日寇重庆大轰炸，他们被疏散到属于巴县的秦家岗，过着"幕天席地"的生活，也毫不介意。

当时重庆《回民言论》半月刊和《突崛》月刊的记者们都对他们进行了采访。《突崛》杂志1935年3月第5卷第8期刊载的《甘青朝觐团会见记》写道："为了日寇封锁了我们的海口，霸占了我们的交通路线，使我们朝觐的教胞，受那不必要的苦痛"，"他们把日寇给他们的痛苦，告诉了国外的教胞，虽然他们的智能，不能具体的揭穿日寇在中国的阴谋，可是他们这一百多人组成的朝觐团到麦加以后，使那日寇所派去的五名所谓'中国回民代表'真弄得一筹莫展，不得不抱头鼠窜。"1939年5月出版的第1卷第9期《回民言论》半月刊则在刊首显要位置刊登了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接见"西北回胞代表的训词"，当时有20位朝觐者代表受到了接见，并汇报朝觐经过。孔祥熙表示："诸位这次到回教圣地——麦加——朝觐，万里跋涉，不辞劳苦，并且，藉便向同时朝觐的其他各国回教教徒，宣传我国上下努力于抗战救国工作的情形，揭穿敌阀的暴行和阴谋，诸位这种尽忠国家民族的精神，实在值得佩慰。"同期《回民言论》还刊载了《秦家岗上的一群——一个民间的

国际宣传队》，记述了西北回教朝觐团经历的种种考验。另外还刊登了一篇薛文波写的特写——《火炬下的回民活动》，记述重庆召开抗战精神总动员大会的当晚，朝觐团的哈吉们参加火炬游行的盛况："在明晃晃的万把火炬里，照耀着许多须眉老者，他们都是戴着无边缘的黑帽或白帽，这些老人虽说年迈了，但都体格强健，精神矍铄"，"他们是西北回民，他们是由阿拉伯作'朝觐'功课归来者，在火龙般大队里，真是一个新奇的阵容，惹得人人注意，个个叫绝"，"他们为完成他们的朝觐功课"，"一路上饱受风霜，沙漠、瘴疠和海洋的苦楚，费了很长久的时间，我们不必实地走去，仅一听道，便觉得疾首蹙额，裹足不前了。难得是这些老年人，有这样乘风破浪的精神。忠于信仰者必忠于国家，他们对于宗教，有这样大的牺牲，对于国家和民族安知没有这样大的牺牲。""中国回民救国协会的大旗横挑着，紧接着便是富有色彩的西北回民朝觐团的团旗。七八十支火炬，蓬蓬勃勃的燃烧着它的火焰和浓烟，把这些老人融炼得回复童年了，他们跳跃着，舞动火炬高呼口号，激动极了，充分的表现出爱国的热衷，沸腾了回民好强之血！""这些老人的热烈表现，使观者受感动了，有的鼓掌，有的高呼"，"本来在今天的游行队里，除去青年，还是青年，仿佛是唯有青年才有爱国的资格，那里见这些集团老人，须知回民把国家与宗教视成一体，爱国爱教，是回民的天职，不分老幼。"

由于1938年西北回民朝觐团的行动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1939年5月第二批38位西北穆斯林又组成朝觐团，循着前人走过的青藏高原——印度路线向前闯，其中有4位女哈吉，还带着两名男孩和两名女孩。这一行笃诚的男女老幼，由西宁到拉萨走了3个月，途中没有见到人烟，所见的不过

是牛羊狼豺，有两位旅伴在石隙中长眠不起。物质的困难毕竟胜不过精神的贯注，他们走出了青藏高原，从孟买坐船前往麦加。1940 年 4 月，他们在历经艰险后回到重庆，后来成为著名的回族学者，但当时恰值风华正茂的王梦扬曾去他们投宿的十八梯清真寺采访，并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 2 卷第 2 期上发表了《哈直访问记》一文。文章满怀激情的写道："一年一度麦加天房朝觐，已于今年 2 月间举行了，在这西濒红海，东接沙漠的荒原而富有神秘性的地带，那里曾聚集 20 万以上来自千万里以外不同地带的广大群众，他们都是伊斯兰教的忠实奉行者，他们那怀着圣洁而庄严的心情，不避艰险的甚至扶老携幼的集合到这圣地，交还他们的拜功，完成他们的夙愿，并瞻仰依卜拉欣以下至至圣的遗迹，加强他们对圣道的怀念及追求。在这广大的群众里面，有着近四十位黄脸黑睛的男女朝觐者，他们以超过其他朝觐者的所遇着到的艰险来参加这个盛会，这就是本届的仅有的中华民国朝觐团。"

三、沟通文化　传播知识

对有事业心的中国穆斯林来说，飘洋过海，长途跋涉的朝觐活动，既是为了履行宗教功课，也是顺便考察学习域外情况，增长个人学识，推动中国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大好机会。因此，一些有识之士专门考察了在中亚和西亚流行的关于伊斯兰教义的新学说，尤其是苏非主义的理论和伊赫瓦尼思想，把它们的见解介绍到国内来，并结合当时当地环境进行发展；一些学有专长的穆斯林在国外接触到大量关于阿拉伯、波斯的历史、哲学、文学、语言学、法学等方面的优秀著作，以及关于伊斯兰教认主学、《古兰经》学、《圣训》学方面的经典作品，他们不光把这些折射出阿拉伯、波斯灿烂文明光辉的重要著作原版带回中国，而且还开展了一系列翻译介绍活动，使汉文译著工作上升到一个新阶段；又有一些回族求知者于朝觐之暇在中东诸国游历考察，负笈求知，广阔的社会生活层面和伊斯兰教各国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扩展了他们的视野，开拓了他们的心胸，使他们成长为近代中国穆斯林中著名的学者；还有一些常年关注民族教育的有心人，他们如饥似渴地了解国外的穆斯林教育事业，回国后，把全部精力倾注到推动现代回民教育的不朽工作中去。

正由于历代中国哈吉们不懈的努力，遂通过朝觐这条特殊的渠道，沟通了中国与阿拉伯、波斯文化的交流，使中国人更多地了解到西亚人民的历史、哲学、教育、文学、法律及宗教情况，同时，又培养造就出一批回族学者，并推动了对伊斯兰

教教义的研究和民族教育的发展。总之，朝觐在传播人类知识和交流信息方面曾发挥过独特的功能，因此，在撰写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时，确实是不能遗漏的。

（一）有识之士西行取经 回国传授影响深远

18世纪以来，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随着社会生产的向前发展和海禁的开放，国外伊斯兰教教派（尤其是苏非主义和伊赫瓦尼思想）相继传入中国，于是中国伊斯兰教教内出现了诸多教派和门宦，并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中。中国伊斯兰教主要教派有：格底目、依赫瓦尼、西道堂、虎夫耶、尕德林耶、哲赫林耶和库不林耶等。一般来说大多数教派没有严格的组织，仅以清真寺为活动中心，各清真寺之间一般也无联系。但有些教派则进而形成了门宦，门宦上有教主、道堂，下有清真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

各种教派和门宦大多首先产生于甘肃的狄、河地区（临夏、循化），以后逐渐发展到西北、西南及东北等地。为什么各种教派和门宦首先产生于这个地区呢？第一，元朝以来移居于这个地区的穆斯林较多，也很集中，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穆斯林经堂教育相应发达，讲经论道很风行，特别在清中叶后，内地伊斯兰教学术活动中心，已从长安转移到临夏，因此该地有“小麦加”之称。第二，17世纪后期清代开放海禁后，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等地传教士相继来此传播各自的宗教主张（以苏非主义居多）。同时，狄、河地区赴麦加朝觐或经商者也越来越多。据1950年临夏社会调查表明，自清康、乾以来当地朝觐者连绵不绝，每批十多人，甚至二三十人，男女都有，仅八

坊、阳哇山、乩藏、何家和东乡等地穆斯林中，朝觐过的哈吉就有百余人。1933年至1937年仅原临夏市朝觐者就有三批共69人，计1933年11人，1934年21人，1937年30人，此后零星去者7人。这些朝觐者有的在阿拉伯接受了苏非主义学说，如哲赫林耶的马明心，花寺门宦的马来迟；有的接受了其它新潮思想，如马万福。中国穆斯林中的一些掌教，伊玛目和阿訇，分别接受了他们的主张，进行传播，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教派。在这个基础上，哲赫林耶、虎夫耶、尕德林耶、库不林耶又各自形成了教主神权高度集中和实行世袭的门宦制度。其实，中国伊斯兰教的这些派别，不是政治性派别，也不纯粹是教法学和神学方面的派别，它们之间相互区别的主要标志，不是根本信仰方面的互异，而是在宗教仪式方面的一些差别，或是宗教修持方式各殊，以致在细枝末节的礼俗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从基本信仰方面说，它们都属于正统的逊尼派，在教律教法上，又属于逊尼派中的哈乃斐派，在教乘修持上基本一致，主要区别在于对道乘修持方式认识不一，各有特点，有的具有浓厚的苏非主义思想色彩。

哲赫林耶是我国伊斯兰教各教派门宦中人数最多，传播地区较广，教权比较集中和巩固，流传时期最长的教派门宦之一。从乾隆十年(1745年)马明心朝觐归来，开始对其创建发展，至今已有230余年的历史。哲赫林耶一词，系阿拉伯语，意为“公开”，故又称为“高念派”或“高赞派”，即高声朗诵赞扬穆罕默德功德颂词之意。哲赫林耶的创建者马明心，被信众称为道祖太爷。哲赫林耶渊源于阿拉伯也门地区的沙孜林耶，马明心朝觐时曾在当地长期逗留学习，后又吸收其他苏非派的一些教义，创建了哲赫林耶教派，而门宦制度则是在其后几代

才形成的。

马明心，字复性，又名真卫。经名伊卜拉欣，道号维尕叶·屯拉（维护主道的人），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 年）生于甘肃武都一个回族家庭，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因苏四十三起义而被清朝官吏杀害于兰州。他 6 岁即在清真寺学习经文。雍正六年（1728 年），他的叔叔带他一同去麦加朝觐。他们取道新疆，沿着丝绸之路古道，费尽千辛万苦，用了近一年时间，于 1729 年抵达耶曼（也门）。途中突遇风沙，叔侄失散，明心几经辗转，流落于也门一老人家，老人为明心幼小虔诚和叔侄失散陷于伶仃孤苦之境所感动，便资助和引导他去沙孜林耶的一个道堂学习。这个道堂的“筛海”穆罕默德·布录·色尼见马明心眉目清秀，十分聪颖，就收他为门徒。由于他吃苦、好学，老师对他非常器重和爱护。除在道堂读各种经典和闭门静修外，他又受老师资助，朝觐天房，实现了此行的最大夙愿，并顺便拜访了一些宗教学者。后来老师见他学习成绩优异，并有独特见地，遂敦促他归返中国故土，传播伊斯兰教。乾隆九年（1744 年），马明心学成回国，取陆路，经中亚布哈拉、阿富汗到新疆的喀什、叶尔羌，再到青海的循化，终于回到家乡，此行前后长达 16 年之久。马明心临回国时，老师给他传授了沙孜林耶道堂的宗旨，送给他《沙孜林耶道堂史》、《卯路提》、太斯比合（念珠），以及拜毡、手杖、宝剑等物，命令他念主赞圣要高声诵念赞词和“则可若”，并取名“哲赫林耶”。同时他还带回《古兰经》、《穆罕曼斯》和《满丹夜合》，以及一百个小石子和十个大石子，作为传教、念“则可若”和干“尔曼里”的凭证。

马明心先在青海循化，继而又在定西、河州、榆中等地传播他的主张。1761 年在撒拉族聚居的循化地区，接受了一些

满拉、阿訇为门徒，讲经论道，传授哲赫林耶的宗旨。当时马明心不仅要传授苏非派学理，而且有改革中国伊斯兰教之意，故对教义教法的阐述，比较透彻灵活，对宗教仪式也有所简化，强调“海的也”（布施）要用于周济穷人，反对阿訇借传教之机聚敛财富，还主张教权传递应传贤不传子，在道统上反对世袭制。他的革新主张得到一些人的拥护，不少人转而遵循哲赫林耶，后来地方官吏将马明心驱逐到甘肃定西县官川山中，此后他即在当地传教，使官川成为哲赫林耶的基地，故又称“官川门宦”，马明心则被尊为“官川阿济兹”（尊贵之意）。乾隆四十六年，哲赫林耶在青海循化撒拉族中传播时，与花寺门宦的矛盾日趋尖锐，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兰州知府杨士玑出面干预，遂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东乡及回族反清起义。后遭清廷镇压，马明心及家属共数百人，被杀害或被流放。

马明心是个虔诚的穆斯林，西行朝觐和游学，使他开拓了眼界，树立起改革中国伊斯兰教的决心，他在三十多年的传教活动中，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学识的阿訇，发展了一大批信众，影响遍及全国穆斯林中。他常以“介廉（指刘智）栽花，我结果”勉励自己，并执著地要用他的宗教主张，影响更多的穆斯林，并为此而不惜捐躯，从而赢得广大穆斯林的尊敬。

记述乾隆年间被清政府两次镇压的回民哲赫林耶派发展历程，以及他们苏非导师马明心故事的《热什哈尔》一书（关里爷著，杨万宝、马学凯、张承志译，三联书店 1993 年 9 月出版），以“爱慕的露珠”，记述了马明心朝觐求学的神奇经历。

该书先以马明心儿子的口吻叙述了其父朝觐的故事：“祖母归真后，人称呼他二爷的我爷爷的弟弟，他带着我孤苦伶仃的九岁的父亲去朝觐。”“两个人离乡背井忍受着旅途的艰险，

朝荆棘之地，荒无人烟的云南路走去。他们进了语言不通的阿侃国，越过了九条汹涌的底格里斯河。一天，当他俩寻水找柴，想烧些饭吃时，突然狂风骤起。砂尘在弥漫、漆黑降临眼前，太阳被遮蔽，灾难驱逐了吉庆。（维尕叶·屯拉——马明心）看不见叔父了，哭泣着；但那里也不见叔父的踪影。他独身一人，惊愕地在那个清晨失去了方向。多么渴望能见到叔父呵。希望的禾苗结不下果实。分离的夜晚见不到月亮。但愿——这分离的诡异中藏着聪颖。叔侄二人永别了。"

一天，忽然一个年迈的沙赫老人从远处出现向他走来，沙赫详知了他是一个路遇不幸、饥渴交加的异乡孤儿，便给他一串葡萄、茶水和食物，向他示意："你是继续向前去，还是返回故乡？若返回，我就送你回家，如果继续向前，我将给你引路指航。"

后来这位沙赫将他托付给另一位有学问的大沙赫，让他在小屋里坐静 9 个月，又送他进一所"尊贵的学堂，教给他许多必要的知识。学业成就后，大沙赫又让他坐静 3 个月，并让他住进了自己的修道房，直至 24 岁时才出来，"不久，马明心"去朝天房"。他带回了渗渗泉水。归途中，他忍受了九天的饥渴，最后一天黄昏，他遇到一个慈祥的老人，"把他领到家里，摆上九碗食物，每碗都有不同的佳肴。"第 10 天早晨，他回到了自己的静室，大沙赫听了他的奇遇后说："祝贺你——忍受了 9 天饥渴的幸运的人。确实，在中国你生活了九年的不当之处已远你而去，使你成为圣洁的人。我的密友啊！……以你九天之间享用九种佳肴祝你幸福。那九种食物代表你的九个品级和你封印品位的终极。"不久，大沙赫让他返回中国，并赠给他道统谱、拜毡、靠枕、拐杖、碗和一件颜色华丽气味馨香的衣

服。

西北属于虎夫耶教派的华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1681—1776年),也有和马明心类似的朝觐求道经历。据说"华寺"原是临夏一所老清真寺,原址为一个花园。始建于明初,清代重修,其结构宏伟,装修华丽,门墙上雕有多色花卉图案,艳丽多彩。当地人称为"花寺",后讹为"华寺",马来迟传教后就与华寺有密切关系,教众们尊其为"华寺太爷"。

马来迟原籍陕西长安,后迁居甘肃河州(今临夏)。其家原富冠河州,但他出生时,已趋破产,故其父为他取名来迟。他8岁进清真寺习经,因天资聪明,又经十年之久的刻苦学习,对经典有了校深的理解,在河州八坊老王寺教长太巴巴的指导下读完高级课程。18岁时毕业,由太巴巴推荐,在青海民和马营及临夏、广河、三甲集等清真寺任开学阿訇达三十年之久。雍正六年(1728年),马来迟随阿拉伯传教士篩海·艾·最占白勒去麦加朝觐,行至广州在怀圣寺,又学习了三个月经典和阿拉伯地理、人情、方言等。之后乘"豪三车来比"的船,经过两月余的行程,到达亚丁,登上也门国土。会见了也门的一些名人学者,访问了各大清真寺伊玛目和宗教领袖。随后赶赴麦加朝觐,并拜虎夫耶道堂的篩海穆罕默德·吉布尼·艾海曼提阿格来为师。学习三年后,又到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游学深造。先后研究了纳格什板顶耶、卡迪林耶、沙孜林耶和苏哈来瓦迪耶等苏非派学理。并直接领受苏非派著名学者茂俩·买核都米的指导,实现了朝觐和求学悟道的宿愿。1734年,由海道经广州回国。临行时,其师送给他拜毡、"苏夫"(羊毛衣)、传教印信以及《冥沙勒经》、《卯路提》等经58卷。

马来迟归国后,声望很高,远近穆斯林都来探望这位有

"阿林"的哈吉。他乘此宣传朝觐收获和他的主张，并在青海循化一带讲经论道，后来又应邀到云南、河南、陕西渭南等地清真寺讲学，继而在临夏莫泥沟、循化等地清真寺任教长，从此开始传授虎夫耶学理，受到河湟穆斯林的拥护，成为甘、青地区著名阿訇之一。马来迟传教的特点是主张"前开"，传教的主要经典是赞主赞圣的《卯路提》和《冥沙勒》，关于"前开"、"后开"之别(即先开斋后礼拜，或先礼拜后开斋)，在河州地区其实早就存在，"前开"比较符合群众的要求。马来迟以哈吉兼教长的身份公开主张前开，所宣传的两部经典念诵时激扬动听，简便而节省时间金钱，减轻群众负担，因而受到大家欢迎，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这就是华寺门宦的先声或前提。该教派的信众最多时达 20 余万人，遍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各地。同时，青海化隆、卡尔岗地区的一部分藏族群众，经过马来迟的艰苦说教，也皈依了伊斯兰教，还有青海同仁县的部分藏、汉族也信奉了伊斯兰教，一直到今天。

到了近代，东乡族穆斯林马万福也曾西行朝觐求学，又在中国伊斯兰教中倡导了伊斯兰教伊赫瓦尼这个新学派。马万福经名奴海(1853—1934 年)，是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果园村人，故人又称其马果园，堪称近代中国伊斯兰教的著名学者和活动家，对推行"维新"伊斯兰教活动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外穆斯林中都有较大影响。马万福祖、父均为阿訇，属北庄门宦。其少年时代就系统地学习伊斯兰教的各门学科，1875 年，22 岁的马万福在北庄拱北"穿衣"结业，正式成为阿訇，且开始收徒讲学。先后在果园本村、红崖、巴素池等地开学，不仅积累了一套教学经验，还在游历讲学活动中精通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为他日后西行出国深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1886年，马果园前往麦加朝觐求学。完成了"神圣"的宗教功课后，他看到麦加的宗教活动中有些与中国穆斯林的宗教礼仪不相同。究其原因，他认为在中国主要是缺乏分析教律教义的经典，宗教学说得不到完整地传播，造成谬误。他抱着探求真理，追本溯源的态度，拜访了当时在麦加的知名人士海力巴氏，入其开办的学堂深造。他在麦加还兼收其他学派的主张，在阿拉伯瓦哈比运动思想的影响下，决心改革中国伊斯兰教，弃门宦而改宗"艾亥里逊奈"(遵经派)。1892年(光绪十八年)他学成回国，途经湖北，为老河口清真寺挽留开学一年，次年返回故里在东乡县隔岸的苦妥当开学阿訇。他在当地与一些前辈和老同学，围绕从阿拉伯带来的经典展开研究，评论不符合经典的礼俗，并提出改革建议，为倡导伊赫瓦尼开始了舆论准备。很快，他的主张受到当地受人尊重的十大阿訇和其他朝觐过天房的哈吉们的支持。在苦妥开学不到两年，马万福"凭经立教"的见解在临夏、东乡、广河各地产生了影响，但一些主张触及到了门宦的利益，引起对方的注意和反对。

1896年，马万福应聘去临夏漠尼沟何家寺开学，招收50多名大满拉开始了讲学活动。这些满拉中不仅有临夏各县的人，还有全国各地来此游学的念经人。他的宗教革新主张，在这里得到进一步发挥。他系统地向弟子们讲授古兰经学、圣训学、认主学、教法教律以及波斯文经典，明确阐述伊斯兰教正统派伊玛目哈乃菲的主张，提出了"尊经革俗"、"凭经立教"的口号。马万福的新见解得到这些满拉和阿訇的称赞，结业后，他们在各自主持教务的清真寺内宣传"艾亥里逊奈"的礼仪，逐渐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派别，自称"伊赫瓦尼"。后来人们根据他们不同以往的新主张，称伊赫瓦尼派为"新教"。其实，

马万福倡导的伊赫瓦尼主张并未对伊斯兰教赋予新的内容，他倡导“革新”的目的是刷新教门，摒弃陋习，要求回到正确的伊斯兰教教义道路上，坚决照《古兰经》、《圣训》中的原则办事。他在何家寺开学历时10年，培养了不少宗教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了。在讲学之余。他还会同当时甘肃河州十大阿訇从8部阿拉伯文经典中择录编印了阐述依赫瓦尼主张的小册子，批评一些门宦的礼仪，引起各门宦的强烈反对，被地方官吏下令禁毁。后来马万福的学生又用小儿锦(即用阿拉伯字母拼音汉字)中间杂以汉文，缩写成《回教读本》，作为甘肃、青海回民学校课本。由于马万福坚持主张“言行一致”，反对苏非主义的修持方法，注重《古兰经》的精神实质，反对将其作为念经祈祷取酬的工具，从而加深了与其它教派门宦的矛盾。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他被迫离开临夏往陕西兴安州(今安康)清真寺开学讲经，继续宣传伊赫瓦尼的宗教主张。辛亥革命后，马万福重返家乡，但由于受对立势力的排挤，无法立足。1916年9月携家眷经酒泉抵哈密，不久为新疆都督杨增新逮捕押回甘肃究办。途中为青海提督马麟援救，接回西宁，并支持他推行伊斯兰教改革主张。1934年马万福在当地归真。马万福在西宁特别注重培养新式宗教人才，为推动和发展伊赫瓦尼维新运动准备了人员条件，并扩大了社会影响。1918年以后，伊赫瓦尼维新运动开始进入一个初兴和发展阶段，并很快波及到全国很多地方。到1949年时伊赫瓦尼派的信众已发展到近百万人。

(二)阿语典籍成批携入　汉文译著得以丰富

朝觐在沟通中阿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通过历代中国的朝觐者，带来了数以千百计的阿拉伯文(包括波斯文)的文献典籍，使中国穆斯林和各界人士，第一次较完备地接触到西亚文明的各个层面，了解到阿拉伯民族的历史、哲学、法学、天文学、文学、教育和宗教的广泛知识。1929 年云南《清真铎报》刊"马复初(德新) 先生事略" 称："(马德新)朝天房，谒圣陵，与天方王公学士优游聚处，讲道论德.穷究天人性命之旨，归根复命之微；又亲炙至圣遗行，孜孜者十数年，继而又游顾德士、鲁穆、埃及等国，采风问俗，博搜典籍。凡东土遗经所脱略，蒙昧难以臆解者，皆考证明确而无疑。乃挟奇经异籍，由海道东归。"回族教育家王宽在朝觐后赴土耳其考察时，也曾挟国外穆斯林友人所"赠经书千卷，多为东土所无"返乡，归国后将"赍回之经，尽举以赠国中同道，冀流传之广，不敢自私也"。现代回族著名学者王静斋在《五十年求学自述》一文中说到当年自己朝觐游学归来时亦称："此行经过二十阅月，除在海外增长不少见闻外，携来印版西经不下六百余种。"这些由朝觐者从万里之外携带回来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典籍，首先使中国穆斯林感受到伊斯兰文化积淀的博大，促发他们重视本国的伊斯兰文化宣传与研究；其次，这些典籍大都是在西亚享有盛誉、并经过朝觐者细心挑选的精品，流传到中国以后，很快受到有识之士的青睐，由于这些原因，中国穆斯林学者纷纷选择紧要者进行翻译或运用有关素材撰写新著，甚至借鉴其内容或形式，开拓自己的创作思路，从而大大丰富了汉文伊

斯兰译著作品系列。

为数众多的汉文译著，发源于明末清初，它将伊斯兰教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丰富了伊斯兰教理论，另一方面也给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输入了新的观念。在清代，汉文译著既是伊斯兰经堂教育的基本教材，而从事译著的学者同时也是设席讲经的一些有造诣的经师。因此，汉文译著创作活动并非纯粹的宗教活动，它还是清代以来中国穆斯林思想家代代相继的一种有代表性的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活动。被称作"汉克塔卜"的汉文译著在明末清初以来取得了明显的成就，给一度处于衰颓封闭状态的中国伊斯兰教注入了新鲜血液。回族译著家们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主的思辩模式和语言比较广泛地研究整理了伊斯兰教教义，从而塑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回族伊斯兰教思想体系。如果说清代前期和中期的伊斯兰学者如王岱舆、刘智、马注等人，由于自己没能出国朝觐，创作时的主要素材，是依靠其它朝觐者和通商渠道流传到中国来的数量有限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典籍，那么到了清代后期，随着海禁的开放，如马德新这样的学者就能通过朝觐实践亲自收集各类伊斯兰教典籍，题材可以更广，版本可以更新，内容可以更精僻，从而依据这些丰富的材料进行编译，向国人介绍优秀作品，或依据这些素材撰写更全面更深刻的新论著。因此，马德新朝觐归国后编译的专著竟达到 30 余部之多，作品题材极为广泛。应该看到，清代的汉文译著作品主要涉及宗教哲理，很少谈到历史、人物或其它方面。到民国年间，随着朝觐等渠道介绍到中国的西亚文献典籍越来越多，中国穆斯林学者接触到的阿拉伯文原著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不但对反映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著作有了深入了解和比较，搞

清了各种思潮和学派的情况，并且把译著视野扩及到与伊斯兰有关的社会、法学、教育、历史、伦理等各种知识领域。正如王静斋在《选译详解伟嘎业》的作者序中所述："自海禁大开以后，印版可靠的大经充满华夏，参考有据，正是学者藉资猛进之良机。"因此，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穆斯林学者开始有目的有系统地翻译和研究伊斯兰学说著作，并为此成立了中国回教文化俱进会、中国回教学会等各种各样的群众文化组织与团体。同时，先后创办的《云南清真铎报》、《月华》、《正道》等多种伊斯兰报刊杂志也成为译解介绍阿拉伯文化的重要学术研究阵地。这一时期，也出版了许多重要的译著作品，如王静斋的《选译详解伟嘎业》、李廷相的《天方大化历史》、马安康的《穆罕默德的默示》。同时也涌现出一批依据从国外带回来的新材料进行研究的重要作品，如王静斋的甲、乙、丙三种版本《汉译古兰经》、哈德成的《回教初步浅说》等。

大量阿拉伯文（波斯文）典籍携入中国后，纷纷被中国穆斯林学者消化吸收，或由携入该书的朝觐者本人进行直接译解，甚至受其内容及形式启示撰写新论著，或根据它们提供的材料由朝觐回来的学者研究传统课题，或提供给不能有机会朝觐的学者进行著译，现分别述说如下：

第一，为了丰富汉文伊斯兰译著，由朝觐回来的哈吉身体力行地投身此举的事例很多。如云南穆斯林马启荣，从麦加归来后，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典籍之丰富感受很深，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尚缺乏研究及宣传的状况十分忧虑，曾感叹地说："亥人木本水源，祖宗之来历焉可泯灭。"因此趁在广州怀圣寺专任开学阿訇之便，根据历史传说并托人查阅史鉴，编辑成《西来宗谱》一书，"将先贤挽个士自西域而入东土，纪其年

而录至行，”并做到“简而易明，人人披阅一目了然。”该书最早有光绪二年(1876年)刻本，约4千字。内容虽多出于传说，然而情节生动，通过挽个士(即宛葛斯)来广州传教的事迹，反映了伊斯兰教在唐代即传入中国的基本事实。此书用“宗谱”作书名，说明近代中国穆斯林面临清末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和压迫，力图通过“寻根”来追溯其悠久的历史、光辉的传统，从而鼓舞广大穆斯林坚守其宗教信仰和传统，抵御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后当局对穆斯林的全国性政治高压。其次，本书通过回兵择妻定居等回族起源的传说，生动地体现了回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一员的历史事实，并赞扬了中国同阿拉伯人民自古以来的友谊和回汉人民的团结。此外，马启荣还于光绪元年(1875年)编写了一册伊斯兰教诗词体通俗读物，名为《认礼切要》，又名《认礼蒙引教科书》或《认礼五时根由》。全书由四言短句组成，即用四字经形式，用意是使“幼童熟读，可为护身之本”，着重介绍穆斯林平日五次礼拜的来历及意义。本书刻板印刷清晰美观，且穿插了作者采自阿拉伯神话的众多典故，如阿丹圣人如何和好娲相聚，伊卜拉欣在火中烧炙40日而无损伤，约拿优素福在鱼腹中40日而完整归来等，因而趣味盎然，深受儿童和普通穆斯林的欢迎，曾多次重印。中国著名伊斯兰教教育家马联元的次子马安义(1867—1943年)，本世纪初朝觐归来，先后在海南岛崖县及广州、上海清真寺任教，晚年回云南，以学识渊博著称，曾用阿拉伯文撰著《聚礼明证》和《明德实语》两书，在宗教界人士中很有影响。再如宁夏虎嵩山阿訇(1880—1955年)，1924年朝觐归国后，先后撰写了《伊斯兰教三字课本》(汉文)、《中阿字汇》、《中波字汇》、《波斯文法精华》、《月论释难》(汉文)、《教律摘要》(阿文)

等著作。同样于1924年朝觐归国的哈德成(1888—1943年),因受新思潮影响,回国后倡译《古兰经》,并著有《回教初步浅说》一书。

但作为朝觐者本人参与译著最多且影响最大的当数云南马德新。马德新的后半生是在烽烟遍野、干戈不息的大动乱中度过的。他"归隐林下"完成了大量的阿拉伯文著作和汉文译著。他的阿拉伯文著作有《天方道行究竟》、《礼法启爱》、《寰宇述要》、《天方历源》、《尔勒璧(阿拉伯)春秋》等。所涉及知识的深度和广度都为前人和同时代学者所不及,表明他对伊斯兰教经典、历史、天文、地理、历法及杂家之学的造诣,因此历来被清真寺作为经堂教育的通用教材,并由其门生译为汉文出版。由于马德新的汉文水平不如阿拉伯文那样运用自如,因此他的汉文译著《宝命真经(古兰经)直解》五卷、《大化总归》一卷、《四典要会》四卷、《会归要语》一卷、《醒世箴》一卷及《朝觐途记》等,均由自己口授其意,由门人马安礼、马开科笔录,再润色加工完成的,是一种"通力协作"形式。马德新译著作品时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马开科在《大化总归》序言中曾说:"夫子谦抑为怀,郑重其事,每于一章一节,必手执经本,逐字对勘,逐字互接,必求无背谬之意,支离之词,并不敢杜撰一语,有负古圣人立言之本心。"

《宝命真经直解》是马德新翻译的我国较早的《古兰经》汉译选本之一,据传已译完20卷(全经为30卷),由于大部分毁于兵火,仅存5卷,被阶州赵真学获得,"珍藏数十年,从未轻示人,今岁往朝圣城,道出申江",于1927年12月在朝觐前夕在上海交中国回教学会刊印问世。但马德新的代表作品是阐述伊斯兰教义的《四典要会》和《大化总归》。《四典要会》共

分四卷，包括《信源六箴》、《礼功精义》、《幽明释义》、《正异考述》等四篇，主要论述穆斯林的六大基本信仰；做礼拜的重要意义；分析“物之起灭，人之始初”，明今生后世之理；并通过论辩、剖析伊斯兰教内存在“异端”的由来、流行的原因及“异端之言”的谬误与危害，本书的最大特点，是吸收、融化、加工、改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素材和概念，用以阐发伊斯兰教教理和哲学。《大化总归》以阿拉伯文经籍《甫苏尔》为蓝本，系《四典要会》的续作，目的是对“王（岱舆）刘（智）诸公于后世复生一节各所厥略”的缺憾进行补充，因为“后世者，生死之大关，幽明之至义，原始返终之要道也。造物之全体大用，圣贤之复命归真，庶汇之知能长养，非此概不能显”。书中的“大化”指先天和中天，此时真主化育万世，化生万物，人生行事，皆著有形迹。而“总归”即是后世，也就是经过先天和中天时期，万事万物都要“返本还原”、“复命归真”，尘世中生生不已者，届时都归属此境。马德新及其弟子都是学问深湛渊源有自的伊斯兰理论家，本书亦如长江大河，浑灏流转，又如众流出溪，百川归海，于简朴明了深沉凝炼的风格中，将内容深入浅出地阐述明白。由于书中时时透出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特有的理性光辉和敏捷机锋，因此被当作阐述伊斯兰教义的经典作品之一。

第二，由朝觐回来的哈吉根据阿拉伯经籍中的材料研修中国伊斯兰教史中的传统课题，尤其是《古兰经》汉译的例子也有不少。如马德新就译过《宝命真经（古兰经）直解》5卷；清末马联元哈吉编译过《孩听译解》，系中国穆斯林最早编译的《古兰经》选读本之一；1926年哈德成哈吉曾口译，由伍特公笔记，参考英文译本译成《古兰经》片断在《中国回教学会月

刊》上发表，以后马坚也参与了这项工作；1943 年，去麦加归来的刘锦标译成《可兰汉译附传》，由新民印书局在北平出版；到当代，马坚哈吉、时子周哈吉、林松哈吉、仝道章哈吉等也根据自己掌握的阿拉伯文新材料，先后译成出版了汉译《古兰经》、《古兰经国语译解》、《古兰经韵译》和《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译注译本)。然而，在用汉文全译《古兰经》方面起步较早，而投入精力和时间较多的当数王静斋哈吉，在近 30 年时间中，他用文言体、白话体分别作了 3 次尝试。他认为："《古兰经》入中国一千多年了，而教外人士始终不知《古兰经》上警告的是什么，这是怨我们未尽到宣传的责任。"他的标准，是把原文意义准确完美地披露出来，让读者明了"古兰"大义。1932 年，他从阿拉伯文直译了由我国穆斯林翻译的第一部汉文通译本《古兰经译解》(又称甲种本)，由北平回教俱进会刊印。抗战时期王静斋又在重庆开始翻译白话文《古兰经》稿，历时数载，未及修正，就被日机炸毁。1940 年 9 月，他移居北培云龙山庄，索居斗室，手不停挥，燃膏继晷，兀兀深宵，至第二年 3 月，全部 30 卷得告译就。脱稿后又赴宁夏修改，历时一载才予修定，刊印了 60 部"非定草"(又称乙种本)。1945 年夏天返回重庆，与时子周共商修改方案，经过两个月努力，举凡未能决定的疑难之处，大都迎刃而解。1946 年 10 月，由上海永祥印书馆印刷《古兰经译解》白话本(又称丙种本)5000 册。为了帮助穆斯林读懂这一部经典，王静斋广泛采纳了伊斯兰世界历代编撰的《古兰经注》，如《侯塞尼经注》、《鲁候尼白亚洛经注》、《哲俩赖尼经注》、《煮麦勒经注》、《鲁候洛埋阿尼经注》，在进行汉文注释时，既有边注，又作脚注，重要章节后面统统加以长篇"附说"。正因为王静斋掌握了丰富的阿拉伯历史文

化知识，因此他提供的大量注释帮助普通穆斯林群众和教外人士都能较方便地了解《古兰经》的内涵，从而受到广泛欢迎，此译本在民间多次被翻印。

王静斋编译伊斯兰教教法学译著《选译详解伟嘎业》时，也跟上述情况类似。他在该书“自序”中称：“生来是个穆民，自得彻底明白教规，犹如凡是法治国民，即当晓得法律。”“此经为吾侪多年之读本，且为一般乡老所熟闻。就《伟嘎业》本文缀以详尽的解释，取材于数十种可靠经典，秉笔直书，彻底表白，俾使不识阿文者得以直接研究教法，可于最短时间阅读译自群经之言，获得教法上之卓识。”本书汉文删去了关于“穆阿迈俩提（阿拉伯世界社会交际）”等项内容，保留了对中国伊斯兰教有实用价值的礼制仪规内容，并在正文后面加入了大量注解，故名《选译详解伟嘎业》。注解部分都列有出处，但也包括作者的独立见解，在文后标以（自）字。全书分为上下两集分别于 1929 年和 1935 年出版，是用汉文翻译的第一部最完整而重要的伊斯兰教法学著作。

第三，由于“印版可靠的大经充满华夏，参考有据”，给不少没有机会朝觐远行亲自考察的学者提供了“藉资猛进之良机”，大批优秀伊斯兰译著作品自清末民初以后纷纷问世。在这方面成就较突出的有河北迁安李廷相，字虞辰（1884—1937年）。曾在北京教子胡同清真寺、南京太平路清真寺当过教长，阿拉伯、波斯、汉文修养及书画均佳。上海爱俪园广仓学会姬觉弥等印刷的《汉译古兰经》，实际上由李廷相从阿文原文译出全部汉文稿，与薛天辉阿訇共同讨论，然后由通英、日文人士参照英、日文《古兰经》译本参订定稿。李廷相的译作很多，有翻译并逐句解释 40 章圣训的《圣谕详解》，有综述伊斯兰教

列圣历史的《天方大化历史》，有介绍穆罕默德军事史的《天方战克录》，以及以故事而劝人行善止恶的《天方奇异劝善录》和《天方奇观》(即《卜合提雅嘞传》)等。又如马联元的孙子马安康(1896—1945年)，精通伊斯兰教典，随父在沙溪、昆明等地任助教，并在蒙自鸡街玉溪棋树营等地清真寺任教长。曾在广州主编《天方学理月刊》，以新观点解释伊斯兰教义。后从事翻译，译著有《穆罕默德的默示》、《回教认一论》、《伊斯兰教典问答》、《清真信仰问答》、《礼拜问答》等。再如《天方诗经》一书，系阿拉伯穆斯林对先知穆罕默德的颂赞长诗，又称"衮衣颂"，1848年马德新由麦加朝觐归来携回该书以及有关注释文集，后来让其弟子马安礼先"研习此诗"，又将阿拉伯诗法编著为"诗海一帙"，供他"研练揣摩，译而传之"。马德新死于非命后，马安礼又与"博通经籍"的马学海合作，"朝夕讲论，纂译成章"。他们采用"海尔布梯"和"巴珠里"二氏注释，广泛参考其他经籍，仿照我国《诗经》体例、韵律，完成了全书的翻译，这在中国翻译阿拉伯诗歌史上属于创举，而汉译本的水平之高，也使它在当代世界五种著名译本中占有突出地位，成为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三)负笈求知增长见识　造就一批回族学者

中国穆斯林常把朝觐称作"巡礼"，因为有很多中国哈吉远涉重洋来到麦加，除了在天房等地完成必要的朝觐功课，还要瞻仰麦加的各种古迹，并到麦地那拜谒穆罕默德的圣陵和诸多历史遗址，活动内容十分丰富。此外，一些有事业心的中国哈吉，更借旅途之便或专程前往考察学习域外情况。经常受

到当地名师或学者的帮助指导，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回国以后，在伊斯兰历史文化研究等学术领域崭露头角，很快成为国内著名的一代回族专家学者，或成为受穆斯林群众欢迎的有“阿林”(学识)的宗教人士。

清代的马德新，在赴麦加途中就考察了缅甸旧都曼德勒、印度的大城市加尔各答，并在马尔代夫的马累岛、也门的亚丁、荷台达等地进行短暂逗留。作为“东土之人”，马德新从也门的“叶兰兰”(耶赖木赖木)戒关进入禁地，投入朝觐者的行列，开始一系列的礼仪活动——寓米那山，会礼于郊野，进驻阿拉法特，射石，宰牲奉献，开戒，巡游天房，亲抚玄石，谒圣贤陵，探渗渗泉，抚幔告辞。有幸的是，他恰遇克尔白开放(一年开放2天，男女穆斯林各有一日可入)，怀着崇敬的心情入内进行了瞻仰。后来由于朝觐者太多，沙特政府待朝觐期一过即遣散哈吉，有幸等到克尔白开放就很不容易了。完成朝觐后，他于1843年底赴麦地那朝谒圣陵，但风向不顺，又有海盗出没，遂改由陆行，途经著名的“白德里”古战场(公元624年穆斯林与古莱氏部落进行了白德里战役，杀死其头目艾布哲赫里，穆罕默德乘胜进军麦加，迫使古莱氏贵族接受城下之盟，承认伊斯兰教)，马德新凭吊了先人战绩，又拜谒了先知穆罕默德陵及圣女法图麦陵后，返回麦加进修学习。1844年8月，由吉达港乘船去埃及，中途到达库塞尔，又陆行至基纳，然后沿尼罗河顺流而下，10月到达开罗(谜思尔城)。当时埃及国王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年)是阿拉伯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实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条建树，蓄货殖”，推动了本国经济发展，并向法兰西等国引进工艺技术，使“诸凡制造无求于他国”。另外国王还动员和领

导埃及人民抵抗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把长期处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控制下衰败的埃及，建设成有一定独立自主权的国家。马德新考察了埃及的政治经济，对国王的政绩印象极佳，赞扬他“大智大勇，善治理”。他在开罗还参观了建于公元970年法蒂玛王朝的爱资哈尔大清真寺，享有盛誉的爱资哈尔大学就是由这座寺院研究教法的57位伊玛目发展成为大学的的。一个半世纪前，马德新是有记载的第一个访问这所大学的中国学者。本世纪以来，该大学又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研究伊斯兰文化和阿拉伯语文的人才，爱资哈尔大学堪称中埃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马德新在开罗还拜谒了伊斯兰教四大教法学家之一——沙菲尔的陵寝，并去亚历山大城凭吊了阿拉伯大诗人蒲绥里的陵墓。蒲绥里的诗篇《盖绥迪·布尔德》(衮衣颂)在阿拉伯世界 享有盛誉，其坟墓坐落在以诗人命名的一座清真寺里，正殿四壁以精美绝伦的浮雕文字图案装饰，浮雕文字都是诗篇中脍炙人口的绝句。后来马德新把这部诗集带回中国，由马开科等译成《天方诗经》。

离开埃及，马德新乘火船转辗奔赴土耳其，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广泛考察，并写入《朝觐途记》。毫无疑问，近代见诸文字记载，访问土耳其历史文化名城伊斯坦布尔的第一个中国人，无疑也是马德新。他详细说明了该城的地理位置，记载了奥斯曼帝国年青苏丹阿卜杜勒·麦吉德(1839—1861年)每周聚礼日(星期五)驾幸“都会殿”，即闻名世界的蓝色清真寺的盛况。当时国王为其皇姐“下嫁”，特在托普卡比皇宫前的“悟思枯多”(今称塔克西姆)广场举行盛大宴会，马德新以中国贵宾身份被邀出席，见到“无数奇珍玩好”，还观看了丰富多彩的文娱表演。土耳其人驶行风帆船的高超技艺，给他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他还得到苏丹签署的证明信——参观了“篆补哈乃”——皇家珍宝陈列院(今托普卡比宫博物馆)。结束了在土耳其的访问之后,马德新又横渡地中海,经过罗得岛、塞浦路斯、雅法,到达位于巴勒斯坦的“圣城”耶路撒冷,参观了“萨哈莱大清真寺”,俗称圣石圆顶清真寺,公元691年倭马亚王朝为纪念先知穆罕默德登宵而建立。寺中陈列一块蓝色大石,传说为先知登宵的遗迹。他还拜谒了阿克萨大清真寺和伊斯兰圣贤伊卜拉欣·达伍德等人的陵园,以及基督教“圣母”玛丽亚的“慈陵”和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升天之处。那里虽由基督徒“掌之,然不阻穆民之游观”。归国途中,他又在新加坡停留一年,大量阅读“房东”尔买勒家各种藏书,并进行天文测验:“向闻新歌敷尔地近中线(赤道),乃南北(半球)间正中之线,平分地为两半,其地北极与地平,南极亦然,昼夜如一。夏至昼不见长,冬至昼不见短,日在春分,秋分,凡太阳偏南,影偏北,凡太阳偏北,影偏南。因此予居斯岛一处试之,罗盘之间立一针,验其二至二分,得古之言,皆属事实,与所遇符合。”此举被白寿彝先生誉为“颇具科学实验精神。”

马德新在其一生中最为成熟而精力尚健旺的年龄,即47岁至55岁之际,用8年时间“既完其天命”,而又“游历天方,旁搜博采”,在西亚诸国择风问俗,寻觅典籍,考察各地典章制度,踏访各种历史古迹,与四方学者广泛接触,并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这些丰富的知识滋养使马德新的学问底蕴越来越广博和厚实,使他回国后得以撰写“诸经籍大阐圣道,使中国学人得悉教门之根柢,祖国之规模”,从而成为受人尊敬的一位著名回族学者。

哈德成是20世纪上半叶经过朝觐洗礼而迅速成长起来

的又一名回族学者。他名国桢，经名希拉伦丁，以字行。祖籍陕西南郑，随父希龄寄居上海，其父曾任浙江路清真寺教长。哈德成自小聪颖过人，遵父命苦习阿拉伯文和汉文，长大负笈求学于南京、河南、陕西诸省，获不少著名经师亲自传授，后来被浙江路清真寺寺坊的穆斯林们推举为副教长。但他对学业并不满足，"恒以足迹不出国门。见闻浅陋；且春申一埠（上海），外侨麇集，于宣教、酬世，尤非抱残守缺所能应付，辄引为憾事。彼时海禁既弛，交通四达。遂灵舟泛海，经南洋达默克"，于1913年"朝觐天方"(尹伯清《哈德成阿訇传略》)。他"面对恺而白，默以献身正教自矢"（白寿彝:《哈德成阿衡墓表》)。归国后，他以发展回族文化教育事业作为奋斗目标，与同仁组织协兴公司经营海外贸易，筹资兴学。1919年出任该公司驻锡兰、埃及经理，遂遍访名家，讲经论道，对英语、乌尔都语也能听讲自如。"所学益博而深，虽外邦人士亦刮目视之矣。"同时积极向国内输入埃及、土耳其、印度等地活字版伊斯兰经籍，推动伊斯兰学术文化发展。1924年回国，在聚礼宣谕《虎图白》时，能操几国语言，为"海内经师所未有也"，被聘为浙江路清真寺教长。在宣教讲学之余，他逐渐感到国内经堂教育的教法、设备陈旧简略，事倍功半，不改弦更张，很难培养出合格的宗教人士。因此1928年在上海南市方浜路青莲街清真寺创办"伊斯兰师范学校"，加授汉文课程，以造就通才。他亲自主持教育，成立数载，业绩卓著。同时，他又鉴于各地教胞团体散漫，意见纷歧，乃邀旅沪同仁组织"中国回教学会"，纂辑学会《月报》，以阐扬教义，启发思想。他与伍特公等所翻译的《古兰经》稿，即最先于《月报》中按期披露，"博征海内同道意见，期以尽善"。他还针对上海穆斯林不能深谙教理的状况，在

清真寺开设“古兰经讲座”，躬任主讲，辛勤不倦，反复推阐，不厌其详，“一时中外穆民仰承启沃，执经问学者，踵接于门；沪上教风为之大振。”以后他将讲授的内容汇辑成册，以《回教初步浅说》书名问世，曾多次重印。另外，他还在“伊斯兰师范”毕业生中选拔俊秀，遣送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留学，作专门研究，并热情接送前往麦加朝觐的内地教胞。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寻衅淞沪，抗敌战起，哈德成投身于难民救助，并倡议设立收容所，使数千名回族难胞，暂时有栖身之处。不久，上海沦于敌手，他隐居租界，闭户研经之余，仍领导东南各省回族穆斯林从事抗战之活动。迨太平洋战争爆发，敌伪势力侵入租界，对哈德成“多方胁诱”“思所以利用之”。他不堪逼迫，就化装逃离上海，历经皖、豫、陕、蜀，抵达重庆，被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聘为编译委员会主任。不久，又赴云南蒙自沙甸，与马坚等专心致志于《古兰经》的继续翻译。由于工作繁重，积劳成疾，于1943年10月25日在个旧疗养院病逝，享年56岁。为了表彰哈德成的学业成就和献身中国伊斯兰学术文化事业的崇高精神，《中国回教协会会报》于1944年出版了第6卷第1—2期合刊《哈德成阿衡纪念号》。

与哈德成同时代的回族学者买俊三（1888—1967年）是位《古兰经》音韵学家。原籍河南洛宁王范镇，早年求学于晋陕等地，曾投土耳其籍学者穆罕默德·阿里门下学习。1911年赴印度学习乌尔都语。第二年抵麦加完成朝觐功课并留居深造阿拉伯文法、音韵学和伊斯兰教义。1914年回国后历任西安、开封、洛阳、郑州等地清真寺教长，1926年受聘任教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因有感于我国伊斯兰经典奇缺，于1930年创

中国回教书局，编印宗教基础知识丛书和阿拉伯语初级读本，翻印海内外各种阿拉伯文典籍，在国内外颇具影响。抗日战争时期不愿受敌指使，赴内地任教，1945年，任镇江山巷清真寺教长。买俊三阿文造诣深厚，对《古兰经》读法和语法均有研究，诵经音韵准确，著有《阿文标准拼音读本》和《文法读本》等。

北平清真书报社创办人马魁林阿訇的长子，赴土耳其留学归来的回族学者马宏道，当年出国求学也是以朝觐为由头展开的。马宏道出生于北京牛街，自幼从王静斋研读伊斯兰经典。20年代初，随王静斋赴麦加朝觐，途中屡遭困厄，艰辛备至，除却单衣数件，棉被一身外，孑然一身，不名一钱，但志不稍息。返国时，因路费不足，乃只身到土耳其勤工俭学，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大学。30年代初返国，重新经营清真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汉文伊斯兰教学术著作。并在南京同刘伯余等创办《晨熹》杂志，后受聘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的秘书。40年代，在西北大学、临夏师范等地先后任教，参与过甘肃回教教育促进会的领导工作。抗美援朝时，曾受命赴朝担任土耳其俘虏的翻译工作。他的弟弟马明道，30年代也曾去土耳其留学，1936年随新疆穆斯林从伊斯坦布尔乘船去麦加朝觐，后从事外交工作，但仍关注伊斯兰学术研究，曾在台湾任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撰述出版过《伊斯兰对中华文化之影响》、《伊斯兰教》和《明朝皇家信仰考初稿》等专著。1988年，年逾八旬的马明道曾回故乡北京访问，与大陆学者就双方感兴趣的伊斯兰教问题进行了交流。

还有不少中国朝觐者，他们虽然没有成为国内有名的学者，但依然凭藉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好学求进精神，朝觐归来后

被公认为有学问的阿訇，受一方人士的尊重，或被乡亲们引为自豪。如西安阿訇马谦益，1928 年以品端学粹被聘为当地大寺掌教。1935 年自费朝觐后学识更有明显长进，受聘在甘肃、绥远、察哈尔等地清真寺开学。因声名卓著，1944 年由绥远(呼和浩特)取道陕北回家乡省亲时，曾受到当时边区政府的热情接待。

又如宁夏灵武县杜木桥乡海子村的马龙哈吉，在民国年间曾两次去麦加朝觐，其不平凡的经历，多年来在当地被传为美谈。

马龙家境贫寒，依靠奶奶和母亲替人帮佣维持生活，但家中亲人都期望他能读书认字，10 岁时送他去清真寺学经。马龙对学习机会十分珍惜，到 18 岁时不仅能诵读全本《古兰经》，还掌握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基本文法。慢慢地，他感到周围老师的知识已不能满足他求知的要求，他决定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于是开始多方设法攒钱，举意朝觐，并趁此机会去寻觅学问。后来，一位较富裕的乡亲知道了他的心愿，就对他许愿，只要他自己攒够 400 元钱，余下的就给垫付。马龙不愿放过这个机会，就含辛茹苦地种植了几亩西瓜，希望卖瓜以后能盈余点钱。但苦干了几年，也只攒下了 200 元钱，然而那位乡亲见他朝觐的举意坚定，就帮他凑够了盘缠。马龙的老师也让他“穿衣”毕业，便于他以阿訇的身份前往麦加朝觐后继续有机会学习。1927 年，23 岁的马龙肩负家人、老师和乡亲们的殷切希望，踏上了第一次朝觐的路程。他从黄河坐羊皮筏到包头，为了省 10 块钱，又从天津坐船到上海。去麦加途中，他忍受住了各种旅程艰辛。顺利完成朝觐功课后，他留在圣地学习伊斯兰教义，由于生活费没有着落，他开始给朝觐者当向

导，以此来挣得一些施舍的"乜贴"。朝觐者和当地人民见他有如此顽强的求学精神，都十分钦佩，并从生活上给予接济帮助。经过一年多的"勤工俭学"，马龙收集到近200册伊斯兰经籍图书，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就高兴地携带这批珍贵的资料返回祖国。为了省钱，他顶着在麦加亡故的中国哈吉的名字，利用其剩下的早已定好的返程票上了船。他回到家乡后正想好好钻研这些资料，谁知一天他不在家，这些用心血和汗水换回的图书资料被人偷走了。为此他伤心了好长时间，经人劝解也难以平复，在痛苦的沉思中，他毅然决定再去麦加寻觅同样的经籍图书。趁着他上次朝觐归来省下了船费，还有一些剩余钱，经过募集拼凑，1931年他又第二次从上海出国朝觐，这时他才27岁。经过张家口时，有人愿意出800元钱让马龙代朝，但他已举意此次是替去世的祖父和父亲代朝，就没有收这笔钱。

在麦加，马龙遇到了从云南来的沙国珍、沙国民两兄弟。沙国珍是云南明德中学训育主任，1931年12月曾率中国第一届公派学生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在异国他乡遇上祖国来的穆斯林同胞，大家都十分激动。因此朝觐完毕，三人就相约去麦地那拜谒。由于当时汽车费很贵，他们就通过别人介绍求见了沙特王国财政大臣。大臣见马龙的阿拉伯语非常标准，也有兴趣听他谈谈。马龙如实告诉他自己是个庄户人，但希望在沙特学习《古兰经》学、教法学、阿拉伯文法和修辞学，同时介绍了沙氏兄弟的情况。他还表示，三人都想去麦地那晋谒圣陵，增长学识，但缺乏川资，希望给予帮助。大臣听了很高兴，说你们都是求知识办教门的年轻人，应该支持。就让秘书写了便条，注明人数及汽车牌号，把车费全免了。第二天他们

不仅坐小车前往麦地那，车上还准备好了茶和方糖。以后，马龙又继续留在麦加一边当向导，间或干杂工，一边学习。并于1933年初与来朝觐的马松亭、赵振武相会，在圣地向这些名师讨教学习伊斯兰教义的问题，并继续寻觅自己所渴求的各种经籍。马龙这次回国时和上次一样，仍然顶用亡故哈吉余下的返程票，但只能到新加坡，因为在当地上船时要用护照核对船票，只好下船重买一张到上海的船票。马龙第二次朝觐归来的消息传到了宁夏，乡亲们都热诚地欢迎他，光银川的穆斯林就连续多日请他吃饭，极为关注地听他讲述麦加见闻。以后，马龙主持的教务和讲学十分受人称道。在灵武、吴忠一带的名声越来越大，家乡的人们也都以马龙哈吉的丰富阅历和顽强求学精神引为自豪。

（四）爱国爱教奉为宗旨　民族教育大力推进

清代末年，面对空前严重的国家与民族危机，在回族中开始涌现出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明确提出了回族与爱国的关系问题，把抵制列强，强盛中华作为振兴回族的重要前提。他们根据当时回族的具体处境，主张宗教改良和普及教育，认为近代中国教育制度的陈旧，是祖国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原因，也是回族社会与文化衰退的病根，因此必须建立新的教育体系和制度，用新的科学文化知识来充实改造传统的经堂教育，并逐步建立普及性的新式回民教育。在这方面，中国穆斯林朝觐者发挥过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他们本着爱教爱国的宗旨，或是在教学方法上引进国外经验，提高经堂教育水平；或是考察国外先进教育制度，回国后推动建立起新式

回民教育和宗教教育;或是在普及民众教育方面开创先例,坚持不懈,他们各自在发展民族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马联元(1841—1895年),字致本,云南玉溪县大营人,在吸收国外经验,改进经堂教学方法上就曾颇有建树。他为经学世家之后,22岁即以擅长阿拉伯语、波斯语而负盛名。1864年第一次去麦加朝觐,并游历了埃及、叙利亚、印度诸国。他在国外向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学习,并把经验带回国内,从此毕生从事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的改革。他在玉溪县讲学数十年,门徒数以千计,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玉溪大营龙门九村,一时成为伊斯兰寺院教育的中心。

马联元认为在中国流行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语法书籍,多半是古典著作,艰深难解,不适合中国学生初学之用。因此,他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编了一套新教材,如阿语的《词法基础》、《语法基础》、《修辞学基础》、《逻辑学基础》以及波斯语的《古文仙法》,不仅精简扼要,浅显易懂,而且创造性地采用一目了然的图表,来解释阿拉伯语复杂的词法、语法。百年之前,能有这样负责任的教育家,编写出如此好的教材,不能不令人叹服。这套语法教材,在当时已由穆斯林捐资全部木刻,在马联元死后的几十年内,不仅在云南,而且在全国各省,普遍为清真寺寺院教育所采用,就是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马联元还首创了汉文与阿拉伯文并授的教育方法,即"中阿并授",要求学生在学习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伊斯兰教经典时,还必须掌握汉语,做到既通晓伊斯兰教经典,又善于用汉语阐述伊斯兰教教义。以适应社会上的实际需要。他还身体力行地编写了一套阿汉并用的《孩听译解》,即《古兰经》选本,用汉文解释若干最重要的《古兰经》章节,在穆斯林中广为

流传。他还删繁就简，改写了《非苏里》(天方分信篇)、《穆希莫托》(教款捷要)、《尔姆法》(清真玉柱)等一套教材，也曾风行各地。此外，还撰有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四篇要道》、《性理本经》和用汉文写的《辨理明证》等专著。他还在云南穆斯林的资助下，完成了杜文秀之后重镌《古兰经》木刻本的巨大工程。书版由他的学生，著名阿拉伯文书法家田家培手书，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木刻本《古兰经》楷书大字，美观无比，共分装成30册。刻版现存昆明市南城清真寺，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珍贵历史文物之一。马联元不仅是国内有名的穆斯林教育家和著作家，而且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伊斯兰教学者。1894年，他再度去麦加朝觐，路经印度东北康波尔时，接受印度穆斯林的邀请在当地讲学一年，他用阿文著的《讨堆哈》(《简明伊斯兰教法典》)也在印度出版。1895年，马联元不幸在印度病逝，深为印度穆斯林所追念，曾立下墓碑，以示纪念，并且一直保留至今。

在中国现代回民宗教教育和普及教育方面最有建树的，则当推王宽，赵振武认为："近代中国回教文化之倡兴，教势之复振，(王)阿衡领导之力也。""近人金吉堂氏著《中国回教史研究》，以唐初迄清季一千三百年之间之中国回教情势，区为三期，其意以为自清季王浩然兴学起，为今后一大变迁，因而归入第四期，今欲述近代中国回教文化教育诸事迹，允宜采金氏之意，断自王浩然兴学始"(《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

王宽(1848—1919年)，字浩然，北京人，排行第五，因此人称王五阿訇。自幼聪颖，跟叔祖学习经典，因专心致志，勤学不倦，没几年就精通所学，造诣精深。稍长，即开始应聘为教长，因为他在说教时，能用浅显易懂的阿语表述出深奥细微的

伊斯兰教哲理，教众非常喜欢听。后又在经堂任教师，因他讲学时"剖析文字，解释义理，非详尽不辍；督课尤严，偶有过，立责之，不少宽假"，所以有许多人从千里之外来跟他学习。

中国回族和伊斯兰教，因为受历代统治者的摧残抑制，到清朝末年，回民已变得极为消极，文化活动基本上局限于清真寺，设有"大学"、"中学"、"小学"。"大学"，为造就阿訇之学校；"中学"，为中年回民失学者受教育的场所；"小学"，为穆斯林儿童受教育的讲堂，均不同于现代教育的大、中、小学校。授课的内容仅以讲经为主，兼学阿拉伯语，其他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实用课程一概不设。经堂教育虽然重要，但它规模小，所学知识太狭，又因为当时回民受信仰、习俗等原因的制约，不能到其他学校学习。所以王宽立志要改革回民教育，兴办新式回民学堂。

在阿拉伯国家中，十分注重教育，像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著名的伊斯兰高等学府；摩洛哥的卡拉维因大学，突尼斯的栽突那大学等，也都是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向往的地方。王宽因自己"未出国门，见闻不广为憾"，打算去麦加朝觐，并借机游历阿拉伯世界，了解当地办学的经验，但因旅费不足，不能成行，后来有许多教胞自愿解囊相助，王宽的志愿才得以实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偕其高足马德宝阿訇从上海出国，乘法国邮船，经南洋向西，越过苏伊士到达埃及，先后到欧洲的雅典、罗马、索菲亚，然后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士麦那、雅法学习考察，后经苏伊士运河、红海到达麦加，朝觐天房后又去麦地那瞻仰圣墓，然后又返回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继续考察。当时土耳其国王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当他知道王宽是中国穆斯林学者后，给予特殊的优待，

并赠送经书千余卷，多数是中国没有的，王宽如获至宝，潜心攻读。中国的穆斯林读《古兰经》，都是由阿訇们口述学会的，发音非常不准确，王宽以为《古兰经》的读法必须由专门的老师教授才行，于是第二年，偕带精通《古兰经》的土耳其教师苏哈夫哈三及阿里雷抓二人回国，从传授《古兰经》正确读法入手，以锐意兴学。

王宽出游之时，正值不少阿拉伯国家遭受殖民主义奴役控制的时候，与中国情况相同，他认识到，"世界大势非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1907年，为振兴宗教教育，改变清真寺经堂教育培养宗教人士中陈旧迂拙的讲授方法，与其学生达浦生等在北京牛街礼拜寺内创办了回文师范学堂，改革教学方法，增设有用课程，既学习伊斯兰教义，又要兼习汉语及科学知识。第二年，又在原址创建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并在京城内外分设小学四处，在国内迈出了普及新式回民教育的第一步。由于经费不敷，王宽常去当铺典衣以充开支。"某日因教薪届发，不愿衍期，衣物搜罗既穷，乃解扎腿之带，使人持赴至今乐道之烂面胡同典肆质银五十两，薪乃得发。盖阿訇平日物望允孚，肆主钦其为人，故虽微亦可质多金，谈者皆诧为异事，至今乐得。"由此可见，王宽一心办学的精神，使很多人都深为感动。

后来他应北京、上海、南京、开封及绥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等地方的聘请前去任阿訇，但是，依然非常关心兴办教育。虽然王宽首先发起创办的回文师范学堂和高师公立清真小学，在开学后不到两年就停办了，但是从那时起，回民教育的基础已经打下，不久，全国各地回民都起来自办学校，只要是有回民的地方，几乎都设有小学，而中等学校在当时有北平

公学，成达师范，上海伊斯兰师范，云南明德中学，山西崇实中学，万县伊斯兰师范，湖南偕进中学，宁夏中阿学校，杭州穆兴中学等十几处。1935年，还在北京由马松亭等人创办了新月女中，这在当时都是很进步的行为。

王宽一生为民族和祖国做了很多好事，如八国联军人侵北京时，他与街坊"议办团练，严警备"，防止本地区遭受散兵逃勇抢劫破坏；辛亥革命后，甘肃总督负隅顽抗，派马安良举兵东向，前驱已抵潼关，王宽"虑国本动摇，人民涂炭，急电回部八王、甘肃五马，释共和真谛，劝勿盲从。未几纷电中央，咸赞共和"，"共和"始基危而复安。孙中山在民国元年与王宽相识于回教俱进会，知他"为人忠鲠"，后"据两粤从事北伐"时，写信要王宽支持，他即派亲信孙绳武"赴粤报命"。但在王宽诸多功绩中，对后人影响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还是他倡导新式教育，推动中国回族与伊斯兰教文化进步的开拓思想与伟大实践。

在王宽"兴学"思想的影响下，宁夏一位朝觐归来的阿訇虎嵩山，也积极投身于新式回民教育，并向学生积极灌输爱国爱教一体的进步思想，为动员回族人民抗日作出了贡献。虎嵩山（1880—1955年）又名镇林，字以行，生于宁夏同心半个城，逝世于甘肃平凉。他父亲是同心县"虎夫耶"门宦的一位"海里凡"，人称"虎爷老人家"。1897年，虎嵩山已18岁，他资质聪颖，仪表端庄，对宗教知识的学习成绩最为突出，所以当其父宣布让他继任第二代"海里凡"时，教民们都很高兴。但是，此时虎嵩山已拜其他著名阿訇为师，并且与其父崇奉的信念分道扬镳。当时，甘肃马万福阿訇所倡导的"伊赫瓦尼"派学说，已在甘、宁、青一带广为流传，虎嵩山对此予以积极响应。1902

年，虎嵩山受聘同心县城清真小学当教长，第一个在宁夏公开宣传"伊赫瓦尼"学说，并在沿袭马万福的"凭经传教"主张的基础上，针对宁夏穆斯林传统宗教活动中一些不符合《古兰经》、《圣训》规定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与改革，提出了"遵经革俗"的口号。早期虎嵩山的思想和当地一般阿訇一样，对国家的观念是比较模糊的。因为建国前，回民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尤其经过清王朝的血腥镇压，回族人民对旧统治者，长期存在着对抗情绪。辛亥革命之后，一些阿訇往往强调中国穆斯林对宗教所承担的各项义务，而对国家的义务，却从来不置一词。

1925 年，虎嵩山去麦加朝觐。沿途他发现中国人由于国弱民穷，处处受到外国人的歧视，不管是回民汉民，遭遇完全一样。他从此认识到，没有富强的祖国，就没有个人的自由，宗教也不例外，这次朝觐，不仅使他的宗教信仰得到完善，而且使他的思想境界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认识到中国穆斯林是全国人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研究了有关西北民族矛盾的史书，发现历史上的民族压迫，是当时的官府造成的，不是各民族之间固有的仇恨。他认为，要转变穆斯林的认识，要靠有效的宣传教育，一是用各种机会向群众讲解爱国爱教的道理，二是创办新式回民教育，培养出一代观念更新的年轻宗教人士，再依靠他们去说服群众，动员群众。他回国后在上海受聘到湖南常德清真寺担任教长。这时他除了专修汉文外，就是特别关心国内外大事，对于"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也深受感动，因而爱国思想越来越强烈了。

1927 年他回到家乡后在各寺任教期间，于宣传教义的同时，尽量向穆斯林群众讲说国内外大事。据说他在镇戎（今同

心县)县城下马关清真寺当教长时,曾与本县回族知名人士白道然合作,在清真寺内成立"镇戎县回民自治公会"一处,目的是想把包括阿訇在内的回族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进行爱国教育,反对军阀割据,实现祖国统一。虽然此"公会"不久即流产,但对于一个宗教职业者,能有如此进步的认识和行为,也是难能可贵的。他除了搞好宗教教务外,还大力提倡兴办回民学校,以期普及回民的文化教育。过去西北回民只让孩子念经(阿文),不让读书(汉文),怕的是读书以后思想被汉族同化。但是虎嵩山却不是这样想的,他认为过去西北回汉矛盾,是少数人挑拨起来的、正因为不读书,文化落后,回汉之间思想不能沟通,以致相互猜疑,才发生误会和冲突。鉴于此,他极力劝说设立回民学校,历数回民念经不读书的害处,因此,1932 年在省城成立的"宁夏私立中阿学校",1938 年在吴忠成立的"中阿师范"都与他的积极倡导分不开,另外他还在同心、固原等地动员群众办起了几处小学。除此之处,他在改革经堂教育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功,并为使学生们更容易、更好的学习伊斯兰教义,他编译宗教常识读物,修订阿、波文法基础课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他的思想里,最反对固步自封,提倡紧跟时代前进。他能够欣然接受科学思想,把在朝觐过程中在国外看到的有意义的思想及学识尽量吸收过来,并能在现实生活中予以贯彻,以推动社会和回回民族自身的进步。

1938 年,正值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开展,虎嵩山受灵武回民上层人士李凤藻等人的聘请,担任吴忠中阿师范学校校长。当时,在强敌入侵之下,国土丧失将近一半,敌人的飞机在后方狂轰乱炸,就连偏僻的宁夏也不得幸免。为了配合全民抗

战，虎嵩山就依靠宁夏穆斯林的这个最高学府组织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规定每天早晨礼拜结束，全体阿訇和学生要参加升旗仪式，利用升旗的机会，和教师们轮流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揭露敌人烧杀掳掠的罪行。他还指导学生每七天出一次墙报，举行一次讲演会，内容都以抗日救国为中心。他自己利用聚礼日讲话（瓦尔兹）的机会，引用《古兰经》、《圣训》动员穆斯林群众为抗日救国做出贡献。当时最令人感动的是，他亲自用阿拉伯文写了一篇反对日本侵略的祈祷词，加上汉译，用尺五见方的白纸石印成宣传品，分发各清真寺。他要求各寺教长在每七天的"聚礼"拜前向教众宣读这篇祈祷词，最后与大家一起共念"阿敏"结束。

这篇祈祷词的内容如下："真主啊！你援助我们的政府与国家；你战胜我们的侵略者，消灭我们的敌人。你以残暴的日本人所干的坏事上保佑我们。他们霸占我们的城市，杀害我们的人民。你给他们差遣狂风，使他们的飞机跌落在荒野，军舰沉没在海里！你使他们的军队瓦解，经济崩溃！你给他们降临应得的惩罚！真实的主啊，你答应我们的祈祷吧！"虎嵩山作为一个宗教人士，他不仅维护宗教信仰，倡办回民教育，而且真心热爱祖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他讲话口口声声不离"国家兴亡，穆民有责"这句话。他常引证"爱护祖国是属于信仰的一部分"这段圣训，因此，他受到宁夏回汉人民的尊重和爱戴。

在西北伊斯兰教人士中，还有一位举意朝觐而因战乱未能如愿，但却把毕生精力投注于民族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他就是西道堂教派的创始人马启西（1857—1914 年）。马启西字慈祥，号公惠，经名叶海亚，甘肃临潭人。幼承庭训，入寺习经，八岁转入私塾。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后，闭门攻读先贤刘智、

王岱舆等人的《天方典礼》、《天方性理》、《五功释义》、《正教真诠》、《清真大学》等汉文伊斯兰著述，深有所得。光绪十六年(1891年)在临潭旧城西凤坪下设帐讲学，开设私塾，命名"金星堂"，讲解"四书"、"五经"及刘智译著的伊斯兰教典籍。马启西从建立西道堂开始，就立下了欲致富图强，须先开化民智，兴办民族教育的壮志。在讲学中他宣传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思想，深入浅出，吸引了不少听众，甚至有汉、藏等族群众听讲并改换信仰。由于遭地方势力排斥，屡起诉讼，为避锋芒，马启西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西行麦加朝觐，至中亚撒马尔干因战乱未能成行，但受到随白彦虎军而逃来此地的陕、甘回族穆斯林的欢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返回故乡，当他到来之日，各地教众闻讯前来迎接，不下千余人，有一位叫铁石的还写了"恭贺马校长暨赵、张二先生西游归来"的七言诗："雄飞远志涉重洋，西去维扬祖国光。真教一源穷性理，乘槎数月历风雷。苦因求识输胞舆，莫谓无人着裔香。我亦圆颅方趾辈，羡鱼徒自怨郎当。"这次归来，马启西将"金星堂"改名为"西道堂"，除继续讲授天经、圣谕、天命五功之外，又加设经济、农艺课程，鼓励教下集资兴办商业贸易，兼营农、牧、林业。他还写下如此对联："名实兼收，不独润身还润屋；经营俱到，真能成己更成人。"

1914年，马启西不幸遭到当时西北军阀马安良的残害，他去世后，其继承人马明仁、敏志道秉承前辈遗志，继续创办学校。1919年，马明仁创办"临潭普慈小学校"，西道堂内7岁以上儿童一律入学，并动员各民族100多名适龄儿童入学就读。1922年，又集资万两白银，修建了"临潭旧城私立第四高级小学校"，现为"城关民族一校"，面向全县各族学龄儿童招

生，各族就读学生超过200人，课程有国语、数学、史地、公民、英语、体育、音乐、图画等。每周还为穆斯林学生加授3小时的阿拉伯文课。1943年，马明仁又破旧立新，创办了一所“临潭城西凤坪私立启西女子小学校”，自任校长，不分地域民族，凡愿上学的女生一律免费并供给课本和文具，提倡剪短发、不缠足、穿适合时代的衣服。马明仁还为学校谱写了校歌，并对其他地区的民族教育也极力支持，如为兰州西北中学捐款捐木料等。1948年，西道堂第四代教长敏志道又创办“私立启西中学”，有校舍4栋，办公室、宿舍和厨房6栋，桌凳100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民族教育重获生机，现任西道堂教长敏生光哈吉不忘先辈重视文化教育、培养人才的崇高品质，积极协助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发展民族教育，被县政府聘为“临潭民族一校名誉校长”。他为学校集资1万多元，又自己出钱买了50套课桌凳送给学校，逢年过节还亲自带上礼品慰问学校教师，甚至带领教众给学校修路，拉沙垫铺操场，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府和临潭县政府给予他“捐资助学，造福后代”和“惠及桑梓”的殊荣。西道堂教派从马启西创建开始，就一直以兴办教育，提高文化素质为己任，虽历经艰辛，但深得社会的称赞。30年代末顾颉刚先生在甘、青各地访问时，就曾书写《天方性理序》和《清真五更劝善歌》堂屏，赠西道堂留念，并为马启西题词：“立教化民为天下法。以身殉道作百世师”。马启西开创的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能保存至今，必将为西道堂教众发扬光大。

四、遵循天命　维护正义

按伊斯兰教教义解释，真主是人类一切物质生活的赐予者，穆斯林的世俗生活既是享受真主赐予的种种恩惠，又为来世的幸福预作必要的准备。所以对每一个穆斯林来说既要虔诚地履行必要的宗教功课，还应该按照伊斯兰教道德和律例规范，主动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抗战初期，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在《联络回教世界计划大纲草案》中，就曾提出"利用朝觐机会为世界回教之联络与宣传"的计划，要求"利用此机会，作联络宣传工作，藉宗教之情感，以把握世界回教之重心"，从而粉碎日本侵略者欺瞒中东人民的诡计，建立反法西斯联盟，让各国人民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必要性。中国穆斯林朝觐者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在圆满完成朝觐礼仪以后，曾为了利用这个机会抵御侵略、揭露阴谋、维护正义、捍卫祖国而在圣地麦加向千千万万的各国穆斯林兄弟进行宣传工作。有的哈吉还进一步访问其它伊斯兰国家，发表各种言论和文告，争取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达浦生出访西亚、南亚，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游说中东诸国，留埃学生组织成立"中国回教朝觐团"赴麦加与敌伪傀儡斗争，都是这方面的生动例子，堪称爱教爱国的典范。1940年，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曾签署文告称："自抗日战争发生以来，我忠勇之回教同胞……一致兴起，或执干戈以卫国家，或尽力捐助以裕军需，或主持正义以正言论、或教育子女以待复兴。在此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交，无不思完成历史之重大任务。凡所表现，不特博国人之敬爱，国际

方面之同情，足使我国同胞引以自慰者也。"同时，几十年来，中国穆斯林朝觐者和全国人民一起，对其他国家穆斯林争取独立、平等与和平的行动，如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恢复主权的斗争也给予一贯和坚决的支持，从而赢得阿拉伯人民的好评。

（一）悲愤交集独行西亚　达浦生游说为抗战

抗战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燃起战火，使许多中国人生灵涂炭或流离失所。面对侵略者的疯狂气焰，具有强烈爱国热忱的达浦生阿訇怒不可遏，毅然独身奔赴中东，又转访南亚，借朝觐之机向阿拉伯兄弟和各国穆斯林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推动了国际援华抗日运动。

达浦生原是我国著名的回族教育家和伊斯兰教学者。名凤轩，江苏六合人。出身于经学世家，是达氏第七代阿訇，自幼学习阿拉伯、波斯语文和伊斯兰教教义。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在北京牛街礼拜寺跟从著名回族教育家王宽阿訇学习汉文。五年以后回乡创建广益小学，准备终身从事回族教育事业。光绪三十七年（1907 年）应王宽之邀，赴北京协助老师创立了回文师范学堂，次年又建成京师公立清真第一两等小学。1912 年起，任甘肃回民劝学所所长兼省视学 6 年。在任期间，遍访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数十个县，视察回民教育并给予大力推进。1921 年—1927 年间，又出国考察印度及东南亚各国的伊斯兰教教育情况，并为国内办回民学校筹集资金。1928 年归国后，任上海福佑路清真寺教长。同年，与哈德成等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并任校长。从 1931 年开始，他

每年都选派该校优秀毕业生，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同时送往该校的同学还有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及云南明德中学的学生。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达浦生多次收到海外友人来函，他们有的表示对中日两国的战争不甚明了，有的甚至认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理应相互亲善，不该兵戎相见，还有人竟以为中日强弱悬殊，中国的抵抗是无济于事，甚至没有价值的。而当时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也来信讲，由于日寇事先就设下了鬼蜮伎俩，进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反华宣传活动，致使不少中东人士对我国抗日战争产生误解。达浦生听到这种情况后非常气愤，当时就萌发了出国揭露日本在华的种种暴行，宣传中国人民抗日爱国活动的想法。但当时上海正处在战乱之中，穆斯林难民众多，达浦生身为上海伊斯兰教教长，担负上海伊斯兰教事务的领导责任，怎能坐视教胞沦为饿殍，面临生死关头而不顾呢，于是，他和哈德成教长等爱国人士筹办起回教难民收容所五处，并多次吁请各界人士资以救济。当时，正值救国公债开始发行，全国劝募总会即设于上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为战时动员全体国民的口号。回族穆斯林乃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有责任参加募捐，因此，达浦生又在9月下旬赶赴南京，请白崇禧担任中国回教劝募总会主任，并在各回族聚居地设立分会，因此很快圆满地完成了募捐任务，并返回上海。

1937年10月12日，上海南市失陷，华界全部沦于敌手。不久伊斯兰学校与城内四座清真寺、两所回教女子学校都被日寇所占据。更使达浦生悲愤交加的是，无耻的汉奸引导着日本宪兵到南市清真寺等地搜捕他，幸亏他当时暂居租界，才没

落入敌手。因此他发誓“上海一日不光复，自己一日不回去”，决心抛弃一切牵挂，出国朝觐并游说中东、南亚各地，为我国的抗战作宣传。由于战火在上海蔓延，朝觐班轮无法开行，他遂于当年岁末乘船前往埃及再转道麦加。到香港时，出席了香港回教团体欢送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的大会，并发表了抗日演说。

1938年元月，达浦生到达开罗。埃及当时与我国在外交上和商务上的关系还很少，但在文化教育方面关系比较密切。如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虽是世界穆斯林的最高学府，历史最长久，学生人数亦最多，而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待遇却十分优厚。新去的中国学生在阿文方面较差，学校允许安排特别的补习；校方对其他外国留学生每月津贴伙食费仅8元，而对中国留学生则津贴2埃镑（合24元），因此当时在爱资哈尔的中国留学生有30多人。达浦生出国游说第一站选择到此，就因为我国与埃及官方有这种特殊友好关系，使之更加有条件在埃及上层社会进行宣传，而留埃学生也可做些配合工作。达浦生抵达埃及时正是埃及国王法鲁克举行结婚典礼的时期，各个伊斯兰教国家的政府贵宾纷纷前来开罗祝贺，并有大量各国穆斯林群众来此观看这一盛典，如能借此机会进行抗日援华宣传，自然可以收到更明显的效果。所以达浦生特别备了礼物，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1月20日的盛典。在名人贵客云集的盛会上，达浦生与各国教胞亲切交谈，然后寻机转移话题，向他们介绍中国穆斯林抗敌御侮、忠于祖国的英勇事迹，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称霸全亚洲，正准备染指中东的阴谋，引起很多宾客的关注。23日他将礼物献给埃及国王，即受到埃及国王召见，宾主谈话大约进行了30分钟。达浦生在表示热烈

贺忱之后，就将日本侵略者在我国的兽行，及全国人民上下一致抗战到底以求最后胜利的决心，作了系统的叙述，埃及国王听后当即表示深切同情。第二天，埃及国王又派人送来回赠礼物，以示酬谢。之后，达浦生在埃及又对民众多次进行关于我国抗日斗争的宣传，也取得了圆满的效果。

为了赶上一年一度的朝觐，达浦生于2月初离开埃及赶赴沙特麦加，一方面要去完成自己的宗教功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抗日宣传。因为每年朝觐期间，麦加差不多都要聚集大约二三十万各国穆斯林，那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宣传机会，因为这样大规模的自发聚会，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达浦生绝不能错过，更何况许久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把麦加朝觐季节作为他们从事反华宣传的一个重要地点。针对敌人的阴谋，以牙还牙的行为也是必须的。许多事实表明，日寇确实很看重麦加朝觐期间的宣传活动。达浦生在去麦加的船上就遇上了3名日本人，他们穿着埃及学生的装束，红帽子白头巾，宽袍大袖，从来不与他人搭话，行动十分诡秘，看来，日本帝国主义确实想趁麦加朝觐之机搞些名堂。因此，达浦生对这几个日本人的言行十分注意。

在沙特顺利完成了各项朝觐功课后，达浦生等又向聚会的各国哈吉进行宣传，此外，设法两次拜见沙特国王。第一次是在米纳山谷，借国王阅兵后会见来宾的时候，但时间有限，只是向国王表示致敬就结束了。第二次是正式会见，达浦生等抓住时机向沙特国王及大臣们详细介绍了中日战争的真象，并请求国王以抵制日货为手段，对我国加以援助。结果国王对他们的要求十分尊重，并给以很圆满的答覆。

达浦生在与各国穆斯林甚至很有地位的上层名流交谈

中，发现他们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存在许多误解和错误，虽然达浦生详细加以纠正，但是毕竟谈话时间很短，个人宣传势单力薄，深感光凭口头作宣传影响太有限，必须用文字宣传加以辅助，才能取得一定的效果。达浦生还想到，中东各国是伊斯兰的天下，在这块地方，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感情，他们的喜好，他们的援助，甚至根本倾向都和伊斯兰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地理的阻隔和历史的原因，中东各国人民对于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甚至受了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影响，对中国还有许多不正确的认识，他们常常觉得中国的事情像一团雾，像一个万古不解的谜。因此只有站在一个穆斯林立场上向自己的“多斯梯”（兄弟）介绍情况，讲述中国的历史，讲述中国穆斯林与中东穆斯林的血缘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让人家认识你，了解你，对你产生兴趣，然后才能关心你的现状，关心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穆斯林的危害，才会同情你，援助你。因此，达浦生又重返埃及，到开罗的乡下居住，闭门谢客，潜心著述，用阿拉伯文撰写一部《告世界回教同胞书》，详述近六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史实，以及当前中国穆斯林和各族人民英勇抗日的情况。1938 年 5 月该书刚脱稿，就在开罗《金字塔》等报刊上被介绍，对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呼吁全世界穆斯林支持中国抗日战争起了很大作用。埃及群众纷纷购买此书，这本书后来加印了五千本，分别赠给阿拉伯政府要人和新闻界。

达浦生从埃及返国途中经过印度，在孟买继续宣传。当时印度各族穆斯林有八千万，居全世界第一位，在印度穆斯林中寻求对我国的支持当然是很重要的。达浦生事先为这次宣传工作做了认真准备，因为他不懂英语，所以从埃及动身时，即

邀请精通英语的爱资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部部长沙国珍一同前往，担任翻译。达浦生在印度出席大小欢迎会9次，不仅得到穆斯林群众的支持，而且博得广大印度教徒的同情。印度人民本来对援华抗日运动就很热心，曾派出一批医疗队员直接为中国抗战前线的将士服务，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柯棣华大夫，就是援华的印度医生之一，由于艰苦的生活和忘我的工作，他后来牺牲在中国，但获得世世代代中国人民的敬仰。同时达浦生他们还将中印两国国旗合制为一，举行募款义售，共征得捐款30余万元，印度友人即用此款购买救护车赠送我国。印度国父、国会反对党著名领袖甘地先生，当时就是印度援华反日运动的主持人，只可惜他当时不在孟买，达浦生没有见着他。当时印度的回教领袖是民族会会长穆罕默德·阿里·真纳，他后来成为巴基斯坦的国父。达浦生曾与真纳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赠给他《告世界回教同胞书》。真纳对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表示钦佩，并答应将该书译成乌尔都语和印地语让印度人民得以了解，同时，他将为中国继续募集救济款项。为了表示信守自己的诺言，真纳将上述事宜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最后还提出将组织团体到中国慰问。

离开印度后，达浦生又在东南亚主要的华人居住地区新加坡等进行了抗日宣传。最后于1938年8月返回国内。因日寇占领上海，他就直接到了武汉，以后将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迁到甘肃平凉继续办学，并改名为私立伊斯兰师范学校(后改为“国立陇东师范学校”)，仍任校长，一面从事回民教育工作，一面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二)争取舆论奔赴中东 “访问团”使命图救国

抗日战争是中国全民族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不仅有中日双方武装力量的较量，而且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外交诸方面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中国人民是否能争取最大多数的同盟国站在自己一边，扩大国际同情援助，对抗战前景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刚开始就在著名的“十大救国纲领”中明确号召实现“抗日的外交政策：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互助协定”。这样，中国穆斯林不仅在前线与各族群众一起与侵略者进行英勇的生死搏斗，涌现出像回民支队那样的光辉典范，同时，在大后方的“许多回族与回教的先进青年及青年志士则组织回教近东访问团、甘宁青救国宣传团……从事唤起回民一致团结参加抗战及国际反日援华的工作”(《回回民族问题》第92页)。自全面抗战发生不久，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即考虑利用穆斯林的传统友谊这层特殊关系，组织团体赴中东、南亚宣传。其目的是：第一，把日本军国主义残害回族人民的罪恶公诸于世，以唤起各国穆斯林对中国抗战的关心；第二，同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各民族的阴谋作斗争，撕破敌人“尊崇回教”的伪善面目，并让世界穆斯林了解中日争端真相，明辨是非；第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东和东南亚的野心；第四，呼吁亚洲各国人民团结一心，粉碎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扩张政策，及其勾结德、意法西斯瓜分世界和称霸亚洲的国际阴谋。

1938年1月，以王曾善为团长，由马天英、薛文波、张兆

理、王世明等一行五人组成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首先趁“大朝”来临赴麦加完成朝觐天命，又依次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印度和土耳其等8个国家，为时一年，行程逾万里。启程前，发表了《宣言》，其最后部分称：“本团谬荷国内各回教团体推举，访问近东回教各国，宣布暴日侵我国土，欺瞒回民之真象，与我国全民抗战之经过及决心，使命致重，深惧不克负荷，谨当勉竭智能，努力以赴，期不负我国全体回民之付托。”

“访问团”在香港候船出国期间，受到当地中外穆斯林的欢迎。香港伊斯兰博爱社、伊斯兰学校及清真寺分别举行了两次欢送会，祝贺“访问团”出使成功。“访问团”乘法国“大德能”号轮经西贡抵新加坡，在西贡华侨区，见照相馆陈列着中国抗战名将肖像，并加以放大着色，书铺内也摆放着各种中国抗战杂志。而一抵新加坡码头就受到当地多家报纸的采访，并被告知：自抗战以来，仅新加坡一地华侨，已向祖国捐款一千万，购救国公债二千万，以当地人口平均，每人负担约10元。华侨的爱国热情，使“访问团”成员深受鼓舞，他们在船上剪贴了12份新闻剪报，分为国政、敌情、战报、舆论、外交等门类，并起草了《告世界回教同胞书》，讲述了中国与近东穆斯林之间的历史联系；日本侵略之实现与中国人民抗战之决心；中国穆斯林参加抗战的情况；希望世界穆斯林予以同情与援助。轮船经科伦坡、吉希提后，于1938年2月3日抵达埃及的苏伊士，并立即转船赴吉达。在专门送哈吉的朝觐船“考赛尔”号上，他们遇到了达浦生教长和陪同前往麦加的马坚。但也遇到了一个身份可疑的日本人铃木刚。据了解，1937年初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去麦加朝觐时曾先到埃及短访，当地报纸把他

描述成“中国回教之爱米尔”，引起埃及朝野注意，以为马麟是中国穆斯林领袖。因此这个日本人铃木刚专程去麦加拜访过马麟，奉赠精制银餐具一套及各种日本画册。当时中日战争虽未爆发，但“九·一八”以来两国关系日益紧张，所以马麟左右为难，思忖以后，只收下画册而退回银餐具，另回赠麝香以堵其嘴，以后不再答理。不料数日后铃木刚又来诱使马麟摄影留念，后来由留埃中国学生部部长沙儒诚出主意推辞，意思是中国穆斯林不习惯照相，恐怕留下形象后影响信仰，这样才好不容易把该人拒之门外。此次沙儒诚陪访问团前往麦加，在船上又与铃木刚照面，只见此人面色沉寂，垂首无语，显出极不自然的神态，因此更引起中国哈吉们的警惕。但是同船的还有一大批埃及大学及爱资哈尔大学学生，他们看了《告世界回教同胞书》英文稿后，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极为愤慨，扼腕不平，甚至有的学生愿意去中国参加抗战，而为弱小民族吐气；还有的学生则自愿将其译成阿拉伯文，并要求在开罗伊斯兰报纸上披露。

“访问团”抵麦加不久，就听同年来朝觐的甘、宁、青穆斯林哈吉介绍，据他们和当地人士接触，有的阿拉伯人已受日本欺骗宣传影响，因而嘲讽中国反抗日本侵略，不啻以卵击石。这些同胞表示，未当亡国奴，其滋味已很难过。“访问团”一面对同胞们加以慰藉，一面感到身上肩负的担子越来越重要。因此等朝觐功课一结束，他们就挨着到各国朝觐者营地分发宣传材料，进行情况介绍。然后，拜访了沙特财政大臣阿卜杜拉·苏莱曼，该大臣表示：朝觐“之用意，主要者乃为世界回教民族之聚会，各将其成败得失，互表衷曲”。又认为“贵国为多数民族缔成之国家，”“在国家之立场，仍须与其他非回教民族

团结”。该大臣还表示："以国家之感情论，因中国有许多之穆民兄弟，故敝国极为同情"，并希望中国货物多多运来销售。因为沙特工业不发达，只有销售日货，如果进口中国货，抵制日货会更有效。访问团还两次晋谒了沙特国王。第一次因人多，只是履行了礼仪。第二次是单独接见。"访问团"代表先致词："余等谨代表中国回民各团体向国王说'赛俩目'。阿拉伯为世界回教之中心站，旧邦所在，典型俱存。国王纲维政教，厥功甚伟，敬礼国运昌兴，王躬康健。"然后简述了中国抗战情况。国王询问了访问团的使命并表示赞赏："中国之坚韧抗战，颇予阿拉伯人民以极度兴奋"，"爱国御侮，实为回教人民的天职"，"君等远来敝国，极为欢迎。关于中日战争，余知之良稔。此若干之穆民弟兄，在恶劣之环境中过活，心尤感痛。敝国对中国极为同情，然无实力之援助为憾"。国王还表示要亲自为中国穆斯林的胜利作祈祷。

"访问团"在麦加时，有幸瞻谒了克尔白天房内部。当时的天房由专人掌管大门钥匙，他们世代承袭，以此作为一种生活来源。开克尔白门时，司门者盘膝坐在门口，入内的人都先向他缴"乜贴"。天房内部不算大，因为石墙很厚，四壁的上半部都用花缎布掩盖，下半部为各种质地和颜色的美丽石块，上面刊刻着样式古朴的图纹和阿拉伯经文，因为人人都去抚摩，所以光滑晶莹。天房内还有三根立柱，质地坚硬，木刻精美，走近时可以闻到一股异香。木柱之间挂着链索，上面系带着用各种金子、玉石制作的古代阿拉伯香炉与灯笼。站在天房之中，哈吉们个个觉得尘虑俱消，一种神圣的感觉笼罩着心头。"辞朝"的日子到了，"访问团"和所有来朝觐的中国甘宁青哈吉同时到天房西南作聚礼祈祷，又由"访问团"成员向国内教友讲

述了中国抗战形势及穆斯林应作的努力。然后由当地领朝人率领，且行且诵，绕天房7圈，再祈祷。在告别天房之际，中国甘、宁、青等省的哈吉们想到此刻国运多蹇，山河沦陷，同胞遭殃，无不泪水纵横，不少人大哭失声，在心中祈求真宰对中日两国显示公道。“访问团”成员深受上述场景的感染，自天房归来，一路无语，抵住所后，同样悲不自禁，连房东也为之伤怀终夜。

“访问团”完成朝觐功课后立即赶往埃及。在船上，他们发现一个在麦加给铃木刚做翻译并身着阿拉伯装束的日本人，此时又改穿西装，戴上红帽，装扮成埃及学者，和铃木刚凑在一起鬼鬼祟祟，真叫人痛恨又可笑，使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背后跟踪窥测更加提高了警惕。

3月9日，“访问团”抵达埃及．因为埃及是阿拉伯地区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所以他们在那里逗留了两个多月。他们在开罗先后拜访了国务总理穆哈麦德·马贺默德、宗教部部长穆斯托发·阿杜来则克、教育部长海克里巴帅、世界回教青年会会长哈密得萨，爱资哈尔大学校长麦拉艾及埃及妇女协会会长沙拉威夫人等埃及上层，均受到同情和欢迎。他们还先后出席了世界反侵略大会埃及分会会议及亚历山大中国救亡宣传大会。埃及国王法鲁克的堂叔，曾一度担任过摄政王的穆罕默德·阿里亲王两次接见了“访问团”成员，还邀请他们到亲王府邸进行“主麻”聚礼并破例和全体成员摄影留念。“访问团”还应开罗市长邀请参加了“恭送天房幔帐复命礼”，即迎接恭送天房幔帐的仪仗队员返回埃及，在盛大典礼进行过程中，穆罕默德·阿里亲王又从观礼台中把“访问团”成员请上检阅台，一一介绍给出席盛典的埃及显贵，并对他们的光临表示感

谢，从而引起所有到会者与新闻媒介的关注。

"访问团"的成功活动，引起日本驻埃及使馆的恐慌。他们派人到埃及回教青年会作反华宣传，并以挑衅的口吻责问："贵会抛弃宗教立场，同情中国乎？同情日本乎？"回教青年会会长明确答覆："同情中国。"日本人又追问："为什么？"埃及朋友的答复为："因中国为被侵略者。"日本人只好悻悻而去。还有一位埃及学者开始嘲讽过中国抗战，经过多次接触，他向"访问团"表示："埃及人受日本之宣传，致有偏见，颇同情于日本。自贵团来埃，向各方宣传后，大部人士已更改其观念，转而同情于中国，余正其中之一人。"在埃及小说家迈哈慕德·帖慕尔伯克家中举行的一次茶话会上，一位埃及诗人布尼马哈慕德咏诗道："同教的弟兄们，欢迎！欢迎！/诸君到处都受教胞的欢迎！/我们是诸君的亲眷，/诸君当自由享受，如在家庭间。/诸君为渴望所驱，不辞万里征程，/我们为诸君所感而充实了满腔热情！/我们已将双方的渴望相糅合，/犹如那双双的斑鸠，一唱一和；/我们已将双方的心弦相联络，/宗教的情操，要使这维系，永不解脱。无论居住何方，都是骨肉，/我们在伊斯兰的旗帜下，互助和睦；/我们中间虽有语言的障碍，/然而《古兰经》使我们互相了解！/我们中间虽有种族的差别，/然而同一的信仰，不愿我们离析。""中国的教胞们呀！请指教一番：/贵国的精神与武力，究竟怎样！/我们为两种情绪所争夺，/我们十分痛心，同时又不胜快活；/每念贵国所遭的凶厄，/不禁终夜在烈火上，辗转反侧！/幸与诸君聚首一堂，获得几分慰藉；/再闻诸君的种种希望，不觉欣然大喜。""祝中华民族万岁，以彰回教'以杀止杀'的主义。"

5 月 18 日，"访问团"抵达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地穆斯

林代表乌默尔贝乘小舟亲自上轮船来迎接，并很快引他们拜访了宗教领袖托菲克哈里德“穆夫提”。“穆夫提”要手下人员对“访问团”活动提供各种方便。20日是聚礼日，“访问团”和当地穆斯林共同礼拜后，寺上的伊玛目在讲瓦尔滋时，专门介绍了中国客人，并说：“世界回民乃为一体。中国回民所受痛苦，我等亦如身受之。中国回民已受日本人之压迫，但未屈服，正自拼血肉为真理而抗战，我等应为同情，应祈祷真宰祝其成功。”言毕就率领礼拜者捧手作祈祷。然后，又邀请“访问团”成员作中国抗战御侮情况报告，听众情绪十分激昂。以后，在会晤一位巴勒斯坦大教长时，他得悉中国各族人民为了抗日而团结一致时感慨地说：“中国之回民，与非回民合作，此现象良佳，不特合于宗教，实亦为今日政治上需要，诚如此，正足以加大反抗侵略者之力量也。”

5月24日离开黎巴嫩，“访问团”即乘汽车向东去叙利亚，当天抵达大马士革。次日他们拜会了范贝尔德议员。议员自告奋勇为“访问团”安排日程，并给予种种关照。当晚，本地穆罕默德青年会会员30多人来访问，交谈了彼此情况，他们表示早从埃及报纸上知道了“访问团”来的消息，十分欢迎。26日，“访问团”应邀去叙利亚国会旁听，中午又有伊斯兰教老学者登门拜访，下午又去当地回教正道会去参观。当天17点，“访问团”成员在伊斯兰学校演讲“访问团”使命与中国伊斯兰教，听众有千余人，掌声不绝，无一早退者。27日，他们又去欧麦爲大礼拜寺作聚礼，当地穆斯林知道客人来自远方的中国，就把他们簇拥起来表示欢迎，以致于要招呼警察来维持秩序保护。礼拜完毕，寺上教长向上万名礼拜者介绍了“访问团”情况，并请王世明作了讲演。听众情绪高昂，甚至有人感动而流

泪。演说后，“访问团”成员立于门旁，与上万名礼拜者一一握手，说“赛俩目”，气氛之热烈，超过了出国以来任何一次活动。

驻贝鲁特的日本领事听说“访问团”已抵达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就专门跑到叙利亚搞破坏，面见总统要求将“访问团”五人驱逐出境，并到处搞煽动制造谣言。但是叙利亚总统不光没有听从日本领事的蛊惑，反而亲自接见了“访问团”，并表示“中国教民不惮烦苦访问敝国，倍觉荣幸。此事实为创举，殊可纪念”，“中国近数十年之努力，颇惊人发展，日本领事且谓：‘中国非昔日之中国’，是可证明吾视中国之前途发展无穷。中国有如此多量之回民，在过去因交通梗塞消息阻隔，与各回教国彼此缺少联络，以后正应着手于团结之工作”。在大马士革，“访问团”又进行了 4 次讲演，并访问了报馆、大学等机构，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同时，还受到官方的热情照顾，他们在旅馆的宿费就全由政府支付。“访问团”5 月 31 日离开叙利亚时，许多团体的名人都纷纷为其送行。

6 月 1 日，“访问团”来到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刚下车，就受到内政部宣传司长的欢迎。2 日，他们拜访了国务总理遮密鲁贝。该总理“辞色殊不骄人”，与他们“纵谈甚欢”，认为“访问团”是远东来的穆民弟兄，故表示钦佩及慰问，有什么事要办不必客气。“访问团”还拜访了伊拉克内政部长、教育部长和巴格达省省长，态度都很热情。在伊拉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访问团”在巴格达大礼拜寺和伊斯兰教青年会都发表了演讲，并和当地名流进行了多次会晤、聚餐，赢得了各界人士的好感和同情。

6 月 9 日上午，“访问团”乘伊朗旅行社汽车去德黑兰，10 日抵达伊朗首都。第二天，他们先去外交部拜访，有一位欧斯

达文科长曾在中国担任过总领事，对他们的来访表示惊奇，但愿意帮助办理一切手续。12日，拜会了外交部第一司司长号马耶目。该司长表示中国之抗战精神，为伊朗举国所钦佩，他自己很愿意与中国人交朋友。13日“伊朗日报”主笔穆芝得马凯尔来采访，并为“访问团”照像。后来，“访问团”又拜访了其他报界人士。由于该国集会结社限制很严，“访问团”的活动也比较谨慎，主要是与宗教界、学术界人士进行个别交往，并参观了一些清真寺、宗教学校及国会。后来，他们经伊斯法罕、阿巴丹等地，从布施尔乘船渡波斯湾前往印度。由于政府来电报关照当地官厅，所以出境手续十分顺利，警署还派2名警察前来保护。

6月29日，轮船抵卡拉奇，“访问团”下船休息，与当地穆斯林交谈中日战争，发现他们对中国多予以同情。7月2日船靠孟买，中国驻孟买领事和华侨前来迎接。7月3日中午，“访问团”前去与印度穆斯林领袖真纳会见，他对中国客人表示热诚的欢迎。当时处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印度民众十分同情中国抗战，认为中国是为真理与和平而奋斗，是弱小民族自拔的先驱，因此不仅舆论方面表示同情，还在经济及医疗方面提供援助。印度民众还把7月的7、8、9三天定为中国日，专为同情中国及宣传揭露侵略者的暴行，并举行募捐。“访问团”抵孟买不久，就参加了圣雄甘地领导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于7月8日上午举办的中国日纪念会，会上演说的人一致拥护中国抗日，痛斥日本侵略罪行。次日，“访问团”又参加了印度回教党组织的欢迎大会，与会者有五千余人，由后来成为巴基斯坦国父的真纳先生任执行主席，群众的热情程度不亚于大马士革的穆斯林。7月10日下午，“访问团”又出席了真纳先生

举办的回教党茶话会，出席的400余人都为穆斯林显宦名流。真纳以鲜花圈分别套置于中国客人头颈以示欢迎。"访问团"成员薛文波曾在《从印度回教徒一致反日说起》一文中对上述欢迎大会作了生动的描述："一次盛大欢迎会，五个中国的回教青年，都是红帽黑衣装，走进会场里，掌声雷也似的鼓动；颂'赛俩目'（问安）的声浪充满了四壁，我们左右的顾盼，黑鸦鸦之一片，只见无数的红帽和白帽的摆动，走了许久，才到演讲台上来。"据薛文波文章记载，真纳在那次集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战斗，有五千万弟兄们是其中的战斗员（按：这是建国前对中国穆斯林人数的一种大略估计），我们得到安慰，我们的精神，已贯注到中国教胞身上，我们同情中国的抗战。"真纳的这几句话，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下面呼声重新震荡起来。访问团在印度驻留宣传的时间特别长，前后约3个多月，先后访问了拉合尔、加尔各答、勒克瑙等城市，均得到当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支持。在此期间，"访问团"又收到一笔国内汇来的经费，这样他们又于10月中旬启程西去土耳其宣传。

10月24日，"访问团"乘船抵达伊斯坦布尔。稍为休息，又于26日乘船去安卡拉。28日是土耳其国庆节前夕，"访问团"在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童代办陪同下晋谒了外交部长鲁斯梯阿拉斯。该外长开始对中日争端不太明了，认为"中日同文同种，不应作此长久争执。""访问团"作了解释后，该外长又表示："中国之抗战精神，甚可钦佩。"次日正值土耳其国庆，下午"访问团"受邀请观看了阅兵式。不久，土耳其《乌鲁斯报》刊登了"访问团"介绍该团组织宗旨及经过的谈话，而《谭报》除披露访问团的活动情况外，还配发了同情中国抗战的长

篇论文。而伊斯坦布尔的《旦报》还出版了介绍中国抗御侵略的专刊。一时间,采访的记者纷至沓来,而正借助于土耳其新闻媒介的帮助,“访问团”的声势得以扩大,来访的土耳其名流亦络绎不绝,表现出该国名众对中国的关心与重视。“访问团”也印刷了土耳其文宣传品向各界散发。面对“访问团”的积极活动,日本驻土耳其大使馆事先已召集该国驻中东各国领事进行过反宣传的讨论。“访问团”抵安卡拉后,在土耳其国庆招待会上,日本驻土耳其大使对意大利大使发牢骚说:“何来中国之回教近东访问团?何来中国之回教代表?实则乃反对余等之国家者!”意大利大使见苏联大使就在旁边,知道苏联同情中国,因此不敢吭声。这个情况后来被当地报纸当作消息登出,在土耳其社会传为笑谈,大家都讥笑日本大使的庸人自扰。本来“访问团”要继续开展工作,不料11月10日土耳其总统凯末尔突然病逝,举国上下一片悲痛,他们于15日前往其设在伊斯坦布尔的行宫举行了吊唁,因凯末尔总统即病逝于此宫。在与伊斯坦布尔的一些土耳其友人会晤后,“访问团”于11月18日乘罗马尼亚客轮经雅典、海法东归,并于1939年1月转辗回到重庆。

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先后访问了8个中东和南亚国家,此外,曾在巴勒斯坦的海法港临时登陆宣传。除拜见各国政要外,又会晤了各界名流60余人,出席欢迎大会19次,宴会和茶话会23次,和11个重要的党派团体进行了交流,参观了18个高等学校,发表公开演讲43次,还以阿、土、英三种文字编写了《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告世界回教同胞书》,并在国外报刊如《埃及邮报》、《贝鲁特日报》、《伊朗日报》、《伊拉克泰晤士报》、《印度星报》、《孟买新闻》等上面发表了宣传文章。中国

近东访问团的出访活动，被后人长期称道。

1939 年 10 月，新疆穆斯林人士马赋良等二人又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名义，组团前往麦加朝觐，并到中东各国进行外交联络。行前，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托他们携带《告世界回教同民胞书》前往海外散发。他们出访的国度，与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基本一致，只是增加一个阿富汗，并且二访印度，前后历时 1 年半，是历次出访宣传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约在 1940 年 6 月返回重庆。

他们首先赴印度会晤了穆斯林领袖真纳等人，然后又与甘地等国大党领袖进行会谈。印度各大报纸都转载了他们带去的传单。然后，陆续前往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德、德里、虎克诺等地组织宣传。在拜会印度诗坛泰斗泰戈尔时，泰戈尔表示："中国是文明古国，是很伟大的，日本绝不足以征服中国。在亚洲，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最密切，痛痒相关，我绝不希望我的兄弟打败仗，更不愿意日本打胜仗。你们替我转达前方的英勇战士，叫他们千万不要打败仗，那不只是中国的损失，而且是印度的损失；不只是印度的损失，而且是世界爱好和平人类的损失。中国的胜利，就是全亚洲人的胜利，全世界的胜利。"

结束在印度的访问后，两人转赴麦加，正值本年度的朝觐季节，他们与留埃学生组成的"中国回教朝觐团"与我国西北回胞朝觐团相聚，顺利完成了天命功课，并与日伪派出的"华北回教朝觐团"展开斗争。1938 年 5 月他们又从埃及到达土耳其，会晤了该国总理、外长、议长等朝野要人，还破例参观了兵工厂、飞机制造厂等。正打算离开，外交部说总统 3 日后即回首都，挽留他们晤见总统。果然，伊斯梅尔总统一回安卡拉即邀请二人至官邸叙谈，彼此不受外交礼节约束。由于总统耳

朵失聪，每当听及介绍中国消息时一再要求："请大声！请大声！"总统还让秘书取来中国地图，要求按图解释，边听边颔首。这次会晤约两个小时，最后总统表示："以中国之大，全民之团结，日寇必被扫荡，中国之复兴，绝无问题。中土两国分居亚洲之两端，实在有进一步往来之必要"。到次年年末，土耳其派出的第一任驻华公使席拔希即抵达重庆就职。

从伊斯坦布尔启程后，他们又先后访问了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所到之处均受到热情接待。如阿富汗国王往常除接受国书外，从不会见外宾，这次打破惯例接见了他们。叙利亚的报纸在听取他们宣传后，于显著位置刊登消息，并呼吁："叙利亚穆斯林应随时勿忘日本飞机轰炸下的中国兄弟，对日本应作有效制裁。"最后，马赋良等重访印度西北各省后，自印度返回国内。

(三)留埃学子正气凛然　忠奸显形麦加城下

在中国历史上，回回民族不仅以其勤劳勇敢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宝库，同时，还以其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彪炳史册。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开始，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的回族同胞，与各族群众紧紧团结奋战在每一条抗日战线上，成为保家卫国的先驱之一，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其中，1939 年朝觐季节发生在麦加城下的由留埃及学生组成的"中国回教朝觐团"与日伪"华北回民朝觐团"之间的斗争，就是一场爱国与卖国、侵略与反侵略的政治交锋，一场正义与邪恶、真诚与虚伪、事实与谎言、纯洁与龌龊的灵魂搏斗。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依靠它的军事力量大肆进攻，同时还在政治上采取“以华制华”的恶毒方针，尽力挑拨和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寻觅与制造为它所能利用的工具与傀儡，以实现其灭亡的野心。其离间手段之一，就是鼓吹成立“回回国”，妄图分裂回族与其它兄弟民族的关系，并首先在沦陷区建立起亲日的组织。1938年2月7日，日寇利用个别甘心附逆，认贼作父的回族败类如马良、王瑞兰、刘全保之流，在北平成立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其口号为“主张日满提携，打倒万恶共产党”，接着又胁迫华北各地清真寺各自组织分会，并一概配置日籍顾问。

日伪在沦陷区的倒行逆施，自然遭到国内外爱国进步舆论的揭露和谴责。为了掩饰自己的侵略手段，并开展拉拢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外交攻势，从而进一步孤立中国抗日力量，操纵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的日本顾问，遂计划利用1939年朝觐机会，向聚集在麦加的各国穆斯林进行欺骗宣传，以达到一箭三雕之目的。为了掩人耳目，日方高垣顾问对组织“华北回民朝觐团”的人选，曾煞费苦心，最后选定由伪“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总务部长唐易尘、委员刘德润、“日本顾问附”马良璞及来自包头和阿拉善旗政治色彩不明显的张英和苏瑞祥两位阿訇共5人组团。据唐易尘在《麦加巡礼记》一书中记述：“余于民国二十七年冬，充任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总务部长时，关系当局（编者按：指日伪政府）有赞助朝觐麦加之动议，余与高垣顾问，遂对人位推定，加以慎重之铨衡。盖此行之目的，必先明了，否则人位不当，影响将来。”事后，尽管某些当事人竭力否认此行曾接受日方给予的政治使命，并表白自己的清白无辜，但所谓“华北回民朝觐团”确实系受日本侵略者指派和包揽经

费这一事实却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而其出行的恶劣政治影响，也是有关当事人难辞其咎的。别的姑且勿论，就从他们所带行囊的丰厚程度来掂量，他们也不同于普通的中国“哈只”，而显示出有“后台”撑腰的复杂背景，从中可以窥见日本侵略当局对这次西行游说活动投资不小，期望甚大。

1939年，对于留学埃及的28位中国回族青年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年份。2月18日，他们突然接到重庆“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唐柯三、孙燕翼、达浦生、马松亭四位先生联名发来的电报，要他们全体学生立即组织“中国回教朝觐团”赴麦加，以便为国家作广泛的抗日宣传，同时监视“华北回民朝觐团”。当时，离最后一期朝觐班轮起程只差5天了，而5天之内又有主麻聚礼日和星期日，海关实际办理手续的时间只剩了3天，但留学生们深受此次朝觐重要意义的鼓舞，一致表示要如期出发，并连夜召开会议，讨论了工作计划，推举庞士谦、马坚为领队。在中国驻开罗领事馆的帮助下，在短短的3天内，留学生们办完了检疫、办护照及复杂的海关手续，并设法买到半价船票。他们还拜访了正在开罗逗留的沙特外交大臣法索莱，经他批准，减少了在吉达收取的关税。启程前，中国驻开罗领事备茶点为同学们饯行，赠“和衷共济”四个字以资勉励，并集体摄影留念。2月23日晚，28名意气风发的留学生打着“中国回教朝觐团”旗帜，登上了开往麦加的“渗渗泉”号朝觐班轮。

一到船上，留学生们即在各舱室的各国穆斯林朝觐者中开展工作。一边散发传单，一边作口头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穆斯林的暴行，以及欺骗世界穆斯林的毒计。旅客听了十分动容，不明白的还继续发问，留学生们一一给予明确

答覆。留学生们发自肺腑的爱国热忱，使各国哈吉深受感染，同船旅客一起捧手诵念《古兰经》首章，为中国人民祈祷，其悲壮场景催人泪下。在船上，中国留学生还拜访了爱资哈尔大学朝觐团，以资联络、互助。后该团团长及三位筛海前来回拜，叙谈之余，为中国回教及中国抗战再作祈祷，诚挚之情不可言喻。

留学生们于2月26日抵达吉达，只见这里市场日货充斥，就是念经用的"太斯比哈"(念珠)，许多都是日本制造的，还有各种彩色手巾。日本为扩充市场，发展海外贸易无所不用其极的事实，更使留学生们产生了爱国警觉。当晚抵达麦加，一到那里他们即与先期到达的以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名义朝觐并访问中东的新疆穆斯林马赋良等及西北回教朝觐团的人员取得联系，并告诉他们留学生朝觐团此行的目的，大家一致表示共同对敌，决不能让日伪派遣的"华北回民朝觐团"的阴谋得逞。

2月28日晚上，伪"华北回民朝觐团"五人也悄然溜进了麦加，他们还以为处在这十几万各国朝觐者当中，根本不会有人认识和注意他们。但当向导把他们直接带到一处旅店，而根本没有问他们想住哪儿，好像预先有人作了安排的时候，就开始紧张起来，忙向向导打听缘由，向导解释说，早就有人替他们订好了房间，他们更大吃一惊。等到一群留埃学生站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什么都明白了，知道自己从此将处在怎样的一种环境中。其实日本侵略当局炮制的"朝觐团"刚在国内开始行动，就受到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抵制，他们藉口大使现在重庆主持工作，留守南京负责馆务的参赞没有见过日伪北平警察局发放的"出境证明书"，所以拒绝在护照上签字，迫使唐易尘一

行改变经埃及转船去吉达的传统旅行路线，也放弃了在埃及进行活动的计划。1938年12月初，唐易尘等从北平坐火车抵沈阳，转道大连到上海，在北平、大连均有汉奸和日方人员送行。然后搭乘意大利邮船“康特罗素”号抵达埃塞俄比亚的玛撒洼港，再设法渡过红海，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才抵达吉达港。他们刚抵上海，就有新闻界根据北平来电，派记者寻找其下落，并打听他们所负的使命，搞得唐易尘等十分紧张。在他们逗留上海的十多天里，又差不多每天都接到恐吓信，并有人监视他们的行动，使他们更为害怕，几乎天天都搬迁旅馆住处，后来竟不敢在公共租界住了，在一天夜里偷偷迁入法租界隐匿起来。直到登上“康特罗素”号轮船驶离上海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该团的刘德润当即告诉其余四人：“现在我们上了船了，说出来也不要紧了，我们五个人在上海这十几天，是很危险的。因为上海租界里，还有很多的秘密机关，他们说听我们去麦加认为有特殊使命，所以我听说他们对我们有些不谅解，我每天心里都捏着一把汗。”在他们的神经还没有完全缓过劲来时，船已抵达新加坡，刚要下船观光，就有《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的两位记者挤上船来采访，述说他们接到重庆国府的电报，认为五人“负有使命到麦加作宣传”，要唐易尘等说明白去麦加的目的，以便向公众交代。唐易尘等十分紧张，只好搪塞一番，同时又藉此机会替主子表功道：“要使各地教民们知道，华北地方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我们可以出来作朝觐，这正可以和新疆共产党残害朝觐团来作对照的。”此番捏造事实的谎话实际上完全暴露了他们这个“朝觐团”的真实面目。

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刚踏上麦加土地，即处在中国留学生的包围之中，他们顿时万分惊慌，唯恐留学生对他们采

取什么行动。留学生领队庞士谦当即警告他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检点自己的行为，不准做有损国家的事。有的留学生一见着这几个人就怒火中烧，甚为憎恨，主张痛打他们一顿；还有的甚至主张杀了他们。但由于大家身处圣地麦加，朝觐期间又是严禁打架斗殴的，更不用说是杀人了。所以留学生们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方式，做宗教功课时与“华北朝觐团”的 5 人同时出同时进，对他们的言行严加防范，不给他们丝毫从事阴谋活动的机会。本来这 28 名爱国学生已使“华北朝觐团”的成员难以对付，再加上当年西北回教朝觐团的众多爱国哈吉及马赋良等人也纷纷来到麦加，更使他们一筹莫展、惶恐不安。

在做完礼拜功课后，留学生们逼迫他们交代此行的内幕。在这些正气凛然的爱国青年面前，“华北朝觐团”的成员不得不承认这次行动是日寇出了 15000 元钱，叫他们借朝觐之名为敌张目，他们携带的大批礼品是准备趁朝觐之机进行拉关系的。送礼名单上包括沙特、埃及、土耳其许多朝野要人。礼物中有贵重的珍珠项链，上好的丝绸、茶叶、手镯等，在沙特海关入境时，由于东西太多，海关人员甚至认为他们是做买卖的，曾一度扣留。留学生们对他们再次严厉警告，不许他们单独出外，更不许他们以伪组织名义到处活动，为虎作伥。当时监视之严谨，甚至连他们上厕所都有人跟着。有一次唐易尘和马良璞出去散步，留埃学生熊振宗一直跟踪着，他听到唐尘易对马良璞说：“我们这回真倒霉，随时随地都有人监视着，真是不自由！”说完两人直叹气。

3 月 4 日，中国留学生集体晋谒沙特国王，当时在位的沙特国王为伊本沙特。那时的沙特很穷，国王在米纳的行宫，通共设有二十间房，四周围是各大臣的帐篷，行宫的前面是一条

大路。而国王的皇宫，座落在麦加城的郊外，也是一座楼房，宫门朝南，有十几位卫兵站岗，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门卫并不盘查。王宫客厅靠墙四周都是用木板做的床，上面放了褥子和靠枕。这就是所谓的沙发，都很破旧，根本谈不上富丽堂皇。同学们的印象是，王宫客厅的布置还不如国内小财主家的陈设。国王尚且住如此宫殿，可想当时沙特百姓的生活是怎样的贫困了。同学们推举马坚为代表向沙特国王诵读贺词，并说明中国穆斯林一致拥护抗日的立场，希望沙特国王陛下予我以精神上的同情。因为是礼仪式会见，时间很短，沙特国王没有作答词。刘德溜、唐易尘等虽也跟随接见，但并不敢暴露身份。他们所带的礼品，都被中国留学生以中国朝觐团名义转送沙特国王，沙特国王收下了礼物。

留埃学生朝觐团在监视"华北朝觐团"成员的同时，还抓紧一切机会进行抗日宣传。团员赵俊复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斥责侵略者侵华罪行的小册子，介绍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情形，散发后深受各国朝觐者欢迎，从而对我国穆斯林拥护抗战的情形，表示了深深同情与支持。由于沙特政府不允许朝觐期间在麦加公开搞宣传活动，因此留学生们主要是分头找各国的朝觐者作私人拜访，并把带来的宣传品拿到商店、茶馆、饭馆等通过交朋友等方式进行分发。只要有人想了解中日战争的真实情形，同学们就详细解释，并说明中国是为正义而战，为求生存而斗争，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是强暴残忍的侵略战争，必定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当来朝觐的各国穆斯林知道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残暴行为，尤其听到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真寺遭到炸毁，无辜教胞遭到杀戮时，都对我国深为同情，对日本侵略者表示憎恨，表示坚决拥护中国人民抗战

到底。

朝觐礼仪结束后，留学生们监督着刘、唐等人回到吉达港。大家经过讨论认为，由于对这批家伙监视甚严，所以他们未敢轻举妄动，但替侵略者效力毕竟是对国家与民族犯下了罪行。因此这些血气方刚的年轻学生都觉得不能就此了结，否则太便宜他们。虽然这是外国领土，不能随便采取什么措施，但应该再次对他们进行批判痛斥，让他们吸取教训，回国后不再做有损国家与民族的坏事。

3月10日下午两点，同学们为此举行了一次"鸿门宴"，饭罢茶毕后，这五个人就想溜，留学生那里能让他们逃脱呢。大家聚拢在一起把他们五个人围坐在中间，这种情形恐怕他们也有几分明白。当马宏毅把门、窗都用力关紧，屋子里顿时光线暗淡时，这五个人吓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以为关住门窗是要打他们一顿。但是留学生们并没有动手，只是严厉地教训他们："顾亭林曾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既说是诚实礼拜的回回，而且是有点知觉的回民，就不应该受日寇的指使而来替他们作欺骗教胞的工作。虽然你们说是哄骗日寇几个钱来朝觐，但你们却做了日寇的傀儡，而去欺骗国内外的无数教胞，对我抗战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同教，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改过自新，回国后脱离日寇，在可能的范围内为国家做点工作。不然的话，等到抗日军队收复北平的时候，你们就危险了。"定仲明同学则仔细给他们分析说："你们不是利用敌人吗？实际你们是被敌利用，日本只要轻轻在报纸上作点宣传，华北的回教都被出卖了，然后他们可以去骗回教世界。你们能否代表全中国的回教呢？至于说拿敌人的钱朝便宜哈吉（朝觐），这话更不必说。第一点，你们被敌人利用，你们对不起国

家，对不起全体回教，便宜在哪里呢？第二点，因为监视你们，致我们所耗费的经济，倍于你们的所得，假使把我们这次所耗费的款子，用于救国，这又是多么大的利益呢？我们为你们，全体动员，旷了一个多月的课，合计起来就是两三年，这又是多么大的损失呢？”有的同学说：“你们不改过自新，就是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日本人，也就是汉奸了。”其他同学更是冷嘲热讽。他们几个听了，汗流浃背。刘德润擦着头上的汗表示，回国后再不给日寇工作，他也明白，日寇统治的势力越稳固，他们也越受日本人的制约，而日后中国老百姓也不会轻饶他们的。他承认这次幸亏遇上的是爱国的学生和善良公正的穆斯林，不仅保住了性命，也使自己不致在叛国道路上走得太远。唐易尘也涨红着脸，双眼像哭丧似地变得通红，极力表白自己只是在北平办《震宗报》，从来也没反对过抗日，他的言论可从他办的报刊上得知。并一再表示回国后即不与日寇合作，并争取在一定范围内做点爱国工作。其他几个人也知道自己不表态是过不了这一关的，于是也纷纷下决心，做保证，不敢怠慢。这个伪代表团终于如丧家之犬掩丑归国，一场由日寇导演的闹剧也就以中国留学生大获全胜而收场。从此以后，日本侵略者再也不搞朝觐活动了。唐易尘等五人在回国时虽然没有和中国留埃及学生、西北回教朝觐团等人同行，但一路上仍然惴惴不安，生怕遇到意外。在回到上海时，五个人还分作两伙，不同住、不同吃，还装作不认识，主要也是怕爱国同胞严惩他们，所以这次西行对他们真是如同一场灵魂审判，根本谈不上作为一个哈吉所享有的荣誉了。

因为害怕，他们离开麦加时，连辞朝都没有做，真是狼狈不堪，失礼失节。而中国留埃学生则胜利完成了这次赴麦加的

两项使命，即履行宗教功课又监视伪"华北朝觐团"。在返航途中，他们仍然不忘自己的责任，抓住一切时机宣传抗战。因为在返回埃及的哈吉船上有两千多名乘客，其中有一部分是参加完朝觐回国的，而另一部分则是其他国家的旅客。这艘名为"快乐公园"号轮船，每天都邀请旅客在广播中讲演。3月16日轮到留埃学生组织的"中国回教朝觐团"演讲，由马坚播音，他首先讲述我国在远东及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其次说到中国回教的概况，介绍中国回教人民拥护抗战的情形及日本轰炸南北各省回民区域与清真寺的惨状，并揭露日本国内并没有回教，去年东京建筑礼拜寺，全是欺骗回教同胞的政治伎俩。最后引经典说明日本野蛮无理，必遭主怒，而中国站在正义一边，求生存的正当要求必然受到真主保佑。演说完后，全船掌声雷动。

这次留埃学生集体朝觐天房，可说是他们的一次意外收获。当时留学生的经费主要靠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津贴，外国留学生通常每月在3—20元之间，虽然我国的留学生比较受优待，一般是2埃镑，但这些钱只够他们的生活费，要想进行其他活动根本不可能。因此开罗比起国内来说距离麦加可谓"近在咫尺"，但对中国留学生来说去朝觐一次没有宽余经费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这次他们有机会顺利完成了巡礼麦加的天命，大概也是真主的一种有意安排或慈悯吧。

（四）中国哈吉齐声呼吁　巴勒斯坦应获和平

在历史上形成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争端，其核心问题是巴勒斯坦问题，一度是中东地区最难解决的一个问

题。赴麦加朝觐的中国穆斯林早在30年代前往巴勒斯坦地区访问时，就觉察到在帝国主义的挑拨下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之间的尖锐对立，并对此深为痛心，盼望有一个合理解决办法。40年代末一些大国提出巴勒斯坦分治计划后，中国穆斯林和朝觐的哈只也连续通过各种行动表示对阿拉伯穆斯林兄弟的声援。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爆发，大批巴勒斯坦难民被逐出家园，阿以矛盾日趋尖锐。面对阿拉伯民族争取生存权利的正义斗争，中国穆斯林始终给予坚决的支持，中国穆斯林朝觐团也曾会见过阿拉法特主席。事实证明，为了维护人类真理和世界和平，中国穆斯林朝觐者不仅为本国穆斯林的安危向世界穆斯林兄弟发出过呼吁，从他们那里得到过大量的精神和物质援助，而当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穆斯林兄弟遭到欺凌和杀戮时，他们也毫不犹豫地曾给予声援和支持。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祖先都是古代的闪族，他们都曾在巴勒斯坦建立过国家。公元前30世纪左右，原住阿拉伯半岛的闪族迦南人移居巴勒斯坦，因迦南人信奉太阳神"巴勒"，故把该地称为"巴勒斯坦"。公元前15世纪前后，闪族希伯来人出现在巴勒斯坦。公元前12世纪左右，摩西率领一批希伯来人从埃及逃回迦南。公元前1020年，希伯来人曾在巴勒斯坦建立希伯来王国。公元前925年，希伯来王国分裂为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太王国。犹太王国的人通称犹太人，以后凡希伯来人都称为犹太人。公元前63年罗马帝国占领巴勒斯坦，此后犹太人不断起义，均遭镇压。公元135年时，耶路撒冷和许多城市变成了废墟，大部分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到12世纪中叶，整个巴勒斯坦只有1400多名犹太人。阿拉伯民族发源于阿拉伯半岛，7世纪时阿拉伯人不光统一了整个

半岛，还征服了欧、亚、非三洲的广大地域。公元636—1099年时，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帝国的一个行省。阿拉伯人的移入和当地居民接受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形成了今天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11—12世纪，欧洲十字军占领巴勒斯坦，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击败十字军，巴勒斯坦由埃及管辖。1516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巴勒斯坦。从19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日趋衰落。1815年，巴勒斯坦在埃及总督阿里管辖之下，当时巴勒斯坦的主要居民是阿拉伯人，犹太人只有三千名。

19世纪末开始，在欧洲犹太人中兴起了犹太复国主义，1897年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提出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犹太人之家"的方案。英国于1917年占领了巴勒斯坦，同年11月2日，英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宣言，声称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次年6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表示赞同。于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量涌入巴勒斯坦，使当地的犹太人从1918年的5万人增至1948年的60.8万人，约占巴勒斯坦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导致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不断发动流血冲突。1932年赵振武与马松亭赴麦加朝觐前访问耶路撒冷时，曾去哈里洛城晋谒伊卜拉欣圣人和圣后萨拉的坟墓，就听当地人说以前该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大杂处，这几年来"回犹争执剧烈，到处相杀，这城中的犹太人便在这种互杀中绝迹了"。正因为两族矛盾如此尖锐，所以赵振武等乘阿拉伯人开的汽车时，虽"昏黑之下，不辨东西，车里不敢燃灯，因为回犹感情恶劣，汽车所经过的都是犹太人的住处"，"怕他们有不轨的举动"。

1938年5月，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朝觐结束去黎巴嫩开

展宣传联络工作时，也曾在巴勒斯坦短暂停留，他们目睹当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激烈冲突，心里十分难过，对帝国主义挑动犹太移民欺凌阿拉伯人的罪恶行径，感到无比愤慨。他们的轮船抵达巴勒斯坦的海法港时，整个城市一片沉寂，且禁止旅客上岸。他们向人打听，一位税关关员感叹地说："巴勒斯坦回犹之争已著名于世界矣，此地情形尤严重，今日殆为死城市矣。"访问团人士又问："回犹今日皆为弱小民族，彼此牺牲，除帝国主义操渔人之利外，彼等又有何便宜？"税关关员回答："君所见之理至明，然英人之嫉回教人甚，假刀杀人，犹太人宁愿如其刀！且回犹之冲突，非平凡之斗争现象也，犹太人乃欲夺回教人生息之地，乃欲绝回教人之食路，回教人明知为强者所操纵，然不能不为目前之生存而牺牲。"又说："此地回犹已不相往来，经济殆已绝交，冲突之事，时有所闻。"访问团成员听到这些情况，感到"回犹皆为信主之民族，而相煎迫若是，岂弱小民族之罪耶！帝国主义不消灭，世界公理将永无实现之日也"！他们还遇到一位民族情绪激昂的阿拉伯卖橘老人，详细讲述了阿拉伯人受压迫的情况，并表示阿拉伯人可杀死，可饿死，但不会屈服。他还感慨地说："君等必疑如是多之回民，转不能战胜犹太人乎？否！今日回民乃与英国人争，非与犹太人争也。……帝国主义之为恶，不只杀人流血而已，直欲亡我民族灭我信仰也。"后来访问团乘轮船在海法港停留之机上岸观光，在拜访当地阿拉伯童子军总会时，听说当地伊斯兰教组织的领袖人物，因阿犹之争中英国官方袒护犹太人，不是被驱逐，就是被监禁。海法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表面上没有发生争斗，但居住区域，所办商店甚至公共汽车都各有自己的界限，经济上基本断绝往来。等访问团于当年年底 12 月从土耳其返

回国内时，发现船上旅客三分之二为犹太人"乃自欧洲返巴勒斯坦者。该地阿犹之争方兴，是亦居异邦而返乱国者。阿犹之民族与宗教并不冲突，而帝国主义故意使善于经济之犹太人剥削适以自保之阿拉伯人利益，使之相杀不已，玩弄于股掌之上，牺牲者何罪欤?"他们抵海法时，当地刚发生过阿犹冲突，治安形势较上次停靠该港时更为严峻，"路上皆英兵哨，荷枪若临大敌，沙袋铁网，到处皆是，武装之军用车，穿行街市如梭，机关枪口皆外向。……战时，街市自为凄凉，加以斋月，商家胥闭户，视之，不啻为死市也，炮毁火烧之房屋，触目尽是，街头流浪之老弱，衣褛褴而行乞"。后来有人知道访问团成员也是穆斯林，就有一个阿拉伯老人上前握着他们的手说："中国的回教人，你们知道阿拉伯民族所受的痛苦吗?"一边说一边流下了眼泪。此情此景，使他们痛彻心底而不能忘怀，他们明白，真正可恨的不是犹太人，而是那煽动人压迫人的帝国主义。由于中国当时也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危难之中，他们对阿拉伯穆斯林兄弟的痛苦自然能深深地理解并给予真挚的同情。

由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阿犹流血冲突频繁发生。1947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在美、法、苏赞同下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建议"(181 号决议)，规定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两个国家，"犹太国"面积为 14942 平方公里，"阿拉伯国"为 11203 平方分里，耶路撒冷为"独立主体"，交联合国管理。阿拉伯联盟七国坚决反对这一决议，于同年 12 月 17 日发表声明，宣称：阿拉伯人"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并且遵照真主的意旨，决战至最后胜利。"由于大国企图"分治"巴勒斯坦的图谋早有泄露，所以阿拉伯联盟事先

已多次声明反对这一不利于阿拉伯民族的裁决方案，因此中国穆斯林也一再宣布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维护生存权利的斗争。1947 年 10 月朝觐期间，有 72 名中国哈吉前往麦加参加了大朝，当年参加朝觐的各国哈吉有 15 万人，来自 20 多个国家。朝觐礼成，沙特代国王在米纳举行盛大庆祝会，各国名流千余人被邀参加，同时举行了阅兵典礼，场面异常热闹。中国朝觐代表参加了庆典礼式，回到麦加后，拜访了国防大臣、财政大臣和内政大臣，又受到代国王的接见，呈交了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函件、照片及礼品。在此期间，李廷弼、张秉铎、闪克行三人于 10 月 22 日发表了《中国回教朝觐团告朝觐弟兄书"。该"告朝觐弟兄书》介绍了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穆斯林在普及教育、加强与世界回民之联系、发行刊物、翻译《古兰经》、组织回教协会和回民青年活动方面所做的工作。《告朝觐弟兄书》还倡议成立一个世界回教大会，于每年朝觐之后在麦加召开，探讨有关伊斯兰文化、政治、宗教及社会方面的种种问题；积极鼓励教胞研究科学；发动一个回教世界运动，号召全世界回教民族觉醒起来，争求进步，摆脱外来势力的侵略。"告朝觐弟兄书"最后表示了对当时回教世界问题的立场与希望，第一条，就是强调"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是合理的！我们与他们同站一条阵线上，他们无疑的将获得胜利，耶路撒冷是全世界回教人中心地，回教人保卫耶城即是真理，阿拉伯人及全世界回教人将以全力支持"。该书还表示支持当时埃及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斗争："埃及人民为自由独立向英国人所施的英勇奋斗，引起中国人民的同情与钦佩，尤其是我们中国的回教人，更对他们寄以殷切的希望，安拉必能助他们成功。""印

度尼西亚人民的英勇抵抗荷兰的战斗，实使我们万分的钦佩，我们中国回教人完全同情他们，声援他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能够获得胜利。”可以这样认为，这份《告朝觐弟兄书》，既反映了中国朝觐团哈吉们盼望阿拉伯民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的良好意愿，也表达了全体中国穆斯林在维护人类正义、关心世界穆斯林兄弟获得平等、发展与和平的博大胸怀。

1948 年 5 月 14 日，即英国托管终止之时，犹太人根据“分治”计划宣布成立“以色列国”。次日，以色列即与阿拉伯国家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在西方大国的支持下，以色列强行占领了划给“阿拉伯国”的 5371 平方公里土地，近 100 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其财产损失估价达 20 亿英磅。以后的几十年中，阿以又爆发了三次中东战争，即 1956 年苏伊士战争，1967 年“六·五”战争和 1973 年的十月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四次中东战争中的死伤人员达 15 万余人，战争费用和物资损失达 1000 余亿美元。

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一起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殊死搏斗。1982 年 6 月，以色列为打击巴勒斯坦武装力量又悍然进攻黎巴嫩，在这种严峻的形势面前，当年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通过会见阿拉法特向他表示了中国穆斯林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坚决支持。1982 年 9 月 27 日夜晚，麦加迤东的米纳山下伊斯兰世界联盟招待所举行的欢迎会的大厅里，不同肤色的各国朝觐者在聆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的讲话。会场由伊盟副秘书长穆罕默德·萨富瓦主持，中国穆斯林朝觐团代表参加了欢迎会。阿拉法特这位身经百战、风尘仆仆的中东风云人物，头缠黑白格的“代思塔尔”

(风巾)，身着土黄色咔叽军装；他身材不高，两眼炯炯有神，慷慨激昂地控诉以色列扩张主义者以武力强占巴勒斯坦的土地，把当地人民赶出家园，流落四方的暴行。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它凭借西方大国的偏袒和纵容，对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人民施行大规模的屠杀，无辜平民中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也倒卧在血泊之中。接着，阿拉法特叙述了巴解组织为了恢复民族合法权利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在暂时失利的情况下，依然坚定自信，表现出"重整旗鼓"的豪迈气慨。阿拉法特的讲话不时为听众们"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和"安拉至大"的呼声所打断。

在阿拉法特讲话后，印度尼西亚、乍得、约旦、毛里塔尼亚和美国黑人等各国穆斯林相继发言。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团长阿卜杜热依木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说：他听了阿拉法特主席的讲话，为英雄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深受感动。巴勒斯坦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中国穆斯林坚决支持你们。我们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阿卜杜热依木团长讲话之后，阿拉法特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趋前和他亲切地握手、拥抱，并告诉他："我去过中国！"阿卜杜热依木说："欢迎你们有机会再去！"阿拉法特愉快地表示："谢谢，一定。"现在，阿以和谈已取得成果，巴勒斯坦地区已出现了和平的曙光，中国穆斯林衷心祝愿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实现和解。今后有机会再去访问巴勒斯坦的中国朝觐者，希望能在那里看到一个和平、稳定、欣欣向荣的新国家。

五、政策开放　情谊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各族穆斯林群众摆脱了剥削压迫制度的束缚，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党和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民族宗教政策，推动了各族穆斯林的繁荣进步，也使他们的正常宗教生活得到尊重和保护。建国初期，中国穆斯林即开始组织朝觐团前往麦加，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为了使中国穆斯林能顺利履行这项神圣的天命功课，恢复历史上中国穆斯林与阿拉伯人民的传统联系，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中国高层领导直接关心此事，并亲自通过各种渠道和沙特方面沟通关系，终于在1955年使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重新畅通。1955年至1964年期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共组织朝觐团10起，只是到了十年动乱期间才被迫中止。三中全会后，1979年10月，中国穆斯林又恢复了正常的朝觐活动。以后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和政策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各族穆斯林的经济能力逐渐提高，使越来越多的普通穆斯林也有条件通过自费办法跨出国门实现朝觐心愿。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和关心各族穆斯林的朝觐活动，从多方面提供物质帮助，不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协助解决朝觐者所需的一部分外汇额度，还在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全程服务。使千千万万难得出远门的中国哈吉安全地来回跨越上万公里，在圣地麦加顺利地履行完各项宗教功课，从而获得中国穆斯林和沙特阿拉伯有关方面的共同赞扬。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年复一年的顺利进展，不仅体现了我国党和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成就，同时，通过朝觐和访问进

一步加深了我国穆斯林与阿拉伯国家及全世界穆斯林的友好联系。

(一)万隆会议建立友谊　巡礼之路重新恢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后，西方某些大国企图在经济上阻遏新中国的发展，并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因此他们对我国实行禁运政策。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也封锁了中国的海口，使中国大陆与国外的客、货运输被迫中断，传统的上海至麦加海上通道也停止运行。同时，因为当时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中国穆斯林前往那里朝觐的签证非常难办，所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虽然组织过朝觐活动，但都因为以上原因未能遂愿。1952年8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委会闭幕，不久即组织16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伊斯兰教朝觐团"，由达浦生、伊明马合苏木大毛拉任正、副团长，张杰任秘书长，团员尽是国内知名阿訇、毛拉。朝觐团经香港、印度，到达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为向沙特驻巴公使馆交涉入境签证，经过近1个月的往返接洽，但最终由于西方大国的阻挠，未取得签证。在留巴期间，朝觐团访问了各方面宗教人士，参观了许多清真寺。巴中友协及其它社会团体专门为朝觐团举行了招待会，朝觐团也宴请了巴基斯坦社会名流。经过广泛交往，使人们对新中国的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了认识，因而使帝国主义的无耻造谣、污蔑破产。由于和1952年时同样的原因，1953年和1954年中国穆斯林也未能实现朝觐愿望。

1955年4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

亚的万隆召开。它是在没有西方国家参加下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表现了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亚非两大洲人民为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坚决意志。中国穆斯林著名人士达浦生作为伊斯兰事务顾问，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万隆会议。参加会议的29个国家中，由于好多国家当时未和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平时来往很少或者没有来往，加之西方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对我国的造谣诬蔑，致使不少人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事实很不了解，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穆斯林都完了。针对这种情况，达浦生和中国代表团的同志耐心细致地向伊斯兰国家的代表们和记者解释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宣传各族穆斯林在新中国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达浦生还应印度尼西亚电台的邀请，对听众介绍了中国伊斯兰教近况的广播演讲。中国代表团把带的一部分阿拉伯文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中、阿、英三种文字说明的《中国穆斯林生活》画册和《中国的穆斯林》画集赠送给各伊斯兰国家代表。达浦生还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新近影印的皮面烫金的精装本《古兰经》分别赠送给沙特阿拉伯、埃及、叙利亚、也门、印度尼西亚的代表。通过一系列宣传和相互交流，达浦生和埃及宗教基金部部长巴库尔等穆斯林代表交上了朋友。在友好信任的基础上，达浦生向巴库尔部长提出中国穆斯林恢复朝觐的要求，拜托他从中协助。巴库尔愉快地接受了此项请求，并回答："托靠主帮助你们完成这项天命。"达浦生又邀请巴库尔赴中国访问，巴库尔十分高兴，并表示希望"我在中国参观完毕后，在北京等着你们一同去朝克尔白"。有了这样明显的进展后，周总理在一次宴会上和沙特阿拉伯代表阿力·雷塔亲王也谈起了中国穆斯林赴麦加朝觐的问题，希望沙特政府予以帮助。

沙特代表听完十分重视，立即表示要把周总理的愿望转达给费萨尔国王，并关切地询问中国有多少穆斯林?居住在什么地区？参加朝觐的有多少人？是由海路去或是乘飞机去？周总理都一一作了回答。不久，沙特阿拉伯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跟达浦生说，有什么事他可以转达他的政府，达浦生即重申了中国穆斯林恢复朝觐的要求。万隆会议结束后，巴库尔部长果然应邀前来北京访问，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热情接待了他。当时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巴库尔部长同我国外交部领导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会谈纪要，为以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和推动恢复中国穆斯林朝觐问题奠定了基础。当年8月，在周总理、埃及纳赛尔总统及沙特费萨尔国王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穆斯林终于恢复了到圣地麦加朝觐的功课。

从1955年开始到1964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共组织朝觐团10起，计132人次。成员包括回、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兹、东乡、塔塔尔等7个民族，绝大多数是年高德昭的阿訇、毛拉，当然这是指有组织的朝觐者，从新疆等其他地方用探亲等名义出国朝觐的人员不在其内，如1957年从新疆、西藏等地出国朝觐的另有44人，加上中国穆斯林朝觐团17人，共61人。大致情况见下表：

1955—1964年中国穆斯林朝觐统计表

出发时间	人数	团长	副团长
1955年7月29日	20	达浦生	马玉槐　伊明·马合苏木
1956年7月18日	37	包尔汉	安瓦尔汗　金凤山　李恕
1957年7月7日	17	吴鸿宾	刘品一　阿不都热依木艾沙
1958年6月27日	20	张杰	安尼瓦尔　贾库林
1959年6月16日	17	马卓洲	马木托夫　禹占林
1960年6月4日	18	伊敏诺夫	刘克凡

1961年5月25日	7	杨　辛	沙梦弼
1962年5月14日	5	麻佩三	
1963年5月3日	5	禹占林	
1964年4月22日	7	张　杰	沙梦弼

50年代时，西方帝国主义不仅想封锁中国，阻碍中国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对中东阿拉伯诸国也加紧政治控制，并继续虏掠当地资源。把中东各国人民推向贫困落后的境地，因此中东各国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阿拉伯人民普遍希望和已争得独立解放的中国人民友好往来。而对新中国来说由于刚从旧制度下摆脱出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上都很薄弱，因此每年前往麦加的朝觐团，可以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通过与阿拉伯各国的亲密交往，增进彼此了解，续建历史上保存下来的传统友谊。所以从1955年恢复朝觐活动起，朝觐团在完成宗教功课后，一部分团员常应邀组成中国穆斯林友好访问团到各中东国家进行友好访问，进行建立友谊的工作。如1957年中国朝觐团在沙特期间，除向国王赠送礼物外，还向穷苦穆斯林施散，并给沙特慈善机关、团体捐赠了两万里亚尔（沙币），表达了中国穆斯林对沙特阿拉伯穆斯林兄弟的关怀。1958年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访问埃及时，正值伊拉克爆发革命。他们看到开罗街道上不断出现宣传车，车上站满了人，都高呼："庆祝伊拉克共和国成立"、"反对美英帝国主义"等口号。所以中国穆斯林朝觐团与埃及穆斯林同在爱资哈尔大寺礼主麻后，应邀发表演讲时，也愤怒谴责美英帝国主义对中东的侵略罪行，表示坚决支持阿拉伯人民反抗外来干涉的正义斗争，从而获得埃及穆斯林的赞扬。1959年中国穆斯

林朝觐团在宗教功课结束后。部分团员应邀先后到苏丹、摩洛哥、突尼斯等伊斯兰国家进行友好访问，不仅参观各国的城市，还特别注重文化交流，主要考察它们的经学院、文化部、电影局、医院等机构，并与广大的穆斯林群众接触，以增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1959 年中国朝觐团来回都经过苏联，还曾受到苏联宗教管理部门的热情接待。部分团员在莫斯科作了短暂停留并参观了举世闻名的苏联国民经济展览会。

由于篇幅有限，下面我们只能重点介绍一下 1955 年由达浦生率领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和 1956 年由包尔汉率领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完成朝觐天命前往中东诸国重叙友情的情况。

1955 年 8 月 14 日，新中国组织的第一个朝觐团在麦加完成天命功课后从吉达港飞行约 2 小时到达埃及的西奈半岛进行检疫，准备应埃及政府及宗教基金部长巴库尔的邀请，对埃及进行友好访问，这是新中国访问埃及的第一个穆斯林代表团，而当时中埃两国尚没有正式建交。团长达浦生在万隆会议上已结识了巴库尔部长，副团长是马玉槐和伊明·马合苏木。成员包括青海的马明基、甘肃的吴鸿业、新疆的色来大毛拉和阿卜杜热西提大毛拉、河北的沙梦弼、山东的米长茂及后来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阿拉伯语教授的刘麟瑞。检疫站对中国代表团的行李免于蒸馏消毒以示优待，对青海马明基哈吉携带的 4 瓶渗渗泉水也只在瓶外做了消毒，未予没收或倒泼在地。有一位度假后返回埃及的也门留学生亦在此受检疫，当他知道中国客人的身份时，随即将携带自用的一大袋也门特产——咖啡豆作为礼物赠送。其他受检疫的埃及哈吉则称赞中国穆斯林严格遵守礼拜时间，而且礼拜动作规范。8

月 17 日代表团抵达开罗，在机场，即听到广播室播出了欢迎中国穆斯林的欢迎词。恰巧巴库尔部长一小时后也从国外飞返开罗，代表团等到他下飞机后一同进城。他非常高兴，丢掉一切公私事务，整整陪了 3 小时，直到把代表团安置在开罗头等饭店才算完事。他还告诉马玉槐副团长，他从北京访问回来后，国民党驻埃及大使通过别人传话要求他少替人民中国说话，认为即使保持缄默已经就是对大陆的有利宣传了。巴库尔让人转告那位大使，我是以一个"人"和一个"穆斯林"的身份访问中国的。一个人应该说实话，穆斯林更应该说实话，谁不高兴就让他不高兴吧。晚间，埃方官方来人商谈访问日程时，又转达了巴库尔部长的指示，代表团可以变动日程，甚至可以全部变动，一切随他们的意愿。

8 月 18 日，代表团和来访的苏联哈吉一起参观了开罗四座古老而著名的清真寺，即建于 1362 年的索丹·哈桑清真寺，建于 1912 年的雷法尔大清真寺，建于 1848 年的穆罕默德·阿里大清真寺(又名堡垒大寺，是以十字军东征战争中的穆斯林大将萨哈丁之堡垒而得名)和建于 1751 年的土伦大清真寺。每参观一座清真寺，中外哈吉们都要在寺内大殿上礼上两拜"台赫耶"(致敬)拜，并恭诵《古兰经》。下午哈吉们游览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在参观时，都有埃及文字及摄影记者随行采访。第二天(8 月 19 日)是主麻日，又是伊斯兰教元旦，代表团致电纳赛尔总统表示祝贺，并在参观动物园后，前往宰乃布大清真寺礼主麻拜。随后，中国哈吉们又瞻仰了在伊斯兰教历 1 世纪 20 年代时修建的埃及第一座清真寺——以征服埃及的阿拉伯大将阿穆尔的名字命名。下午又参观了在侯赛因清真寺主办的"希吉来历元旦庆祝会"，会后去侯赛因墓前恭诵

"法蒂哈"(《古兰经》首章)。侯赛因是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次子,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他的母亲即是穆圣的女儿法图玛太太。哈吉们在这里看到了由阿里等亲笔书写的全本库法体《古兰经》,字迹清晰,纸较厚,但无虫蚀痕迹。他们还瞻仰了据说是穆罕默德的一些遗物,计有用绸布包裹的圣杖一节;装在玻璃管里的胡须若干根,根根翘起,乌黑发亮;还有他生前所用的金属眼药勺和针,都很完好。哈吉们目睹圣人遗物,又亲手触摸了勺和针,都异常激动,有的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声泪俱下。接着,哈吉们访问了久慕盛名的爱资哈尔学府,其中纳训和刘麟瑞都曾留学该校,自然格外亲切。在"爱大"秘书长和基金部数人陪同下,哈吉们拜访了埃及前任穆夫提哈桑·买哈鲁夫长老,介绍了中国穆斯林今天男女平等的美好生活。穆夫提向中国客人赠送了自己的许多著作,问了好多情况。双方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热诚、坦率的交谈。

以后几天,中国哈吉先后参观了共和国宫陈列室、埃及古物陈列所,参加了爱资哈尔大学举办的伊斯兰历元旦庆祝会、苏联驻埃及大使馆的茶话会和埃及穆斯林青年专为欢迎中国穆斯林代表团的茶话会,还专程去亚历山大参观了解放省经济开发工作、当地的清真寺和前法鲁克国王王宫。返回开罗后,代表团于8月24日下午拜会了纳赛尔总统。达浦生团长首先转达了周恩来总理为纳赛尔总统帮助中国穆斯林实现了朝觐的愿望和埃及政府盛情邀请朝觐团访问埃及所表示的谢意。总统回答:巴库尔部长访华以及你们访问埃及,是埃中两国密切联系的因素之一。又说,希望明年看到更多的中国客人访问埃及,并托达浦生代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好。总统接受了代表团的捐赠和礼品,回赠代表团每人一部亲笔签名的《古

兰经》。巴库尔部长送代表每人一册访问埃及活动的像册、衣料和一套咖啡具；爱资哈尔大学另送每人一部《古兰经》；埃及穆斯林青年会、国家新闻局和宗教基金部另外赠送了一批宣传品、100册经书，71公斤阿拉伯文铅字。代表团由书店选购的数十册阿拉伯文经书，也由宗教基金部付款作为礼品赠给代表团。和纳赛尔总统的会见结束后，《金字塔日报》、《共和国报》、《消息报》、《开罗日报》等四家报社都作了报道，并刊登了代表团的谈话。

12天的埃及之行结束了，8月25日代表团离开开罗回国。当时，埃及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仅仅阿年时间，而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也不长。两个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共和国，经过万隆会议双方领导人的接触，首先实现了人员互访，继而于1956年5月30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从此两国穆斯林之间的友好联系进一步密切起来，进而推动了其他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卓有成效的访问，使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且开创了新中国穆斯林同埃及和其他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1956年，以包尔汉为团长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在圆满完成宗教功课同时，与各国朝觐者进行了广泛友好的接触，热情宣传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和民族宗教政策。当时沙特国王阿齐兹曾3次会见包尔汉团长，并盛情邀请他一起参加洗天房典礼，给予他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级的最高礼遇。沙特还向朝觐团赠送了天房幔帐和民族服装。接下来，朝觐团又用4个多月的时间，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利比亚、突尼斯和阿富汗等八个伊斯兰教国家，这是

历届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出访国家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朝觐团成员共 37 人，成员包括维吾尔、哈萨克、回、乌兹别克、柯尔克兹等 5 个民族，来自 10 个省区。包尔汉团长等大部分成员在访问黎巴嫩后先行归国，其余 12 人由李恕任代理团长继续访问。当年，朝觐团把中国千万穆斯林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和平、友谊带给了中东各国人民，而中东各国人民的勤劳智慧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精神，以及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也给中国穆斯林朝觐团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年朝觐团负责人李恕曾对这一切撰文进行过生动的描述。

6 月末，在北京已进入阴雨连绵的季节，仰光和孟买更是整日阴雨，潮湿和闷热使人透不过气来；而中东地区却是万里晴空，看不到一缕云丝，深蓝色的天空和一望无边的黄色沙漠构成了这个地区的特殊风光。在中东，冬季的西北风只能给地中海岸地区带来少量的冬雨。沙特的情况更是特别，这里是终年无雨的，有的孩子只能从大人那里听说过下雨的故事，但没有见过下雨是什么样子。辽阔的沙漠，再加上终年无雨，使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最炎热的地方。在 7 月初，白天温度经常在 40℃以上，中国医生带去的体温计都失效了，凡士林油也化为清水，在飞机场的水泥跑道上，任凭你穿的是厚底皮鞋，也会把两脚烫得发疼。白天，人们只得躺在屋子里或帐篷里避暑。然而中东各国人民是勤劳而智慧的人民，中国哈吉们在访问时亲眼看到，干旱的气候和一望无边的沙漠，虽然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可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们，却用勤奋的劳动和智慧同自然界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改变了大自然的面貌。例如埃及人民就把尼罗河的水引向沙漠，使尼罗河两岸变成

了物产丰富、风景优美的绿州，并且开始了改造沙漠的伟大工程。

至于地中海沿岸各国，从亚洲的叙利亚、黎巴嫩和约旦，到非洲的利比亚和突尼斯，也有许多山青水秀、风景优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区，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有大片的果园，生产葡萄、香蕉、苹果、橄榄、柠檬等各种水果。中东地区特有的椰枣树，把城市与田野点缀得异常美丽，它们那高大、挺秀的树干顶端，披散着绿油油的大叶子。

中东各国人民又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在开罗，中国哈吉们参观了举世闻名的金字塔，这些由 230 多万块、平均每块重两吨半的石头砌成，高约 130 公尺的古代帝王的坟墓，是古代埃及人民智慧的象征。在距今四千年以前，就创造出这样雄伟的建筑物来，真是太了不起了，他们当时的文化技术水平和那种雄伟的气魄怎能不使人惊叹。他们还参观了约旦的加来士和利比亚的沙哈特等地的罗马帝国时期的许多建筑，虽然残缺不全，但古城的街道、广场、宫殿、庙宇、圆形的露天剧场，还可隐隐约约辨认出来。中东各国差不多都有些古老的清真寺，例如古都斯（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大马士革的翁米亚清真寺，开罗的侯赛尼和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都是些气魄雄伟的古老建筑。上面石刻、木刻的图案，都是极其精致美观的杰作，从这里更充分地表现出中东穆斯林的天才。

中国哈吉们还看到，自从西方殖民主义者侵入中东这块美丽的土地后，广大善良的人民便开始了苦难的生活，他们的自由甚至生存的权利被剥夺了，意大利法西斯对利比亚人民惨无人道的屠杀，在他们统治的 30 年中，利比亚全国人口已

由30年代的230万减到50年代的120万了。在当时，中东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虽不完全相同，但就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却是十分贫困的。西方殖民者给中东人民带来的祸害，还表现在人民文化教育的落后，有的国家不仅没有自己的高等教育，甚至连普通教育也没有。至于剧场、电影院、体育场等文化设施就更谈不到了。

倍受殖民主义灾害的中东各国人民，对于殖民主义是万分憎恨的，从殖民主义者侵入的那一天起，人民就没有停止过抵抗。反殖民主义的烈火，燃遍了中东大地。二战以后，特别是50年代中期，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更加普遍和深入。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一些政府官员和伊斯兰教界的上层人物也卷入这一斗争。利比亚人民经过30多年与意大利法西斯的斗争，终于打败了敌人，取得了独立。阿富汗人民对英国殖民主义者也进行了长期的反抗。在首都喀布尔大街，一座纪念塔旁，陈列着缴获来的敌人大炮，它们表现出阿富汗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对于侵略者却是一种无情的讽刺和有力的警告。在埃及则由于苏伊士运河问题，中东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情绪更加沸腾，不仅一般人民积极支援埃及，阿訇们也大大发扬了伊斯兰教反抗侵略的积极精神，号召穆斯林团结起来反击侵略者。代表团访问埃及时，正值英法侵略者剑拔弩张地准备进攻埃及。埃及人民在入侵者面前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慨。全国青年男女都动员起来，在赤日炎炎之下手持武器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就连须发皆白的爱资哈尔大学校长也拿起武器练习射击，准备参加反抗侵略，保卫自己祖国的战斗。中国哈吉们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大会。当包尔汉团长在大会上用高昂的声音宣布：“中国人民和中国

穆斯林坚持支持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时，顿时整个会场沸腾起来，与会群众高呼"人民中国万岁！"

在访问中东的过程中，各国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给哈吉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代表团每到一个国家，毫无例外地受到热情招待和欢迎。在开罗和亚力山大，埃及朋友们一听说他们是从北京来的穆斯林，就围上来握手问候。有的青年朋友坚持请他们到家中喝杯咖啡，在亚历山大参观法鲁克王宫时，中国哈吉被一群埃及小学教师发现，他们停止参观围上来和代表团成员握手问好，几个人还发表了欢迎中国朋友的演说。后来因为屋子里太拥挤了，只得把这个欢迎会移到草地上举行。

在叙利亚边境的一个小镇子上休息的时候，两位团员"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们被一位青年学生拉到家中喝汽水，吃点心。当这位叙利亚青年把两位团员送回来时，很激动地说："今天能在我的家里招待中国哈吉，是我们全家的最大光荣！"在约旦首都安曼的大街上，只要中国哈吉一出现就被人群包围起来。有些青年还请他们去俱乐部开欢迎会，在边境办理出境手续时，他们在路边休息，因为口渴，吃了些西瓜，喝了些汽水，但当时付钱时，却找不到卖西瓜的人。后来才打听明白：原来这位是叙利亚的汽车司机，载运西瓜从这里经过，为了表示叙利亚人民对中国朋友的欢迎和敬意，特地请中国朋友吃西瓜，并为了赶路已经走了。

突尼斯——中国协会朋友们的热情更使中国哈吉们感动。为了能使他们深入地访问和表达热情，在他们逗留的 7 天里，为他们安排了十几次家庭宴会。10 月 1 日晚，该协会还特地召开了会员大会来欢迎中国朋友，庆祝中国国庆。

无数事实使中国哈吉们深深地感受到，中东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热爱是很难用笔墨来形容的，他们把东方出现了一个强大、爱好和平的中国，引为东方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他们向往新中国，热爱中国的一切。黎巴嫩东正教大主教尼鸿撒巴在他的住地设宴招待中国朝觐团时，意味深长地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丢了一件东西——我把我的心丢在中国了。"为了纪念这次难忘的会见，团员们拍了一张照片，这时他又说："这张照片，比我本人幸福的多，因为它能同你们一起到中国去。"

很多到过中国的中东朋友们，把从中国带回去的东西，像宝贝一样地收藏着或陈列在最显要的地方，在埃及一位朋友的客厅里，团员们看到墙壁上悬挂着中国分省地图、杭州都锦生丝织风景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照片。在突尼斯和黎巴嫩的两个家庭宴会上所用的茶具、碗筷以至台布都是中国的产品，这使得代表团成员像回到自己家乡一样，感到分外亲切。当时的中东人民还殷切地希望向中国学习。穆罕默德圣人的遗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话被广泛地引用。进步报纸和刊物经常刊载介绍中国情况的文章，他们甚至希望中国出版阿文书报，更盼望能听到北京的阿语广播。新中国的诞生，鼓舞了中东各国人民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勇气和信心。我国建国以来的伟大建设成就，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得中东各国人民的拥护和赞扬。而抗美援朝的胜利、万隆会议的成功以及对埃及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大力支持，更使我国国际威望大为提高。

1956 年中国穆斯林访问团的出访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不

仅在中国穆斯林朝觐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也在中阿人民交往史上留下了又一段佳话。

(二)祖国进步政策开放　中阿兄弟日益亲近

由于受极左思潮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自1965年至1978年，我国伊斯兰教的正常活动一度停止，中国穆斯林和阿拉伯各国，以及世界穆斯林的传统联系被迫中断达14年之久。在这14年中，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最令人惊异的是，石油财富使一些阿拉伯国家在经济上迅速崛起，从而使伊斯兰教成为当今国际舞台上异常活跃的一位主角。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每年去麦加朝觐的人数为17.2万人，而1945年仅有3.76万人，其中还有许多人来自阿拉伯半岛。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急速增加，60年代中期每年达到100万人，70年代则增至150万人，80年代初已达200多万人。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朝觐者不仅为沙特阿拉伯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还带来了巨大的朝觐收入。在石油财富发现之前，沙特的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发展也相当落后，对此，中国朝觐者都深有体会，当时，朝觐经济收入曾支持了该国的财政。而在石油经济上升为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之后，朝觐收入在国家经济总格局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虽然随着朝觐人数增加其绝对数有明显增长，但这笔为数可观的收入，绝大部分用于完善圣地朝觐设施，如机场、道路、旅馆的修缮改进及朝觐活动所需方面。

50年代，沙特阿拉伯联合其它几个第三世界产油国，建

立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击败了国际石油垄断集团的压价政策，并通过增加产量来提高石油收入，在1960—1969年间，该国石油产量增长了31.87倍，石油收入由3.3亿美元增至9.59亿美元。进入70年代后，沙特阿拉伯又几次提高油价，致使石油收入从1970年的12.14亿美元，增加到1974年的225.7亿美元。随着石油收入的猛增，沙特阿拉伯已从五六十年代的一个负债国一跃而成为纯资本输出国，1974年石油资源盈余已高达222.67亿美元，1980年，石油收入约有900亿美元，仅国外资产年利就达百亿美元之巨。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继承了前国王费萨尔的外交政策，利用它是圣地所在国家的优越条件，依靠丰富的石油资源，力图在伊斯兰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对朝觐的组织管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圣地麦加三面环山，可利用的平地面积很小，且气候酷热，由于缺水而几乎没有蔬菜、水果等农副产品供应。一年一度的朝觐季节，二百来万人拥到这块狭小的地区朝夕相处，并要在限定的时间内进行各种朝觐功课，困难实在不少。沙特政府组织专家经过研究，认为限制人数和减少宗教功课都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是向现代化要高效率，向改进朝觐环境找出路。伊斯兰教国家发展现代化时，对待世界上的事物是比较开明的，它们认为任何科学技术都是真主赋予人类的，伊斯兰教同工业和技术发展并不矛盾，因此采用新技术手段为安拉的宗教服务是顺理成章的事，绝不是异端。所以，在实现经济管理及社会生活现代化方面，沙特阿拉伯和许多穆斯林国家一起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穆斯林在使自己乘飞机去麦加朝觐、通过电视转播盛大宗教仪式和宣讲《古兰经》、在清真寺

安装空调器、接受现代教育的过程中，相对来说没有经历太激烈的自我折腾。例如，沙特第一位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最早在决定是否使用电话和无线电时，曾遇到来自乌里玛（宗教法官）那里的强大阻力，认为那是一种“魔鬼的发明”，“铁器说话是世界末日的象征。”国王便通过安排一次无线电广播《古兰经》的例子来说服乌里玛们。乌里玛们最后的裁决是：如果这种仪器能精确地传播神圣的语言，就可以使用。这是一个利用宗教使现代科技新事物合法化的成功例子。对电视机的普及应用也大体如此。此外，沙特王国在早年引进汽车这一现代化交通运输工具时，亦曾在王室内部引起过争议，最后还是由开明的国王说服了保守的大臣们。现在，西方的现代科技正在被阿拉伯世界大量吸收，但在沙特阿拉伯进口的喷气式客机上，仍然要喷上“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的字样，从而反映了伊斯兰教的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和谐统一。

沙特政府从70年代起掀起的现代化运动，是全面而广泛的，其中包括为保证朝觐功课顺利完成所作的一系列改革。朝觐是一件关系到亿万穆斯林信仰的大事，从事这方面的改革当然绝不能贸然行事。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沙特阿拉伯对朝觐环境的改革得到了国内外穆斯林的一致拥护。其原因在于：首先沙特的现代化，不光靠石油财富，还以拥有一批具有现代意识的人才引为骄傲。新一代的沙特人，已经完全脱离了落后的游牧经济的思想束缚，举国上下的管理干部，包括宗教领袖都是一批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高文化修养及专业造诣的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和改革的愿望，这是推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思想基础。如果不是具备这个基础，贸然提出对一些事物进行

外科手术式的改革，那是断然行不通，十有八九会被送上宗教法庭。其次，沙特政府从70年代起所掀起的现代化运动及改革浪潮，是全面而广泛的，这股势头汹涌的浪潮，也涉及宗教领域，可以认为，这是对朝觐进行必要改革的物质基础。走改革之路是为了向落后和低效率告别，适应经济现代化的需要，同时更好地保证宗教功课的实施。也可以说，为保证朝觐功课的顺利进行所作的一些改革是势在必行的，是社会全面进步的一个标志，因此受到国内人民的拥护。第三，改革的核心是采用先进技术，更有效地为朝觐服务，使朝觐者能更方便地履行天职，并保证他们在圣地逗留期间健康、安全、舒适。环境改革后的麦加，建筑宏伟，设施先进，街道整洁，空气清新，景色宜人，使数百万朝觐者，能在熠熠的阳光下身披白色戒衣，秩序井然地从事各种宗教功课，完全符合各国朝觐者的根本利益。其实，近几十年来由于努力发展民族经济及文化教育事业，世界各国广大穆斯林的物质及文化生活都或多或少有了改善，现代化的事物，已经进入许多家庭的生活领域，因此各国朝觐者都乐于接受新事物，并共同具有改革落后面貌的要求和愿望，对沙特政府为保证朝觐功课所实行的改革，他们都不感到意外，并欣然接受。连一些参加朝觐的穆斯林国家首脑人物，在回答沙特新闻媒介采访时，亦异口同声表示赞赏。沙特政府在改善朝觐环境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实现交通管理现代化。朝觐的现实意义之一本来是培养穆斯林的坚忍精神，即不怕路途遥远、山高水险、饥渴劳累，立志向着每天五次礼拜所朝向的天房前进，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在过去的一千多年中，穆斯林朝觐者总是背着干粮，步行或骑着驴、马、驼长途跋涉，餐风宿露，前往麦加，其交通方式

没有根本改变。然而随着世界的发展，人类已进入了太空飞行时代，再按照陈规步行或乘旧式交通工具去朝觐，既费时间也不经济。为了满足更多穆斯林的朝觐需要，沙特政府以圣城麦加为中心，拨巨资修建了南到也门，北到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东到海湾各国的高速公路，小汽车可以160公里的时速行驶，可供20多万辆各种型号的朝觐专车运载各国穆斯林往返麦加。此外，沙特在吉达以北35公里处拨款50亿美元修建了阿卜杜拉·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占地面积达105公里，其候机大厅宽达150万平方米，仅主厅就达51万平方米，相当于80个足球场，由210顶46米见方的半透明的玻璃纤维织物做成的顶篷连成，号称"顶篷城"，亦称"哈吉城"，既明亮又凉爽，可同时接待20多万旅客中转。据统计，该机场每年可起落87万架次飞机，接送旅客3000万人次，目前每年约有五分之三约120万朝觐者从这里坐飞机起落。此外吉达港还修建了巨大而设备先进的客运码头，接待各沿海国家来的朝觐之舟。设在吉达机场附近的空运"哈吉城"与毗邻海港的海运"哈吉城"凡朝觐季节就是一片繁忙景象，因人数太多，哈吉城内密密麻麻的朝觐者或行或止，或坐或卧，犹如人海。

2、接待管理的高效率。几十年前去过圣地的哈吉们都知道麦加许多地方比较脏乱，但现在再看不到这种情况了，按沙特朝觐部的建议，各国管理朝觐的机构都要将本国朝觐者按地区或行业进行编队组织，大家穿统一服装，胸前佩统一标志，从出发到进行朝觐功课至回国，全部过程都要集体进行，一切事物均有专人负责，朝觐者个人安心做功课，不担心别的事。沙特朝觐部每年对此进行一次评比。沙特在卫生方面的改善最为明显，仅吉达港就有规模宏大的防疫站，两个设备齐

全的附属医院，加上其它办事机构，占有150幢大楼，是中东最大的一家防疫机构，有"防疫城"之称。尤其是麦加市容卫生，政府投入大批人力物力，将城里城外清扫得干净整洁，十大医院日夜服务，医疗急救站遍布每个角落，100多辆流动小医院，24小时跟随着朝觐者的人流运转，随时随地提供优质服务，而且全部免费。一架涂着红星月的乳白色飞机，每天在圣城上空喷洒空气清新及消毒合剂。对中暑休克等危重病人，不允许有病不治等死，而是立即送往就近医院抢救。对于确实抢救无效而死亡的人，则由殡葬部门统一处理，然后向所属国政府及家属发一份由主治医师及殡仪馆负责人签署的死亡通知书，并附医疗诊断报告。沙特政府所作的高效率的组织管理工作，不仅保证了朝觐者健康地完成朝觐功课，而且也防止了疾病蔓延，保护了本国的环境和人民安全。

3、改善麦加大清真寺及周围的环境设施。自1956年起，沙特政府每年拨巨款对麦加大清真寺进行大规模修葺和扩建，使全寺面积达30万9千多平方米，可同时容纳近百万穆斯林同时礼拜，在四周的走廊外面建造了高达20米的两层大理石大厅，法赫德国王还拿出280多公斤纯金，把天房原来的木门换成两扇金门。以往，萨法和麦尔卧两山之间为土石地，路线无明显标志，往返的人混杂在一起，尘土飞扬，秩序不易维持，尤其是近十年来朝觐人数猛增，哈吉们无法履行奔走功课。70年代经宗教领袖、教法学者及专家多次论证研究，在两山之间修建了一条密闭式长廊，两头将两山包括进去，长廊高20多米，宽25米，墙高3米。3米以上是大玻璃窗，顶呈拱型，长廊由南向北，分为两条道，右为上行道，去往麦尔卧；左为下行道，由麦尔卧返回萨法。每股道宽约10米，均单行，地

面铺着白玉石板;两条道的中间又有用金属栏杆隔开的推行轮椅车的小道,亦分左右两道,专供年老体弱者、残疾人或临时患病者使用。长廊内装有通风和照明装置,日夜各进行3次空气更新与地面清洗消毒工作。著名的赞目赞目泉甘洌醇厚,但当初水量很小,被蓄存在一个水池里由专人用水勺舀给朝觐者饮用。往昔朝觐人数少,尚能免强供应,至于想洗洗头,洗卡凡布或带一点回去使亲邻共沾甘露则办不到了。为了满足数以百万计的朝觐者需要,沙特政府在距天房50多米远的原赞目赞目泉位置建了一座机井和扇面形饮水厅,面向扇轴建立了一排排半圆形的饮水台,每台相隔40厘米装有手压自动饮水器。哈吉在这里饮水、洗面,措身极为方便。此外在大清真寺的其它三个角及周围回廊内还设立了350处饮水台,并在寺外周围广场上也设立了许多饮水处和给水站,使哈吉在朝觐期间随时随地能喝上赞目赞目泉水,并允许使用各种容器装水带走。

4、强调射石打鬼的象征性意义,并为此进行改建。沙特宣传部在广为印发的小册子中宣称,射石打鬼是象征性的,它提醒大家不要忘记自身私欲这个万恶之鬼以及现实生活中危害人们的大大小小的魔鬼,时时刻刻同这些魔鬼作战,才是射石打鬼的真正精神和要求。过去,射石的目标是3个石堆,周围地势不平,大量的人拥在一起投石打鬼,很容易伤人。经朝觐部研究,铲平了乱石岗,整平了周围地坪,在上面修建了宽约50米,长达2公里的立交桥,与东面通阿拉法特的立交工程相衔接。又将原来的石堆改建成3个直径1米,高3至5米的粗糙石柱,周围加了水泥短墙不让射去的小石头流出来。于是,哈吉不仅可以在下面平射打鬼,也可以在立交桥上居高临

下打鬼，同时打鬼要按由东到西顺序进行，依次打小鬼、中鬼、大鬼。这样的措施保证了打鬼活动分层而有秩序地进行，避免了拥挤和事故。尽管沙特政府强调朝觐期间只搞宗教不谈政治，但有的也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禁不住赋予打鬼功课以更现实的内容和意义。

5、合理利用宰牲节的鲜肉．宰牲是朝觐功课之一，每个哈吉须在朝觐月的第9、10、11这三天里宰一只羊，或7人合宰一头牛或骆驼。以往宰牲都在米纳地区一条不太宽的山谷里进行，宰牲期间，到处是一滩滩的牛羊血迹和肚肠内脏，皮张头蹄，石头上晒着一条条血肉，气味难闻，环境污染。后来朝觐人数猛增，必须改革落后状况，才能避免瘟疫。于是，沙特政府在米纳建成了一座自动化程度很高的大型屠宰场，有熟练工人1600名，装有48条宰剥线，日处理7—8万只羊。同时又在麦加、吉达、麦地那等处接近朝觐者的地区，相继建成了十多座类似的大型屠宰场，可在3天内处理200多万只羊，协助朝觐者完成这一功课。新的宰牲办法变得更加简便，哈吉不必亲自去市场挑选羊只，也用不着亲手屠宰，只要在事先向就近的银行代办处交钱，就会得到一个收据，上面记录了所宰羊价格，另有编号则代表你要宰的那只羊，这些卡片资料，将被输入屠宰场电脑，按时为你宰羊。你如果觉得不放心或觉得新式宰法不合古训，也可以到屠宰场亲手按动控制台电钮并念"奉大仁大慈安拉之名"宰羊，甚至自己买羊动手宰，有人会协助你按卫生条件处理。为此米纳立交桥下专门设了一个羊栏，但真正自己买羊宰羊的极少。宰杀后的牛羊，就地被冷冻、加工、储藏，由于当地最大的冷库只能冷藏30万只羊，约5—6千吨，而一个朝觐季节所宰的牛羊总重量约4万吨。按《古兰

经》训示，这个节日宰的牲，意念上是敬奉给安拉的，然而安拉是伟大而无所需求的，因此把其中一部分送给亲友邻居或周济穷人，就是敬奉安拉。由于今日的沙特王国里已没有穷人，因此政府就把很大一部分冻肉空运给非洲灾民或巴勒斯坦难民，或接济世界各地穆斯林经办的慈善机构，通过这些渠道把宰牲节鲜肉送到全世界贫穷穆斯林手上。

沙特的现代化改革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国际化影响，由于天房是穆斯林的朝拜中心，麦加是各国穆斯林的精神首都，因此在朝觐环境方面的改进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它像一股潜流，通过每年到麦加的二百多万哈吉，传到全世界每个穆斯林聚居的地区，送达了人类要进步，社会要变革的信息。

和平、发展、进步开始成为 20 世纪末叶世界的主流，沙特阿拉伯在发展，整个世界在发展，到 70 年代末期，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嘹亮号角，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随着各行各业开始拨乱反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重新得到贯彻，传统的中国穆斯林朝觐活动也终于正式恢复。

1979 年 10 月，中断 14 年以后第一次组织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乘坐的波音 707 客机掠过首都夜空，飞往赴麦加的中间站卡拉奇。中巴两国是近邻，在卡拉奇，当地人民对中国人特别亲切。代表团成员戴的白色礼拜帽，在巴基斯坦是只有哈吉才能戴的，因此，街上人一望而知他们是哈吉，显得分外尊重。当两名学生知道他们身份时，买了许多汽水送来，代表团付钱后，小伙子们敏捷地把钱从车门夹缝中扔进来，高喊着："希望你们在朝觐时为巴基斯坦人民祈求幸福！"这些发自内心的诚挚语言，使中国哈吉们深为感动。但是由于十年动乱不

仅在国内造成极大破坏，使广大穆斯林和各族人民一起深受折磨。在国外，各种新闻媒介更把神州大地当时发生的一些不正常现象进行大肆宣扬，甚至添枝加叶，致使许多国家善良的人们误以为中国已消灭了宗教活动，消灭了穆斯林。所以当中国穆斯林朝觐团飞临阿拉伯大地时，当地的官员和许多穆斯林都对他们的诚意表示怀疑。10月19日晚10时45分，中国朝觐团抵达吉达空港，只见机场上用醒目的大字书写着："欢迎你，真主的客人！"再看看那一大片现代化的接待设施，哈吉们觉得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心里有一种亲切温暖的感觉。但不一会，苦涩的感觉却爬上了心头。原来，当地工作人员一面领他们到贵宾室享用汽水、可乐，一面对他们的行李进行了分外严格的检查，连装茶叶的铁桶、纸盒、檀香扇、竹帘画都反复验看。朝觐团带去的风景画册，海关说是"宣传品"，要没收；对哈吉们带的中山装，检查人员更认为是军服，把衣服拿到另一个地方继续检查后证实不是军服后才送回。当他们作为伊斯兰世界联盟的客人被安排到"绿州别墅"居住时，虽然接待工作客气周到，但不让随便出去，连用餐都由工作人员送来。另外，在周围还出现了两名"服务人员"，对他们的一言一行进行监视，代表团成员在饭店门口照了张像，像机也被没收，其实这根本不违禁，经过抗议才要了回来。本来，朝觐团当天就可以到达麦加，但却在吉达滞留了五天，面对这些难题，中国哈吉们十分坦然，因为他们早在国内就对将来可能遇到的情况作了充分估计。他们意识到，这次赴麦加朝觐的意义十分重大，非同寻常。首先，恢复朝觐活动，就意味着党的宗教政策重新贯彻落实，国内各族穆斯林无不翘首盼望朝觐团圆满完成这趟使命，这将给千千万万期待朝觐机会的穆斯林带来机会和

幸运，从而使朝觐活动纳入正常轨道；其次，各国舆论尤其是伊斯兰各国的新闻媒介都会关注这次朝觐团的行动，因此他们的言行，必须朝着增强中国阿拉伯人民友谊的方向努力，对由于时间和空间隔阂所带来的穆斯林兄弟之间一时半时的误解和疑虑，他们完全理解，除了进行必要的解释外，都要高姿态对待。鉴于上述原因，我国领导部门对朝觐团的组成十分重视。成员素质都很高，团长是全国政协常委东四清真寺伊玛目安士伟，副团长是中国伊协副会长张杰和新疆的大毛拉等，成员中包括上海伊协会长马人斌、宁夏伊斯兰经学院院长刘景隆以及中国伊协的马善义先生一共 16 人，朝觐团还专门选了一些经文，如"穆斯林之间要友好、信任，不要猜疑"等，在住房内高声诵念，有意让沙方人员听到。时间稍长，沙特人员也看出中国哈吉是诚心诚意来朝觐的。

当时，虽然中阿尚未建交，部分官方人士对人民中国有戒备心理，但沙特的普通穆斯林和各国来朝觐的哈吉，都对中国朝觐团十分友好。各国哈吉对中国今年能够派出朝觐团表示祝贺，特别是非洲哈吉，经常主动过来与中国哈吉握手、拥抱。我国朝觐团成员也主动作一些宣传，介绍中国民族宗教政策及清真寺修建情况，当外国哈吉们听说"四人帮"被粉碎、穆斯林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障时，纷纷高赞"玛沙安拉"，庆贺中国的灾难消失了。那年美国来了 300 多哈吉，一部分是黑人穆斯林，开斋时，他们主动给中国哈吉送来了水果，针线盒、矿泉水等物品，并听取中国哈吉对国内情况的介绍。1974 年访问过我国的阿联酋沙迦宗教局局长阿里·马哈茂德听到中国穆斯林终于来到了麦加，拄着拐杖前来看望，与安士伟阿訇共叙旧情，欣喜异常。当然，作为伊斯兰世界联盟的客人，中国朝觐

团也受到沙特官方的很高礼遇。如朝觐团于10月28日凌晨1时乘车去麦加大清真寺时，就有警车为其开道。中国哈吉的汽车随着人流艰难地向前蠕动，大家从车上远远望去，只见整个大寺披满华灯，辉煌壮观，那是一座高大而富有艺术特色的雄伟建筑，四周是两层高21米的围廊，有大小门64座，其中3座大门的灯塔和接近萨法山方向的一座高90米的巨型灯塔高耸入云。中国哈吉下车后，看到大寺周围的马路上挤满白色的人群，步入大寺的和平门，耳边是一片恭颂赞词的嗡嗡声。穿过那大理石砌成的宫柱林立的巨大围廊向寺内的中心广场眺望，蒙着黑丝绒幔帐的"克尔白"天房就矗立在此。中国哈吉们面对着像一颗明珠点缀着圣城麦加的天房，实现了多年的宿愿，禁不住感谢安拉对中国穆斯林朝觐的襄助。中国哈吉们在麦加期间，始终以一种崇敬的心情完成了全部朝觐功课，事后又去麦地那拜谒了穆罕默德的圣陵。当中国哈只从麦地那重返伊盟在米纳招待所等待办离境手续时。为迎候朝觐者而建起的巨大的帐篷城已奇迹般地从旷野上消失了，只有消毒车沿着大街喷洒着药物，百万朝觐者已经在完成天命功课后心满意足地奔向各自的归途。

11月10日夜，中国哈吉们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航程，那是伊斯兰教历第14世纪的最后几天，11天后，全世界的穆斯林迎来了伊历第15世纪。在旧的伊斯兰世纪即将逝去之际，中国哈吉前往麦加播下了友谊和希望的种子，因此，当新的一个伊斯兰世纪开始时，数目越来越多的中国哈吉再来麦加，就收获到了深厚的友情。

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10月10日，由国务院宗教局宛耀宾，中国伊协马进成、马云福，人民画报社李华英等16位哈

吉组成的中国朝觐团在沈遐熙团长带领下抵达吉达时，沙特方面很快办好了手续，中国哈吉翌日便乘车奔赴麦加，这时大家的心情十分激动，在车上不断高声朗诵“台勒比也”（应召词）。其实朝觐团路经卡拉奇时，沙特驻卡拉奇总领事赫亚尔就曾给以热情的帮助和款待。赫亚尔先生不仅很快帮助办理了签证，并诙谐地说：“明年你们来多少人，我给你们办多少人的签证，来一百万人我办一百万人的签证。”他还在官邸举行晚宴招待中国哈吉。当汽车进入麦加戒关时，见马路上空牌子上写着“非穆斯林禁止入内”。一位身着白袍、头顶红色头巾的年轻向导引导大家进圣城，他向中国哈吉道了：“色俩目”，这时大家更加激动了。当中国哈吉巡游天房时，部分团员挤进人群，幸运地摸到天房上镶嵌的玄石，他们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非常幸运，这次朝觐团住地离禁寺很近，只需步行 10 分钟就到了，因此，每天五个时辰都能瞻仰天房，在禁寺作礼拜。在驻阿拉法特的那天傍晚，中国哈吉徒步穿过层层白色帐篷，来到离住地很远的拉哈麦山山麓，由副团长玉赛因带领虔诚地诵念了祷告词《都阿》，表达了大家内心对安拉的感赞。住米纳时，为严守宰牲节 3 天内必须完成游转天房的法规，在汽车安排不上的情况下，中国伊协的马云福和另外 9 位哈吉头顶烈日，耐受着 40 多度高温，徒步 7 公里走到麦加城，完成正朝功课，受到了许多国家哈吉们的赞扬。同行的闽省三阿訇已 74 岁高龄，到麦加后因不适应高热而病倒了，许多哈吉提议租用担架或小推车推他游天房，跑萨法和麦尔卧，但都被他拒绝了。他说我慢慢游、慢慢跑，真主的回赐更大。使代表难以忘怀的是，沈遐熙团长和玉赛因副团长两次荣幸地见到了沙特哈立德国王。一次是出席国王举行的晚宴，见到了国王和沙

特政府的其他要人。另一次是在庆祝古尔邦节时，在国王的米纳行宫里再次与国王握手会见，国王一再表示："欢迎！欢迎！"朝觐团在麦加期间，无论在禁寺、街头，还是在商店里，人们都把中国哈吉以兄弟相待。在极为满足的心情下，1980 年的中国朝觐团圆满完成了朝觐功课，拓展了今后中国穆斯林奔赴圣地麦加之路，带着阿拉伯人民的友谊返回了祖国。

(三)改革推动经济振兴　自费朝觐方便穆民

自 1955 年中国穆斯林恢复朝觐活动，通常每年由国家出钱组织一些在国内外德高望重的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因朝觐的花费很大，而中国的各族穆斯林又有一千多万，国家拿不出更多的经费，只能组织几十人的朝觐团来代为表达全国穆斯林的心愿。五六十年代，我国国民经济正处于初创时期，人民生活水准普遍不高，再加上政策还没有开放，因此自费朝觐尚不可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1979 年中国穆斯林朝觐团的巡礼成功，使我国穆斯林通往麦加的朝觐之路重新畅通。同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穆斯林，尤其是广大农村穆斯林的经济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许多勤劳致富的殷实人家，如果每年仅组织几十人的朝觐团，显然无法满足广大穆斯林盼望早日踏上圣地的迫切愿望。因此，从 80 年代中期起政府开始安排穆斯林自费朝觐和利用出国探亲机会，由政府给自费朝觐者解决一部分外汇额度，朝觐在穆斯林普通群众中逐渐形成声势。据不完全统计，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公派朝觐团，1979 年为 16 人，1980 年为 16 人，1981 年为

21 人，1982 年为 22 人，1983 年为 23 人，1984 年为 22 人，1985 年为 25 人，1986 年也为 25 人，1987 年为 24 人，1988 年为 14 人，1989 年为 12 人，1990 年为 7 人。1987 年以后公派朝觐团人数减少的原因是由于中国伊协和各省区每年都要抽出一定数量的干部去从事朝觐群众的组织工作，担任领队和管理人员，同时由于有条件自费朝觐的穆斯林也日益增多，因此原有的独立组团形式根据形势发展必须改变，中国伊协等部门对朝觐工作的重点，也开始放在组织自费朝觐方面。从 1984 年起，用探亲和自费方式朝觐的中国穆斯林骤然增多，且增长迅速。如 1984 年新疆探亲朝觐者有 1375 人，其中 700 余人在巴基斯坦及时办理了签证顺利成行，约有 530 人，没有赶上，次年重新启程满足了心愿。1985 年新疆探亲朝觐者达 1864 人，宁夏、甘肃都首次出现了由 10 人组成的自费朝觐团，自 1986 年以后，我国穆斯林自费朝觐人数一度保持在 250 人左右，而探亲朝觐人数每年不等，少则几百人，多则有上千人。1986 年沙特公布当年中国朝觐者数目为 2267 人，其中新疆探亲朝觐者 1905 人，甘、宁、青三省区探亲朝觐者 93 人，其它省区自费朝觐者 243 人。这一年，我国首次派出朝觐工作组 10 人，配合沙特朝觐部共同做好为中国哈吉的服务工作。1987 年新疆自费朝觐者 200 人，探亲朝觐者 800 人，甘、宁、青、滇等省区自费朝觐者各 15 人，其它省区共 18 人，青海、甘肃还各有探亲朝觐者 93 人和 234 人。另外还有上年未赶上办手续而在巴基斯坦滞留的新疆朝觐者约 100 人，此外还有香港朝觐者 8 人，台湾朝觐者 50 人，当年全部中国朝觐者约为 1542 余人，1988 年甘、宁、青、新等省区自费朝觐者为 250 人，甘、青、新等省区探亲朝觐者约 730 人，当年全部中

国朝觐者约为1118人。1989年以后，中国朝觐和探亲（朝觐）者，包括从其它国家走的哈吉，人数多在2000以上。如1989年甘、宁、青、新、滇及其它省区自费朝觐者为258人，而探亲及自筹外汇朝觐者约1918人，全部中国朝觐者约为2374人。1990年中国朝觐者约为1459人，其中自费朝觐者为250人。1990年7月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立外交关系后，自费朝觐更为方便。1991年中国朝觐者统计为1499人，1992年为2080人，1993年猛增到5435人，其中有组织的朝觐者甘肃340人，宁夏207人，青海175人，云南174人，新疆800人，陕西48人，其余人为新疆、青海、甘肃自己前往探亲的，其中以新疆为最多，连西藏也去了6名穆斯林，这是该年朝觐者行列中的显著特色。1994年中国朝觐者总人数为6161人，其中甘肃443人，宁夏132人，青海165人，云南188人，新疆850人，陕西61人，河南47人，内蒙40人，其它省市35人，其余零散去的为4200人，其中3400余人来自新疆。应该说明，自80年代以来，伊斯兰世界联盟及伊朗、利比亚等伊斯兰国家也曾陆续提供过少量朝觐给旅资名额，资助一小部分中国穆斯林前往朝觐。

在新疆地区，维吾尔族穆斯林较早就通过自费或探亲方式出国朝觐，而在内地回族中，自费朝觐最早约出现在1985年，那年甘、宁、青三省各安排了10人，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也安排了17人。用穆斯林自己的话说，党的政策好了，给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也带来了活力。虽然自费朝觐对内地回族穆斯林来说还是个新事物，出门意想不到的事难免会发生，但他们为了完成天命，十分珍惜当前国内大好形势给穆斯林提供的良好机会，毅然收拾行装踏上了西行的路途。宁夏灵武台子清

真寺的马自安阿訇和其余9位宁夏哈吉，就是当年我国穆斯林自费朝觐的首批尝试者或先行者。出国前，宁夏宗教局的3名同志帮他们办理了一切涉外手续，护送这10名哈吉到达北京，在京的宁夏领导同志还与巴基斯坦驻华武官洽谈成功，让巴方回国家属乘坐下一航次，留出10个座位供宁夏穆斯林先出国。出了国门，一切就靠这10位宁夏哈吉自己掌握了。他们于8月14日晚上抵达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正要办中转吉达的机票，不料因按沙特方面规定关闭机场时间已到，12日停止签证。这一下可糟了，由于马自安等不懂乌尔都语和英语，没法与机场交涉。情急之中，恰巧遇上一位维吾尔族华侨，他帮助打电话与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联系，但使馆人员因他们来得太迟也爱莫能助。于是他们一面在机场清真寺休息，一面想，要获得放行，只有找能理解朝觐对一个穆斯林是无比重要的人才肯帮忙，于是他们求见了寺中阿訇。那位阿訇得知他们是中国穆斯林，立即表示欢迎，但开始还以为是缺乏经费才找他。领队的马自安立即掏出钱表示并非缺钱，这时阿訇笑了，弄明白了意思后，马上派人雇车送他们去沙特签证处，这时已是15日早晨了，可是一到签证处，不光没人办公，警察还不让靠近，管得极严。在这紧要关头，他们想起出国前沈遐熙会长为他们写的一封阿文介绍信，意思是委托伊盟办事机构帮助他们办理入境签证。由于有这封信开路，终于让他们进了签证处。办手续要填英文表格，他们找专门代办此事的人代填，并坐车去补照了像片。手续办妥后，已是16日，由于登机时间快到，他们在伊斯兰堡哪儿也没去。宁夏哈吉这次遇上的麻烦虽大，但当地巴基斯坦朋友给他们提供了热情的帮助，尤其是机场的巴方工作人员给予中国哈吉很大的同情和照顾，

所以归国途经伊斯兰堡时，他们专门向机场人员赠送了伊斯兰教用品。

马自安一行抵麦加后，住在三四十年代建立的中国哈吉接待站，楼房已翻新，共4层，每间房的地毯上可住40多人。因为当地熟食很贵，而白米、面粉都很便宜，他们便自己做饭。由于朝觐期间麦加人山人海，因穿统一戒衣人们穿着打扮都几乎一样，走上街满眼都是白茫茫的人流，稍不注意就容易走失。正朝还未开始，宁夏海原县的老哈吉蒲福祥就已走丢了，由于他没有记住住宿地点，又没拿地址牌，大家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其实在上百万人中寻一个人，真好比大海捞针。朝觐结束后，有人通知马自安等说医院里有一个中国人，宁夏哈吉们赶紧租车去看，一见面正是蒲福祥，双方都哭了。听他讲了经过后大家才明白，那天走散后他在禁寺北面寻找了几天，而当时宁夏哈吉在西面找，双方一直碰不上面。由于连续几天没有结果，蒲哈吉一着急就晕了过去，当地人只听明白他是中国人，但因语言不通，不知该把他送那里去，幸亏沙特在朝觐期间医院收治病人一律免费，于是就把他送到医院，一可解决他的食宿问题，二可保护他的身体健康。说话间，蒲福祥深深表露出对沙特政府和麦加穆斯林的感谢之情，他一见着祖国亲人，病也顿时好了一半。在麦加时，台湾来的哈吉还给他们赠送了伞、扇子、背心和熟鸡，因为每次都没有遇上送东西的人，但凭扇子上印着台湾一座清真寺的图片，可以肯定是他们送的。有一位祖籍银川的沙特华侨纳海先生，听说他们是宁夏来的，几次从塔伊夫市来麦加看望，听他们介绍家乡的变化。

正朝完成后，宁夏哈吉们又去麦地那朝谒了圣墓，然后直接跟巴基斯坦航空公司办事处联系回国。由于他们声明自己

不懂英语，因此吉达机场的服务人员怕他们呆久了不方便，只隔了一宿就让上了飞机，而许多外国哈吉等了十几天也没有拿上机票。然而等他们到卡拉奇时，误以为要到伊斯兰堡才能转机回国，就上了去伊斯兰堡的飞机，但到伊斯兰堡后，才知道这儿没有飞往北京的班机。出于无奈，在机场候机楼台阶上睡了两晚上，巴基斯坦方面招呼他们吃了两顿饭，然后让他们搭一架大飞机回到卡拉奇，经过种种周折，终于在 9 月 16 日平安地回到北京。由马自安等哈吉的经历可以看到，在中国伊协和各地宗教部门联合派出朝觐工作组以前，中国穆斯林虽然经济上有能力自费朝觐，但由于路程遥远、手续繁多，加上语言障碍和环境不熟，一路之上是十分艰辛的。宁夏哈吉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顺利完成了宗教功课，同时，他们的经历也很快引起了中国伊协等部门的重视，第二年，即 1986 年就派出了专门为中国哈吉服务的朝觐工作组，以便为广大自费朝觐者排忧解难，中国伊协的阿伊明、杨志波等与新疆的七位同志首次挑起了这一重任。

自 80 年代以来，我国穆斯林在完成朝觐功课后，总是努力搞好同世界各国朝觐者的关系，向外国穆斯林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和中国穆斯林的新生活。归国以后还主动作报告，写文章，向周围的同胞介绍伊斯兰国家发展科技文化的生动事例，讲述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新旧社会朝觐者的不同境遇，在穆斯林群众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如杨连凯《朝觐散记》（《中国穆斯林》1981 年第 2 期）、温亮《麦加朝觐杂感》（《西亚非洲》81 年 2 期）、尤苏夫（刘景隆）《麦加朝觐记》（《宁夏群众文艺》1981 年第 3 期）、马云福《麦加朝觐记》（《中国建设》1981 年第 4 期）、李华英《麦加朝觐与沙特阿拉伯见闻》（《编译参

考》1981 年第 1 期)、王根宝《麦加朝觐》(《宁夏日报》1983 年 1 月)、沈遐熙《谈 1984 年麦加朝觐之行》(《阿拉伯世界》1985 年第 1 期)、马万宝《西行朝觐日记摘抄》(《阿拉伯世界》85 年 2 期)、冶正纲《去麦加朝觐》(《民族团结》1985 年第 7 期)、马飞龙《麦加朝觐散记》(《新月》1986 年第 1 期)、马智雄《朝觐随笔》(《阿拉伯世界》1986 年第 4 期)、林松《朝觐漫记》(《新疆回族文学》1987 年第 1 期)、李沛沦《朝觐城杂感》(《新疆回族文学》1988 年第 1 期)、马守清《朝觐散记》(《民族报》1988 年 9 月 28 日,10 月 8 日)、敏生光《朝觐纪实》(《宁夏社会科学通讯》1990 年第 5 期)、马新三《朝觐回忆》(《智慧》1992 年第 1 期)、哈宝信《沙特朝觐纪实》(《民族团结》1992 年第 6 期)、叶哈雅·萨纳拜尔·林《朝觐漫笔》(《启明星》1994 年 5 月 30 日)、马利强《沙特王国采访录——在圣地麦加的日子里》(《中国穆斯林》1994 年第 3、4 期)。以往,在报刊上发表朝觐见闻的大都是一些穆斯林学者、记者和领导干部,但从自费朝觐出现后,一些汉文学识基础较好的宗教界人士和普通穆斯林也拿起笔杆,用生动的文字记述下震憾自己心灵的麦加巡礼过程和种种难以忘怀的感受。其中,甘肃临潭西道堂清真西大寺的教长敏生光哈吉,这位因十分关心民族教育和重视回藏汉各民族团结而屡次受到表彰的爱国宗教人士代表就曾撰写了一册《朝觐纪实》,全文感情深挚、文笔优美,充分表现了一个穆斯林光临圣城时感到幸福和无比虔诚的心情,全文刊登在《宁夏社会科学通讯》90 年第 5 期上。兹摘录部分精华介绍如下:

"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们甘肃省自费朝觐团一行 10 人于 1985 年 8 月初在首都北京集中,由

全国伊协协助，短期内便办妥了出国手续”，“8日飞抵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在这里住了十天，期间，曾到市区一带游览了这里的优美风光和历史古迹。”“到伊斯兰堡后，得悉沙特政府通知它的使馆停办入境签证的消息……（后来由中国驻巴使馆邱明伦同志帮助，终于办妥手续。）“我们搭上西行的飞机时。不免衷心感谢友好邻邦为增进中巴友谊所作的努力，为每个朝觐者所提供的方便和照顾；祖国的声誉和邻邦的友情，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

“激动人心的应召词中，各国穆斯林心心相印——8月18日当地时间下午3时受戒后，我们登机起飞，飞机在蓝天白云中平稳穿行，机仓里响彻了高声赞颂‘团然比耶’应召词的声音”，“赞念声时起时伏，在奉应伟大安拉的召唤声中，人们忘记了言谈和欢笑，机窗外，白云翻腾，彩霞映照，人们个个心潮澎湃，起伏不平，完全沉浸在一种甜蜜而幸福的遐想和心驰神往的期待中，盼望早点接受圣洁的洗礼，同机的朝觐者们，虽属不同国度、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但在共同的信仰和共同所念的阿拉伯语赞词中，众心维系，心心相印，增进了彼此的相互了解和真诚友谊”。

“心潮澎湃的时刻——夜幕深沉，忽然在机翼下展现出一派灯火辉煌的旖旎美景”，朝觐者的飞机降落在吉达空港，敏生光等“做完晌礼后去麦加。在高声朗诵应召词声中，小轿车缓缓开近全世界穆斯林向往的圣地——克尔白。当雄伟壮观的禁寺及其高耸巍峨的尖塔映入眼帘的时候，我和全体朝觐者们的心境豁然旷达，一种沐浴在

真主阳光下，普受恩泽和幸福的情感似潮水，不时在胸中激荡，不由使人潸然泪下”。

“巡游天房——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先知门，远远见雄伟壮丽的克尔白屹立在圣寺中心，巡游的人群像海潮似的滚动不息。天房啊天房！你怎样吸引着千百万穆斯林前来朝觐。你怎样维系着千百万穆斯林纯洁的心，紧握着真主的绳索，遵从安拉的晓喻，增进了世界穆斯林之间的团结？我们每个朝觐者，含着热泪和虔诚的心境溶入巡游天房的人海中高声朗诵着大赞词。”“我们拥挤在人群中巡游了七周，虽然汗水湿透了戒衣，却完全忘记了困吨。”

“疾行于渗渗泉——为了纪念真主的标识，在萨法和麦尔卧两山之间修起了400米的长廊楼亭，我们就疾行在铺有大理石的走道上，朗诵着祷词，在有两山遗迹的地方，念求祈祠，来去7次后，即去饮渗渗泉水。多少先知在此得以解渴，亿万穆斯林吮吸着乳汁般甘甜的泉水，陶冶着对天房充满神奇感的心灵。”

“正朝开始了——教历12月8日，天气晴朗，碧空万里，这天是正朝开始的日子。随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的情绪更加高涨了，心境亦如这晴朗太空般的明净。我们甘肃朝觐团的部分人，伴随住在沙特的亲戚、朋友去做正朝，者全福、韩哲民等教长与我随着东南亚地区的朝觐团体进行正朝。吴永泰阿訇有病行动困难，起居不能自理，……鉴于此，我们搀扶着病人步履艰难地走向米纳、阿拉法特，圆满地履行了朝觐功课，实现了自己的宿愿。”“12月9日，是阿拉法特正典日”，“这天是‘立站礼’的一天，

'安拉伟大'的大赞词响彻山谷，直冲云霄。正朝的晌礼和晡礼同时进行。尽管烈日当空，天空炎热，但朝觐者们还是身着白色戒衣，围绕拉哈玛山，不断地赞念、祈祷。我想，如果全世界的穆斯林不受区域、肤色、贫富等之限制，每年每月每日都象此时此刻，以坚忍不拔的信念团结在安拉的正道上，人类持久的和平、安宁与幸福一定实现。"

"宰牲与射石——在奈哈勒日，我们完成了宰牲的功课。宰牲日，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每年都举行盛典的日子。在遥远的异国土地上，在神圣的日子里，我们遥望东方，想起了祖国。我为祖国的穆斯林同胞致以真诚的祈祷和良好的祝愿！我又想到我们祖国穆斯林集居的各地，各位伊玛目在古尔邦节怎样讲述伊卜拉欣圣人奉命把爱子易司玛仪为主做牺牲的动人故事……朝阳初升，我们踏上去射石的道路。在米纳谷口，相传先知伊卜拉欣奉命牺牲易司玛仪的时候，受到恶魔的打扰。伊卜拉欣投掷石子，清除邪恶，发扬正义，结果感动了安拉，赐羊献牲。后来为了仿效先知的行为，穆圣在辞朝中，也投石恶魔；今天我们郑重地履行了第一次射石。"

敏生光等在麦加遇到了一位华裔教师，他用自己的小车引领他们参观了阿拉法特的米那赫凡大寺，阿尔法奈姆顿大寺，再次瞻仰了拉哈玛山及米纳地区先知穆罕默德出走麦地那避过难的"骚然"山洞。在天房，甘肃哈吉们还多次亲吻和抚摩了玄石，另外，看到鸽子"从不在天房顶上飞越"，"盘桓的鸽群，总是绕着天房而飞旋，或者飞到天房旁边就倒翅而飞。我们目击这种稀奇的现象，询问世居麦加的侨胞，他们说：'天房的威严就在它的许多异迹……'闻之令人赞叹不已"。他们还

看到"麦加禁寺里陈列着千万卷《古兰经》，放置在四周的经架上，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男女哈吉们在全神贯注地各自诵读《古兰经》。集五洲四海之男女穆民于一地，同时恭诵《古兰经》，这在世界其他地区是罕见的，唯麦加、麦地那两个圣地得天独厚。"几位甘肃哈吉在夜礼后巡游天房时，常发现在游转的人群中有一缕缕青烟萦绕而上，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位管理天房的长者，掌着一盘金质香炉，满盛着龙涎香等高级香料，围绕着天房巡游。袅袅青烟从香炉里升往夜空，散发在空气里，异香使其他巡游者们感到沁心的舒适。他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再次瞻仰过的禁寺，其时辞朝的人依然非常之多。各国哈吉们互相致礼，挥手告别。我们完成辞朝，走出和平门，不少人的眼里滚动着晶莹的泪花，挥动着双手。告别了，克尔白！告别了，麦加！经受洗礼的人们更增加了在真主的道路上，为伊斯兰教门和人类友好事业多做贡献的坚定信念。

9月21日傍晚，敏生光哈吉等向麦地那进发，495公里路程走了7个小时，"此刻正值拂晓，高耸入云的塔尖，庄严肃穆的圣寺、圣陵的绿色拱北，附近各建筑等新颖奇特的景色，一一映入眼帘，真是美不胜收。晋谒的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每个朝觐者的脸上，显露出激动不已的情绪。我们在圣寺礼了晨拜。瞻仰圣陵的哈吉们在拱手祈祷、恭诵《古兰经》时，个个声泪俱下，以寄托他们的哀思，和对先知的深切怀念。""在圣寺院内，我们听到了伊拉克女哈吉们的高赞，也看到了非洲黑人女穆斯林虔诚的恭诵，东方的哈吉，西方的哈吉，大家聚集一堂，共同道出吉庆的色兰和祈求人类和平的心愿。"随后他们又瞻仰了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首创的古巴艾清真寺，和他在此礼晨拜后奉命改换朝向对着麦加禁寺的格

布赖台尼清真寺，以及埋着无数先贤的班格尔坟园，和由昔日壕战遗址改成的法蒂玛花园。敏生光哈吉出于对民族教育的关心，还特别留心考察了沙特的教育状况。

临别麦加时，敏生光满怀激情地感叹："西行的40天，是我一生最感幸福，最难忘的40天"，"我感到在这伊斯兰教的发祥地，瞻仰、参观、学习、游览的时间太短了，对于这里的名胜古迹、风物人情，我考察了解到的也还太少了。但是我知道，随着每年朝觐人数的不断增加，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去那里瞻仰和参观学习。"最后，他在回顾和侨居沙特的中国穆斯林多次团聚的欢乐时刻时还感受到："自费朝觐团"的影响在沙特逐步扩大，因为侨胞们从甘肃哈吉们无拘无束、言谈欢笑中清楚地看到祖国对外政策的开放、经济的好转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正当自费朝觐一年一度顺利开展，并越来越吸引举意朝觐并有经济能力的广大穆斯林时，恰好发生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当时严峻的形势下，许多人担心当年的朝觐会实现不了，然而事实证明，党和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不会变，因此，在各级伊斯兰教协会及政府宗教管理部门的奋力合作下，宁夏灵武县的马廷贤等73位哈吉和全国其他省区的近两千名哈吉一起，顺利履行了朝觐功课。尤其使他们难忘的是，马廷贤等900位哈吉，还首次乘坐中国伊协与中国民航共同组织的包机直飞吉达。为此，马廷贤也写了一篇记述长文，题目是《终身旅游——回行朝觐日记摘抄》。

据马廷贤记述，虽然当时正值"六四"风波高潮，但6月7日他们从县上出发时，灵武县的党政领导专门召开了欢送会，祝贺哈吉们一路平安。到达宁夏首府银川后，全自治区73

位哈吉又组成了一个总团，下设2个分团，并分成8个小组，以便互相照应，6月9日，自治区主席白立忱在民委、宗教局、伊协等领导的陪同下专门接见了哈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和大家共进午餐。次日，宁夏哈吉们就启程赴京，临行前晨礼时，大家都礼了两拜告别故乡的"乃麻子"，祈求安拉纯洁自己的意向，给自己恩典，以便最完美地完成朝觐。从驻地到达火车站时，前来送行的人很多，整个站台几乎全是戴白回回帽的穆斯林，情景令人感动。到北京后，中国伊协的沈遐熙会长、马贤副会长又来看望大家。在伊协朝觐工作组的精心安排下，全体宁夏哈吉直飞吉达，并很快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克尔白。每个朝觐者在首次见到克尔白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有的像触电一样的颤抖着，有的情不自禁地呜咽着，还有的激动得不能发出声响，但无论是谁，大家都陷入了一种甜蜜而宁静的深厚感情之中。在作了天房巡游等功课后，宁夏哈吉瞻仰了禁寺风貌，只见大殿内和奔走长廊中，装有5.5万盏具有东方艺术特色的照明灯具，入夜华灯齐放，把大清真寺照得如同白昼。寺内还装有8000多台电扇，白天黑夜不停开动，为朝觐者驱赶暑热。

马廷贤感到最为庆幸的事，是两次亲手抚摩到了玄石。第一次是6月23日主麻那天和大家一块游转时，刚转到第二圈，人潮把他推到黑石跟前，他用右手一把抓住黑石边缘不放，虽然身体被人群挤得架空起来，但激动的心情真难以言表。第二次是6月25日和大家一块去天房作副朝时，当大家游转到第3圈时，警察过来让人避开，说要清洗天房。当清洁工用香水冲洗时，哈吉们都避到外围，他看到这是个触摸玄石的良机，就在清洗即将结束时，不顾警察的阻拦，直奔玄石而

去。由于摸玄石心切，加上清洗过的地面很滑，一不小心就跌倒了，但他顾不得腰腿疼痛，在警察的搀扶下刚爬起身，就扑到了玄石跟前，并将头部紧贴在玄石上，一时间清香扑鼻，他也热泪满面，泣不成声。后来在阿拉法特作集体功课时，他又亲眼目睹了200多万人同时礼拜的宏伟场面，大家"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人人泣不成声"。他们在麦加时生活上自己起灶，灶具很简单，就是一口锅，一个电炉子，一把刀子。和面用的是锅，擀面用的是醋瓶子。每个房间就是一个伙食单位，都有一人专管伙食。其实，绝大多数自费朝觐者的日常生活都像这么俭朴，因为要说起来，他们的家境都是近几年才开始好起来，出国朝觐一次，要花费一万多人民币，对他们来说绝非小数目，所以在平常就非得节省不可。虽然自费朝觐的中国穆斯林绝大部分是普通农民、宗教人士和城镇居民，然而，他们这种重信义薄财帛的追求精神，以及坚忍耐劳、趋善止恶、团结穆民、增进友谊的行为举止，却是足以令各方面的人士所钦佩的。

（四）朝发夕至直飞吉达　中国哈吉倍增豪情

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自1979年重新畅通以后，虽然沙特阿拉伯和中国尚无外交关系，但数以万计的中国各族哈吉通过自己在圣地的言行，开展了一种特殊的人民外交，不但加深了中国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的友谊，也进一步增加了中沙两国政府间的了解和信任。多年来，实现中沙建交，不仅是我国在新时期外交工作的重点，而且也是国内广大穆斯林的迫切愿望，因此确切地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于1990年7月建

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的盛举，其中也有中国哈吉们的一份功劳。

自70年代末朝觐活动恢复正常后，中国穆斯林的良好道德风范和认真细致地履行宗教功课的实践，使多年来在阿拉伯和各国穆斯林中间产生的对中国的种种误解甚至不信任感逐渐消除。阿拉伯和各国的穆斯林看到中国哈吉身心健康、言谈自如、行动自由，他们开始相信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政府是关怀穆斯林的，因此有的沙特官员和群众赞赏中国朝觐者说："你们是真正的哈吉。"如果说1979年文革后组织的第一个中国穆斯林朝觐团还免不了遭受一些冷遇和猜忌，那么自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哈吉抵达圣地履行天命，两国穆斯林的接触日益增多，沙特政府和伊斯兰世界联盟对中国组织穆斯林的朝觐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方便，对中国哈吉本身则表示出更大的尊重和给予更多的礼遇。如1982年中国伊协副会长马贤哈吉随中国朝觐团一行共21人前往麦加时，伊盟早已做好接待的准备，因为朝觐办公室的向导先行把他们接走，所以伊盟后来重派车将他们从向导安排的旅店接到伊盟设在米纳的招待所去住。到那里后，当年6月曾来华访问的拉哈麦图拉弟兄提供的真诚帮助，伊盟顾问法塔哈博士表达的热情关照和伊盟秘书长哈尔卡尼长老的及时会见和友好交谈，使中国哈吉有"宾至如归"之感。伊盟是个国际性的伊斯兰教组织，创建于1962年，总部设在麦加，并受到沙特政府的支持和资助。1971年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成立后，也给予它很大的支持。它自称是一个民间性的宗教组织，不干预政治，以宣传伊斯兰教、向各国穆斯林提供经书、教师及必要的经费为宗旨。过去该组织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没有联系。1979年我国穆斯林朝觐团在沙特受到它的接待后，开

始有所接触。1982 年 6 月伊盟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建立了更进一步关系。此次伊盟秘书长和中国哈吉一见面，就对中国伊协邀请伊盟代表团访华及对他们的热情接待一再表示感谢。伊盟访华代表团团长贾姆珠姆先生听到中国哈吉来，就转来了“赛俩目”，并邀请他们来家做客。在伊盟的安排下，中国朝觐团全体成员应邀出席了王储兼副首相代表国王举行的国宴，后来又参加了沙特国王在米纳行宫举行的接见仪式。在进入接见厅时，领先的是伊盟的理事，接着便是中国朝觐团成员。仪式开始朗诵《古兰经》，接着是伊盟秘书长、朝觐和宗教基金大臣以及代表外宾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先后讲话。其后，来宾依次与国王和王储一一握手，祝贺节日。朝觐仪式结束后，从麦加归来的中国哈吉们一致认为伊盟的热情而友好的招待对自己顺利完成朝觐功课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对那些为中沙两国人民和穆斯林之间友谊铺路的弟兄们，遥寄深切的谢意。

1984 年是文革后第六次组织朝觐团去麦加，那是我国公派人数最多的一年，共 98 人，也是我国朝觐团在沙特受到礼遇最高的一年，宁夏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冶正纲等参加了这一年朝觐。此外，还有约 800 名新疆自费朝觐者参加了麦加大典，震动了沙特朝野。往年在朝觐期间，当地有的报纸总要登一些对华不友好的文章，抨击我宗教政策，也不正面刊登我国朝觐团的消息。但这一年，我国朝觐团还未到达沙特阿拉伯，当地报纸就先报导了消息，法赫德国王还亲自打电话给沙特驻卡拉奇总领事，告诉他，中国穆斯林朝觐团是国王的客人，要友好接待。因此中国哈吉在卡拉奇以极快的速度办好了入境签证，到沙特后，又受到了沙特政府和各界穆斯林的热烈

欢迎。朝觐期间，法赫德国王先后两次盛情接待中国朝觐团，一次是举行盛大国宴，邀请我国朝觐团30名成员出席；另一次是宰牲节，沙特有关方面又安排中国朝觐团5人在前排就座，并安排为第五个被国王接见的朝觐团。法赫德国王见到中国穆斯林朝觐团时，非常高兴地和团长紧紧握手，并说："欢迎中国穆斯林来麦加参加朝觐"。同时又说，他知道中国穆斯林现在情况很好，祝愿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人民幸福。朝觐期间，沙特的很多报纸多次比较客观地报导我国朝觐团的活动情况，《国家报》、《麦地那报》等报刊刊登了中国朝觐团团长及成员做礼拜和朝觐团在阿拉法特山做宗教仪式的照片，对我国的称呼也从"共产党中国"、"赤色中国"改为"人民中国"，并公布了"人民中国"的朝觐数字。沙特的电视、广播和一些报刊的编辑、记者也多次采访我国朝觐团，并撰专文报道。著名的《欧卡兹报》刊登了中国朝觐团1983年来麦加时的情况，还介绍了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以及中国新疆穆斯林的现状等。有一家报纸在刊文介绍中国穆斯林情况时，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政策，称赞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策稳定，特别是开放政策深得人心。旅居当地的华侨见到中国哈吉更是热情拥抱，畅叙乡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欢迎他们。这一年四至五月伊盟副秘书长阿布迪长老率团访问了乌鲁木齐、喀什、银川、同心、兰州、临夏后，深有感触地说："中国是真正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我们百分之一百地认为中国的伊斯兰教是非常好的。""这里的穆斯林尽管穷，他们在真主的事业上如此虔诚尽心，使人感动。"

80年代初，我国因与沙特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所以省部级以上的高层官员几乎没有一位访问过该国，这种情况，到

1985年出现了突破。这一年四至五月，由黑伯理主席率领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穆斯林友好访问团一行14人，先后出访了巴基斯坦、埃及、北也门、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原先没有想到沙特阿拉伯能欢迎代表团前往，但到了巴基斯坦后，齐亚·哈克总统亲口提出了三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建议宁夏穆斯林代表团去沙特访问，并表示给沙特国王写信联系。哈克总统两次征求在场的我国驻巴大使王传斌的意见，并很风趣地说："大使是不是同意？先要大使同意了，我才好联系。"王传斌大使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当代表团从埃及等国访问结束抵达科威特时，得到了我国外交部对宁夏穆斯林代表团访问沙特进行副朝的批准。在巴基斯坦驻沙特大使馆的协助下，代表团迅速办好了去沙特的入境签证，并于5月8日抵吉达，受到伊斯兰世界联盟总部工作人员和驻吉达代表的迎接，巴基斯坦驻沙特使馆参赞也到机场欢迎。但即使是参加副朝，来自世界各国到麦加朝觐天房的人每天也平均有20万名左右(正朝时200余万人)，代表团能不能顺利完成自己的使命呢？但这个担心很快就被证明是多余的。一下飞机，伊盟就为代表团安排了副朝仪式，满足了这14位宁夏穆斯林瞻仰克尔白天房，对圣地麦加表示无上敬意的多年心愿。完成副朝仪式后，负责接待的伊盟又提出要代表团延长访问时间，并组织观光了麦加、麦地那、利雅得、扎兰、朱贝勒、塔伊夫、吉达等七个城市。除瞻仰伊斯兰圣地、古迹和知名大清真寺以外，还参观了国家电视台、伊斯兰大学、古兰经印刷厂、费萨尔国王医院兼研究中心、灯具厂、朱贝勒石油化工城、海水淡化厂、天房幔帐织造厂。会见了伊盟总部秘书长，三个副秘书长，沙特伊斯兰伦理研究、宗教法解释和指导总署署长兼世界伊盟主席和王室工业管理

机构总经理，与伊斯兰开发银行行长、商会主席商谈了经济合作问题。宁夏代表团认为，与阿拉伯国家交往，必须充分发挥穆斯林的作用，因此利用各种机会，介绍中国穆斯林特别是宁夏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生活情况，从而引起沙特各方面人士的关注。沙特总穆夫提(伊盟主席)听说宁夏要建伊斯兰文化中心，毫不犹豫地表示要支援宁夏伊斯兰经学院和同心阿拉伯语学校这两个项目。伊盟秘书长纳绥夫还说："文化革命当中，我们不知道中国穆斯林的情况，世界各地都向我们打听，我们也说不清楚。伊盟副秘书长阿布迪去中国回来，在宁夏也作了考察，说中国穆斯林很虔诚，享有真正的信仰自由，我们才放了心。他正在写一本书，介绍中国的穆斯林。我们感谢中国政府对中国穆斯林兄弟的关怀。"由于双方了解的加深，在沙特，宁夏代表团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们乘坐的汽车上挂有"政府代表团"标记，凡乘车外出，都有警车鸣笛开道护送。由于我国同沙特没有外交关系，开始接触时对方有些人有点拘束，后来越来越亲近，比如接受小礼品后，把"中国宁夏"小型纪念章公开佩在胸前，连警察也佩带。又如参观沙特部队医院时，少将院长亲自讲解，当有人催他讲快点，不要影响下一个参观项目时，他说："王室嘱咐过，要好好接待人民中国代表团，我不能马马虎虎。"在代表团离开沙特前两天，伊盟秘书长还正式告诉黑伯理团长，本来已经安排了会见沙特国王，由于利比亚总统卡扎菲突然访问沙特，打乱了国王的工作计划，很对不起，表示歉意。宁夏代表团在沙特前后访问了 12 天，事后，我国驻海湾国家的使馆和中国驻外经贸公司的负责人一致认为，宁夏代表团这次能以副朝的名义进入沙特并到首都等地进行访问，不能不说是两国政治关系上的一个突破，这也

说明穆斯林友谊是一种推进中沙两国接近的助动力。

也就在1985年8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17次穆斯林朝觐团共40人，与各族穆斯林自费及探亲朝觐者约1900余人，前往麦加履行功课。上海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的马智雄教授参加了这次朝觐，据他记述，当时国内的五位担任政协人大职务的省、部级干部持有红皮外交护照，其他团员一律持绿皮公务护照。到吉达海关后，按规定要把护照全部交上去，并填写很详细的登记表。朝觐团认为，中沙两国虽未建交，但在各种场合表现了对中国的好感，不久前，沙特就曾热情接待了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率领的穆斯林代表团前往副朝，以诚相待是伊斯兰教的良好传统，实事求是和真诚相待又是中沙两国理解的前提，只有建立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友谊，才是真挚可靠的，于是一致决定按要求如实填写，对五位省部级穆斯林干部也不例外。登记表交上去后，沙特方面的负责人详细看了半天，并询问了不太明白的地方，没有发生什么麻烦。后来正朝结束，由沙特方面安排的刚卸任的麦加地方长官哈米德亲王接见中国朝觐团时说，中沙两国虽然没有外交关系，但中国是个大国，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世界上都能引起反响，“这几年来我们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所执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以及这项具有远见的政策在中国国内引起的巨大变化和国际上的惊讶反应。而令我们高兴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使中国穆斯林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这个方面最好的说明是这几年中国穆斯林朝觐的人数越来越多，这同时也证明了你们享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接着他感谢万能的安拉，使自己“今天能与在座的各位会见谈心。你们是中国穆斯林的杰出人士，在中国的党和政府各部门中担任高级职务，我们感到

由衷的欣慰和高兴。我们没有想到穆斯林能在中国的省和中央政府里担任高级职务，这不仅是中国穆斯林的光荣，世界穆斯林也为之感到自豪。”他还表示，沙特期待有更高级的中国穆斯林代表团来访。亲王的这番肺腑之言，使大家心存的一丝疑虑及朝觐中的疲劳都一扫而光。在麦加期间，伊斯兰世界联盟除承担中国朝觐团的全部费用之外，还给他们特别的关照。归国时朝觐团因手续未办齐延误了行程，当伊盟秘书长纳缎夫得知他们滞留吉达的消息后，即派助手到旅馆表示歉意，并表示在吉达的一切费用仍由伊盟负责。那位助手是中国通，和代表团很谈得来，除派两部旅行车供他们参观使用，当晚还亲自驾着私人汽车陪同在红海之滨游览，品尝当地风味小吃。同年 12 月初，现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当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的司马义·艾买提率团访问沙特进行副朝，同样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

通过 80 年代中沙双方主动发展信任与协调的关系，1989 年，两国达成在对方首都互设商务代办处的协议。虽然沙特商务代表一时未能来北京，但中国伊协与中国民航仍分别主动同沙特有关方面联系办理签证和中国民航飞机在吉达机场降落问题。在国务院宗教局和外交部的帮助下，我驻沙特商务代办处与沙特有关方面联系后，终于同意当年中国 900 名朝觐者可在吉达机场办理入境签证；沙方亦批准中国民航飞机直飞沙特，在吉达机场降落并在朝觐结束后将中国哈吉接回北京。1989 年 6 月 15 日至 27 日，由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中国民航组织的民航包机 6 架次分别运送 900 名中国自费朝觐者和探亲（朝觐）者（其中有妇女 100 多人），顺利抵达沙特阿拉伯吉达机场，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900 名哈吉直飞吉达，

使1989年的朝觐非同一般，它不仅体现了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反映了中国穆斯林经济上有了提高，同时也反映了我国民航事业的发展和强大，更反映了中沙两国关系的新发展。特别是900名中国哈吉在吉达机场签证一事，没有沙特政府的特许是绝对不行的。另外，运载中国哈吉的中国民航包机直飞吉达成功一事，也为今后我国民航飞机运载中国穆斯林朝觐者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继中国哈吉直飞吉达成功后，中沙两国穆斯林及其政府间的关系更加密切。1990年7月21日，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从而为全面开展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奠定了基础。同时，沙特方面为中国穆斯林赴麦加朝觐提供了更多的方便和优厚礼遇，比如多次安排中国哈吉参加洗天房。众所周知，洗天房是一项极为荣耀的工作，请外国穆斯林参与，是对其国家或本人的一种崇高礼遇，通常极难获得这种机会。1956年包尔汉曾受邀请洗天房，以后中国哈吉长期没有再获得此种殊荣。直至1989年，沙特重新邀请我国哈吉参与此举，我方去了1人；1990年，则去了3人。1991年6月13日，正在麦加朝觐的回族穆斯林、上海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哈宝信有幸参加了清洗天房，据他介绍：按规定唯有国王、亲王、军政要人、伊斯兰教学者和国外重要贵宾才能享此殊荣。那天有两位亲王参加，一位是内务部长，一位是麦加城的总督；此外还有一些重要贵宾，也就几十个人。那天他去得较早，可天房跟前已水泄不通，幸亏有位警察见他佩戴着通行证，就拽住他胳膊拼力挤开人群，将他护送到天房跟前。在做晨礼之后，清洗天房的仪式就正式开始了。所谓清洗，主要是松开旧的天房帷幔，以便换上新的。天房用褐色的石头砌起，

上面用帷幔罩着。帷幔用毛线缝在粗粗的麻绳上，麻绳固定在大大的铜环上，铜环再固定在石头上。洗天房的人把拆下的毛线之类东西往外扔，这时天房四周人山人海，群情激动的哈吉们拼命争抢扔出来的东西，不少人泪流满面、失声痛哭。他看到有的人是拄着拐杖来的，此时也靠了精神的支撑和信仰的力量，扔掉拐杖随着人群一步一步地走了起来。帷幔松开后被卷至4米高处，然后用2米宽的白布将露出天房的石头再围护起来，清洗天房的第一步礼仪程序就是这样。第二步，是开来几千名警察，将天房内外围了三圈，让清洗天房的贵宾们在腾出的空地上进行仪式。然后让贵宾们跪在地上等待，而沙特政府的大臣们转完天房礼拜后，也趴在天房墙上一动不动。不一会，推来一个类似飞机弦梯的大扶梯，对准天房那扇用金箔包裹的大门。天房金色大门的门槛距地面2米高，清洗天房的贵宾们顺梯面上，交出内务部发的通行证，进到天房内，里面没有灯，只有借助于从门外射入的光线。贵宾们向四周各礼两拜，只见里面墙上的绿色丝绒毯也被卷起，下面的大理石裸露了出来。天房里仅有的三根柱子旁挂着些阿拉伯工艺香炉，里面熏着香料，烟雾袅袅。出天房后贵宾们又绕天房七圈，在伊卜拉欣立足处礼拜，整个天房清洗仪式才告完成。

当我们回溯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曲折过程与种种插曲时，不得不把年复一年、数以千计的中国哈吉称作架设两国之间感情之桥的友谊使者。然而，客观地说，那些帮助中国哈吉播种友谊的人们更是功不可没，多年来，从中国伊协到各省市自治区的伊协及宗教管理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帮助中国穆斯林朝觐者比较顺利地完成朝觐天命，他们通过自己大量细致深入的工作来体现党和政府的

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来转达党和人民政府对各族穆斯林的尊重和关怀。因而，中国伊协、地方伊协及各级宗教管理部门组织朝觐的这项工作，也始终如一地得到外事、公安、银行、卫生、交通等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上述部门的大力支持，要把全国各地情况各异、年龄不一的几千名穆斯林朝觐者集中在一起，办理好各种必要手续，并安全迅速不误期限地将他们送出国门并迎接回来，则是不可能实现的。自然应该看到，从中央高层领导到各省市自治区的党政领导，对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也是极为重视，并通过采取各种必要措施给予保障。如果作个比喻，把各级党政领导作为组织这项跨国界宗教活动的指挥员，各协助单位是必不可少的后勤部队，那么中国伊协、地方伊协及宗教管理部门的同志就是第一线的战士。他们一年要抽出三至四个月时间来从事各种具体、繁琐的朝觐组织管理工作，面对来自祖国各地，而平素又很少出门更不用说出远门的各族哈吉，其中大部分又年岁偏高，文化偏低，他们的工作必须加倍地细心、耐心和有责任心。当然，中国伊协等部门的同志所以能把这件大事妥妥贴贴地办好，首先在于他们自己对各族穆斯林哈吉有一颗真诚的爱心。

具体来说，我国组织穆斯林朝觐的工作，大致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1、组织专门服务机构。中国伊协抽调部分干部、职工，组成接待、机票、签证、培训、检疫（黄皮书）等服务小组，积极开展对外联系和认真做好内部安排，为来京的哈吉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工作。而各省、市、自治区伊协及宗教局也分别在所辖地区进行登记组织。协助哈吉办理各种出境及换汇手续，并将朝觐者编排成组成团，以便互相照顾。然后，由专人护送朝

觐团进京，并一直陪伴到国外，负责为哈吉服务。

2、提供食宿和礼拜场所。哈吉们到北京集中后，中国伊协根据自己的条件为一部分哈吉提供食宿服务，同时为保证哈吉们礼拜的需要，伊协沐浴室整日备有热水，供哈吉们大小净，并且在协会的礼拜殿礼五时拜功。不仅在中国伊协住宿的哈吉们到此礼拜，在周围旅馆住宿的哈吉们也前来凑"者麻尔特"，有时人数达千余人之多。另外，哈吉们有机会赴圣地麦加去完成自己的天命，其高兴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但如何进行朝觐？途中和在国外应注意哪些事项？绝大部分人是陌生的，因而产生了担忧。针对这种实际情况，中国伊协国际部于1986 年 3 月和 1993 年 5 月先后两次编印了《朝觐须知》，介绍了朝觐的条件、种类与形式及出国注意事项，并附有一些中阿文对照的朝觐祷词。同时，中国伊协还组织报告会，播放录像片，对哈吉们关心的问题进行全面而形象的介绍。这样一来哈吉们有的说："听了报告，心里踏实多了。"还有的说："这是出国前哈吉们的必修课。"普遍反映良好。

3、安排检疫，注射疫苗。根据沙特政府通知，凡到沙特者必须注射预防脑炎的疫苗。尽管有的省市在地方上安排哈吉注射了上述疫苗，但所持注射证明不是国际通用的"黄皮书"，来京后也要重新更换。中国伊协将北京检疫所医生接来，为哈吉们注射疫苗并发给注射证书(黄皮书)或更换那些不合规格的注射证明。

4、护送哈吉登机。为了减少哈吉们初次出国办理机场手续的困难和保证大家按时有秩序地上飞机，中国伊协在有关部门配合下，为哈吉们组织车辆并送往机场，在机场为每位哈吉办理手续，使中国民航班机准时起飞。除了从北京起飞的包

机是这样办，1993 年开始从乌鲁木齐起飞的中国民航包机，也由当地伊协及宗教管理部门代办一切手续和送上飞机。开始时，部分哈吉为及时受戒，在飞机上进行小净，泼洒的水流给飞行安全带来了隐患。后来中国伊协一方面向哈吉宣传飞行安全与卫生，另一方面调整了去麦加的时间，即飞机降落吉达后不立即去麦加，而是安排哈吉先去麦地那瞻仰圣寺，这样就可以在地面上沐浴受戒，妥善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5、开展境外服务。在国务院宗教局的关怀下，中国伊协从 1986 年开始，每年派遣由 8 至 12 位人员组成的工作团，分别在巴基 斯坦的伊斯兰堡、沙特的吉达、麦加和麦地那为中国哈吉服务，安排住处、交通。如在麦加安排到米纳、阿拉法特山，乃至麦地那的交通、吃住，并帮助解决临时发生的各类问题，如医疗、丢失机票和钱物、甚至有的哈吉迷途丢失等。凡是哈吉在国外发生的问题，我工作团都尽可能帮助解决。

从 1979 年中国恢复派出朝觐团，及自费朝觐的穆斯林每年都顺利地在圣地麦加举行伊斯兰教大典，而且人数逐年增多，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我国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最好的宣传材料，在国内外均产生了良好的反映。同时，各方面人士对中国伊协等部门为哈吉们提供的完善、周到的服务，也一致给予好评。对广大中国哈吉来说，他们一方面对党和政府的开明宗教政策以及中国伊协等部门提供的圆满服务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几十天的出国巡礼，对祖国和现实社会也产生了许多新的认识，其感受非常之深。

其一，他们抚今追昔，深深感到穆斯林如今在国外能受到尊敬，与祖国的强大是分不开的。旧中国，由于国衰民穷，中国哈吉出门在外，受到过许多侮辱和不公正的对待。如 1936 年

留学土耳其的马明道陪同300多位新疆哈吉，从伊斯坦布尔乘船去麦加，由于这些哈吉穿越亚欧大陆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个人卫生都来不及搞，因此托马明道转达要求船上多供应一点开水。不料这件事会招恼了与马明道同舱室的一位叙利亚人，他认为中国人好欺侮，当着马明道大喊："你为什么把这些畜牲弄到舱里来，臭得很，脏得很！他们不是人，是驴，是一些脏驴。"马明道觉得此人当时也是一个亡国奴！竟对中国哈吉这样无理，因此寻找机会狠狠回敬了他，把那人气得脸色发白，但自己内心仍然为祖国的不幸、同胞的屈辱感到无比难过。

又如宁夏吴忠马明文阿訇20年代末去麦加时，因为他是普通的中国穆斯林，在船上也遭到洋人的取笑和侮辱性检疫，使他在以后几十年中一直难以忘怀。再如1923年秋王静斋赴麦加朝觐时，"是年中国朝觐人止二十余名，半多西北籍。在未向亚喇法台山出发以前，由喇秀山先生主张制一中华国旗，看作本国同仁目标。因朝觐人不下十余万，抵亚喇法台山扎下帐房后，幕顶上各悬本国国徽，俾出游者望而知返。讵麦加王见我特色国徽，禁不准悬，同仁反抗无术，乃忍辱撤下，虽求与异国之同教弟兄一视同仁竟不可得也。"（《五十年求学自述》）

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中国哈吉也受到各国穆斯林的尊重和厚待。我国的友好邻邦巴基斯坦，近十几年来在协助我国哈吉顺利赴麦加朝觐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产生了许多动人的友好佳话，受到我国哈吉众口一致的称赞。我国哈吉以往在沙迦等地转机时，也在安全检查方面受到优待，表现

了海湾国家对中国的高度信任感。1985年宁夏马飞龙等在朝觐结束参加伊盟在麦加宣传中心举办的报告会和晚宴时，近千人的大厅里除了前几排外，几乎座无虚席，但当他们进入礼堂时，扩音器中即传出："请中国的哈吉前排就座"，一些先来的外国客人，怀着羡慕的神情望着这一批中国哈吉，致使一位中国阿訇噙着满眼泪花对马飞龙说："在旧中国，我们朝觐者有谁理睬，如今我们才亲身体验到我们祖国的伟大强盛。"而侨居沙特的中国华侨，对祖国的繁荣进步分外高兴，当他们听到祖国的巨大变化时，不断念诵"艾勒哈木独林俩西(知感真主)"看到祖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以及流落异国的华侨思念和关心祖国的真情，中国哈吉们都增强了自豪感。虽然远离祖国，但倍觉祖国的伟大、亲切和可爱，一俟朝觐结束，人人盼归心切。当飞机在首都机场着陆后，大家都兴高采烈，互道"艾勒罕木杜林俩习(感赞真主)"，表达庆贺之意。另据甘肃西道堂教长敏生光记述，那次他去朝觐，法赫德国王给每个中国哈吉在正朝费用中补助沙币250元，赠送精装《古兰经》一部。沙特的官员、群众每见中国哈吉，均道色俩目；表示问候和友好，当他们看到身穿短袖衫的中国穆斯林在认真细致地做功课时，赞赏地说："你们是真正的哈吉。"1993年中国在吉达港设立总领事馆后，中国穆斯林赴麦加朝觐的权益更加得到了保障。当年有一位哈吉不慎丢失了护照，要在往年就很麻烦，而这一次就由总领事馆给补办了。因此许多中国哈吉运用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句圣训"爱国属于信仰的一部分"，来表达自己在朝觐中的最深刻体会，他们通过出国实践认识到，祖国的命运和穆斯林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不爱国的人就没有真诚的信仰，也就不能算一个完美的穆斯林。因此穆斯林必须搞

好安定团结，为伟大祖国的繁荣富强，为四化建设作出各自应有的贡献。

其二，通过古今穆斯林朝觐方式的对比，我国各族哈吉都大大开阔了眼界，深感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大多数哈吉都或多或少听说过中国历代穆斯林朝觐者不畏艰险，远涉万水千山前往麦加的动人故事。现在有飞机直抵吉达，前人要走一年半载的路程，现在只用 12 个小时就到达了。这种巨大的变化，不能不深深打动每一位哈吉的心灵，许多宁夏哈吉说："看起来还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搞现代化，否则国家就富强不起来。"又如 1993 年去麦加的国务院宗教局的郭承真哈吉讲述："当飞机飞越山岳江海、沙漠草原时，我想起古代前辈哈吉们，历尽千辛万苦，跋山涉水，月月年年艰难地向麦加进发的年代。比起他们，今天我们可称高速度了。时代变迁，先进的空中飞行器已代替了昔日库尔班的小毛驴，也代替了三宝太监郑和的大船。12 个小时，万里飞渡，世界变得这样小，我们离圣地却比以往什么时候都近。"

许多去朝觐的人是普通农民，他们长期生活在西北偏僻、闭塞的地区，西行朝觐使他们大开眼界，特别是沙特等国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大城市的现代化给他们影响很大。他们目睹了繁华的阿拉伯市场，宏大的宗教活动场面和一些利用现代技术建设起来的公共设施，回国后，不少哈吉向亲友介绍见闻时都提到我们国家现在提倡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中国穆斯林希望祖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让人人都过上富裕的好生活。还有的哈吉如敏生光等进一步认为：要赶上阿拉伯国家的生活水平，我们穆斯林就要发展科学技术，首先本着发展民族教育、提高民族觉悟的宗

旨，努力办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特别是在加强妇女教育，提高妇女知识水平方面，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民族文化水平提高了就能熟练掌握科学技术，就可以像阿拉伯穆斯林一样加快社会发展。

其三，许多中国哈吉通过朝觐增加了法制观念，并更加珍惜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他们看到世界各国 200 多万穆斯林聚集麦加，尽管他们国籍、肤色、语言、教派不同，但都各行其是，互不干涉，和睦相处，秩序井然，认真完成自己的宗教功课。因此宁夏的张忠孝哈吉等深有感触地说："过去我们中国穆斯林拘泥于教派偏见，互相指责，闹不团结的事屡见不鲜，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和民族的发展都很不利。通过这次的所见所闻，可以使我们真正理解政府提出的宗教活动'各行其是，互不干涉、互相尊重'的重要意义，我们宁夏今后要增进教派团结和民族团结，为稳定大局做贡献。"云南文山州砚山县茂隆清真寺教长马新三阿訇也曾发表过类似感想："沙特阿拉伯是个法纪严明的国家，这次我亲眼见到，各教派之间，没有任何争吵，求大同，存小异、互不干涉，大家互敬互爱，见面道安问候，讲文明，讲礼貌，这种风格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当我们撰写完这本追溯中国穆斯林朝觐者不朽业绩的小书时，吉祥的斋月瑞气馀馨犹存；隆重的朝觐盛典又将届临。我们自身至今虽仍无缘亲履圣地麦加，但作为穆斯林青年学子，我们面向天房，凝眸西望，思潮沸腾，浮想联翩。即将起程的中国各族可尊敬的哈吉们！祝福您，恭喜您！全体穆斯林都在向您，也请您向大家互相致以问候与祝愿："安赛俩目——尔莱衣库目！"

后　记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这项于1992年秋列入宁夏“八五”社科规划的重点研究课题。其实，书稿的写作始于五年前，而资料的准备工作，则更要早一些。此时此刻，笔者的心情一半是完成任务后所感受到的轻松感，另一半则是对鼓励、推动、帮助我们履行课题研究的诸位师友的衷心感谢。

从本项目的立意到书稿的写作，始终得到了宁夏社科院副院长余振贵的指导，最后，亦由他协助修改定稿。在为本书收集资料的工作中，我们还得到了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宛耀宾、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兼国内教务部主任马云福、《中国穆斯林》杂志主编兼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秘书长马忠杰、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国际部主任杨志波、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图书馆主任赛生发、宁夏宗教局伊斯兰教处副处长张忠孝及刘景隆先生的热情支持。令我们感激不尽的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安士伟大阿訇特意给本书题词，马云福副会长则对全书作了修改，使本书大为增色。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社科规划办哈坚主任、统战部研究室陆军主任、宁夏社科院名誉院长杨怀中及姜庆和、雷晓静等诸位师友，也为我们提供了众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铁维英　李学忠

1994年12月29日